

凡 例

一 《中共四川党史资料丛书》是以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的主要活动、重大事件为主线，汇编党的历史资料的多卷本丛书。目的是在收集保存历史资料，把党史资料立准立好，为研究和编写中共四川地方党史，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提供准确、完备的资料和可靠的依据。

二 本丛书以历史发展为序，按四川党的主要活动和重大事件列专题，每个专题一卷，每卷一册；少数专题有二——三册。各卷出版顺序按完稿先后定。

三 丛书每卷有综述，介绍该卷反映的活动或事件的始末。主要篇幅是汇编有关的文献档案资料、回忆录、考证和调查材料、报刊资料、历史照片、图表等。丛书选编的历史资料，以我党的资料为主，同时收入有史料价值的友方资料；可资研究参考的国民党方面的资料也予辑录。有的重要文献资料与几个专题有关，为方便读者查阅研究，同时收入有关各卷。

四 丛书选编的历史资料一律保持原貌。原件文字有错讹的，在方括弧中更正。原件文字有缺损的，以□表示。原件经考订有衍文的，有文字错落、意义不明而又难以考订的，有部分缺失的，均在圆括弧内以楷体字注明。原件经考订后增补的文字，在方括弧内以楷体字排印，并在注释中说明增补的依据。

五 选编的历史资料，均按现在规范的标点符号排印。原件

较长又未分段的，由编者分段。这些地方均在注文中说明。

六 一些史实有多种说法现在还难以定论的，经编纂者研究采用其中一种说法。在注文中列明其他说法，供进一步研究。

七 丛书采用公历纪年。在选编的历史资料中，凡采用农历或以民国纪年的，电文中以韵目代日的，均按原件排印，在注文中注明公历年、月、日。

八 丛书使用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选编的历史资料均按简化字排印；个别情况下使用简化字可能引起误解的，保留繁体或异体字。

目 录

总序.....	杨 超 (1)
凡例.....	(1)
综述.....	(1)
一 中共中央有关文件	
中央致四川临委信 (节录)	(27)
中央给四川临委信 (节录)	(29)
中央致四川省委信 (节录)	(33)
中央关于军事工作路线给四川省委并转军委的信 (节录)	(40)
中央给四川省委的指示信 (节录)	(47)
中央致四川省委信 (节录)	(51)
二 中共四川省委有关文件及各地党组织给四川省委的报告	
省字通告第七号 (农字第一号)	(63)
省字通告 第廿一号 (农字第二号) (节录)	(66)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	(68)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	(71)
中共四川省委军事委员会复梁山函.....	(77)
中共四川临时省军委关于军运致中央报告 (节录)	(79)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致綦江函.....	(85)
中共四川临时省军委制订的四川军事运动计划.....	(87)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拟订的四川暴动计划.....	(97)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文件（节录）	（101）
中共四川省委制订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	（105）
刘坚予：《四川政治及党务报告》（节录）	（127）
中共川南特委扩大会议关于政治问题决议案	（129）
中共川南特委扩大会议关于农民运动问题决议案	（132）
中共川南特委扩大会议关于兵士运动问题决议案	（137）
中共川南特委扩大会议关于宜宾暴动问题决议案	（140）
中共川南特委扩大会议关于南溪暴动问题决议案	（143）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文件	（147）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通告第七号	（151）
怡生特委给省委报告	
——军事形势和军事工作的布置（节录）	（158）
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告四川全体同志书	（161）
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农民运动	
决议案（节录）	（176）
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四川政治形势和	
党的任务决议案（节录）	（193）
四川省军委通讯伟字第一号、觉字第二号（节录）	
——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策略总路线的指示	（216）
为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全旅兵士举行革命兵变宣言	（222）
中共川西各县代表会议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226）
中共川西各县代表会议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	（238）
C·Y川西扩大会议关于农村青年工作决议案（节录）	（249）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荣县农民斗争经过致中央	
报告（节录）	（255）
四川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失败的	
决议案（节录）	（268）
中共四川省委刘坚予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273）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农村斗争战术的指示·····	(275)
中共四川省委致二路红军游击队前敌委员会信(节录)·····	(280)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四川军事工作致中央报告·····	(292)
四川省军委致中央报告	
——六至九月工作大要(节录)·····	(303)
中共四川省合川县行委:《合川地方暴动概略》·····	(307)
内江农民协会秋收斗争宣言·····	(310)
中国共产党内江县执行委员会为秋收告农民书·····	(312)
涪陵县县民抗捐同盟大会通电·····	(314)
中共巴县党、团执委会印发的革命口号·····	(317)

三 各地武装斗争简介

南溪农民暴动·····	(319)
宜宾农民暴动·····	(325)
邻水农民暴动·····	(326)
武隆桐梓山游击队·····	(329)
涪陵天宝寺农民暴动·····	(334)
川南工农革命军独立团·····	(337)
潼南兵变·····	(343)
万县兵变·····	(346)
涪陵罗云坝农民暴动·····	(349)
绵竹农民暴动·····	(352)
武隆火炉铺农民暴动·····	(356)
射洪农民暴动·····	(358)
涪陵金银乡农民暴动·····	(361)
丰都农民暴动·····	(364)
雅安农民暴动·····	(368)
潼南赤卫队·····	(370)
平民革命军·····	(372)

万源固军坝起义·····	(378)
荣县“五二五”事件·····	(386)
遂蓬起义·····	(390)
涪陵抗捐军·····	(398)
宜宾大塔农民暴动·····	(403)
彭水武装起义·····	(406)
涪陵罗云坝起义·····	(410)
遂宁吉祥寺武装起义·····	(415)
梁达虎南农民暴动·····	(419)
合川兵变·····	(422)
江津兵变·····	(427)
铜梁土桥农民暴动·····	(433)
荣县农民暴动·····	(438)
广汉兵变·····	(442)
彭山公义场农民暴动·····	(449)

四 回忆资料

川党内战大事记(节录)·····	程子健 (453)
制订南溪农民暴动计划的回忆·····	赵之祥 (455)
回忆邻水农民暴动情况·····	危石顽 (457)
回忆涪陵天宝寺和金银乡农民暴动·····	皮斌 (459)
凌霄血战·····	张国忠 (463)
涪陵罗云土地会情况·····	刘贵方 (466)
关于绵竹“七四”事略追述·····	丁毅 (467)
绵竹农民暴动前后·····	骆是愚 (470)
武隆火炉铺农暴点滴情况·····	邵益阳 邵征先 (471)
1928年丰都农民起义·····	朱挹清 (472)
我所知道的秦伯卿情况·····	谷志标 (476)
秦伯卿等人被处决的情况·····	张明才 (477)

- 回忆大塔农民暴动……………曾特生 (479)
- 回忆彭水武装起义……………郭德樵 (482)
- 四川第二路红军游击队始末……………石大斌 (485)
- 吉祥寺的枪声……………蒲善全 (488)
- 回忆梁(山)达(县)边境三次武装斗争(节录)……………李 维 (490)
- 参加江津“九三”兵变的经过……………苏爱吾 (495)
- 关于“九三”兵变的点滴情况……………张志和 (497)
- 我所了解的“九三”兵变……………洪沛然 (498)
- 铜梁土桥武装起义情况的回忆……………彭如春 (500)
- 回忆“广汉起义”(节录)……………刘连波 (502)
- 对彭山农民运动的回忆……………李蕴璞 (510)

综 述

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四川党组织遵循这一方针，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建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向军阀、土豪劣绅展开了前仆后继的英勇的斗争。

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蓬勃高涨的四川工农革命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军阀土豪劣绅更加残暴的统治，促使阶级矛盾愈加尖锐。

四川军阀自1918年至1935年间，形成了所谓“防区制”。大小军阀按其实力强弱占据数县至数十县的地盘作为防区，在其防区内任意委派官吏，征收赋税，印发货币、公债，造武器，办报纸，拥兵称雄，各自为政，俨然独立王国。

军阀之间为扩大势力连年混战，在十多年间四川发生大小战争四百七十多次。1932年刘文辉与刘湘等军阀混战，双方出动兵力二十余万，历时数月，殃及数十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惨重损失。军阀们为维护与扩大防区而争相发展武力，到1935年川军各部共达四十万人枪；军阀的另一支柱——民团武装，此时更达到百万之众。维持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需要庞大的经费，其来源只能是对人民的掠夺。1916年，四川财政收入预算为一千一百五

十五万一千零五十元，军费开支为六百零二万四千零七十八元；十年以后，收入增加三倍多，为四千三百六十万零三千八百五十三元，军费开支则增加六倍多，高达三千八百八十万零三千八百五十三元。到1934年，仅军阀刘湘财政收入即达七千二百三十一万六千六百元，军费支出为三千万元^①。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一个军阀的搜刮数量，竟比全省总收入超出了近六倍，而同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却并没有提高。在军阀的财政收入中，田赋预征居首位。他们将一年一征的田赋增加到一年数征或十数征。例如安县，1925年到1934年的九年半中，竟征田赋八十八年半，平均一年近十征。1935年，二十一军防区有的预征田赋到1991年，川陕军防区已征到百年以上^②。军阀还强迫农民种植鸦片，课以重税，不种者则抽懒捐。1926年全省烟税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四，以后逐年上升。杨森的二十军防区，1930年烟税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五九。田頌尧的二十九军防区干脆将烟税摊入田赋一并征收。安县1926年烟税为三万五千元，1927和1928两年按田赋一年之数摊烟亩捐年征七万八千元，1930年又增为按一年半田赋征烟亩捐十一万七千一百一十八元五角^③。

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1925年据六十县统计，苛捐杂税已达九十余种，以后逐年增加，到1935年防区制结束时，裁去的苛捐杂税就有一百二十四种之多。地方团甲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更难以统计。

极为苛酷的压榨，加上天灾病疫，军阀混战加速了农村的破产，市镇的凋零。农村自耕农逐年减少，而佃农却逐年上升；还

① 吕平登著《四川农村经济》，商务印书馆民国廿五年初版(下册)16—17页。

② 《四川农村经济》478页。

③ 《四川农村经济》521页。

有大批的农民被迫脱离土地，或自发地揭竿而起，或投入兵“匪”行列，或转为佣工。以荣县为例：

年 度	全县人口	农村人口
1923年	484501人	368150人
1933年	472274人	238508人

十年间农村人口减少了十二万九千多人，占了三分之一左右^①。连中小粮户也经不起军阀土劣的压榨。将田契缴入官府或弃田而逃者，时有发生：荣县董家场、老龙场、雷音寺三地调查，将田契交官或弃田逃亡者达二十五户；雷音寺粮户虞克纯有数十亩田产，也弃业远逃以避苛捐^②。苛政猛于虎，人民走投无路，只有起而反抗以求生存。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的方针反映了四川人民的要求，革命运动又迅猛发展起来。

从1927年到1935年间，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四川共发动武装斗争六十九次。这些武装斗争，具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在组织农民协会基础上，由抗捐抗粮、抗租抗税发展为武装斗争；一是党在军阀部队中进行工作，发动革命兵变；一是农暴与兵变相结合举行武装起义；一是红军主力与地方游击队结合开展斗争。随着党在各个阶段的任务不同，其作用和意义也不一样。多数斗争发生在敌人统治薄弱的边远山区，也有的是在临近敌人控制的政治、军事中心，涉及范围上百县，震动全省，有的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但这一时期四川的武装斗争，由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又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以参加斗争的干部和群众大多缺乏斗争经验，因而多数都失败了。有的尚未准备充分便仓促

① 《四川农村经济》331页。

② 《四川农村经济》84页。

起事，很快就遭到失败；有的刚刚准备就绪，因事机不密而被敌人抢先镇压，归于失败；有的武装起义取得了初步胜利后，被敌人围剿而失败；部分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由于坚持了创建根据地，实行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而获得了成功。这些斗争都给予敌人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扩大了党和工农革命的政治影响，教育并团结了人民，播下了革命种子。特别是有部分武装斗争，直接配合了红四方面军和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四川的斗争，积极支援配合了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英勇斗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此，这一时期四川武装斗争是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篇章。现将这些斗争史实按阶段简述于后。

一、八七会议后四川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 (1927年8月至1930年底)

(一) 贯彻八七会议精神阶段 (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派傅烈、周贡植等到重庆，建立了以傅烈为书记的中共四川临时省委。10月，临时省委在重庆召开紧急会议，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并通过决议案，完全接受中央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给农民”，“领导他们从抗税抗捐抗租抗粮的斗争，一直发展到暴动夺取武装，夺取政权”的决定。临时省委还成立了省军委领导全省武装斗争，制订了一系列有关武装斗争的文件。11月20日拟订了《四川军事运动计划》。27日又拟订了《四川暴动计划》。在计划中明确提出“以农民暴动为中心，土地革命为目的”，做好农运、军运以及民团和土匪工作，以保证武装斗争的进行。这些文件贯彻了党的八七会

议精神，给四川武装斗争指明了方向。1928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并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制订了《四川暴动行动大纲》。这个大纲对暴动的意义、条件、目的、形式、时机、区域、旗帜、口号、宣传、组织以及建立政权、政纲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是指导全省暴动的文件。但因受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暴动大纲中也作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决定。

1928年3月到1929年2月，四川党先后领导农民暴动和兵变共十五次，即1928年4月的南溪农民暴动，宜宾农民暴动，邻水农民暴动；1928年春的武隆桐梓山游击队的斗争；夏初的涪陵天宝寺农民暴动；6月的川南工农革命独立团的斗争，潼南兵变，万县兵变和涪陵罗云坝农民暴动；7月的绵竹农民暴动，武隆火炉铺农民暴动，射洪农民暴动；9月的涪陵金银乡农民暴动，丰都农民暴动；1929年2月未遂的雅安农民暴动。

这个阶段的武装斗争，有的还未准备就绪，即因事机不密而遭敌人抢先镇压。如1928年6月13日万县党组织策动杨森部队举行兵变，尚未发动就被叛徒告密遭到镇压，领导人曾润百、雷震寰等十四位同志被敌人集体屠杀。1928年4月的宜宾暴动，在爆发之前，宜宾县委的主要负责人被敌人杀害，起义受到破坏。有的武装起义已取得初步胜利，但随即遭到强敌的进攻和镇压而失败。如1928年7月，中共绵竹县委在发动农民进行抗捐斗争基础上，由黎冠英、王干青等领导的绵竹农暴，有农民群众数百人参加，在围攻县城时，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黎冠英等在撤退途中被敌人杀害，致使起义失败。又如1928年9月，丰都临时县委领导崇德乡数千农民在观音寺举行武装起义，后聚集于栗子寨，遭到敌人一个团的围攻，经三天激战后失败，领导人陈光鑫、

甘禹疏等牺牲。

在这一阶段组织领导较好，坚持时间较长，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是川南特委领导下的南溪农民暴动和川南工农革命军独立团的武装斗争。1927年，南溪县农民积极作了暴动准备，次年4月在牟坪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暴。起义军命名为“川南工农革命军”，设立了总指挥部，川南特委派曾君杰、袁敦厚等参加领导，参加斗争的农民达五六千人。后遭到强敌镇压而失败，总指挥曾君杰英勇就义。这次斗争积累了经验，培养锻炼了干部和群众，为后来川南工农革命军独立团的斗争创造了条件。1928年5月，省委派陈泽煌到宜宾七星山召开紧急会议，到会者二十余人多是曾经参加南溪暴动的骨干。会议通过了《当前形势和宜南联合暴动失败的经验及今后的任务》，提出“保存力量，继续战斗”，决定正式成立川南工农革命军独立团游击队。参加过南溪暴动的王泽嘉担任团长，袁敦厚负责党的工作，制定了行动纲领和八条纪律。独立团游击队成立后，转战川、滇、黔边境，打了许多胜仗，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反动政府。后来游击队发展到三百多人，改名为川南地下游击队，王泽嘉任团长，袁敦厚为政委，先后粉碎了敌人六县团防会剿。1929年冬，游击队在兴文县凌霄城（山名）建立了根据地，顶住了优势敌人的多次围剿，一直坚持到1930年6月，终因强敌长期围攻而失败。

南溪暴动和川南工农革命军独立团的斗争，在川南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为后来川南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以及1935年初川南游击队的建立和斗争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武装斗争，为党建立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为开创革命根据地，作出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经验，培养、锻

炼了革命骨干。

（二）贯彻党的“六大”精神阶段（1929年3月至1930年7月）

1929年2月15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刘愿安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3月26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发出《通告第七号》，根据“六大”精神结合实际情况部署了四川的工作。通告指出当前革命受到“暂时挫折”，但是“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到来，而且是很快的到来”。但是主观的力量太薄弱，目前四川党的总任务是“夺取广大群众，准备将来的武装暴动。”“工作重心应该是几个重要的城市”，但是，“要努力实现地方暴动和地方政权之建立。”随后，省委在《关于农村斗争战术的指示》中指出，农民群众“对于革命要求非常迫切，是工人阶级巩固的同盟军”，“农运工作在目前工作中占重要位置之一”。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四川省委积极领导了全川的革命武装斗争。

在这一阶段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共十一次，即1929年3月潼南赤卫队的斗争；春，平民革命军的建立；5月万源固军坝起义和荣县“五二五”事件；6月遂蓬起义；7月涪陵抗捐军的斗争；9月宜宾农民武装抗租斗争；1930年3月彭水武装起义；4月涪陵罗云坝起义；6月遂宁吉祥寺武装起义；7月梁达虎南农民暴动。下面对主要几次武装斗争简述。

1929年3月，“潼南赤卫队”正式成立，周世力任队长，江涛任党支部书记。赤卫队活动于潼南的茶店、太平，合川的三庙、龙凤等地，打土豪、惩恶霸、袭团防、劫监狱，多次打退敌人的“围剿”。赤卫队一度发展到六七百人，坚持游击活动三年多。1932年4月，因领导人被敌诱捕，遭敌人围攻而失败。8月

12日江涛、周世力等被敌人杀害于潼南。

1929春，共产党员秦伯卿在忠县石宝寨发展农民武装六七百人，正式打出“平民革命军”旗帜，并改造了川鄂边区的神兵“大刀会”。这支农民武装活跃在川鄂边境的石柱、忠县、利川一带，数次攻打石柱西界沱和万县武陵镇，击败了团防队伍，提取了武陵区团练局的枪支，没收了镇上富商的财物。同年10月，平民革命军遭川军二十军第三师围攻，虽受到损失，仍坚持分散斗争。1930年8月秦率部参加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同月，第三路游击队失败后，秦率余部在石柱西界沱继续坚持斗争。10月，正式打出“共产军”的旗帜。12月7日，秦率部从西界沱向湘鄂西进军，准备同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汇合，沿途接收了一些地方武装，收编了几支绿林队伍，部队扩大到数千人。月底，部队到达湖北五里坪，加入了红二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二路军。这是党的“八七”会议后，四川武装起义部队同主力红军汇合的第一支部队。可惜，由于当时红二军团有的领导人推行“左”倾政策，以国民党改组派、假共产党之名杀害了秦伯卿。

1929年5月12日，李家俊、唐伯壮领导千余农民自卫军在万源固军坝宣布起义，组成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李任司令员，唐为政委。8月军阀刘存厚部廖雨辰率三个营来攻，游击队采取“诱敌深入”与“飘忽”的战略战术，于10月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省委派李哲生、徐允士等前来加强领导，王维舟又策动前来围剿的魏邦文师两个连举行兵变投向红军，起义部队发展到二千余人，枪八百多支。年底，又粉碎了敌人两个团的第二次围剿。这时游击队已建立了城（口）、万（源）、宣（汉）三县边境五个区二十多个场镇，约二百平方里土地、六万余人口的根

据地，并开展了土地革命。1930年3月，刘存厚又调集五个团的兵力，加上民团共万余人，对根据地采取层层进逼、步步为营的办法，进行“普剿血洗”。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根据地不断缩小，坚持到1930年6月，轰轰烈烈的起义遂告失败。

1929年5月25日，荣县县委发动农民在双石桥召开抗捐斗争大会，参加者达一千多人。县知事派便衣马弁当场逮捕农协领导，枪杀农民敢死队员三人。事件发生后，荣县东南区农民在县农民协会领导下，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到处袭击地主住宅，镇压反动土豪团总二十余人，收缴了地主武装二百多支步枪，并编成了一支游击队。根据省委指示，在斗争取得一定胜利后，县委及时组织退却隐蔽，待刘文辉派一个旅的兵力下乡挨户搜捕时，游击队没有受到损失。

1929年6月29日，川军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旅长旷继勋率全旅官兵二千余人，在遂(宁)蓬(溪)边界举行起义。早在1926年共产党就在该旅建立了组织，旷继勋等一些军官先后加入了党。后来四川省委又派罗世文、邹进贤等到该旅组织起义，成立了中共“怡生特委”和四川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总指挥旷继勋、党代表罗世文，特委书记邹进贤。起义时印发的《为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全旅兵士举行革命兵变宣言》中指出：“这是四川国民党军阀统治崩溃的开始，这是四川工农革命成功的信号！”起义军计划到川东与李家俊领导的一路红军游击队会合，在攻下蓬溪县城后经西充、南部、营山、巴中、渠县、达县等地，沿途向群众宣传，并开展打土豪斗争，起义军发展到三千余人。7月13日攻打梁山猫儿寨未克，遭到军阀部队截击，后在达县万家坝、碗厂沟一带被敌围攻，起义失败。这次起义促使了军阀部队的分化，此后，革命兵变不断发生。

1929年7月，张光瑩、周晓东将涪陵的农民武装、民团、神兵等组成抗捐军。川军郭汝栋所属两个连也起义加入，抗捐军发展到三千余人。8月20日围攻涪陵县城未克，后遭敌人围攻失败，张光瑩壮烈牺牲。余部坚持到1930年春。

1929年9月，宜宾大塔乡二千多农民参加了抗捐斗争。9月3日，农民赤卫队四百余人围攻驻军驻地，敌假称答应农民要求减租，同意解除武装等，以蒙骗赤卫队，赤卫队撤围后，即遭敌残酷镇压，三十多人英勇牺牲。

1930年4月7日，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在涪陵发动罗云坝农民起义，赵启民带两排士兵到罗云，联合组成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李鸣珂，党代表苟良歌，前敌指挥赵启民，农民赤卫队司令尹颢阳。游击队转战于涪陵、武隆、丰都、石柱、彭水、忠县交界的广大地区。1930年5月，红军游击队攻占了丰都栗子寨，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各地农民赤卫队纷纷来栗子寨会师，红军游击队扩大到三千多人。后来，因遭强敌围攻，游击队撤出根据地，转战于石柱，在鱼池坎遭敌围攻而失败。

这年7月，由覃文、李光华、蔡奎等领导的梁山县（今梁平县）虎城乡、达县南岳乡的农民武装共千余人起义，在忠县黄钦坝组成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游击队成立三天后在李立三“左”倾错误影响下，即受命东进，会师武汉，8月中旬进至石柱县西罗坪，遭敌围攻而失败。

这一阶段中共四川省委贯彻了党的“六大”精神，较为正确的领导了四川的武装斗争，无论在组织、领导、计划、策略，以及斗争中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比前一阶段有所发展和提高。虽然多数武装斗争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是，通过这些斗争，积累了

武装斗争的经验，锻炼了干部和群众，打出了四川红军的旗帜，实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几块小型的游击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在四川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贯彻李立三“左”倾错误阶段（1930年7月至1930年底）

1930年7月，中央派余乃文到四川任省军委书记，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以及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集中红军“会师武汉”的计划。7月25日到28日，省军委在江津召开全川军支联席会，决定将全省划为五个军区，组织十七路红军。丰、涪、梁、万以东为第一军区，以梁、万为中心；武胜、潼南、合川以东为第二军区，以重庆为中心；荣县、威远、资中以南为第三军区，以自贡为中心；金堂、德阳以西为第四军区，以成华为中心；川北为第五军区，以顺庆为中心。在第一军区内已有一、二路；梁山发动第三路（第四路不明）；江津兵变为第五路；重庆为第六路；合川为第七路；邻水为第八路；荣、威为第九路；自贡为第十路；宜宾、南溪为第十一路；南六县为第十二路；绵竹为第十三路；彭山为第十四路；汉州、成都为第十五路；广安、岳池为十六路；蓬安、营山为第十七路。以上限三个月内发动，然后会师重庆，进攻武汉。省委在《关于四川军事工作致中央报告》中，报告了四川军阀及民团、土匪的情况，以及各地农民斗争情况；还批评了各地方党部忽略兵士运动的倾向。省委于8月2日召开扩大会议，贯彻推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决定将党、团、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以便领导各地武装斗争。在近半年之内省行委发动了三次兵变，三次农暴。即：合川兵变，江津兵变，广汉兵变，铜梁农暴，荣县农暴，彭山公义场农暴。

合川兵变：1930年8月，合（川）武（胜）行动委员会计划发动合川驻军兵变，因事泄未遂。但为策应这次兵变，合川狮滩区委组织了三百多农会会员，于8月20日晚在狮滩场举行了“秋收起义”，攻打团防局长的庄园，终因孤军无援而失败。12月，省行委又派曾海元、邓止戈等去合川陈书农师策动兵变，因叛徒出卖，兵变尚未发动便遭敌人镇压而再次失败。

江津兵变：国民党二十四军第一师驻防江津。这个师的副师长张志和（张清平）是共产党员，有两个团为我党所控制，成立了军支。省行委派苏爱吾、于渊等到该师发动兵变，拟建立第七路红军游击队。1930年9月3日兵变爆发，遭到敌人镇压，于次日失败。

广汉兵变：1930年10月25日省行委派廖恩波、川西行委派刘连波领导驻广汉的国民党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两个团三千多人举行兵变，组成红军二十六路军第一路。起义后即向什邡、绵竹进发，拟与当地农民游击队会合。因进攻绵竹县城未克，遭到镇压，历时一周的起义遂告失败。

彭山公义场农暴是为了配合广汉兵变，于1930年11月2日在党组织领导下，由一千多农民举行的武装暴动，拟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由于广汉兵变失败，敌人加强围攻，这次农民暴动很快失败。

四川党在李立三“左”倾错误领导期间发动的六次武装斗争，特点是仓猝起事，瞬即失败，牺牲很大。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条件不具备，准备不充分，进行中指挥失误等。江津兵变失败后，被捕百余人，被杀者四十余人。在李立三错误影响下，四川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全省党员由四千多人减至一千五百人。

二、配合主力红军在四川的斗争和长征

(1931年至1936年)

(一) 支援川陕、湘鄂川黔苏区，四川各地武装起义蓬勃兴起（1931年至1935年）

党在这一阶段领导四川人民进行了二十九次武装斗争。1931年有川东游击军，华蓥山武装斗争。1932年有南江平民军，德阳孝泉兵变，南部升保农民暴动。1933年有蓬溪东乡民众自救团，三台柳池农民暴动，苍溪苟英寨农民暴动，盐亭保安大队兵变，南充西区农民暴动，苍溪三堆石农民暴动，阆中老观农民暴动，上川南抗捐军，黔江红军游击大队，安县保卫团兵变，中江文家桥农民暴动，遂(宁)安(岳)农民暴动。1934年有涪陵土地坡农民暴动，盐亭农民游击队，越西农民暴动，酉阳红军游击队，万县第二次兵变，崇庆分州兵变，叙永游击队，南六^①游击队，青神西山农暴。1935年1月有剑阁兵变，云阳武装暴动，峨眉武装起义等。对主要武装斗争情况简述如下：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1933年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2月贺龙率红三军入川，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活动，1934年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两大苏区的建立，使四川革命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从1932年起，四川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又蓬勃兴起，主要是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和支援苏区的斗争。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解放通江，中共四川省委即于12月27日、29日接连发出通告，指示各地党部支援红军。1933年1月省委作出巩固和扩大川东游击队，积极配合红军的决定。接着发出一系列通知和指示，要求各地在城市发动工人开展经济斗争，

^① 南六，指川南地区的高县、珙县、兴文、庆符、长宁、筠连六县。

停运军火，破坏交通桥梁；在农村发动农民，反对军阀拉丁派款，开展抗捐抗税和游击战争，扰乱敌人后方，以配合主力红军的斗争。由于有两大苏区为依托，得到了红军的支援，地方党组织也总结了前一阶段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实行了正确的领导和策略，因而一部分武装起义取得成功，并与主力红军汇合，参加了巩固和扩大苏区的斗争。其中，最重要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是川东游击军。

川东固军坝农民起义和虎南（梁山县虎城乡、达县南岳乡）农民起义受挫后，1931年5月28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会议决定“重组川东游击军，王维舟任川东军委书记兼总指挥，发动第三次游击战争”。王维舟回大山坪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省委决定，总结前几次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制定了对敌斗争的方针和策略。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极力避免打阵地战，实行正确的统战政策等等。并决定以井岗山为榜样，建立以大山坪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早在这一年春，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省委决定成立了梁山中心县委，直接领导梁山、达县、开江、大竹、宣汉、万源等地党的工作，由曾莱任书记，加强了同川东军委的联系，对革命起了推动作用。川东游击军重建之后，下设三个支队。第一支队在曾莱、蔡奎等领导下，在虎南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后曾莱等被内奸暗害，梁山中心县委被破坏，省委派张云禄、盛一平重组梁山中心县委，张云禄任书记，继续领导和扩大游击战争。经过几个月的斗争，革命队伍和赤区都有所发展。由于敌人的围攻和内奸的破坏，斗争再次受挫，蔡奎壮烈牺牲。1931年夏，游击军第二支队由王维舟和杨克明一起组建，乔典丰为支队长，在开江县广福场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一段时期的斗争，队伍发展到数

百人，枪一百多支，游击区也得到扩大。1932年7月，在敌人围剿清乡的险恶情况下，支队为保存实力决定停止活动，人员分散隐蔽。游击军第三支队由王维舟兼队长，以大山坪为中心，在宣汉、万源、达县和平昌部分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支队下还成立了“锄恶团”、“去毒军”等武装组织，开展除恶除奸斗争，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同时，在农村以农会为中心，广泛地发动群众建立了不脱产的赤卫队、儿童团、妇女会。在城镇也建立了各种群众团体，开展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作。利用敌人内部军政矛盾，宗派斗争，争取和控制武装力量，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他们还采取打入敌人营垒，掌握敌人政权，掩护革命活动等一系列的斗争策略，使游击军得到巩固和发展。

1932年夏，省委决定将梁山中心县委改为梁达中心县委，杨克明任书记，领导梁山、达县、宣汉、万源、开江等县工作。梁达中心县委的成立，加强了对游击军和地方工作的领导。

1932年底到1933年二月初，红四方面军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川东的革命形势也起了根本变化。军阀急将部队北调，造成后方空虚，给扩大和发展游击军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省委及时向川东游击军指示：迅速动员一切力量，大力恢复和发展农民群众组织，猛烈扩大游击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配合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在敌后狠狠打击敌人，争取早日与主力红军会合。王维舟根据省委指示，召集军委会讨论决定扩大各种群众团体，动员青壮年踊跃参加游击队，迅速扩大革命武装；将游击军主力转入宣汉、达县、万源、城口，接近主力红军前沿地区，以牵制军阀刘湘、刘存厚兵力，使红军迅速向南发展。会合游击队再次进行整编，宣汉西北地区编为第一支队，宣汉东部地区编为第二支队，达县、梁山编为第三支队。整

编后各支队积极贯彻军委的各项决定，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扩大游击军。

1933年，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宣(汉)达(县)战役”，川东游击军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战争开始后，游击军在宣汉、万源、通江、达县之间的地区以及敌人的后方袭击敌人，对溃逃到南坝、清溪场、黄金口、天先场等处之敌进行了有力的截击，缴获许多武器弹药，增强了游击军的实力。在这次战役中，川东游击军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同时，宣达战役的胜利，也帮助了川东地区党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很短时间内，川东地区武装游击队发展到数万人，成为支援川陕苏区的重要武装力量。

1933年10月宣达战役取得胜利，刘存厚部队被击溃，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川陕革命根据地与游击区联成了一片。通过这次战役，川东游击军发展到一万多人，随即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从此，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转战川陕，反击刘湘的六路围攻，参加伟大的长征，为巩固川陕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川北革命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在党的领导下，川北人民的武装斗争如燎原之势，此伏彼起。川北南部升(钟寺)保(城)地区党的力量强，群众基础好，特别是余岱生(于江震)等发动领导抗租抗捐斗争后，群众革命情绪高涨。升保地区地势险要，敌人内部矛盾也很激烈。早在红四方面军即将入川之前，省委已派覃文到南充中心县委组织领导升保农民武装起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1932年11月，在南充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举行了著名的“升保”起义。起义的武装队伍有二百多人，群众达一千多人，成立了游击队(后改名为川北工农红军)，

队长张友明，政委覃文，军事指挥罗敏（罗南辉）。起义的行动纲领是抗租抗息，抗捐抗税，破仓分粮，推翻军阀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起义后，在升保地区掀起了革命风暴，参加群众达数万人，震动了全川北。12月，四川大、小军阀和反动头目，拼凑反动武装，对起义军进行疯狂的围攻，加上革命主观力量准备不够和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起义军受到重大损失。为了保存实力，指挥部决定分散突围转移。12月4日，张友明转移到南江任伟章部做军运工作。

1932年5月，田頌尧部旅长任伟章和共产党员李载浦在渠县秘密建立“平民军”，活动于南部、西充之间，发动群众抗捐抗税，相机打团防，夺枪支。8月，平民军发展到千余人，任伟章任司令，谭席贞任副司令，李载浦为参谋长。根据省委指示，部队转移到南江桃园寺建立根据地。1932年9月，平民军更名为川北民众救国义勇军（简称川北民军），队伍不断扩大，发展到一千六七百人。升保暴动失败后，张友明转移到南江，任川北民军参谋长。红四方面军进至南江时，即派干部同川北民军联系。1933年1月19日，任伟章在桃园寺率川北民军三千余人投入红军，编为红四方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任伟章，参谋长张友明，政治部主任李载浦。改编后参加了“尖山战役”和粉碎田頌尧向苏区发起的三路围攻，战果显著。1933年4月，因张国焘搞肃反严重扩大化，任伟章等干部不幸被陷害，独立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后来这个团的第五连编入川陕游击队，在南江桃园寺继续坚持斗争。

在红四方面军的支持下，川北地区武装斗争取得成功的，还有苍溪苟英寨等地的农民暴动。1930年以来，苍溪苟英寨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发动和组织起来。1933年2月正式成立了七十

多人的游击队，党派曾参加“升保”游击队的陈洪钧任指导员，陈子谦任队长，下设三个排。他们以苟英寨为基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队伍迅速扩大。4月，游击队发展到五百余人，游击区也扩大到新观、雍河和龙王等地区。5月，游击队同红四方面军驻通江部队取得联系，得到了王树声领导的红三十一军的帮助。这支游击队曾多次配合红军打击敌人，屡立战功。1933年6月改编为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七七一团三营特务连。

1933年4月，苍溪党组织领导了三堆石农民暴动，参加起义的有四百多人，二百多支枪，推翻了当地国民党反动政权，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后来，游击队改编为红四方面军三十军独立营。7月，这支革命武装扩大到一千二百多人，又改编为独立团；11月，编入红三十军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以后参加了长征。

在川东南，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也有发展。1933年底，贺龙率红三军攻占黔江，不久大部队撤离，龚昌荣率领的红三军第二特科大队活动于湘鄂川边开展游击斗争。1934年4月，第二特科大队改称黔江红军游击大队，龚昌荣任大队长。6月，红三军主力进入酉阳南腰界，很快帮助酉阳农民建立起了四个游击大队，有队员三百余人，均编入红三军川黔边独立团。黔江和酉阳红军游击队以后编入红军黔东独立师，在主力红军的帮助下，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抗租抗税，并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屡立战功。1934年11月，主力红军东进湘西后，这两个红军游击队仍在川黔边坚持游击，后在敌人重兵围剿下失败。

与此同时，中共四川省委还领导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四抗”（即抗丁、抗捐、抗粮、抗债）斗争。“四抗”斗争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团结和发动了广大群众，斗争声势越来越大，直至发展到武装斗争。省委对

开展“四抗”斗争的指导思想明确，并实行了正确的领导。1933年2月19日省委制订了拥护川东北红军入川的宣传大纲，明确提出“我们必须针对国民党的一切欺骗剥削和增加苛捐杂税……反对增加一个钱的捐税去进攻红军”，“从抗租、抗粮、抗债、吃大户、破仓分粮去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去促进群众的阶级觉悟，发动农民的游击战争”。此后，还多次发出指示。省委认为“广泛的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抗捐斗争，是粉碎军阀刘湘‘围剿’川陕苏区最中心而有效的工作”，特别是邻近川陕苏区各县必须抓紧进行。各地根据省委指示广泛开展了“四抗”斗争。在川北方面，声势较大的是中江、盐亭一带的武装抗捐抗粮斗争。中江、盐亭邻近川陕苏区，是军阀田頌尧进攻红军的后方基地。田頌尧为筹集“剿赤”经费和粮食，大肆搜刮民财，民怨沸腾。中江的农民群众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1933年12月在文家桥开展了武装抗捐斗争，杀了提款委员，焚毁田契租约，破仓分粮。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赤卫队，中江北部的泥金、会棚、永太等乡基本赤化，“四抗”运动迅速波及全县以至邻近数县。盐亭以龙潭子山区为中心也开展了“四抗”斗争，从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抗捐抗债斗争遍及全县，农协会、抗债团、川西北抗捐大同盟等群众组织迅速发展，还组织了三百余人的农民武装“工农前卫团”，打击土豪劣绅和提款委员，开展了游击活动。

1933年6月，阆中老观乡三四百农民在共产党员彭蕴山领导下举行暴动，攻打区政府，推翻乡政权。暴动胜利当天，红四方面军八十九师派出代表到达老观，军民共庆胜利，并将老观编为川陕苏维埃长池县第十一区。起义队伍一部分参加了红军，一部分组建成“川陕省游击队独立营”，保卫当地新生革命政权。

在川西方面，影响最大的是邛崃抗捐军，它由武装抗捐发展到建立游击队，打出四川红军旗号，长期坚持了游击战争。1932年11月，在党领导下，邛崃成立了“上川南抗捐大同盟”，发出了宣言、通电、公函、布告、口号以及《抗捐大同盟斗争纲领》、《敬告各县民众书》等。1933年夏，在省委领导下，邛大蒲地方党组织秘密组建了邛崃抗捐军，孟光远任总司令，下设第一、第二路军，拥有五百余人枪。6月26日，抗捐军率领革命群众二千多人在邛崃王店举行武装起义，正式打出了抗捐军的旗帜。7月，省委派余宏文（化名陈伯峦）任抗捐军政治委员，加强领导，改名川康工农红军游击队，先后转战于邛（崃）、大（邑）、蒲（江）名（山）、洪（雅）等县，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斗争，建立游击区。9月下旬，抗捐军进驻总冈山。11月，敌人对抗捐军进行围追堵截，部队受到很大损失。为了保存实力，游击队将枪弹暂时收藏起来，人员分散转移。1934年1月，余宏文率领抗捐军余下部队回大邑王泗，取出武器，重新组织战斗。是年春夏，在党的影响下，敌“邛雅清乡司令总部”一营士兵在金龟山起义，与抗捐军会合。8月，抗捐军改名为川康边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余宏文任大队司令，曾海云为省委驻游击大队的特派员，继续在邛崃、蒲江、名山、大邑、芦山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时，组建了中共邛大游击特区区委，余宏文任区委书记。游击队发动群众抗粮抗捐，打击土豪劣绅，有的地区还进行了土地革命。是年秋冬，敌人调动十五个县的驻军和团队，轮番向游击队进攻，我游击队进行了英勇的反击。但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省委特派员曾海云、游击队领导人余宏文、侯伯英等先后被捕壮烈牺牲，邛（崃）大（邑）县委和游击队又遭破坏，这场持续两年多的威武壮烈的农民武装斗争终于失败了。但隐蔽下来的游击队员，有的后来随

红四方面军长征，有的转入地下长期坚持革命斗争。邛崃抗捐军的英勇战斗，牵制了部分反动军阀部队，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作战，支援了红四方面军反围剿的斗争。

1935年1月，党发动了剑阁兵变。1月9日，中共四川省委派入川军二十八军第六旅二团六连进行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阮自强、李鹏等，在剑阁县高石坎发动全连起义。部队渡过嘉陵江，胜利进入川陕苏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省委多次发出通知和指示，要求“坚决的从农民的一切斗争中去发动游击战争与布置地方暴动”，认为“哪管是很小的一个暴动，对红军都有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这个阶段一部分武装起义，因忽视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有的远离主力红军孤立作战，有的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很大，有的又缺乏正确的领导，以致遭到失败。例如1932年10月底，田頌尧部第二混成旅二十六团部分士兵为反对军阀混战，在德阳孝泉举行了革命兵变；1933年1月蓬溪县东乡民众自救团以“反对军阀压迫，响应红军入川”为口号，举行暴动攻打蓬溪县城；1933年10月遂安中心县委领导的安岳通贤农民暴动等等，都很快失败了。特别是1934年，中央特派员先后数次来川，强制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不仅多次严厉批评四川省委贯彻中央路线不力，并从组织上改组了四川省委，派来刘道生任省委书记，这样，使王明“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那一套“左”的主张和政策，得以进一步在四川推行。部分地区本来不具备武装起义的条件，也不得不执行上级党组织布置，仓促起义，因而很快失败。这就暴露了当地党团力量，使各级党团组织遭到破坏，牺牲了许多军事骨干和赤色群众，城乡革命力量均受到极大损失。例如1934年2月，为减少川军对中央红军的压力，由上海党组织派

人回川，在涪陵组织了土地坡农暴；5月，越西彝汉人民数千人围攻县城，举行武装起义；6月，计划为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打开通道，在万县举行的第二次兵变；10月，驻崇庆分州的国民党二十八军五团一个营在上川南特支的领导下，发动了分州兵变；12月，青神县西山三百人举行了农暴；1935年1月，再次计划为二、六军团同四方面军会师创造有利形势，又举行云阳暴动。这些兵变和农暴，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准备工作不足，都很快遭到敌人镇压。这段时间，三台柳池农暴和盐亭保安大队兵变等，因事泄而未遂。

这些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了，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但是，对于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兵力，支援主力红军，巩固和扩大苏区，仍然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

（二）配合主力红军长征，四川又进行了艰苦的武装斗争。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四川，四川党又领导群众进行了多次武装斗争，以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主力红军长征。这一时期，党在四川领导的武装斗争计有：1935年2月，川南游击队的斗争，沐川天宝山的农民暴动；3月，合江石鼎山农民暴动和隆昌石包店工农暴动；5月，沐川高笋农民暴动，冕宁抗捐军的斗争；以及为配合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参加长征，于2月、4月组建的川陕游击队和南部升钟寺独立师的斗争，共计八次之多。其中对支援和配合红军长征作出重大贡献的有：

川南游击队的斗争。早在1934年8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就在叙永组织了游击队，活动于五龙山一带和川黔交界的大山区。同年11月，中共宋（古宋）兴（兴文）特支又组织了南六县游击队，活动于古宋、高县、珙县、江安、兴文、长宁一带山区。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几次进入川南，他们积极配合，

开展武装斗争。1935年1月底，叙永游击队同中央红军三军团取得联系，得到彭德怀同志的鼓励和支持，经过红三军团的帮助和补充，加强了游击队的力量。

1935年2月，中央军委为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开辟川、滇、黔边根据地，决定抽调一百多名干部和国家保卫局第五连共二百多人，在云南威信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和中共川南特委，徐策任书记。中旬，游击纵队至叙永五龙山，同叙永游击队会合，整编后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政委徐策，司令员王逸涛。川南游击队下设五个大队，共六七百人，在川滇黔边二十多个县内，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在川南的兵力，对于支持和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7月，川南游击队在叙永同陈宏、张凤光领导的黔北游击队会合，整编后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徐策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凤光任副政委，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六个支队，发展到八百多人。不久，遭敌人包围攻击，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徐策和张凤光在战斗中牺牲。1935年秋部队经过整顿，余泽鸿任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刘干臣为司令员。南六县游击队也前来会合，部队又发展到千余人枪，继续坚持在川滇黔边二十多个县内开展游击战争，直接威胁到川南重镇宜宾、泸州等地。1935年冬，国民党调集重兵，实行三省“会剿”，游击队受到严重损失，部队只剩下一百多人，特委决定分为两个支队活动。随后，余泽鸿、刘干臣相继在战斗中牺牲，余下部队继续坚持战斗在古宋连天山。1936年上半年游击队又有所发展。秋、冬，敌人再次进行三省“会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在转移中遭到敌人围攻，游击队的领导人先后壮烈牺牲。

这一时期，党发动和领导的合江石鼎山武装起义和党组建的升钟独立师等也有较大影响。1935年3月，为配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经过“升保”起义洗礼的升保地区农民群众，在中共阆南中心县委领导下，成立游击队，四处打击敌人区乡政权，破坏敌人交通。红军渡江后，游击队在于岱生（即于江震）等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在斗争中队伍不断壮大。4月，组建了升钟独立师，师长于岱生，部队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同年3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发动了石鼎山农民暴动，建立了“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纵队”，队长杨其生，政委李清泉（即李亚群），在合江、叙永、赤水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后在敌人攻击下失败，队长杨其生壮烈牺牲。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留下三百多人枪，在旺苍坝开会组建由刘子才、赵明恩领导的留守镇地游击队。以后扩编为独立师，由刘子才任师长，王天海为政委，任务是坚持游击，镇守阵地。游击队活动于川陕交界的南江西北的深山地带，打退了民团的多次进攻。1936年3月，胡宗南调了一个团的兵力围剿游击队。由于游击队领导存在轻敌思想，部队在转移中受到很大损失，只剩下六十多人。6月，游击队进行整顿和总结，决定将游击师改编为一个营，由赵明恩任营长。此后游击队依托大巴山，同当地人民武装结合，打败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一年后，游击队又发展到五百多人枪，在南江北部、南郑南部建立了以桃园寺为中心的纵横约百里的游击根据地。由于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党中央多次派人进行联系都未实现，游击队只能在艰苦条件下独立作战。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连续调兵围剿这支游击队，1939年冬，敌出动兵力达五个团之多。游击队在旷无人烟的莽莽山野里，在弹尽粮绝的艰苦情况下，以树叶蔽

体、野菜充饥，坚持战斗达一年半之久。1940年春，敌人四面围攻，实行空山政策，加上叛徒的破坏，赵明恩被杀害，刘子才被捕牺牲，坚贞不屈的游击战士，在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这支游击队在同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活动在大巴山腹地，同人民结合，坚持游击战争，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进行了长达五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他们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和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四川人民奋勇前进。

此外，红军长征在四川时，沿途组织的游击队，如在攻占越西后，留下红军干部王观澜就地组建的一百多人的越西游击大队等，均未列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南溪打响农暴的第一枪起，先后举行了农暴和革命兵变约七十次。参加历次武装斗争的，在十余万人以上，打出工农红军旗号的，就有五万余人。在斗争中创立了区域广大的游击根据地。如万源固军坝起义创立的城口、万源、宣汉边区游击根据地；涪陵罗云坝起义后建立的栗子寨游击根据地；川东游击军建立的以大山坪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川陕游击队创立的以桃园寺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以及上川南抗捐军、川南红军游击队等建立的广阔的游击区。特别是川东游击军、平民革命军、南部升钟寺独立师、苍溪三堆石起义等十余次武装斗争，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三万余人的四川工农武装与主力红军汇合，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前仆后继的武装斗争中，牺牲了许多军事领导骨干，如南溪农暴总指挥曾君杰，万县兵变领导人曾润百，四川红军一路政委唐伯壮，三路总指挥李光华，邛崃抗捐军领导人余宏文、曾海云，川南游击队的领导人徐

策、戴元怀、余泽鸿、刘干臣，川陕游击队的赵明恩、刘子才等；更有成千上万的游击战士和赤卫队员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由于中央几次“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共四川省委在领导武装斗争中有不少失误；加以敌人的疯狂镇压，致使多次武装斗争均遭失败。但川东第一、二、三次游击战争，上川南抗捐军……都是屡仆屡起，火种不灭；川南工农独立团，升保暴动……都是突围再聚，重整旗鼓；川南游击队和川陕游击队，为牵制敌人兵力，在艰苦环境中长期坚持战斗，最后大部壮烈牺牲。这些都充分表现了四川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百折不挠、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领导的几十次武装斗争，英勇地反击了敌人的屠杀，打出四川红军的旗帜，建立了革命武装和游击根据地，在四川的土地上洒遍红色火种，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作战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配合了红军长征的斗争，在四川谱写了一首悲壮激烈的战斗史诗，也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中央致四川临委信（节录）

（1927年10月2日）

你们接到八七紧急会议的决议案后的决议虽比前好得多，然而从你们的报告中看出你们还未能整个的了解中央的政策，仍有不能脱离旧的策略的地方，因此中央特有以下几点指示：

（一）在政治方面，你们过去的策略完全是在各派军阀互斗之内，取“尽挑拨之能事的态度”，“在杨的范围宣传刘之罪恶”，“在刘境宣传杨之罪恶”，以为如此，足以增加杨、刘的冲突而我们可得点发展的机会。你们对国民党的工作则取灰色态度，并且要与“武汉接近的军阀敷衍”，取得由上而下的发展群众的机会，这些都仍是机会主义的旧把戏，不是紧急会议的政治路线。我们虽然也要利用军阀间的冲突，但我们是站在反对一切军阀的立场，绝不帮助这军阀反对那军阀。象你们的办法恰恰与此相反，并且在杨境内宣传刘之罪恶，则无异专帮助杨之宣传，反之，在刘境内宣传杨之罪恶，其结果亦然，我们则从中偷窃点发展的机会，这不是机会主义是什么？

（二）你们农运的决议有四个缺点：一、对于土地问题，主张政治的没收，不主张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二、主张做乡村自治运动；三、认为农协的组织难于取得四川农民的信仰，而有放松农协的倾向；四、主张多发动政治斗争，从政治斗争发展到经济斗争。这几个缺点，是由于你们还没有完全的明瞭

没收土地革命及紧急会议农民斗争所致〔原文如此〕。在这土地革命的阶段中，我们对农民运动一开始即须提出“耕者有其田”、

“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给农民”、“武装农民”、“一切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去宣传组织农民群众，领导他们从抗租抗税抗捐抗粮的斗争一直发展到暴动，夺取武装，夺取政权，分配土地，与城市工人贫民的革命势力联合，完成民权革命。你们应根据这一个主要意义改正你们对农运的缺点。

（三）从你们各种报告和决议中，看出你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甚明瞭，这大概是因为你们还没有看见中央政治任务的决议案。在政治任务的决议案上，很明显的指出革命前途是由工农阶级暴动，推翻一切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独裁政治，实行没收土地，交给农民，武装工农，成为工农的革命军。我们党应当开始一切工作于这个总目标之下，时时不要忘记我们党正在准备或组织工农暴动，在这一个目标之下，不仅要改正我们党的一切工作中的策略上的机会主义的倾向，而且要改造党的组织（参看中央通告第二号），使之成为真能领导暴动的布尔塞维克的党。因此希望你们接到这个信和中央最近一切决议及中央通讯后，立即从新讨论你们的工作计划，并依照中央通告第二号改造四川的党部（洗刷坏的分子，提起积极的分子）。在四川党部过去的历史，不仅没有群众化，而且党中各种小派别互相冲突闹意见的习惯已经很深，现在四川党的组织上应当一面与机会主义奋斗，一面与这种坏习惯奋斗，改造一个群众化、斗争化、集体化的布尔塞维克的党。

（下略）

中央给四川临委信（节录）

（1928年3月29日）^①

一、目前四川的形势很明显的是各派军阀相互间及某一派军阀内部的矛盾已经非常厉害，彼此间的暗斗一天一天的复杂和剧烈，随时都有爆发全省军阀混战的可能。每个或大或小的军阀都在那里准备保障在混战中取得胜利的条件，期于此混战中增加其力量，扩大其地盘，来增加其剥削的范围，维持其残喘的命运。因此，军阀在这一混战的准备当中尽了其剥削之能事，于是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种种无名义的临时勒派，各种各色的新式搜括方法，如创立银行来操纵金融，吸收现金，及各大小军阀之任意铸造假币等等，加到民众的身上，特别是穷苦的民众深受其苦。同时豪绅地主更助军阀为虐，军阀的勒索不但到不了他们的身上，他们反成了帮助军阀勒索捐派的助手，从中他们更可取得一笔余利，因此更见增加民众之负担与痛苦。特别是下川东，现金几为杨森所吸尽，于是形成了一个绝大的剪刀问题〔原文如此〕，以致下川东的农民感受了不能忍受的痛苦。在这种状况之下，一方面军阀虽然对一般民众施行了无情的剥削，但以全省财富儿为他们所括尽，军阀财政的来源已经非常枯竭，一天都在经济的社会的恐慌中，军阀在四川的统治绝不会稳定。另一方面一般民众因军阀残酷的剥削与压迫的结果，也发生了两种现象：一部分走

^① 原件无时间，此时间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时间——中央档案馆注。

入了消极之途，只好听天由命，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他们无革命的要求，而是他们看不见自己伟大的力量，感觉无办法无出路；另一部分已经忍受不过而发生了一些自发的反抗运动，如成都的反对劣币运动，下川东农民的骚扰。在这些反抗斗争中，我们看出还是阶级混合的形式，并且多非以工农群众为中心，并且多系以中小商人地主为中心。即如成都的反对劣币以及下川东的农民骚扰，并没有表现穷苦的工农群众的单独的阶级意识反抗劣币，反抗苛杂劣币实为中小商人地主所急迫要求者。同时在这些斗争中极少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力量非常之弱，工农运动都还没有基础。在上述状况之下，我们明显的看出四川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但还不是一个暴动的时期，而是一个创造暴动的时期。因此目前我们在四川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我们要不畏难不怕麻烦的去发动工农的日常斗争，从斗争中来提高群众的革命情绪来发展党，来建立工农运动的基础。同时我们要认识在目前状况之下是我们工作的最好时机，我们应毫不放松的抓住这个时机努力的艰苦的工作，只有经过这样艰苦的工作时期之后才有实现暴动之可能，不然，只是一天在那里空口叫暴动，暴动终没有实现的一天。其次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工作也要加以注意，这一工作应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争反苛捐杂税等等口号之下进行，反国民党的工作也要特别□……□

于此，我们还要指明的是从你们的报告中，看出你们对于暴动及游击战争的意义尚不甚了解，即如你们决定要在成都“马上设一特委负指导成都暴动及川西教匪运动之责”，同时命令下川东各县“立刻开始组织暴动”，“积极暴发抗税的暴动”，并且决定“令成都马上在城内尽量多爆发群众的游击战争”。这些很显然都是不正确的。成都并不是一个暴动的局面，城内的工人贫

民及四郊的农民连小的斗争都还没有，固然说不上一个革命的高潮，你们仅仅根据一点学潮及反劣币的运动来决定暴动是显然没有认识什么是暴动的条件。抗税斗争的发展与扩大固然可以进到武装暴动，但抗税的斗争并不就是暴动。至于游击战争完全是在乡村中农民斗争的一种方式，并不能适用于城内，你们决定在成都城内实行游击战争当然是错误的。总之暴动与游击战争的意义，如果不能正确的了解，必会妨害我们的策略之正确的，望你们参照中央关于武装暴动之意义的通告纠正你们的错误。

二、四川的农民运动现在仅仅是在静的状态中介绍几个同志发展几个党的支部及农协的组织，而无斗争的表现。一般同志对于党在农运中策略并不了解而且有许多错误，自流井同志在乡村事事与豪绅协作；成都党部还要讲农村联合战线并且主张设立中农部，这可以看出乡村中的阶级分化极不明显，在乡村中虽然起了一些反抗苛杂及军阀种种残酷剥削的斗争，但在这些斗争中所表现的还是阶级合作的形式，而且领导的作用，完全在中小地主的手中，这种阶级混合的状况，当然还没有开始土地革命。因此，四川目前农运的主要方针，便是要利用种种机会在抗税抗租抗粮抗债抗捐，杀豪绅地主，夺取军阀民团的枪械，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等等口号之下，发动乡村的斗争，形成乡村阶级的分化，提高农民群众斗争的情绪，而逐渐认识本身伟大的力量。从斗争中建立并发展党的组织，只有经过这一工作的时期，才是开始向土地革命的路上走，才能开始割据局面之建立。四川省委必须明瞭这一前途，同时在此艰苦的工作时期中，尤须注意下列几点：（1）斗争一起来必须是群众的，切记犯只重军事不要群众的军事投机或者是单纯的农军暴动，并且要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的工作，如杀豪绅地主、焚烧田

契、没收土地、建立乡〔苏〕维埃政权等；（2）要绝对相信群众的力量，要在农民群众斗争中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发展党的组织，提拔积极的分子来负责农运工作，须知只有这种土著的分子才能真正明解〔瞭〕群众的要求，才能真正打入群众中去发动群众的斗争；（3）省委对于农民运动应有一具体的计划，要注意各县农运的特殊要求，很切实的指导各县的工作，并须特别注意比较重要的区域，如下川东，集中力量在这些区域去工作；（4）教匪神兵运动亦是农民运动之一种，他们中间也分了几种派别，据报载他们中间有反共的，有倾共的，敌人已经注意及此，而下川东的敌人更注意到要利用反共的教匪神兵来抵制倾共的教匪神兵；同时教匪神兵的性质与枪会（原文如此）相同，内部的分子虽然是穷苦无告的农民，但大部分皆在豪绅地主领导之下，来做一点反抗苛杂的运动，有时可以成为反土地革命的力量。因此，我们对于教匪神兵的主要工作是打入他们的当中，夺取其群众，号召群众脱离其领袖，并须努力于教匪神兵农会化之工作，同时提高反军阀及不要受军阀利用的宣传。此外还有一个反迷信的问题，中央认为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逐渐消灭群众迷信观念，直接宣传反对迷信的方式是最笨的办法，不但不能得到好的结果，反可以使群众不能入耳，发生一种反感，这是望你们要特别注意的。

（下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中央致四川省委信（节录）

（1928年9月29日）

一、总的政治任务与工作路线

现在四川的形势正是全国形势的缩小的一副画图，并且形势还更严重，还更利于革命的发展。第一统治阶级的冲突因派别的复杂，而形成一种混战的局面。决无稳定的可能而只有日益削弱。这种形势比其任何一省都要利害。第二群众所受的残酷的剥削已经到了无可生存的余地，如工人工资的低廉，农民租税的繁重，兵士毫无餉给，尤其是苛捐杂税的剥削与金融的混乱使广大的群众到要走向破产死亡的道路，除了革命更无丝毫出路。最近各地爆发起来的许多工人原始的罢工，农民自发的暴动，城市小商人的罢市抗捐等，都明显的表现革命的火山快要爆发了。第三尚没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使群众更易为团结在革命斗争的下面来。所以现在四川整个的局面实在到了革命火山快要在我们前面大爆发的时期。其所以现在还没有形成广大的群众革命浪潮的主要原因，就是群众还没形成坚固的组织，还没有有力的坚决的先进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尤其是还没有一个坚固的党，还没有使各种斗争汇合起来。一个革命高潮的爆发与革命的彻底的胜利，不只是需要客观形势的成熟，尤其需要主观力量的坚固与有坚决意识的工人阶级的领导。现在四川革命的客观的条件的确充分成熟了，但是主观的力量实在太薄弱。如果我们不积极去做

加强主观条件的工作，将要使革命运动成为流产，将要使革命斗争不能形成一个总的汇合而遭受敌人各个击破，最后就是将要断送整个的革命。所以四川党的目前总的政治任务就是要发展并坚决群众革命的意识，争取群众，组织群众；同时加强党的组织，发展党的组织，使广大的群众都团结到党的革命的口号之下来，使群众的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不成为零碎的行动而汇合起来成为将来武装暴动，推翻现在统治建立工农兵贫民代表会政权的总的爆发，这是目前唯一的任务，这是目前工作的总的方针。省委必明确的从目前革命主观力量的薄弱而认识目前严重的任务，坚决的加速的去完成这一任务，然后才能促进高潮更快的到来，领导革命的彻底的胜利。如果不从即刻起加紧去到群众中去切实的做群众的工作，领导群众的斗争，发展群众的组织，有计划去布置准备，或存一种侥幸成功的心理，结果将不止是延长革命爆发的时期，甚至使革命流产失败。过去四月来省委的工作的确带有疏（原文如此）散、不紧张的现象，固然有许多客观的原因，但是没有认清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与严重的严重任务，（原文如此）是最主要的原因，这是值得省委特别加以注意的。

上面指出目前四川党的总的任务是夺取广大的群众准备将来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但是夺取群众的策略是如何？第一，夺取群众就是要夺取群众的思想上的领导。现在四川广大的群众，在客观上都必然有热烈的革命的要求。但是没有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去领导他们，所以，很易为跑到豪绅富农或者带有迷信的会匪（如神兵）的影响下面去。所以，目前的党的策略，最主要的是要极力扩大党的宣传，坚决的正确的提出党的宣传的总的口号——如“推翻国民党军阀政权建立工农兵及贫苦群众的代表会议政权”，“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等，在群众中去作广大的

普遍的宣传，使群众脱离豪绅富农的影响而走到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来。第二、从斗争中夺取群众组织群众。所谓夺取群众，决不是□□□□组织宣传工作，而是要利用群众各种迫切苦痛的部分的零碎的要求，发动群众的争斗，领导这些争斗。从争斗中扩大党的总的宣传口号的影响，从斗争中把群众组织起来，然后才是正确的实现夺取群众的任务。第三、夺取群众必须利用公开的机会——如国民党号召的各种群众会议及各种团体召集的会议请愿运动等——公开的机关——如各种各色的社会组织不管他是反动或者是黄色的，只要他是有一点群众，都必须设法插入进去，来扩大党的宣传。总之稍有一点公开的机会，都应该尽可能的利用，决不可故步自封，陷于狭隘范围的秘密活动。因为必须如是然后党的宣传才能深入群众。不过我们是要找到各种公开的机会去发展党的政治的宣传，但是决不能降低党的政治的口号去找公开的机会。——如党的政治的口号是反对国民党，现在因为要找公开的机会，便暂时放弃反国民党的口号，那就是很大的错误。至于利用群众目前迫切的要求的口号来引导向党的总的口号方面去，那是很正确的。第四、夺取群众最主要的是城市中的工作尤其是工人群众，如果城市工作不能建立起来，工人群众没有很好的基础，夺取群众的任务决无法实现。所以现在应该极力纠正避免城市工作的困难，完全跑向农村去的倾向——四川过去在客观上也带有这一种错误的倾向。所以四川目前工作的中心应该是重庆、成都、泸州……以及几个重要的工人区域。省委以后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去建立这几个区域的工作。

最后还要指出来的，四川的政治的形势，军阀已成为广大群众厌恶的东西，“反对军阀”已经为一般群众共同的心理。所以四川将来革命高潮的到来，必然是反对军阀斗争的总的爆发。所

以党应该以“推翻国民党军阀政权建立工农兵士贫民真正民众的政权”为一切工作和一切斗争的总的口号。无论是工人斗争，农民斗争，反苛捐杂税运动，反帝运动，兵士的索饷运动以及各种群众的各种各样的部分的运动，都必须加紧这一总的口号的宣传，领导向这一总的口号的路上走。尤其是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军阀战争，更易为直接走向这一总的口号。党更要加紧领导，使群众在每一个斗争中都坚决他的“推翻军阀政权”的意识。然后各种斗争——工人经济斗争，农民夺取土地斗争，兵士改良生活的斗争，城市小资产阶级反苛杂斗争——一齐汇合起来成为一个总的反军阀斗争的大爆发，而促成革命的高潮，以达到革命的彻底的胜利。但是将来能否实现这一任务，全看现在的工作如何？现在的群众工作如何？这是中央要再三明显的指出来的。

二、职工运动

(略)

三、农民运动

四川农民群众，受地主豪绅军阀重重的压榨，已到了无法生存的地位，必然走向革命的道路。最近各地的自发暴动与教民神兵纷起，便是很明显的例证。只要党能在农民群众中加紧工作，必然可以很快的在党的领导之下。

农民运动中最主要的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与“推翻豪绅军阀的统治建立农民代表会议的乡村政权”。过去“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使阶级意识模糊，不能树立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抗，绝对不能采用。这两个主要的口号应该在群众中作普遍的宣传，使群众有明确的认识而渐次团结在这两个口号下作广大的斗争。

现在四川的农民群众，所受的苛捐杂税的剥削，不亚于地主

佃租的压榨，因此农民日趋于破产，尤其是小自耕农。土地日渐集中于军阀官僚的手中。所以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军阀），与反地主的斗争同样的重要。抗捐抗税的口号，与减租抗租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应居同等的地位。尤其是发动斗争之初，反苛捐杂税的口号更能吸引广大的群众，尤其是在自耕农较多的地方。所以如果只注意宣传没收土地的口号而忽视了反苛捐杂税的宣传，那便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现在农民群众因没有很得到党的正确的领导，因此跑在豪绅富农——除暴团、青白团等组织和迷信的会匪——教民、神兵——影响之下。党现在必须坚决的奋斗，扩大党的宣传来扫除豪绅富农的影响，夺取农民群众的思想上的领导。省委在报告中所说对神兵教民中的策略大体是正确的。但是要注意的，这些会匪其所以能取得群众，就在反抗苛捐杂税的一个口号。所以党要夺取他们的群众必不能忽视这一口号。夺取群众的方法，主要是要加入他们内面去，发展我们的宣传，反对豪绅地主的领袖，使这些组织的领导归到中农和贫农手里，而不一定要树立农民协会和他们对抗。因为这样，或许还更难夺取群众与组织群众。如果在这些迷信组织的地方，当然要极力发展农协的组织。

农民运动，在斗争发动以后，常常很快转变到一种武装的激烈斗争。这是不应该避免而且不能避免的。所以游击战争成为农民主要斗争方式之一。省委在农运已经广大发展的地方必须有计划的很正确的去发动游击战争。

四川民团特别多，省委认为“如果不能分化民团，农民运动便很困难的发展”这是很正确的。所以对于民团中工作自然应该特[别]注意。不过民团的组织非常复杂有，①团丁完全为农民者，②土匪改编者，③溃兵改编者，④招募编成者，⑤完全地主子弟

亲戚组织者的种种分别。所以我们的工作也应该看民团成份的性质来决定我们的方法。对①种应完全运用农民运动的口号与策略去影响他。对③④两种，应以兵士运动的方法去工作。②⑤两种——尤其是⑤很困难工作，最主要的是要农民武装的力量去消灭他的一个方法。当然发展农民运动，扩大农民斗争，是瓦解民团最主要的策略；如果农民斗争不发展，决无法单独去进行民团运动。

关于农民运动的一切详细策略，省委应该详细去看此次大会的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的决议案。

四、兵士运动

夺取兵士群众也是目前重要工作之一，因为中国工农群众没有经过武装训练（中国不是征兵制度），所以武装暴动的技术非常缺乏。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如果不能取得兵士群众，决难得到暴动的胜利。就是将来的红军，也必须有现在的兵士群众大批的加入。现在在客观上，兵士运动很易为发展，因为兵士生活已是万分痛苦。军阀因财政的困难更无法改良兵士生活，所以必然逼起兵士群众走向革命的方向来。

兵士运动要能很好的发展，当然要靠工农运动的影响。如果没有工农运动的影响，决不能引导兵士群众向正确的革命路上来。这是我们应该彻底认识的。

兵士运动的主要的策略，一方面要发展士兵反对官长的阶级斗争来打破维系军阀军队组织的“阶级服从”的信条。所以应该利用各种士兵迫切要求——如发欠饷，改良待遇，加饷，军需公开，反对官长压迫……等，作广大的鼓动，来发动兵士群众的斗争。另一方面应该加紧党的总的政治口号的宣传——推翻军阀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没收地主土地等——给兵士以正

确的最后的出路，来打破他们升官发财的心理，然后才能使兵士群众走向正确的革命的道路。太和镇兵变的不好的结果，固然省委所指出的“教育训练工作不好，组织松懈”，是一些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注意党的总的政治口号的宣传，使兵士没有明白革命的意识。同时没有工农斗争的影响。还有利用出发□□□也有极严重的错误。这是省委以后应该坚决□□的。

（下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中央关于军事工作路线 给四川省委并转军委的信（节录）

（1930年1月8日）^①

一、在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仍然日益加紧，军阀混战仍然继续扩大，特别是工农革命斗争正在复兴的现在（详细的政治形势见另函），无疑义的加口口口口口党对军事工作的任务。四川是全国范围的一部分，不但在全国军阀混战的狂澜口中绝对不会有甚么例外，而且更因为四川经济政治地域的特殊条件，使全省分割成好些区域，而这些区域都各有不同的军阀割据，都各有不同的独立的系统，遂使这种混战形势更加延长，当然群众的痛苦更加加深。同时四川的革命斗争，一样的逐渐开展，如自流井的工人罢工运动，荣县、宜宾、涪陵、南溪、蒲江各地的农民武装斗争，旷旅的爆发革命兵变□□□□□□兵变的不断的发展，虽然这些斗争因为我们事前没有积极的准备，缺乏□□□□的作用，以致走上失败的路途，然而这种斗争毫无疑问□□□□□□□□□□与尖锐，只要我们能有正确的工作路线与策略，能有很完善的计划来加强领导，四川军事工作必定可有惊人的发展。目前四川的军事工作首先须着眼于全省的工作布置。这里要依着全省的中心区域，建立中心区域的中心工作，要针对着各中心区域的特

^① 原件无年代，此年代是文件载记上填写的时间——中央档案馆注。

殊情形订出更具体的工作计划，特别是加强这些中心区域的策略上的领导。目前中心区域暂分五处：第一以自流井为中心，包括荣县、威远，内江、富顺、宜宾、南溪一带。这一区域的中心工作是自流井工人的武装组织和训练的开始，荣县、宜宾农民游击战争的扩大，与加强二十四军的兵士工作，并开始这一区域内中心部队以及农村警备队中的群众工作。第二以成都为中心，包括新汉〔原文如此〕、金、郫、灌、绵竹一带。这一区域的中心工作是成都六三厂□□□□□□工作的加紧，成都工人及川西工人武装组织和训练的开始，新都汉县〔原文如此〕什□□县一带的农民武装组织的建立，绵竹安县农民游击战争的扩大并加强其领导，发动其斗争，以转变过去失败后之消沉情绪，灌□彭各县的农民斗争更须特别注意领导，发展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的工作，并在二十八军各中心部队普遍建立兵士支部。第三是以顺庆^①为中心包括南部、蓬安、岳池、广安、遂宁一带。这一区域的中心工作是顺庆工人武装组织与训练的开始，顺庆、南部、遂溪〔原文如此〕等处农民武装组织和□□□□□□□□二十八军十一师中间各部工作的平衡建立。第四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合川〕^②、涪陵、綦江一带。这区工人运动的工作过去很弱，农民虽经过斗争，□不能有很好的领导，所以目前的中心工作应是开始重庆工人武装的组织和训练，发动合川、涪陵、綦江一带的农民游击战争□□□□□□的工作，加紧二十一军第三师、二十四军二师、二十军二师的工作以及开始建立各地民团中的工作，注意散布在这一区内土匪工作。第五是绥定^③、梁山、忠县一带的工作。此区农

① 今南充。

② 原件此处缺三字。据紧接下文提到“发展合川、涪陵、綦江一带的农民游击战争”，故应为“合川”。

③ 今达县。

区域的可能。加以民团壮丁的组织又异常广泛，神兵土匪是满布在全省各区，兵变也继续普遍的爆发□□□□□□农民武装斗争汇合转变成广大的游击战争的绝好条件，因此你们□□□□□要去组织各种农民武装发动斗争举行地方暴动，深入土地革命并建□□□军扩大红军。对全国红军如朱毛红军等的政治影响要特别扩大宣传，使全省农民工人都深刻认识红军意义而自愿加入红军扩大红军□□□要扩大工农兵群众的日常斗争，使之转变为广泛的武装斗争□□□□□合这些武装斗争以生长红军出来。第三要集中各中心区域的武装农民群众，从斗争中使之编成红军，在里面要有经常的群众工作，提高群众的组织力量。第四、要加强宜宾、荣县、威远、万源、绵竹、涪陵、合川、南溪、宣汉、富顺、梁山一带现有的游击队的领导，健全其组织，〔扩〕大其斗争，尤其是党要在里面建立起核心作用，特别要纠正联络他们上层领袖的错误策略，而要打入群众中加紧我们的工作，改变他们无组织的土匪性，使之能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在斗争中坚决逐渐改编他下层群众的组织，肃清他们遗留下的保守性，使他们坚决的执行进攻的策略。发展的方向必然要是能充分运用中央所决定的原则——向群众斗争发展的区域，向敌人统治摇动加剧的区域，向交通便利（航路汽车及中心城市）的区域，发动群众斗争来推向目的地发展。第五、一开始发动游击战争，就应使各地游击战争能够互相紧密联系以取得共同的大规模的发展，绝对要消除地方主义、取消主义、保守主义、割据主义、和平发展等等错误观念。

三、无论就全国的兵变形势来看或就四川的兵变形势来看，你们目前必定要有计划的来执行加强兵士运动与组织兵变的策略。这一工作路线的执行。第一、要坚决建立起兵士运动的正确路

连负责人也不懂得游击战争土地革命是什么。第九、要加紧发动年关斗争并有计划的来准备这一工作，当然一切节关如上元端午节中秋等均宜发动斗争。第十、要在中央指定兵士运动周（假使日期已过，你们可另定期举行）中加紧兵运的工作，动员全党与C·Y同志以及工农群众都进行这一工作，每一支部至少要建立一兵士支部，每一同志至少要找一兵士线索。以上是兵士运动一般原则上的设施，无疑义的你们应该立刻按照各部队的特殊情形，去建立适于这原则的更具体更详细的工作计划与工作方法。

四、民团土匪的工作，在四川也是要特别注意，在民团中特别要注意壮丁的工作。执行这一工作的路线，当然主要的还是要发动下层群众的日常斗争，在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政纲以夺取其下层群众组织，经过各种的方法去训练他们组织他们，使他们能团结在农协之下。对土匪工作不但不应联络其上层领袖而且□□□□□取他的下层群众，以反对其领袖，在行动中去根本□□□□□有组织。已经有线索的部队，更应该在里面建立起党的核心□□□□□□□□公开的宣传党的政纲，在斗争中改变下层群众无组织的□□□□□□□□□□来执行游击的任务。对秦部更应进去加紧工作，因此□□□发动农民斗争，发动地方暴动，扩大游击战争来影响土匪的武装下层群众，来改变其习惯，来分化其组织，以至驱逐一切动摇妥协的领袖。

五、关于工人武装组织和训练工作可以说过去在四川没有一点基础，然而在目前政治形势之下，这种工作已是非常必要和迫切。工人武装首先要从建立工（人）纠察队开始。过去一般同志对于工纠意义的了解颇不正确，以为工纠的组织只是“秩序的维持”，而不知道进一步的去了解工纠是会有“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夺取

敌人的武装推翻敌人的统治以建立自己的政权”的伟大的政治意义，他是工人阶级一切集体行动直接□□□□□□□□□□□□因此，你们必定要开始注意建立这个工作，一定要把这个工作提到各地方党部以至于各支部去详细讨论，号召所有的同志来注意这一工作。在工人有斗争的地方固然应该立即开始组织与训练，在无斗争的地方也应该宣传组织，经过赤色工会征求各产业各部门广大的工人群众自愿来参加这种组织，分别编制，加以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训练。这种组织一定要深入广大的群众，而且这种组织应该向群众公开。组织的条例可依照上海工纠队的经验，以五人为小队，二小队或四小队为一小队，二中队至四中队为一大队。组织的单位，以适应他生活的产业或部门为原则。在目前白色恐怖笼罩之下训练应该秘密，然而除秘密的训练以外，一定还要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去加强武装群众的集体训练，以各种公开的名义（如运动会、野外旅行、拳术等）去进行，以期能在行动时互相策应互相声援。训练的材料除各种的武器的使用普通战术外，应特别注意“示威巷战”的技术以作武装暴动的准备，尤其要加以政治训练如革命形势及工纠任务等。除此外并要有计划的征调失业工人群众□期间的到军队中去。这种办法一方面可以使工人与兵士群众的生活□□一方面可以学习军事的技术。

（下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中央给四川省委的 指示信（节录）

（1930年1月20日）

二、四川现状与群众斗争

1. 四川的经济破产与帝国主义侵略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整个的侵略，因为全国经济命脉操在帝国主义手里，所以任何一省，甚至如贵州，均一样的受侵略的祸害，四川当然也是如此。省委以及坚予同志^①的报告中，客观上把帝国主义在四川的侵略与在其他各省的侵略对立起来，在估量帝国主义的作用上，自然就会以为帝国主义在沿海各省侵略的厉害些，在四川侵略的较轻些（所举的例证是：四川无租界，外兵很少，外国工厂很少等等），因之，反帝的任务自然也就不自觉的看得轻了。实际上四川的经济破产状况如何呢？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农民与土匪之增多，出口特产之锐减，手工业生产之日趋崩溃，新式工业之不发展，洋货必需品输入之日有增加（新式手工业虽有小的发展，然这是建筑在日趋破产的旧式手工业的基础上，这丝毫不能挽救手工业破产的危机），这些是由于什么呢？由于帝国主义障碍整个的全国民族经济之发展；因为地

^① 坚予即刘愿安。

理上的条件，更特别障碍着四川民族经济的发展。

至于各帝国主义特别对四川的侵略主要的用什么方法呢？因为交通不便，帝国主义在四川尚没有大规模的直接开办工厂，帝国主义的商品（同样、民族工业的商品）尚不能盛销于内地，可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已使内地旧的经济组织完全趋于破产，这是最显著的事实。帝国主义对四川的侵略，主要的是更加维持了军阀制度，借着军阀制度以剥削四川的广大劳苦群众。当然对全国亦是如此。此外，金融的侵略，航业的侵略，商品的侵略，亦占有甚大的地位。所以分析军阀制度若不与帝国主义侵略联系起来，则决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2. 四川的资产阶级与政权性质

.....

3. 四川群众斗争的形势

因为军阀战争的祸害，因为地主资本家的无情剥削，四川工农兵士群众的革命斗争在客观上日益向前发展，特别因为全国群众斗争潮流的鼓荡，更使四川群众斗争采取更尖锐的形式。尚有省委对于群众斗争的估量未免过低，首先认为工人斗争是消沉低落，对农民斗争与地方暴动，始终机械的遵守暴动的条件而未能认识斗争发展的前途。一般的说来，省委以为四川的群众是落后些。殊不知所谓落后只是政治意识或许表现不十分明显，而四川群众的斗争并不落后。省委甚至以此责难群众，说“他们（工人）的要求尚只限于日常生活的改良，还没有用自己的力量起来推翻统治阶级的决心和勇气。”“农民斗争意识很模糊，斗争中心口号只是反抗苛捐杂税，还没有废除一切捐税，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农民苏维埃的明确认识和要求，更没有土地革命，彻底

推翻地主阶级封建统治封建剥削的决心”（政治决议案），对黄色工会的认识，则说：“工人不认识改良主义的欺骗，还只认为是工会这一批人不好”（坚予同志的报告）。省委如果只是以这样高的条件——这样高的条件只是暴动之前夜才成熟的——去估量斗争的形势而不去正确的认识现在斗争的发展与前途，不去正确的运用策略以推进斗争之进一步的开展，以便创造这些条件，结果必然使成熟的斗争浪潮空空过去。客观上是帮助统治阶级延缓他的日暮西山的寿命。

实际上四川的群众斗争，假使党曾运用了正确的策略，则已经发展成几个游击区域，工人斗争力量必更壮大，反动的军队必更动摇，便是现在，这一可能的前途仍是非常之明显的。

4. 四川党工作路线的总错误与群众斗争的弱点

.....

三、四川党目前的迫切任务与策略路线

.....

5. 土地革命与农村阶级斗争

四川的农民斗争是非常发展的，在许多地方已经进入武装斗争的方式了。惟因各地党部领导的错误，以至爆发得很激烈的斗争，通归失败。现时四川农村工作最严重的问题是富农领导问题。因为农村斗争被富农或富农意识领导，所以斗争只停顿在抗捐抗税的口号上，取消游击战争或甚至对反动的驻防军发生幻想，靠土匪为保镖；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省委应即根据中央关于农运策略的决议严厉纠正对富农的错误策略。

党对于农村斗争的领导，应该坚决的由抗捐抗税发展到抗租抗债以深入农村土地革命的斗争，四川现时的农村环境，发动游

击战争是可能的。党须特别注意于游击战争的发动与领导，极力排斥富农分子之加入游击队，省委首先应纠正自己对于游击战争之保守的取消的观念。

军阀战争在川北已经爆发。党须特别加紧农村中反军阀战争的斗争，在斗争发展的区域，须注意地方暴动的布置工作。

6. 士兵运动

省委应根据中央最近关于兵变策略的通告，加紧实现这一前途的布置工作。特别在客观上游击战争易于发展的情形之下，有计划的组织兵变与农村武装斗争汇合，是四川党目前迫切的任务之一。同时士兵工作之向着中心部队发展，加强士兵群众的组织，防止对军官发生幻想，发动士兵的日常斗争，仍为现时兵运的主要内容。在军阀战争中，士兵工作尤应加紧，坚决的执行失败主义的策略。

(下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中央致四川省委信（节录）

（1930年5月26日）^①

这一封信的中心内容是在指出四川党的主要的错误及缺点，指示四川工作路线转变的方针，唤起四川党注意改造组织之必要，特别在全省代表大会之前，这样的详细的指示是非常必要的，望你们注意。

一、四川革命形势与四川党的总任务

（1）四川革命形势与全国革命形势

（略）

（2）省委对四川革命形势的右倾估量

因为省委缺乏一个全国的观点，不明全国总的趋势，加以四川防区制度（其实这亦不是特殊的，四川之军阀割据比其他省份只是较为复杂）之反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不宽广，遂对革命形势做出右倾的估量。

第一、便是对军阀战争的估量问题。你们在表面上虽然知道四川军阀与全国军阀的关系，虽然知道四川军阀内部的矛盾，但对军阀制度的实质认识得还不清楚，对军阀战争认识得还是过于机械。很明显的你们把对军阀战争的估量的重心，只是放在四川的

^① 原件无年代，此年代是编者判定的，——中央档案馆注。

军阀身上，只是放在炮火交锋的爆发上面，而对于全国军阀混战的形势以及军阀战争所牵连所影响（即加于广大劳苦群众的痛苦）的范围，还是忽视的。全国的军阀已经打得一塌糊涂了，而你们却等待四川的军阀战争的爆发，以便组织兵变，等等；你们昨日预料四川军阀战争今日将要爆发，而今日又没有爆发，于是使你们“大失所望”。象你们这样机械的认识军阀战争，自然使你们放松了反军阀战争的迫切任务，自然使你们等待军阀战争，自然使你们做出右倾的以至取消主义的策略。这一错误之根本的观念上的来源，即是由于没有一个全国的观点。

第二、对群众斗争形势的右倾估量。对于上述的群众斗争的特征，很明显的你们并未能清楚，群众的弱点——其实只是落后的一部分群众的——反而被你们的“显微镜”照得非常之严重，从你们报告的措词中，如“虽然群众斗争是如此这般，可是群众还有许多弱点”，便可看出你们对群众斗争估量之右倾的路线，你们这种观念便没有现实策略的意义，便是把自己主观的短处归咎于客观的群众弱点，实际上你们把四川的群众看成了脱离全国的群众之落后的部分。我们对于群众斗争的估量，上边已经指出，必须观察其总的趋势，观察其进步的特征，追求其所以造成的根本原因（经济政治的危机），然后才能规定正确的策略；即或一部分落后的群众是有某些弱点，我们亦必须估计到工作之内，必须以主观力量去克服客观的弱点，以便于更容易的实现我们的策略，而推进革命潮流向前发展。客观的形势已经明显告诉我们，虽然群众中存在有某些弱点与缺点，但是生活的恶劣条件使他们经常不断的爆发经济的以至政治的斗争，这并不仅是四川为然，在全国都是如此，而你们的结论却适得其反。唯一的原因

也是由于没有一个全国的观点，将四川群众与全国群众对立。

第三、对革命的主观力量之右倾的估量。所谓革命的主观力量系包括党的组织力量，群众的组织力量及政治经验，党与群众的关系而言。省委对于革命的主观力量估量太低，以至怀疑主观力量对于革命的领导。第一、省委总以为四川党的组织是落后的，你们对党的组织客观上是存着一种取消观念，这样必然不能抓紧组织上的斗争与改造组织的任务。第二、你们没有看清群众的组织力量在斗争过程中的发展，更没有看清群众的政治经验的增多（反国民党、改组派及黄色工会），反而只看见群众的弱点。第三、党与群众的关系在客观上是进步的，你们不但未能抓住这些进步的现象，努力增进党与群众更密切的关系，反而将党与群众对立，客观上是削弱党与群众的联系。推进革命高涨更快的到来，革命的主观力量有决定的作用，所以关于革命的主观力量之任何右倾的估量，均足以障碍党对革命之积极的领导。

（3）四川党的总任务

（甲）中央七十号通告的意义

中央七十号通告所指出的“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特别是武汉及其邻近的省区表现着更多的可能。”是非常正确的。这是指出全国的革命危机一般的成熟，因为“军阀战争的继续扩大，发展到目前准备中的蒋阎直接开火，已牵动了中国全部的生活，从两广到顺直，从四川到江浙，没有一省不受军阀战争之直接的祸害的。”机会主义者最容易把以上的论点解释成为：湖北一省胜利有可能，而其他省份便落后些。这种把湖北与全国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目前全国的革命形势中，四川一样有首先胜利的前途，但同时必须指出，四川不会单独一省爆发革命高潮，所以脱离全国的

形势，而准备四川一省的首先胜利，便是异常错误的观念。

(乙) 在武汉领导下的意义

四川既不会单独一省爆发革命高潮，那么他必然要与全国工作有密切配合。四川是属于长江流域，在交通上、经济上，均与湖北有密切关系；武汉为长江的中心，四川的革命不仅要与湖北配合，而且只有在武汉的领导下，只有在全国的胜利中，才有完全胜利的可能。这便是说，四川的工作布置，必须首先与湖北有密切的配合，湖北的革命浪潮之激动固可以推进全国的革命形势，而全国的、尤其是邻近省区（四川当然是主要省份之一）的革命发展，必然推进湖北革命浪潮之高涨，亦即是全国革命浪潮。

.....

四、组织地方暴动及农运中的问题

(1) 反富农路线的斗争

四川农村斗争中最严重的现象是富农路线。以四川党的组织成份说，富农占农民同志的百分之二十，占四川党的百分之十二。四川全党的富农成份比工人成份还要多！此外，还有百分之二十的知识分子，以及地党部〔原文如此〕的许多的知识分子干部，这些成份亦容易反映富农意识；区农协乡农协更多为富农把持。土地革命之不深入，地方与保守观念之存在，地方暴动之未能坚决组织，主要由于富农路线之障碍，所以反富农路线的斗争，成为地方暴动的先决条件。反富农斗争的主要路线是：（一）以斗争方式驱逐富农出党；（二）拒绝富农加入农协，发展雇农贫农党员，建立雇农工会，领导雇农加工资改良待遇的斗争；（三）坚决执行组织地方暴动的中心策略，深入土地革命的斗

争。

(2) 组织地方暴动与发动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是从农民武装斗争或兵变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武装斗争形式。它的中心任务是：

(一) 彻底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分给农民（只于杀地主豪绅是不够的，无目的烧杀更所应忌），只有这样，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土地斗争；(二) 集中武装建立红军，只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三) 摧毁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地方暴动是在游击战争发展过程中夺取地方政权的武装斗争形式，组织地方暴动必须尽可能取得城市工人斗争的帮助与兵变的配合，以夺取较大的城市。地方暴动之另一方式便是兵士组织的兵士暴动，这一暴动不仅杀戮反动的长官，而且要摧毁反动的政权机关，以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代理临时的革命政权，如果环境允许，必须建立苏维埃，另一方面必须坚〔决〕向外发展，扩大游击，深入土地革命。

至于你们所讨论的先游击而后建立苏维埃，或先建立苏维埃而后游击，是机械的了解问题。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土地革命深入扩大。因此，通常是农民的武装斗争发展成为游击战争，在游击过程中发动了广大群众参加土地的斗争，建立了一乡一区乃至一县的苏维埃政权；在建立政权之后，一方面必须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必须向外发展扩大游击扩大土地斗争。同时亦有这一前途：农民的武装斗争与士兵暴动的汇合而首先建立了革命政权，才后实行游击战争。你们如果机械的了解先游击而后建立苏维埃，在策略上必然容易形成单纯军事的行动，而忽视政权的作用与土地革命之深入；如果机械了解先建立苏维埃而后游击，在策略上必然容易产生保守与地方的观念。这里中心问题是土地

革命之深入与扩大，只有深入才能吸引广大农民为土地革命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只有扩大，才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造成土地革命的巨潮，现时地方苏维埃就是执行这一任务的枢纽。

至于重庆的暴动，不仅是一简单的地方暴动，而且有全省的意义，所以准备重庆的暴动，与组织地方暴动不应平列起来。

（3）农民组织问题

四川现时农民组织，大都为富农把持；党必须坚决采取领导贫农雇农斗争巩固与中农同盟的策略，而以斗争方式排斥富农，富农不排除则土地革命斗争无由深入。推翻富农领导最好的组织方式是组织农民委员会，直接领导群众斗争。在游击与农民斗争区域，农民的组织不应倚赖游击队而存在，农村党内倚赖军事的观念亦必须坚决肃清。

雇农工会是农村无产阶级的阶级工会反对农村资产阶级（富农）有力的武器。党必须建立雇农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向他们解释他们的利益与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利益是冲突的。每个农村支部必须以建立雇农工会为其主要的工作之一。

五、组织兵士暴动及士兵运动

（1）兵士暴动在四川的意义

目前全国军阀混战与土地革命及红军的影响，使兵变潮流普遍全国。四川的兵变亦是一样的发展。但是军阀制度急剧崩溃的形势下，我党如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动兵变及士兵暴动，则其政治影响将更加百倍增加，其转变为红军的成绩将更百倍伟大。四川的士兵生活比之全国士兵尤为痛苦，这更成为组织兵士暴动之有力的条件。目前四川隐而未发的兵变还有很多，如果组织成为兵士的暴动，则可以开辟四川广大的兵变潮流，可以开展农村的剧烈

斗争，可以加速军阀制度的崩溃。

（2）兵士暴动的条件问题

军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均是急剧崩溃，士兵生活在全国范围内均毫无出路：这是全国组织兵士暴动之主要的条件。四川党对于组织兵变机械的了解与遵守兵变的条件，实际上是取消组织兵变的中心策略。第一、上面已经指出，你们是呆板的等待四川军阀战争的爆发；第二、你们机械的等待工农斗争的配合或等待党的组织的基础，没有农民斗争的地方，你们总是不敢发动。这种等待主义无疑的是取消了兵变。就今天的形势说：四川的兵士暴动有许多部队是可以爆发的，因为其条件早已成熟了。现时组织兵士暴动的中心条件是主观倾向的问题，是主观力量布置的问题，如果主观上的布置充分，即令某地方农民斗争尚没有起来，亦一样的有变动之必要；因为兵士暴动一起来，对于当地反动统治便是霹雳一声的炸弹，对于群众斗争便是有力的发动机。而且这显明旗帜的、兵士群众自觉的、伟大的兵变，必然可以掀起兵士暴动的巨潮，使军阀军队的基础根本动摇起来。

（3）军官的领导问题

兵士暴动的领导机关，原则上必须引进士兵参加；上级军官，无论他如何表同情于革命，亦不得引为暴动的领袖，至多将他看成为革命同情者。因为军官的阶级利益与豪绅地主富农的利益有密切关系，而兵士暴动必然同时是反对军官的暴动，所以在组织兵士暴动中，就是同情革命的军官无疑的是动摇的，甚至要反革命的，党必须纠正“军官不成问题”的错误观念，必须坚决以新的士兵同志的领导代替军官的领导。留恋军官是兵士运动中最严重的机会主义。

（4）兵士暴动与苏维埃政权

兵士暴动之所以异于兵变者，便在其不仅除掉反动的军官而且要消灭当地的反动的政权机关，建立新的政权机关。因此，暴动一开始，就必须组织红军，打出鲜明的红旗，暴动一胜利，必须一方面坚决向外发展，一方面必须立即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指挥这一胜利的暴动。革命委员会同时必须执行革命的政纲，准备从速建立苏维埃；而这时的红军则须依照全国全省的形势向交通要道及主要的城市发展。

（5）重庆的兵士暴动问题

在全省总的布置上，重庆的武装暴动必须力求工农兵革命力量的配合。这便是说：党必须更加紧城市工人与加紧农民的工作。但这决不取消重庆士兵暴动的前途，如果士兵中的工作充分，主观的组织与发动的力量有战胜敌人武装的可能时，如果重庆附近县份的士兵工作同时亦可发动时，——自然这种主观条件亦必须是经过新的革命浪潮的推动与党的策略的正确运用——则党便毫不犹疑的组织重庆的兵士暴动。但同时中央必须指出：这决不可以做成放松职工运动、农民运动而单纯做军事运动之错误的观点。

（6）警察与民团工作

警察是统治阶级的有力的工具之一，一般警兵之主要的倾向便不同于一般士兵的倾向。我们做士兵运动的目的，不仅要破坏军阀制度，而且要使士兵群众转变到革命队伍中来。但是我们对于警兵运动的目的便仅是破坏统治阶级的这一工具，并不企图将它转变或改造为红军。所以如果警兵要参加暴动，加入红军，这只是例外的情形，至多只是少数人的情形。然而这决不是说，我们因此可以忽视警兵工作，可以忽视发动警兵中的斗争。你们在做警兵运动时，必须有这样原则上的认识。

至于民团工作，在四川亦是很重要的。四川党必须到团兵中去争取群众，而不应做团总运动。

六、扩大红军

(1) 如何建立红军与扩大红军

四川现时的环境非常便利于建立广大的红军。建立红军的主要来源，必须是坚决的组织兵士暴动，坚决武装农民，发动游击战争，只要四川党坚决做反富农路线的斗争，这是非常可能的。梁山的三千武装必须坚决发动，组织成为红军。万源城口以及涪陵的游击队必须打出红旗，正式编为红军。“集中武装，猛烈扩大红军”，是现时党在游击与农民斗争区域中的主要口号之一。反对地方主义，反对保守观念，反对上山倾向，是扩大红军的主要前提。深入土地革命斗争是红军发展的政治基础。肃清富农路线更成为扩大红军的先决条件。

四川党对于办团的同志，不但不加以指正，反而予以赤卫队的总司令的名义，是非常错误的。这种办团的方法，绝不能发展成为红军，因为根本不是建立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与军阀土匪之招兵买马毫无分别。党须坚决纠正同志的这种投机取巧的错误倾向，尤其要防止拿某种名义去敷衍那些同志。

(2) 红军发展方向

中央站在布置全国工作的观点上，指出四川的红军在重庆以西者必须首先坚决向川东发展，下川东的红军必须积极沿长江两岸向鄂西发展，为争取武汉的首先胜利，这是绝对必要的。你们规定下川东的红军只是逐渐向长江两岸集中以便堵截军阀军队，是不够的。你们这样规定便是由于没有站在全国工作的观点上。对于四川的红军，虽然成都与重庆是主要的发展方向，然而站在全国

的观点上，其总的方向，必须向着湖北，尤其是下川东的红军必须直接向鄂西发展，不坚决执行这一原则，便是严重的地方与保守观念。但在执行这一路线时，你们必然遇到许多障碍，这需要你们做很大的斗争，只有坚决与地方、保守及右倾的观念斗争，然后才能正确执行红军的积极战略。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必须是在向交通要道与主要的城市发展的条件才能集中，才能扩大。如果目前固定几个地点，为红军集中之所，亦是严重的保守观念，亦根本不能集中红军。

（3）红军的游击战略与土地革命

红军的游击战略必须是以集中的原则向着交通要道及主要的城市发展。在这一战略下，必须坚决与一切右倾，如兜圈子、上山等斗争；同时必须坚决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以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游击战争，加入红军。在可能的条件之下，必须召集群众大会或群众代表大会，组织一区、一县的苏维埃，给群众以政权的观念。土地革命愈深入，红军的政治基础愈巩固，如是，则动摇敌人军心的可能亦愈加多。地方党及群众的组织，决不应跟着红军游击。

（4）政治委员制，政治工作与红军

红军的任务，不仅在消灭敌人的武装，武装工农群众，而且要做群众的宣传鼓动与组织者，它负着异常重要的教育群众的责任，因此，红军本身的政治工作便非常必要。四川现在的红军中政治工作尚未开始，这样，便容易使红军单有军事上的作用，而且红军士兵如缺乏政治教育，亦必然减少了它的战斗力，削弱它与群众的关系，这亦是减少土地革命的斗争力量。因此，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必须马上开始，同时党必须派遣得力的同志为政治委员，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地位，使党的策略路线得以在红军中实

现。但同时必须防止军党对立，或以党治军的不良现象的发生。

（5）红军中的指导机关的改造

目前四川红军中的领袖，有收千担的租者，有收五六百担者，这种地主的成份留存在指导机关内，必然妨碍土地革命的深入；至于反对一部分豪绅而保留一部分新式豪绅，更是严重的错误！这样领导者其本身便成了豪绅地主，红军倒反成了他们个人的武装。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这样指导机关必须根本加以改造，排去一切地主与富农，建立新的指导机关。

（下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省字通告第七号（农字第一号）

（1927年8月13日）

各地负责同志：

1. 我们四川的经济情形差不多整个的尚在封建式的农业社会内，所以我们党在四川的工作，农民运动要算是唯一的重要，我们四川党部的基本力量，亦在农民群众身上，今后我们的同志大部分要到农民群众中去。就是以全中国来说，农民运动亦算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第五次代表大会，特别从详讨论决定我们现时要进行土地革命，喊出“土地国有”的口号，并确定国民革命中之农民政纲七条，大意如下：

（一）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其权应付诸土地委员会，土地分配的方法，皆由土地委员会决定之。

（二）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但属于小地主的及革命军人的土地，可不没收，并于革命战役完终后，分给土地于兵士耕种。

（三）耕种已没收的土地之农民除缴纳累进的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税。耕种未没收的土地之农民，亦只缴纳确定之佃租，不纳其他杂税，并此项佃租，减至与累进税相当程度，且农民有永远租佃权。

（四）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之乡

村自治政府，对农村各被压迫阶级所组织的乡民会议负责，农民协会并当参加民权的乡政府之创造。

(五) 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

(六) 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农民的消费生产信用合作社，改良水利。

(七) 取消重利任务的利息，限制重利盘剥，规定最高限度的利率。

这七个政纲是我们目前农运的标准及目的，我们应斟酌环境，逐步谋其实现。

2. 我们四川的政治环境与湘鄂赣不同，我们农运的策略，当然也有变更，尤其是在目前这种整个反动形势之下，与三·三一以前的方法都不一样。我们今后的方法，大部分或全部取秘密形式。我们的策略，当以贫农为中心作坚固之团结，为将来发展之核心。从前我们只图多而未着实际，某处农协号称几百几千，然一遭打击便完全瓦解。我们的力量完全等于虚用，这是由于我们未把基础打稳的原故。今后我们要注意先作少数勇敢忠实分子之训练，使之坚固团结，造成农民运动的核心，有自动争斗之可能，不致因某一同志之逃亡，而致复归消灭。我们应利用种种机会或联络一切势力，以反对军阀之苛捐杂税、预征钱粮等，或结合中小农民以反对团阀之专横压迫、重利重租……等。总之，我们的工作，要切实实际，要有下层基础，要造成发动运动的核心，要这样才能获得多数农民之信仰而少遭失败。

3. 今后凡市委、县委、直属区、特支都应有一委员（市、县、区委）或指导员（特支）负农运专责，他在委员会指导之下，指挥该范围内的农民运动，调查关于农民之事项，定期向省

委农民部作报告等，并须于最近将各特派员（无论从前的或新自中央农所归来的）与当地专做农运工作同志的姓名及其通询处，汇录前来，以便考查。

4. 我们的党应建基于工农群众身上，所以在农运中不应发展我们的组织，我们应在乡村中选择中小地主以下的（特别是贫农）、忠实勇敢的农民，使之加入我们的组织来作农运的核心，在最近的将来，各县均应发展本校^①乡村支部。

5. 省委农民部名字今后称冯仁甫。

林蔚叔^②

冯仁甫

十六·八·十三

（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① 本校即本党，当时党内通讯称党为大学，团为中学。

^② 林蔚叔即当时临时省委代号。

省字通告第廿一号（农字第二号） （节录）

（1927年9月30日）

各地负责同志：

（1）四川农运之重要及今后工作的标准与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之政纲等，均于农字通告第一号约略说明。现在蔚叔^①更将此工作的标准从详讨论后，作一工作实施大纲及仁甫^②最近工作计划等，均与你们寄来，望今后即本此标准努力做去。

（2）……到现在各地农运进行情形仁甫不甚明悉，以致无从指导。望各地于接此通告后，即将农运过去工作之经过、目前的状况、今后的计划及方针策略等，作一详细报告寄来。

（3）根据本校组织章程，各县市委内应有一农民部，县市委之下应委托农运工作有经验之同志数人组织农运委员会，以农民部长为书记，讨论各项专门问题。各区委及特支、乡村支部等，亦应有一人专任指挥农运之责。望各地即日将此等负责人员指定后，报告前来以备考查。

（4）各地速将专门做农运工作的同志姓名、履历等即造一表寄来。

（5）各县市委农民部，各直属区、各特支农运指导员，务

① 蔚叔、施省三均为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代号。

② 仁甫、冯仁甫均为省委农民部代号。

于每月将工作经过的整个情形作一个有系统的报告，每两周作一次通讯，有特别事件须随时报知。

(6) 各地报告中所指各乡村市镇等，仁甫不易知其各方位之所在，碍难决定工作及知道其实际情形。在此间市面上又绝不能购得各详细地图。务望各县负责同志即日在本地购买或自制该县详细地图一张寄来。(最好是自制较详清楚，并须加说明某地之重要等)

(7) 我们工作之初步重在调查。除前蔚叔通告第八号附调查表第六(农业调查表)，已可为农运调查标准外，兹更制定农村调查报告大纲及调查表数种，以后望本此等标准随时报告为要。

(8) 要知道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形及农村之痛苦等，也须要搜集多量的材料。现在决定由仁甫办一农村通讯，望各同志时常将乡村的生活状况及农民痛苦情形等，详细笔记不断地向仁甫通讯，由仁甫集印分发各地同志或省内外各报馆机关等，作为宣传资料。这一工作，凡农运同志、尤其是在乡村工作的同志都应负责。

(9) 本校农民的宣传品甚属缺乏，不能不急于编制。各地同志有善于编歌谣、唱本、通俗刊物者，多望本着本校农运策略，多多编辑寄来，审查以后印发各地作为宣传品。

(10) 各工作同志有关于四川农运整个工作上的意见，望随时向仁甫发表，俾我们的工作日趋进步。

以上各项务望立即切实执行，是为至盼!!!

施省三(即蔚叔)

冯仁甫

十六·九·卅

(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 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

（1927年9月10日）

党的五次大会，对于农民问题有详细讨论，其中心问题，就是土地革命问题之急进的解决，及乡村农民政权之建设。因为要取消封建式的剥削，只有将耕地无条件转给农民，要破灭乡村宗法社会的基础，必须取消豪绅的政权。过去粤、湘、鄂等省的经验，农民运动，大半以贫农为领导者；有些地方的农民，已经开始要求土地。这种事实，很明显的指示农民运动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现在地主阶级、豪绅，依据反动军队的武力和国民政府的机关，虽然使农民运动遇着了暂时的失败，但这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本党对于农民群众暴动带有机会主义的犹豫政策，没有坚决的革命指导所致；决不是什么“过火”，“幼稚”的原因。由此充分证明紧急会议所指示之正确。党应该准备领导最近期间必然高涨的农民暴动，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

固然四川过去农运工作异常幼稚，在宣传上、组织上都还够不上遽然从事土地革命运动。但我们必须根据过去湘、鄂农运之经验，准备领导以贫农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从原始的暴乱和士绅阶级所号召的抗捐运动，急转直下过渡到土地革命，这是四川农运以后唯一的目标。

当此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亟亟向中国发展，农业经济日渐破产

的时候，四川农民感觉的痛苦，比其他各省还甚。在历年各军阀互相混战中及平日之种种剥削，都是农民吃了大亏。而一般地主阶级，因为土匪之骚扰，感觉生活之不安，于是笼络人民，提倡办团。现在虽有些县份把土匪肃清了，而一般农民头上，却再加上一层团阀之剥削与压迫。兼之各大地主及土豪劣绅的重押重租、大利盘剥与乎物价之飞涨，币制之混乱，更使一般小农阶级日渐破产，贫农阶级连生活都不能维持了。因此，他们要求解放之心，实在比什么迫切，只是在主观方面，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来领导他们，遂至强者有形成原始暴动的趋势，而弱者则委诸天命叹息无法而已。在这客观革命已经成熟而为数众多的农民中，确是我们党在四川基础之所在，因此我们对于农民运动，要用最大部分的力量去干。

过去四川的农民运动，是利用农民协会的名义在号召，虽然有许多县份发生了组织，但只可说是农会运动而不是农民运动。换言之，就是我们的农民运动仅至成立农会为止，没有进一步给农民以相当的训练，更未发展我们的组织，造成活动的核心，所以一遭打击便完全瓦解。其次是少于做为农民自身利益的争斗，虽然做了一些抗捐抗税的运动，结果是地主阶级获得了利益，而农民只是跟着地主阶级跑，对于自身痛苦如重利重租，可说是丝毫未能解除。这样注意政治争斗而忘却了经济争斗，使一般农民怀疑农民协会以至于不接受我们的宣传。□……□规定今后工作的方针如下：

（一）一般农民受压迫过久，以及少于争斗的原故，他们很不相信自己有力量能用斗争以解除痛苦。所以我们仍然要引导他们在各种的政治斗争，使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而逐渐引上经济争斗之路。但无论是政治争斗或经济争斗，当然贫农为领导。没

收地主的土地之口号可暂缓提出，而代以没收反动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土地分给耕种农民及无地农民。

(二) 领导农民积极参加一切抗捐抗税□□对战争运动以获其领导权，培养农民争斗的力量。同时要力谋建设乡村自治机关，夺取乡村政权。

我们由斗争中获得的利益及将来□□□之保障。

(三) 在反动局面下农协组织取秘密形式，但在能公开的地方，仍须尽可能的公开以号召群众□□□□或均须注意建设核心及养成领导人才，并发展党的组织于农村中。

(四) 民团运动应注意下层运动，只能拿着上层必须要藉此去建筑下层基础，改换下层组织。如不能以之改造下层或有利于农运时，则此种上层团运应绝对放弃，并力谋常练之取消，根本破坏团阀之势力。

(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

(1927年10月15日)

(一)

紧急会议对于中央关于“政治任务与策略”、“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等议决案，及对于临时省委之批评与指示，均完全接受。照中央正确的分析，中国革命运动现在确已到了一个新阶段；各种阶级力量，已剧烈的变更其结合形势。自三月二十日事变，经四月十二日的上海屠杀，以至七月十五日的武汉政变，革命营垒中的阶级分化，已经表演完结。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其中最激进的所谓左派分子如汪精卫等，已公开背叛革命，完全走入反革命的营垒，而成为最积极反革命力量之一。现在，中国民族解放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任务，已完全肩负在工农运动身上。要实行这些任务，只有工农的革命民权独裁，很坚决的与国际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一切资产阶级直接斗争，而取得工农运动方面的胜利。这样，必须民权革命的急剧的前进与高涨，而且一定要超过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进而没收一切外国企业及一般反革命的财产，直接无间断的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

在各种阶级力量剧烈变更其结合的形势中，因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方面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未能领导工农运动的急激向前发

展，才使资产阶级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但他们现在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冲突及其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均无法消灭，在客观上决难继续巩固其暂时的胜利。如果使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勾结成功，与封建势力联合一致，而巩固其现时的胜利，则中国必陷入“普鲁士”式资本主义之发展，使工农及一般平民更受残酷的压迫，生活愈加痛苦。帝国主义的侵略，亦必越加利〔厉〕害。要战胜这个危机，全赖中国共产党坚决的纠正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很正确的领导工农阶级，实行其一切斗争的任务，推翻一切反动的统治，建立工农民主独裁政权。至于土地革命与农运策略之应用，武装暴动与苏维埃口号之执行，以及利用平民代表会、革命委员会等方法，临时省委决议切实执行。

(二)

中央对于国民党的观察，谓已成了腐烂的尸首，赤裸裸的露出军阀的残酷面目，不能再为一般民众所信仰。而过去我们的左派运动，亦徒然费力，毫无结果。以后工农的武装暴动，不必再用左派国民党去号召，而应积极谋苏维埃制度之实现。此种决议，自应执行。现在四川的旧省党部（莲花池党部）刻已表示左倾，同时反对南京与武汉之不合法，诚属进步现象。但此等左派分子，或其他左派组织，必须真能完全接受急进的土地革命政策，方可认为是革命的暂时同道者，领导之来赞助我们及革命的民众，或择优吸收之为同志；不必留着他们为左派挡场面，以为左派团体有永远存在之必要，更不应再用过去的策略，积极制造左派国民党，以图扩大革命声势，或以同志冒称左派，以冀从上而下，获得若干发展机会。这样不独在事实上毫无成绩，反足以引入机会主义的倾向，使党不能集中精力发展工农运动及一切革

命的斗争。

中央对于四川的农运指出四个缺点：（一）只主张政治的没收，不主张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口号；（二）主张做乡村自治运动；（三）有放松农协组织的倾向；（四）主张多发展政治斗争，从政治斗争发展到经济斗争。并谓以后在这土地革命阶段中，农民运动一开始，即须提出“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给农民”、“武装农民”、“一切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等口号，宣传组织农民群众，领导他们从抗税抗捐抗租抗粮的斗争，一直发展到暴动夺取武装，夺取政权，没收土地重新分配；并与城市工人平民的革命势力联合，完成民权革命。中央这种批评及指示，临时省委经过讨论的结果，亦完全接受。现在四川的农民运动，却太幻想。除宜宾、綦江、彭县、江北等县外，几全无基础。以后要按照中央指示，积极发展各地农运，特别在川东一带，应马上领导农民起来，很剧烈的作反对军米、反对公债的斗争；而且很普遍的宣传四抗及耕者有其田等口号，组织农协，夺取武装，进而实行暴动，没收土地，占据乡场以至于县城，残杀豪绅地主，解散驻军以及团阀的武装，建设农民自己的农军，而使一切权力归于农民协会。

最关重要的是，中央训令四川临时省委时时不要忘记我们是正在准备或组织工农暴动。在这个目标下，不仅要改正我们党的策略上的机会主义，而且要改造党的组织，使之成为真能领导暴动的布尔塞维克党。又在四川党部过去的历史，不但没有群众，而且党中各种小派别互相冲突，闹意见的习惯已经很深。现在四川党的组织上，应当一面与机会主义奋斗，一面与这种坏的习惯奋斗，改变成一个群众化、争斗化、集体化的布尔基〔什〕维克的党。省委考察各地党部的组织，实觉甚不健全。同志成份百分之

九十五以上尽属知识分子。最近如宜宾、邻水等地，因同志个人之间闹意见，几使党的组织完全破坏。今后各级党部，应切实执行党内讨论，重新组织；洗刷一些小资产阶级积习太深的分子，另行选拔积极分子起来负责。以后如再发现提出派别问题或私人互相攻击，致碍党务进行者，当即严重处罚，以至开除。尤当注意的是，各级党部应留心从斗争中尽量吸收工农分子，积极发展组织，以重新党的生命，而使其从研究的小团体，变成群众的争斗的政党。

(三)

此外，紧急会议对于同志各种怀疑的不同的意见，尚应有一切实在的批评与答复：

(一) 以为本党主张没收小地主和靠土地生活者的土地，足以破坏农村中的革命联合战线。殊不知在此土地革命急剧发展的时候，小地主及一切土地所有者，在严格的减租条件下，因切身的利害关系，必易受大地主的影响而趋向于反革命。现在除贫农、自耕农及其他同情土地革命者外，已无农村革命联合路线之可言了！况在土地革命根本打破土地私有制度的观点上，以及农民革命情绪紧张时的直接行动中，事实上均不能不连小地主的和一切私有的土地一同没收，重新分配，这是用不着怀疑的！不过在实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初期争斗中，可斟酌当地情形或暂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以图破坏地主阶级的联合战线，而增厚贫农的声援，但这仅是实现此政策的一种手段而已。

(二) 以为现在完全抛弃国民党，足以使一般小资产阶级不得不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且苏维埃口号系属外国名词，亦不易使群众了解而且接受。这完全是迷惑于旧的成见，而未看清现在的

小资产阶级是已经起了分化，而非整个的了。在各种阶级剧烈的变更其结合的形式的时候，一般上层的动摇的犹豫的小资产阶级如汪精卫等，早已揭破其虚伪的左派面孔而成公开的反革命了。其有因感情驱使而自称左派的，亦必迟早变成反革命，虽竭力去拉拢组织他，亦属无益。而下层与工农痛苦密切相关的城市平民，如手工业主及乡村自耕农等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则亦必自然投入工农急烈革命的营垒，受本党领导，努力于土地革命，用不着另有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去代表他们的利益。况现在的国民党，已成了腐烂的尸首，根本不能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大联盟；且分化后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其力量决不足以与工农革命势力鼎足而并列，据本就不需要一个什么代表工农小资产的革命联盟的政党。因此，本党决定组织工农民主独裁的政权，喊出苏维埃的口号而准备促其实现。这个苏维埃口号，虽然是个外国名词，但是工农民主独裁政权的具体表现，可举苏俄许多现成的事实，给以明白的解释，实比什么名称繁长的委员会使工农群众更为较易了解。若谓外国名词即为洋奴化，则不过是资产阶级造谣的借口；工农是决不会有这个感觉，因为在他们看来亦不过等于机器、引擎、马力、肥田粉……等新名词一样。况什么德漠克拉西、巴力门、逻辑、乌托帮等外国名词，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都已说得烂熟，独对于苏维埃这一口号便会不了解不肯接受吗？那只问他革命不革命！

（三）甚至谓本党近来只知注意农民暴动问题，而有忽视城市职工运动及军事运动的倾向。这更是忽略事实，近于臆度。本党关于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在各种出版物中，不知申述过多少次。其次关于工农运动的决议和计划，亦从未见有忽视工运的倾向。就事实而论，在上海三次暴动及武汉同盟罢工失败

后，虽然党极注意于两湖秋暴之领导，但武汉三镇、长沙、广州、上海等地的工人暴动，亦何时不在积极准备中，不过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当〔尚〕未得机会大爆发罢了。至于党对军事运动，亦始终未曾忽视，不过过去军运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偏重于军队中的上层运动，而现在则极注意于工农武装工作。对旧式雇佣军队，党认为是军阀压迫民众的唯一工具，除对于现时确已参加革命的雇佣军队（如贺、叶等部队），加紧政治工作，尽力促进士兵觉悟，其他反革命的雇佣军队，只有破坏之。现时既已努力于建设工农革命军，从而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开始新的革命军队的征调，已算是谋进一步的发展了。此外军运中之会匪运动，亦较前大有进步，而已收了不少的实效；各地都值得努力进行，以帮助农运的发展。

（四）若谓本党太忽视小资产阶级而太重视帝国主义，欲极力避免与之冲突，这亦不是事实。本党对于小资产阶级只重视革命的，而且已经积极领导之，前言甚详，可不赘述。单就工农民主独裁政权来说，即等于无产阶级与城市平民及乡村农民的政权。所谓平民与农民，均属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如此看重，何曾忽视！至于对待帝国主义，本党始终是尽力反对的，而且认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已到了快入坟墓之时期，本身矛盾极大，并不能联合一致尽力来对付世界的革命势力。但当中国的革命政权尚在新兴未固的时候，当然要暂时避免与帝国主义军事上直接的冲突，而免中其阴谋，受其危害。此时只有加紧经济上的斗争以制其死命，而促进其国内阶级斗争之爆发，等到有利于革命的时机到了，在国际无产阶级赞助之下，自当领导中国工农民众去直接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这不是一个妥协不妥协的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3年第2期）

中共四川省委军事委员会复梁山函

(1927年10月27日)

〔梁山来信摘略〕

1.对该县农民反抗捐款〔，反抗〕豪绅地主的热烈的斗争情绪，应如何领导，或为顾全大局计，应暂时抑制？

2.一部分激进青年，拟对该地豪绅施行“暗杀”手段，我们应否赞助，且与我们过去不主张“暗杀”的原则有无违背？

3.对土匪的态度究竟如何？



□□同志：

接得你们十月二十三日的信，除由省委已函复了以外，我们对此问题，更为具体的指明如下：

(一) 自从武汉七月十五日政变后，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以至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战线而跑入反革命的营垒，实行严重的白色恐怖；另一方面广大的农民群众运动，不特不因此消沉下去，反而激起极大的反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工农政权，已成了中国整个的问题。因此，我们对于各地革命民众的要求，无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又〔只〕要他是能够给反动派以打击，甚至能够破坏现有各种政治经济的组织的，尤其是破坏乡村封建制度的(用各种或任何方法消灭军阀豪绅地主都可以)，

各种运动都须赞助之，并促其扩大，必如此才能够以革命的恐怖反攻白色的恐怖。应不惧失败坚决的进行，从每次斗争中向农民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显露我们的面目，扩大农协的组织，特别尽量吸收勇敢的农民，扩大本党的组织。

(二) 我们自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专以单纯的个人的恐怖(暗杀)为能事，但革命到了此一阶段，我们必须全体动员，施行群众的恐怖正式反攻，“暗杀”亦是反攻之一种方法，当然在必要时是可以应用的，而且须设法鼓励热血青年去做。此时正宜赞助群众用各种反攻的方法向敌人进攻，并应将群众组织扩大起来，运动也扩大起来。

(三) 现时我们对流氓无产阶级应特别的重视，因为他是扰乱军阀团阀等统治阶级及破坏旧社会的好工具，其反抗力最强而亦最有团结性，最能耐久。同时大部分都是破产的农民出身，我们应尽量解释他们自己的地位及将走的出路，使之与贫苦的农民的革命行动(土地革命)渐取连络，同时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以无损于农民而减少普通民众对他的恶感。尽可能的劝阻他们莫接受任何部队的编制招安，因为他一被招安即不是完全的被压迫者，反而成为与军队联合起来为大军阀压迫人民的工具了。此复。

省委军事委员会

十月廿七日

(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中共四川临时省军委关于 军运致中央报告（节录）

（1927年11月5日）

前次报告中已将川省军队大概的内容派别述说了，兹再就一月来川省军事之变迁及我们所进行的工作报告如次：

甲、军事方面

（一）刘（湘）杨（森）冲突。近来刘杨两部均各自积极整顿，如统一财政、饷糈〔糈〕，改编部队，补充军实种种措施，预定于三月四月内，即将准备完毕，以决雌雄。最近杨森欲编掉郭汝栋实权，调他为副军长、副司令等闲职，郭甚愤慨。刘湘乘隙对杨表面表示赞同而实则助郭，盖刘必需新二军系能成立方不致受保定系之压迫。但刘杨防地毗连，纠纷时起，隐患滋多。此时正值杨改编部队，宰割其师长王兆奎后，杨之宿将人人自危，皆不满于杨。故刘与郭暗中协商，拟在二十军部队内倒杨而继以郭，郭让涪陵、彭水等处与刘而自处万县，则一渝一万庶以生存，此刘湘、郭汝栋倒杨之企图也。惟杨见势不佳，又让步挽郭复职，并召集梁山会议以解决之。

（二）刘杨两部改编情形：

1. 二十军杨森内部将改成委员制，设军事行政各委员会。又杨久欲去郭，最近因改编部队，致引起郭汝栋辞职，因各方挽留

的结果，于是该军为解决郭的辞职问题，将召集一梁山会议，以图内部之团结。计杨郭于最近改编后共为十四师、四混成旅、一宪兵司令——第一师长白道成，共三旅——第二师长吴行光，共二旅——第三师长已委陈光仁，因郭汝栋辞职问题未解决，故陈尚未就职——第四师长何金鳌，共两旅——第五师长郭汝栋，共三旅（现郭辞职，另委廖海涛为五师师长，但杨现又挽郭复职）——第六师长王兆奎，约两旅（其十一旅长袁治被免职，团长尤多更易）——第七师长范绍增，共二步兵旅、四独立旅，一手枪团——第八师长王文鏢，共二旅——第九师长杨〔森〕自兼，共三旅——第十师长唐庄，共两旅（现调军部中将参军，缺以喻孟群代）——第十一师长杨春芳，兵额不甚足——第十二师长龚达，号称纯系招抚而成——第十三师师长原为罗觀光，近将委包晓南升任——第十四师长陈兰亭，共七团——独立第一师长刘鸿逵——独立第二师长毛光翔——两部兵额均未详——第一混成旅长喻孟群——第二混成旅长胡民生——第三混成旅长乔得寿——第四混成旅长包晓南——宪兵司令于渊（已编为八师之第十六旅）。以上编制人数仍无确切之调查。就中除范绍增及杨自兼之部分外，其余均是各怀异志的。又其军队以招抚者为多，根基极不巩固，而在其防地内所征之粮税捐款较其他各地亦特别征收得利〔厉〕害，军团时相冲突，股匪随地皆有。因税捐影响，许多小田主都只得弃其田而过流离生活，良田美地竟致荒芜。

2. 二十一军刘湘最近改编结果，共编为七师一混成旅，位置亦略有变更。计第一师长唐式遵，刘先瑜副之——第二师长许绍宗（尧卿），穆瀛洲副之——第三师长王陵基——第四师长罗仪三（纬）——第五师长王治易——第六师长潘文华，郭勋祺（翼之）副之——第七师长蓝文彬，饶国华（弼臣）副之——第一混

成旅长杨启文(国桢)——炮工兵司令张邦本,其余鲜英、郑英两部正在改编。计每师各三团,混成旅则为两团,共已编成二十五团。惟因川省次等军阀新结合的影响,及此次改编中有降职者,有丢实权而仅供闲职者,有编掉者,皆表示不满,于是内部发生许多暗潮。近日永川县驻军李用生师,有一团哗变,即为该军分裂的开始。

(三) 省方军事情形。省方军事现无若何变动,亦因未得彼方报告,只拟载行渝报者述之,惟邓、田、刘(自乾)三部,因地处省垣,屡有欲组织政府以供其发号施令之权能,但此终不过为邓等之幻想,不能成为事实。刘较倾心于唐(生智),邓、田复倾心于吴(佩孚),于是省城方面有反吴与拥吴两种趋势,互相冲突,实即邓、田与刘(自乾)之冲突。同时对渝万方面亦已危机四伏,有谓川中各方正积极准备,将于明年三四月内作一种爆发者。

(四) 次等军阀之新结合。郭汝栋、王治易、李其相(即李家钰)、罗泽洲等谋一新结合,最近拟第一步由郭汝栋辞职问题,利用刘(湘)以倒杨,并疏通刘自乾,如得其赞成时,则同时倒刘(湘)。此刻因时机未熟,酝酿的叙府会议,尚未开成。上月只有李其相、罗泽洲会于蓬溪,闻系先讨论对付渝方办法。但四川军阀非常骑墙稳健,尚不能即时发生正式的冲突举动。

乙、四川的团务

四川团练几乎全体皆握于土豪劣绅之手,各县按人民财产之多寡,强令购买枪支子弹,因此民团枪支之数较军队的枪支多过数倍,其唯一任务在于消灭土匪。但最近以人民生计困难,虽在江津、綦江、涪州、长寿、丰都、梁山、垫江等县民团成绩卓著之地,亦有千百成群之土匪无法裁制。因练费抽收极重,除抽常

年田亩捐每市银洋二角至八角外，还有月捐杂捐等名目。各县多注重壮丁门户练，而常练则较少，只于各办事〔处〕设置听差数名或数十名，然亦间有设置常练至千人之多，着枪支之数，每县至少在一万以上。在巴县的团练则步枪多至五万，连枪在三千以上，实为可惊之数目。团练亦屡有反抗驻军之行动，如长寿、绥江两处的军团冲突，竟相持二十余日之久。最近大竹县抗捐运动冲突，更为极〔激〕烈，军队方面死伤数百，结果杨子惠让步，将白道成师长调防，并且捐征减轻，捐款敷衍了事。至于团练学校各县亦随时举办，造枪厂则随地皆有。我们决定在农运开展之地注意民团工作。

丙、土匪情形

川省近数年来，因团练之积极筹办，土匪几乎绝迹。然自今年5月杨森出兵犯鄂之后，其残兵散将及其他流落之人民多在夔巫一带聚而为匪，中间虽有一部分已被招安（如贺森权等），但未受招抚及不愿受招抚者，则尚存一大部分势力（数目不得其详）。此外在江津、綦江、涪州、长寿、梁山、垫江、广安、岳池等县，近来均有土匪出现，或数百人、数千人不等，就中以小地主以至贫民受苛捐杂税之影响而流落入山者为多。有一部分土匪之头目，则为昔之带有赤化嫌疑或因团练内部发生派别，结果失势，在本地无立足之地者。其对于我们的意见，颇能接受，易与接洽。刻下我们正设法进行此项工作，渐次改变其思想行动，促其打富济贫，不受招抚，并且与各地土匪取相当的联络，这是我们刻下初步的工作。

丁、我们的工作

军委自成立以来，即从事调查各地军队、团练、土匪等详细情形，以及就各地作军事工作的同志组成军事支部。惟川中因交

通不便，兼之经费支绌，不能特派人往各处巡视之，故以致虽有各种议决案及通告、工作计划等，或未普遍的交到，或已交到而很难实际督促其执行。尤感困难的是成都方面所辖五六个军事支部，虽已屡次催促令其移交军委直接指挥，然至今未得到彼方之报告及介绍各军支之信件，以致军委对成都方面的军事消息及工作状况完全隔膜，而军事支部及军运同学^①之详细情形皆无从考核，不能直接指挥工作。刻下省委已派人前往巡视，注意此点。现在与军委发生密切关系的军支有两个：一在二十军第五师内，共有同学六人，其中一为中校团副，一为政治部主任，其余皆为政治教官；又在江防总司令部第三师五旅内，共有同学五人，其中有团长及中校团附各二，余一人为旅部二等书记。这些都是旧有的组织，近刻方开始督促其向下层作新的发展。此外在自流井的工人武装，尚无若何成绩；在团练中有同学十余人，都尚未成立支部。成都附近的军支尚未得报告，不知其详细。但据我们所知，各处军事工作的人数已有五十名左右，若在各处再详细清查，必不止此。我们目前为应付工农武装的需要，正在设法培养军事技术人材，其法为：（一）遣派同志投考各处的军事学校、训练班等，此项已切实执行。（二）拟办秘密训练班。至于左派军人联合会仍在进行，并认定工作目标：一为农民武装，二为民团，三为土匪，四为军人。因农民多属门户练，易于取得武装，民团工作可以掩护农运之发展故也。此外我们请求：1.多派熟知军事技术的同志回川工作；2.请速示军事运动策略；3.发信〔给〕秘密训练班的教授材料；4.请月给津贴，以利工作（因我们拟办训练班及派人参加□□运动，并派人巡视各军支整顿组织，这些事务在初期的时候，都是无款不行的）。

^① 军运同学指从事军运的党员同志。

.....

段勤威^①

十一月五日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2期)

^① 段勤威系四川省委代号。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致綦江函

(1927年11月13日)

□□：

十月二日来信收到了，你向省委建议四项，省委总括的答复是这样：

“工农运动才是我们主要工作，尤其在土地革命的高潮中，更须用全副力量领导农民不断的暴动，从根本上推翻乡村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复古的资产阶级……其他一切工作都是附带的工作……。”这些话简直可说是最近的行动政纲，如果我们超出这个政纲，无论主观是如何革命，在客观方面看来是投机主义的倾向。你们不把党的力量运用到农民运动上去，偏偏不断的来大做其反孙运动，你们以为教育局长不到手，一切工作都无法进行，这种依赖的心理是何等的错误！试问在现在的社会里无产阶级受着严重的压迫，资产阶级军阀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来维持他一切的已得的优越地位，孙一中不是个简单的教育局长而是军阀势力的一个细胞，你们的力量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可以将他推倒！看呵，今天的报纸，已经明显载出刘湘已电令穆旅用武力来制止綦江的学潮了。不怕你们怎样去活动，终久必归失败。最可耻的，你们要省委托人到军部替你们去“吹嘘”，如果省委有这般大的力量来“吹嘘”就可以使你们的目的达到，那末，省委何必要督促你们极力领导工农起来革命！？我们革命工作可以停工了，专门来奔

走军阀之门，尽量的来献媚官府，耍耍政客手腕就够了，共产党的招牌可以收起来，挂上一个研究系或进步党的头衔。照你们驱孙工作及继任问题的决议看来，充分表现了“投机”“乞怜”的状态，同时更犯了“幼稚”“慌乱”的恐慌。如托黎陈等三人向章特派员“吹嘘”，仰承穆旅等驱孙的同情，指定某同志做什么宣传，派某同志向某个人“谈话”，这种种的行动都是新式土豪劣绅的手腕，机会主义者的鬼蜮，不是革命的行动。这种种奇怪现象，都是由于你们没有了解最近党的政策和党的政治任务。你们前次来信说要召集农运同志大会，后来又说只召集少数农运负责同志开会。据我们的推测，并非环境恶劣，实由你们将大部分力量用到驱孙方面去了。不然，试问你们“环境恶劣不能开党内的秘密会，难道还能大闹特闹的做反孙运动么？”啊，这也是马克思的所谓“矛盾现象”吧！？现在省委已经决定，反孙运动应当尽量缩小，农民运动应当尽量扩大，总之我们要用农民暴动的力量去推翻一切黑暗势力（当然坏教育局长也在内），不然是没有出路。如果你们再不服从省委决议，马上给你们严重的处罚。

临时省委

十一月十三日

（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中共四川临时省军委制订的 四川军事运动计划

(1927年11月20日)

为便于实施军事运动起见，特根据军运议决案，拟定工作计划如下：

A. 过去的缺点

1. 没有独立的系统的策略。
2. 没有健全的指导机关。
3. 军事组织与地方组织混合，官阶高的同志不参加党的地方组织。
4. 在军队及民团中未起党团作用。
5. 军运同志少受党的训练，日渐腐化。
6. 全未注意工农武装运动。
7. 在军队中的军事工作未注意建设下层基础，集中并培植自己力量。
8. 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无目的，无步骤，结果不能使军队民众化、革命化，而反使政治工作成为军阀压迫士兵的新工具，欺世盗名的装饰品。
9. 民团运动不切实，未注意建设下层基础，尤未能借此掩护农民运动之发展。

10. 全未注意团结左派青年军人,以协助我们工作之发展。
11. 全未注意调查及秘密侦探工作。
12. 全未注意匪、会运动。

B. 今后工作的纲要

1. 确定独立的策略,积极作武装暴动的准备。
2. 健全指导机关,有计划地发展工作。
3. 在秘密原则下,严密党的军事组织,积极发展党团作用,并提高党的训练,防止同志腐化。
4. 尽最大的可能开始武装工农。
5. 利用旧有军队和民团孕育我们力量,并尽可能以谋集中。
6. 尽可能发展军队和民团中的政治影响,使兵士与团丁多与民众接近,而日益趋向革命,藉使反动部队瓦解,左倾部队成为我们的同盟军。
7. 根据左派运动政纲,分就各地积极组织革命的青年军人,使之在我们的领导下起分化旧部队,拱卫新力量的作用。
8. 开始注意特别工作,指定专员从事侦探调查等工作,并分任会、匪运动。

C. 健全组织计划

1. 在省委军事部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以五人组织之,设书记、部长、兼□□,另设□□一人)管理全川军事运动。
2. 军委应根据省委及中央军委之政策,受军事部长之指导,决定一切军事计划,指导军运同志工作,并代理省

① 军中校务,指军事运动中党的工作。

委指导军中校务^①（整个军事策略应交省委书记或常委会决定之。关于校务方面，军委只有转达权，一切均应交省委决定，但军委有更调军运同志工作权，然亦须同时通知组织部长）。

3. 军委内部工作，应分总务、校务、军机、特务四科办事，现校务、军机二科暂由书记兼理，总务、特务二科暂由秘书兼理，将来工作发展，各科均应决定专人负责。
4. 军委之下，应成立一消息局，其事务由特务科兼理。
5. 军队与民团中的党的组织，应不与地方组织相混合，而另外成一系统。军队以一军或一师（如郭、陈、王、李等有独立性之师）为单位，民团以县为单位。
6. 党的军事组织之系统与普通组织无异，只不设县、市委，在军委下区委为最高级组织，至其人数亦略变通如下：
 - （1）三人以上成立军事支部，只设书记一人；
 - （2）八人以上二十四人以下之支部，得设分为二三小组，组设组长一人，支部设干事二人或三人，成立干事会，以一人任书记，一人任宣传兼组织，或一任宣传一任组织；
 - （3）二十四人以上三十六人以下之支部，得分为二三支分部，支分部下仍分二三小组，支分部设书记一人，支部设干事三人；
 - （4）三十六人以上设军事区委，区委下分支部、小组，不设支分部（有必要时仍可设支分部），区委设委员五人，分任书记、宣传、组织、兵运、调查等职；
 - （5）以上各级组织人数之规定，不过组织上的标准，可

斟酌实际情形，依军师旅团营连的编制而决定我们的组织系统。

7. 党的军事组织应绝对适合秘密原则，同志非同组者，不应互相认识，各级机关的负责人不得越级发生关系，亦不得同级互生关系（得上级许可者例外），组长、支书、部书（原文如此）等联席会议，非必要时均以少开为宜。

8. 各级会议次数宜勤（最少一星期一次），时间宜短（最多二小时），不重形式，只重精神贯注。

9. 报告分三种如下：

（1）每月总报告应分：

甲、□□的□□——内容如：①住地政治状况；②本军变动情形及现状；③高级军官之政治活动及其趋向；④军中各派别的活动；⑤士兵的表示及其要求；⑥军民的关系。

乙、工作成绩——内容如：①对该军应付的策略；②对高级官长之应付；③对上级及同僚之应付；④对部下的军事训练计划；⑤政治训练计划；⑥实施训练后的成绩；⑦实施训练后的反感〔应〕；⑧计划改变的经过。

丙、校务概况——内容如：①总的现象及批评；②各级会议情形；③组织变更及发展概况；④对官兵各方面的宣传工作概况及其效果；⑤训练工作进行概况；⑥同志的错误及纠正后的情况；⑦困难情形及其原因；⑧建议事项。

丁、其他事项——如：①调查工作情况；②临时事件

之应付及其结果；③待解决之事件……等。

(2) 消息报告应分：

甲、系统调查的报告——以详细明确为主；

乙、零碎消息之报告——以广播〔博〕兼收为主，
并注意报告敏捷勿失。

D. 开始工人武装计划

1. 以成都、重庆、自井、五通桥、□□、万县等劳动者集中地为起点。
2. 于每次罢工斗争中领导工人组织纠察队，实行武装自卫与争斗。
3. 罢工完毕后，将纠察队公开或秘密的保存，继续加以军事训练。
4. 以体育会、郊外游戏团等名义给工人以军事训练。
5. 在店员运动中应注意派人参加商团中活动，借以取得武装。
6. 武装分子应慎选忠实勇敢、有觉悟、有牺牲精神者，特别秘密组织，厉行铁的纪律，并集中指挥权。
7. 尽可能开办工人军事训练班，特别慎选优秀分子加以严密训练，以培植工人武装的干部人材。
8. 在新年、清明、端午、中秋及其他例假日和罢工间歇时，应乘机加紧工人军事训练，多作野外演习。
9. 工人的军事训练应与普通军队有别，多注意战斗技术，少习礼节仪式。
10. 武器分白刃、火器二种，在不易获得火器时，尤应尽量利用白刃。
11. 应在工人中特别挑选曾服兵役或曾习拳术技击者出任

教练。

12. 应利用机会夺取军队、民团或土匪之枪支弹药。
13. 在平时枪械应分散密藏，切忌聚集一处，以免被敌暗算。
14. 应尽可能即派军事同志往自井专任武装工人的工作。

E. 农民武装计划（民团运动附）

1. 以成都、重庆、自井附近各县及宜宾、綦江、涪州、大竹、顺庆、遂宁等地为农民武装起点。
2. 尽可能派同志用市民资格参加城厢民团中活动。
3. 宣传农民武装自卫的意义，打破农民迷信团阀的观念，而要求自己武装之独立。
4. 鼓动农民尽量找得武器，勿使集中于团阀一人之手。
5. 尽量反对常练，注意拉拢门户练，使之暗受农协指挥。
6. 派忠实同志打入反动的民团内，努力下层工作。
7. 促进民团中之下部团练，在我们的影响下，进行推翻团阀运动。
8. 多派忠实同志入团务学校，借以培植农民武装的干部人材。
9. 在反抗军阀或军阀互战时，尽量参加军事行动，借以学习战争技术，夺取枪械，并尽可能打倒团阀而建立农民自卫军。
10. （原件不清——编者）

F. 军中军事工作计划

1. 以现有〔为〕我们基础的部队为最大的对象，集中力量渐图发展。
2. 注意发展下川东及川东南的工作，以便与全国军运取

联络。

3. 整顿□部之□团，多派同志充实下层基础。
4. 合□□等同志对外十分灰色，努力取得上级信任，积极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
5. 尽可能秘密增多士兵政治训练（如早晚点名时作精神谈话或多与士兵作个别谈话），使其了解本身的痛苦及其与工农的关系，进而解释土地革命的意义及其与士兵的关系，使士兵稍明革命理论而赞助土地革命、社会革命。
6. 很慎重的在士兵中发展组织。
7. 于必要时设法破坏旧军队。
8. 多派忠实同志进军官学校，以培植党的军事人材。

G. 军中政治工作计划

1. 除原有基础外，当更注意新兴势力中之发展。
2. 应以“促进士兵与工农的关系”、“分化军阀势力”为工作目标。
3. 应注意接近士兵的下层工作，尽可能多派同志为连指导员。
4. 任上层工作的同志，态度宜十分灰色，以取得军事长官的信仰，而便掩护下层工作。
5. 实施政治训练的计划——
 - 第一步应使官兵明瞭本身痛苦的来源；
 - 第二步应使官兵明瞭士兵与工农的关系；
 - 第三步应使官兵明瞭中国革命的性质与意义。
 但一切宣传的口号与文字均应摘引中山、仲恺、□

□、□□、□□诸人的革命成语，以增加宣传效力，而避免赤化嫌疑；尤应根据本校策略，多解释总理遗嘱、三民主义、三大政策暨历次大会的宣言及政纲等。

6. 应多作建立工农兵的密切关系的实际运动（如合组宣传队、募捐队、共演新剧、互派代表联欢、参加会议等）。
7. 做政治工作同志应特别刻苦耐劳，勇敢牺牲，以取得官兵信仰。
8. 做政治工作同志应注意学习军事知识，随同出操，随同作战。
9. 做政治工作同志应兼做调查侦探工作，随时向负责同志做报告，每周至少一次。

H. 团结革命青年军人计划

1. 以忠实勇敢富有革命性的青年军人为对象。
2. 以私人感情及朋友关系为开拓运动的媒介。
3. 应先作宣传使其接受左派政纲，然后再谋团结。
4. 革命青年军人团结的信条应有：
 - (1) 拥护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
 - (2) 实行土地革命，彻底打倒封建势力；
 - (3) 拥护三大政策到底；
 - (4) 拥护革命的国共两党切实合作；
 - (5) 拥护革命的广东革命委员会；
 - (6) 反对宁汉沪一切反动的伪党部伪政府。
5. 此种团体应就各地各军分别成立小团体，不应形成全省或全国的大组织。
6. 此种团体的名称应极灰色。
7. 此种团体的组织最大限度只能采二级制，不应过于严

密。

8. 应多派同志参加此种团体中活动，以谋训练群众。造成有理论的左派。
9. 应谨慎地在此等团体内吸收同志。
10. 应于必要时有解散此种团体的可能。

I. 特务工作计划

1. 调查及侦探工作

- (1) 应责成消息局负管理及计划全责。
- (2) 应在最短期间内将全川各军实在情形调查清楚。
- (3) 应指定各军同志负调查及侦探各军一切情形专责。
- (4) 应指定各地同志专任各地调查侦探工作。
- (5) 消息局应随时指导同志作调查侦探工作的方法。
- (6) 消息局应随时供给省委军委一切材料。
- (7) 消息局应分类整理一切材料，多〔妥〕为保存，以备各方参考。
- (8) 有必要时消息局得商同军委书记及组织部长，特派某同志赴某地短期工作。
- (9) 消息局特别注意取得全军各民团各政治机关及各反动团体的一切消息。
- (10) 消息局应随时选定目标，注意某些反动分子的个人行动。
- (11) 在必要时消息局得收买非同志为本党利益而工作，但须得军委书记之同意。

2. 会匪运动

- (1) 第一步调查同志之与会匪有关系者，另派工作；第二步设法调查各会匪之内容及其趋向。

- (2) 选定同志参加某些较好的会匪中活动，以掩护农民运动，而抵抗豪绅地主阶级之摧残。
- (3) 于必要时运动会匪作助工农暴动之声援。
- (4) 在会匪中向〔相〕机宣传并很慎重的吸收同志，以谋改造会匪，使之成为革命先锋队。
- (5) 于武装暴动失败后为保存实力计，须暂时率众入山□□或与某□合作，借厚声势。

3. 破坏工作

- (1) 设法准备人才及工具，以备必要时应用。
- (2) 选最忠实最勇敢的同志教以爆破学及其他内战知识。
- (3) 调查并测绘各要道桥梁及火药局、军械局、兵工厂等。
- (4) 战争爆发时作扰乱敌人后方工作。
- (5) 在武装暴动时，作扰乱人心，防止敌人进攻等工作。

4. 拱卫工作

- (1) 在可能时教授忠实同志拱卫机关及领袖的知识。
- (2) 在可能时慎选最忠实最勇敢的同志经常练习技击及枪法，以备拱卫时应用。
- (3) 于必要时使前后同志秘密武装起来，实行拱卫本党重要机关及重要领袖。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2期)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拟订 的四川暴动计划

(1927年11月27日)

(一) 主旨 暴动——以农民暴动为中心，土地革命为目的。因四川为农业经济社会，农民占全省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以一省人口约七千万人计算，约占五千余万人。但因本党组织不健全，农民方面，全无阶级意识，所谓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在农民耳鼓中丝毫没有听到，若亟引导暴动以行土地革命，理论上似觉困难；可是有一个特别的客观条件，最足以引起农民暴动情绪的，就是：十几年军阀混战，各个在割据的地盘里头，严酷地向农民身上筹款以作军饷。

四川——从辛亥民族革命以后，无年没有战争，近年军阀小首领有五六个（保定派的——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速成派的——刘湘〈赖心辉附〉、杨森等），统计军队数目，约有二十余万人。各个军阀的军饷来源，除征收各项苛捐杂税外，就是估征粮税。所采用的手段，表面上是地主筹款，而实际方面，完全是榨取农民来的。因地主接到军阀筹款命令后，马上就向农民身上加租——加押（押——又名稳租，地主恐怕农民欠租时，以作扣除的）缴献军阀，并且一年征缴几次（名为预征），有许多县份，已征到后一、二十年的。农村经济，真是完全破产了，因

此农民失业的非常多，失业以后的趋向，就不外当兵——当土匪——及其他流氓式等的生活了（四川二十余万的军队，十余万的民团，有十分之九是失业农民）。现在既有此种客观事实的压迫，引起农民暴动情绪可无怀疑了。不过四川环境极为复杂，军阀和封建势力异常雄厚，暴动计划和手段，务要曲折周密，才能够战胜环境。

（二）农民 农民缺乏统计，详细数目无从调查，今略分四种如后：

1. 自耕农（半自耕农附） 农民中有少数田土可耕，供自耕，在农民经济方面是较丰裕的，数目占全农民约百分之二三。

2. 佃农 有少数押金向地主借贷土地耕种的，在农民经济方面居中位，数目约占百分之二十以上。

3. 雇农（即贫农） 得最低工银代自耕农——佃农作耕种劳动的，生活在农民里头为最苦，数目亦占大多数，约计有百分之七十以上。

4. 失业农 系由自耕农——佃农——雇农中经济破产而作当兵、当土匪及其他流氓式等生活的，数目约有百分之二三，并逐渐增加，此为农民中的特别现象。

农民中的生活，以雇农（即贫农）为最苦，每日最高工银，不到铜币一千，照银币每元平均换铜币八九千计算，仅值银币一角一二仙。至工作时间，每日从天明起至黄昏止，约在十小时以上。以此最低工资，那能够维持家人的生活，真是劳动群众里头最穷苦的人类了。而在农民中又以此占最大多数额量（以全省人口计，约占三千万左右），农民暴动时定以此作主力军和先锋队。还有一物质条件，最能帮助农民革命势力之稳固与雄厚的，就是各县团练枪支很多（全省约有精利枪支在三十万以上，实超

过军阀的武装），不过此种武装，完全在地主豪绅的手里掌握，以作保障自身阶级利益之工具。假如一旦为农民夺取，编为整练的工农军，既有此强大的工农革命武装，那就帮助西南及长江上游各省之农工土地革命成功，固属理想中的易事。

（三）组织 第一步最切要的，须将党组织健全起来，在党的指挥之下，成立一暴动委员会，以筹备暴动诸事项，内分数部，组织如下：

1. 农民组，以组为暴动之中心力量，务须组织健全，以土地革命的目标，夺取国际和反动军队的武装，大杀豪劣，没收地主土地，铲除苛捐杂税并一切封建势力，完全掌握农村政权为主旨。

2. 士兵组，在农民暴动的先前或当中，用诸种方法和手段煽动军队中的兵士或下级军官，或直接用武装帮助农民土地革命，或消极不妨害此种革命运动。

3. 外交组（外交二字，在四川下层阶级口语中，即含有通土匪、袍哥即哥老的意义），以煽动宣传土匪——袍哥——流氓无产阶级，或用武装及其他方法帮助农民土地革命，并妨害有障碍此种革命之运动。

4. 工人组，在农民暴动的先前和当中，用诸种方法和手段，帮助土地革命之成功。

5. 青年组（妇女附），在青年群众中，用诸种方法帮助农民土地革命之运动。

6. 宣传组，专任农民土地革命运动中，对农民土匪士兵工人等之切要宣传，务须适合当时客观的需要条件，而于农民土匪士兵之宣传，更要简要明白。

7. 交通组，专任各地之联络，及其他联络方法和手段，务

要灵通秘密。

8. 总务组，此组任务，如金钱物品等之出纳购给，倘暴动区域中党尚未组织健全时，凡关于土地——工农军士兵的餉项——及其他一切经济等问题，就暂由此组织负责解决。

9. 秘书处，会内决定事项，由此处执行，并对内外负责任。

10. 其他………

（四）区域 斟酌当时环境及情势，决定暴动区域若干个。今假定以上、下川南、川北、川东、川西为五区，每区分设若干支部，暴委地址，暂设重庆，区——支部地址，视当时情势缓〔决〕定。

以上系从理想上暂定的区划，但据目前湘鄂两省，已有相当的暴动预备，兹为连（联）络计，暂以川东之酉阳、秀山几县为初次暴动区域。因酉秀几县与湘西永保及鄂西施鹤等县连接，而在四川方面，地居边境，反动的军队势力不易摧残此革命运动。基此关系，可暂定酉秀等县为理想上的良好暴动地点。

（五）手段 暂定三种：1. 由农民自动的夺取团防及反动军队的武装以行土地革命运动；2. 煽动宣传土匪的武装以帮助农民土地革命；3. 煽动军队内士兵或下级军官同情于土地革命，并用武装帮助农民以贯彻此种革命运动。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2期）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 会议文件(节录)

(1928年2月)

(略)

农民运动决议案

(略)

(四) 四川农民受痛苦既如是之深，又有形成直接行动的客观形势，可惜党过去的农民策略，始终有意无意的拘迷于先宣传，次组织训练，再武装暴动的旧观念，始终没有组织农民暴动之决心，故工作毫无成绩；并且使农民感觉得机械的组织农协，开会训练，毫无实际利益，因此渐渐有脱离党的领导之趋势。今后工作应该以组织农民暴动为农民的中心工作，领导农民从事于土地与政权之斗争。

四川农民既以佃农占大多数，而农民对土地要求又异常迫切，土地革命与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更应该是农民运动唯一的纲领，而领导农民坚决的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由农民苏维埃分配与贫农。

……

……四川农民受预征钱粮、苛捐杂税及重利盘剥之苦痛最深，党应尽量领导农民作抗粮、抗捐、抗税、抗债及抗租之斗争，

使之达到最高形式，以发展土地革命的农民暴动。

至于今后全川农运工作，除尽量普遍发展外，应特别重视江巴、成华、绵竹、南充、邻水、宜宾、自流井、涪陵、万县各地之工作，予以特别的指导，尽量供给以经费及工作人材。

（五）农民运动既然是以暴动为中心工作，故农民组织应该如中央十一月扩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所说，农协当是暴动的组织，而不是类似工会的经济组织。……

（六）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口号之宣传，仍是今后农运中主要工作。对农民应随时说明土地制度之沿革和变迁，使明白土地私有制度之来源，破除其命运的成见。一方面应解释工农的关系与工农联合的意义，使明白彻底改变土地私有制度，只有与城市工人联合，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建设工农民主独裁政权。

……

军事运动决议案

I、工作环境及总的策略

……

在此资产阶级已完全反动，与封建势力勾结，一致向工农群众严重进攻的整个局面下，工农劳苦民众的唯一出路，实只有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使中国民权革命得以彻底完成，而且急转直下，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据此扩大会议认为四川军事运动今后的总策略应该是：（1）努力建设工农阶级的独立武装组织，而积极作夺取武装和暴动的企图；（2）努力加紧兵士运动，破坏军阀武装，并根据革命的失败主义，用工农的武装暴动，以消灭军队屠杀人民的循环战争；（3）努力破坏地主阶级的武装（民团），并在其中秘密成立农民的独立武装组织，而使地主的武器完全转到农民手中；（4）努力使流氓无产阶级的武装组织与工

农组织发生密切关系，而成为工农暴动的助力，并积极领导其自发的暴动，使其成为有组织的高度的争斗。

II、（略）

III、农民武装问题

四川民团组织的成分，大部分以贫农为中心，但民团的领导权，实紧握在地主豪绅手中，而确实成为地主阶级的武装。过去许多同志，往往认民团运动即是农民武装运动，甚至谓不作民团运动，即无作农民运动之可能。这种错误的观念，实是阻碍进行农民武装暴动的主因，值得我们立刻纠正的。不过地主阶级的武装（民团）中，既以贫农为基础，在客观上，实予农民武装暴动以极大的便利。即是说地主阶级事实上已将农民武装训练好了，而且给了农民的武器，待我们努力的，只是一个如何将民团破坏而形成农民的独立武装组织问题。

是故今后农民武装运动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在各地与农协同时发生〔展〕秘密农民革命军的组织，把所有参加民团曾受军事训练的农民，在农民革命军名义下独立组织起来；同时亦应将农协中未受军事训练的贫农，尽可能给予武装训练，以扩大农民革命的范围，培植农民武装暴动的力量。至于对付民团的策略，以后必须取破坏的原则，而绝不能发生利用地主武装保障农民运动的幻想，更不能助进民团之巩固，以为借此造成农民的武装，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将民团破坏，秘密成立农民自己的武装组织——农民革命军，才能将地主阶级的武装转移到农民手中。

IV、士兵运动

过去党在军士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政策，成为整个机会主义政策的最主要的部分。此种错误政策，在四川的影响尤为深沉，故现在在军队中的工作，仍是偏于政治工作与军官运动，而未注意到

士兵运动。以四川雇佣军队之多，普通同志接近兵士的机会本来极多，且极容易，但过去四川的党对兵士运动竟成为普遍的忽视，以致丝毫未能尽到破坏反革命军队的任务。

下略

(原件存四川省档案馆)

中共四川省委制订的四川 暴动行动大纲

(1928年3月)

(一) 暴动的意义——四川农业经济崩溃异常迅速，而工业发展则极迟缓，经济危机与失业恐慌，均有江河日下之势。在这种条件下，封建政权必极动摇，而愈形反动，劳苦群众则痛苦日深，必然更趋向革命了。此时军阀没得出路，惟有冒险混战。工农劳苦群众呢？亦只有武装暴动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现在四川各地的原始暴动，已经从各种不同的形式中不断的发生了！（如夔巫的神兵，川西的教匪，反劣币运动中春熙路的群众怒潮，各地匪势之猖獗，各军团冲突之加紧……等等。）军阀的战争，春荒的危机，又愈迫愈近，亦促在眉睫了。组织暴动，领导暴动，实成为各地党部刻不容缓的工作。因此省委扩大会才坚决的议决于最近二三月春荒期内，必须尽量加紧各种斗争（从在极小的斗争中，也要领导群众去了解暴动与夺取政权之必要），爆发游击式的战斗，爆发不论大小，不择时间，不计胜败的群众武装暴动。从这些各地尽可能爆发的许多零碎暴动中，迅速形成弥漫全川的“春暴”局面。

(二) 暴动的条件——普遍说来，暴动的必须条件是：（1）工农的日常斗争的加紧与扩大，形成激烈的政治斗争；（2）统治阶级的动摇崩溃与社会危机之扩大；（3）一般平民的恐慌，犹豫、动摇，对统治阶级厌恶而反对，甚至同情统治阶级之颠

覆；（4）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之组织，与技术上的准备。现在四川的情形，在客观方面，早已超过（2）（3）两条件了，对第（1）条的□□亦正在原始的自动的发展中而很迫切的急待我们去领导，只是在主观方面成问题的第（4）条此时更要我们加紧工作，立即快马加鞭做去，否则即是对革命怠工。但四川工农受过武装训练者极多，且地主的武装亦多散在贫民手中，所谓技术上的准备，并非□□，只待我们很勇敢的去组织他们，领导他们起来斗争罢了！这样的情势，更足以证明省委扩大会的“春荒暴动”政策是极正确的。

（三）暴动的目的——这种暴动政策的决定，其目的有五：

（1）在四川发展土地革命的影响，彻底打击封建势力；（2）扩大工农及本党的组织及政治影响，迅速形成四川的伟大革命势力；（3）破坏军阀及一切反动的武装，并给迅将爆发的军阀屠杀人民的战争予以重大的打击而使其两败俱伤；（4）推翻一切反动政权，指示群众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出路与方式；（5）扩大社会危机，提高革命情绪，使全川广大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趋向革命。这种目的，无论暴动是否胜利，都是可以达到的，故我们应该极坚决的不计成败的去执行这个暴动政策，因为即使失败，亦等于胜利。

（四）暴动的性质——不过我们应十分明白，暴动是群众创造的艺术，决非单独的军事行动，我们执行这个暴动政策，应以发动群众的热烈情绪，组织群众的伟大力量为最主要的工作。因为我们对敌人的打击，全赖群众的勇气与威力，决非专靠我们的武装力量——被压迫阶级的武装力量，是永远敌不过统治阶级的，但军事技术的准备，亦是必要的，不过不应仅仅于武器之多寡优劣，更不应专作利用军团匪等现成武力之企图，而应很艰苦

的去创造工农的独立武装组织，很巧妙的去尽量利用工农固有的武器（甚至菜刀锄头亦是很好的武器，有鸟枪大刀戈矛更妙）。若避难趋易，以求急效，不着眼于广大的下层的工农群众，而只知连络上层的军官团总和匪首，以图利用若干武装力量来干暴动，这决不是我们和工农群众所需要的暴动，而只是军事投机之表示。因为暴动是群众斗争的最高形式，离开群众，便无所谓暴动。

（五）暴动的形式——中国革命运动是长期的而且是无间断性的，既不能使民权革命与社会革命即自告段落，亦不是一击而中，一蹴而就的。中国革命必然要从各地频繁的游击式的零碎隔离的大小暴动，进而形成某区域的总暴动，再进一步而爆发全国的十月革命。□此时在交通特别不便利，经济基础特别带地方市场性的四川，更谈不上作全省总暴动的计划。现实四川的暴动形式，只是开始游击式的战争，是从各种日常斗争中开始，由杀人放火过渡到游击式的战斗，是各地尽可能爆发的零星隔离的暴动，而非长期筹备、长期连络、等待什么特别的机会、然后约期举行的总暴动。若错认四川暴动的形式，一开始便想主观的计划四川的总暴动，以为要这样才有把握，才不致失败，才可以一劳永逸，马上成功，这是何等的机会主义，这简直是阻遏暴动，取消暴动，结果必同时犯了等待主义与军事投机的两种错误，而决不能形成工农群众的斗争。因此，各地应不等待什么，连络什么，而立即从春荒期开始（简直是即日开始），一直下去，不断的尽可能的爆发游击式的战斗。即是说不要不量力企图占县城或巨大的区域，□费力去建设大规模的军队，以至长久的迟延下去，失了暴动的时机；而是以人数虽少，确是团结坚固的暴动军，经常不断的袭击政府的军队或地主的武装。这种游击式战

斗，所经过的地方，必须发动更多更广的群众，使群众起来自己动手没收土地，屠杀豪绅地主，取得政权。这样必很容易跟着发生巨大的农民暴动，进一步而达到在较大范围内建设革命的政权以至形成更大的总暴动。

（六）暴动的时机——四川的暴动虽然是正待开始游击式的战斗，说不上什么总的暴动时机，但各地组织暴动，应在什么条件下方爆发起来，实是值得注意的时机问题。这个时机，不是由本党主观去决定，而是要各地党部善于捉住客观的时机。暴动的客观时机是：（1）大规模的罢工爆发后，资产阶级滥用军警武装及种种手段加紧压迫，工人群众奋激异常，团结一致向资本家示威时；（2）在抗捐抗税，反贪官、反豪绅，争水利、争田产，闹饥荒、闹豪绅地主的命案……等目标下，广大的农民已起来哄闹时；（3）为反对官吏，反抗捐税，反抗公债、纸币、劣币等原因，已发生罢市潮流时；（4）当军阀混战或军团冲突，工农贫民最痛苦最恐慌，而急欲找出路时；（5）在大规模的水灾火灾发生后，广大群众无衣食无住所，群情汹汹不解决时；（6）由某种压迫而已激起广大群众的反抗运动时……等等。凡适逢上述任何时机，我们都不能轻于放过，必须全体动员，加紧煽动组织，而且领导群众直接行动起来，从□□□□起，马上爆发游击式的战斗，形成较大的群众暴动，或乘时派同志作□□□□的事，以激发并组织群众起来暴动。但是这种时机并非自然来到，必须我们经常的去加紧宣传煽动与组织工作，而且尽可能多爆发并扩大各种日常的斗争。

（七）暴动的区域——四川的暴动，虽是要各地尽可能的干去，但在本党的政策上，终要有特别着眼的区域，集中我们的力量去推动他，使其更能及早爆发，以便影响其他各地。这种区域

确定的标准是：（1）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占较重要的地位的；（2）是工农群众较多较有组织较有势力的地方；（3）是反动势力较薄弱的地方；（4）是农工商业危机较大的地方；（5）有地位上的凭藉的；（6）便于与其他革命势力联络的。省委更根据上述标准，在全省的范围内，特别确定某些地域，而增加其人力上与物质上的补助，督促其及早爆发暴动。各县党部亦应在一县内照样确定其特别重视的地域，而特别集中人力，加紧工作。这也是暴动战略上所必要的。

（八）暴动的先锋队与群众基础——暴动中群众力量之应用，亦须十分得当，方能起积极的作用。普通说来，暴动的先锋队应该是产业工人与贫农。但以四川产业之不发达，无产阶级力量之微弱，以及四川农业经济崩溃之迅速，真正贫农早已不断的坠入□□队伍，而形成广大的流氓无产阶级。这样，四川做暴动先锋队的，决非手工工人与普通农民所能单独胜任，而必要利用广大的流氓无产阶级，特别是正要失业的农村地痞（如教民、神兵、袍哥等），因为他们极富反抗精神，而且憋不畏死；但他们若失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与广大工农群众的监督，必然易为反动势力所利用，而反足以增加暴动的危机。故我们利用流氓无产阶级作暴动的先锋队时，绝对不能用国民党所惯用的发委招安等买空卖空的方式。欲利用其首领，利用其整个的部队，必须设法改变而且严密其组织，使其同化于工农群众的组织中，且须加紧政治宣传，逐渐纠正其帝王、神权、宗法和英雄主义的倾向。若迷于实际现象而忘记反对封建的土地革命的伟大使命，避难趋易，仍欲以帝王迷信等观念利用之以求速效，则危险极大，而且无异饮鸩止渴，此乃为机会主义另一形式的表现，是极大的军事投机主义，必须立即纠正过来。至于暴动中群众基础之培

植，正是我们极伟大极艰深的群众组织工作，也是极重要极必需的。

(九) 暴动的旗帜——旗帜是一种意识与目标之代表，故必要是很鲜明的，因此，各地春荒暴动之旗帜，应该是划一的，而且是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的斧头镰刀大红旗，若仓卒不及制备，亦可使用大红旗替代，惟绝对不能沿用各种会匪旧有的龙旗、八挂〔卦〕旗……等杂色旗帜，以减少暴动的革命意义。此外，如有可能，尚应多备大小各式的红布旗，上书各种简明的口号，如“土地革命”、“耕地农有”……等等以壮声威。其次，参加暴动的群众，亦应以红布系于头上或臂间以示区别。

(十) 暴动的口号——此次春荒暴动的主要口号是：（1）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反动政权；（2）暴动反对军阀屠杀人民的战争；（3）暴动罢工罢市罢课；（4）暴动抗债抗捐抗税抗租抗粮；（5）暴动建设工农民主独裁政权；（6）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7）实行土地革命，耕者有其田；（8）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给贫农及革命兵士；（9）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公司、轮船、矿山，收为国有；（10）工厂归工人管理；（11）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励行劳动法，绝对增加工资；（12）废止一切捐税厘金；（13）取消一切苛约债务；（14）老弱病残由苏维埃国家供养；（15）救济失业劳动者；（16）改良贫民生活；（17）军官由士兵选举；（18）兵士监督军队财政收支；（19）增加士兵饷项，改良士兵衣食住所；（20）收回海关盐税管理权；（21）驱逐停泊川江的外国兵船；（22）驱逐外国传教士，没收教会财产；（23）没收军阀、官吏、豪绅、富商、重利益剥者及一切反

革命的财产；（24）屠杀军阀豪绅及一切反革命派；（25）歼灭屠杀民众欺骗民众的国民党；（26）推翻勾结帝国主义祸国殃民的南北军阀政府；（27）打倒国际帝国主义；（28）建设统一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29）拥护共产党；（30）工农兵革命联合万岁；（31）暴动胜利万岁；（32）苏维埃政权万岁。以上口号各地应斟酌实际情形，使其通俗化，并得酌量增减之，惟不得以改良口号代理〔替〕革命口号（如以“没收中大地主土地”，代理“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等）。

（十一）暴动与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时的唯一劲敌，即是军队、民团和地主阶级所利用的土匪等武装组织。但此种组织中的群众仍是破产失业的工农，他们的生活仍是极痛苦的，只要我们宣传得法，是很容易破坏之，而使其群众带枪跑回工农群众中来，而减少暴动的绝大阻力。否则以我们微弱的武力，要战胜这些劲敌，决非易事。故我们组织暴动时，必须特别注意反革命武装中的破坏工作，其方法是：（1）派遣同志打入该项组织中，在下层秘密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宣传，并于必要时领导一部分群众叛变；（2）多派同志从外面设法与其群众接近，加紧宣传以至吸收为同志，并乘机鼓动他们叛变；（3）多张贴鼓动宣传的图画传单标语于其必由之路及住所、厕所等处，或派同志设法秘密于其所在地散发；（4）多派女同志扮作洗衣妇、缝衣妇，青年同志扮作卖香烟零食者，深入其住所散发宣传品并调查其内部虚实情况。

（十二）宣传与鼓动工作——我们已决心要开始组织暴动领导暴动，必须立即加紧暴动的宣传与鼓动，此时各地党部应尽可能公开党的宣传，多宣传上节诸口号与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河南等省的暴动事实；同时，应尽量督促全体同志，

在工农劳苦群众面前拿各种实际问题，尽量鼓动他们的暴动情绪。在各种宣传的对象中，尤应特别注意贫农、兵士之鼓动。至于宣传与鼓动的方法，有下列诸点须特别注意：（1）宣传应力求通俗有趣，使群众顿〔格〕外容易了解；（2）多宣传省内外革命的事实，以壮群众的胆；（3）明白指示各种问题的原因、结果，各种运动的出路、趋势，使群众之〔有〕所适从；（4）多宣传团结力量之伟大及各地工农的实力，以提高工农的自信力；（5）多宣传统治阶级的罪恶，以引起群众的愤怒热忱；（6）多宣传工农兵匪的关系，以团结一切革命力量；（7）从私人的仇恨中煽动阶级的仇恨；（8）从不安的日常生活中鼓动群众的反抗精神；（9）利用各种临时事变（至极小的）鼓动群众起来硬干；（10）利用侠义观念鼓动的敌汽同情心；（11）用□□□□□□□□手段激发群众热烈情绪；（12）用破釜沉舟的决心，鼓动群众勇往直前；（13）用逼上梁山寨的方法，打破群众游移观念；（14）特别注意鼓动兵匪群众提枪哗变，跑回工农队伍里来。此外对各种群众尚应有特殊的切合其本身利益的宣传口号与鼓动方法，可于上述口号与方法中比较实际情形斟酌交换使用之，切忌很呆板的应用本大纲的口号与方法，以为是万宝全书，可以适用于一切，但在原则上亦决不能相违背。至于暴动爆发后的宣传工作，除尽量公开党的宣传，多召集群众大会，多发革命文告宣传品以扩大群众的政治宣传外，尚应特别注意解释的：（1）暴动的意义及其成功的条件；（2）政权的作用及其意义；（3）革命委员会与苏维埃的形式及其组织法；（4）革命政纲；（5）反革命势力低落与革命潮流高涨的情况；（6）怎样扩大暴动范围与保障革命的胜利。总之，宣传工作之重要，实不亚于军事，尤其是我们被压迫阶级之唯一武器，过去苏俄曾以此战胜一切帝国

主义,我们亦应善于利用此唯一的武器,以战胜一切敌人。对内,我们应有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工作,使每个群众每个战斗员均明敌我的情势,明瞭作战的方略,明瞭暴动的目的与出路,使他们常保持其最高的勇气与自发的情绪。对外,我们亦应有大规模的宣传队之组织,用文字图画口语等方式去煽动敌人群众,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与革命情绪,把敌人的部队完全瓦解哗变,失掉作战能力。此外对动摇游移的广大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亦完全靠宣传工作去吸引他们,使其热烈地来参加土地革命。

(十三) 组织工作——暴动之胜利与否,完全关系于组织工作之优劣。所谓组织暴动,是要使暴动成为最高度最精密的组织,此时不仅党的组织应格外严密,而且特别注意加紧调查工作,以便根据实际情形建立完善的群众的组织与军事的和政权的组织,即使暴动原始的自发的而未经过我们的准备即自动的爆发起来了,我们亦应立即前往领导,使此种原始的散漫的群众自发斗争,马上变成有组织的暴动。兹将关于暴动的各种组织工作中应特别注意之点,指明如下:

A. 党的组织工作——(1) 迅速充实并健全当地党的指导机关;(2) 迅速健全军事科或即成立军委,计划并管理一切军事、特务、破坏……等工作;(3) 在工农兵匪群众中迅速发展支部组织并加紧支部工作,使所有支部均十分健全起来;(4) 特别注意健全群众组织、军事组织与政权组织中的党员,严禁同志的非组织的各人行动;(5) 加紧秘密工作;(6) 在暴动中公开党的名义,大批吸收勇敢忠实的工农兵士贫民分子,并严厉洗刷一切投机腐化分子。

B. 群众的组织工作——(1) 迅速发展工会和农协的组织,特别在军事上的重要区域,应格外注意;(2) 特别注

意设法改变流氓无产阶级的组织，使其更适合于革命的行动并迅速的同化于工农群众组织中；（3）注意用“兵士委员会义勇团”、“兵士革命同志会”……等名称，迅速发展兵士的群众组织；（4）特别注意组织失业的工农，使其成为工农群众组织中的中坚分子；（5）城市贫民亦须注意组织之，或组织于各种手工业工会、店员工会，或另组其他革命团体，可斟酌实际情形决定之；（6）乡场中的手工工人、体力劳动者与运输工人，如人数不多，无单独成立工会之必要，均可组织于当地农协中，以免分散革命力量；（7）工农兵的群众组织，决不能与党的组织相混乱，但必须尽量发挥党团的作用以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8）工农兵的群众组织必须以工农兵本身参加指导机关的工作，知识分子只能站在帮助的地位，不能包办一切，反使群众成为被动的而缺乏自动的勇敢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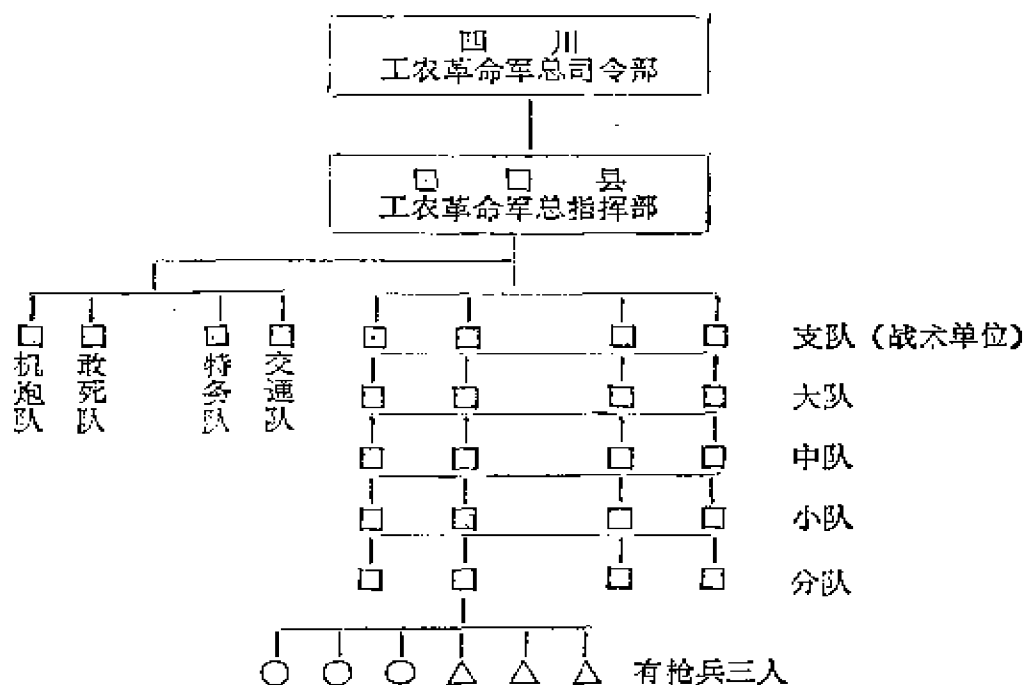
C. 军事的组织工作（可参看军事行动大纲工农武装之部——惟尚有待修改处）——

（1）迅即发展工农革命军的组织，其成分应以失业工人与贫农为主体；（2）凡实行参加土地革命的一切部队（如军队民团土匪）均应改编为工农革命军；（3）工农革命军的编制应尽可能统一之；（4）凡参加土地革命的部队，而不愿加入工农成分遵照改编者，可称工农革命军别动队；

（5）工农革命军的编制法，为四四制，因武装少而须有较大的预备队；（6）工农革命军的最高指导机关为总司令部，在每县可成立一总指挥部，为当地工农革命军的最高指导机关；（7）各县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可斟酌需要设参谋、秘书、经理、军械、交通、特务及政治训练等处；（8）各县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之下，可斟酌需要组织交通队、特务队、敢死队……等；

（9）工农革命军各部队内应特别加紧政治工作；（10）工农革

命军的各级指挥人，应尽量以同志担任之；（11）暴动后应不断的大规模的扩大工农革命军的组织；（12）革命政权成立后，应立即在工农革命军中挑选精干分子，组织政治警察，专负镇压反革命、捍卫政权之职任；（13）工农革命军的组织系统如左^①表：



D. 政权的组织——暴动后的政权组织分临时政权与苏维埃政权二种。临时政权机关为革命委员会，其组织异常简单，可由工会、农协和兵士委员会等团体各推举代表若干组织之。革命委员会的人数为七人至九人，其成分比例，在农业区为农民三至五，工人一，兵士一，其他（必须党员）二；在工业区（如自井、五通桥等地）则为工人三至五，农民一至二，兵士一，其他（必须党员）一至二。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关可斟酌需要暂设军事、土地、粮食、财政、宣传等科，或暂不分科办事而集全力以指导暴

① 原件为竖排，“左表”即“下表”。

动。至于苏维埃政权的系统，必俟全国总暴动时，由中央颁布之。现暂斟酌需要草拟乡村苏维埃农民代表会议与市县苏维埃（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组织法草案如下：（1）乡村苏维埃为乡村最高政权机关，暂以代表四十八至八十人组织之；乡村政府委员则暂定为七人至九人，由农民代表会选举之。其代表与委员的成分，暂拟为贫农占40%，中小农占20%，手工工人占5%，体力劳动者占10%，兵士占10%，革命的知识分子占15%。其办事机关可斟酌实际需要，暂设军事、财政、土地、粮食、宣传、政治、警察及反革命裁判等科。（2）市苏维埃为暴动军占领之城市的最高政权机关，暂以代表六十至一百二十人组织之；市政府委员人数，暂定为九人至十三人，由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选举之。其代表与委员的成分，暂拟为工人（店员在内）占50%，兵士占15%，附郊农民占15%，革命的知识分子占10%，其他非剥削的平民占10%。其办事机关可比乡村政府酌量增加邮电、外交及公用生产管理等科。（3）县苏维埃为暴动军占领之县区的最高政权机关，暂以代表一百至二百人组织之；县政府委员人数暂定为十一人至十五人，仍由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选举之。其代表与委员的成分比例，暂拟为工人（店员在内）30%，农民30%，兵士15%，革命的知识分子15%，其他非剥削的平民10%。其办事机关之组织与市政府同。此外在暴动后的政权组织中，应尽力肃清旧官僚、政客、豪绅、地主、富商、买办、资本家、重利益剥者、僧侣、教徒等及一切反动派，并绝对保障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于必要时，政权机关可用政治权力集中粮食与现金，以免动摇革命的基础。

（十四）军事计划——暴动是群众的军事行动，是直接的武装斗争，举凡一切军事行动，必须有根据当地实际情形而决定的

整个严密的军事计划。此种计划之适用与否，尤与调查工作有密切的关系。故在未开始军事行动以前，应有长期的精确的调查与侦探工作，应不致发生重大的错误。兹将军事计划中应注意之点，指示如下：

A. 战略方面——（1）说明暴动的环境及时机；（2）说明暴动的任务与目的；（3）说明敌我的各方情况。

B. 战术方面——（1）分析敌人的军事力量；（2）估计群众的革命势力；（3）如何利用地形与确定时间；（4）如何配备各部队；（5）颁定各种旗号口令；（6）决定各部队的任务与集中地；（7）说明进攻路线与进攻方式；（8）说明预备队的分配及应用方式；（9）规定警戒与侦探之任务与方式；（10）规定给养与弹药的补充方法；（11）与友军如何取联络；（12）说明胜利或失败后的收容地点与方式。

C. 主力军与友军的关系——暴动的主力军自然是真正工农自己的武装，其他同情的友军和当时解决反动的友军，如未经改编的军队、民团、土匪等，虽然有时是首先发难的先锋队，但终与主力军有别。所以：（1）主力军应自动执行一切任务，勿过于迁就友军；（2）主力军决不能牺牲已得的胜利和固有的任务，而与友军讲联合战线；（3）主力军在一切战争中均宜站在主体地位，不能放弃任务而退居于客体被动地位；（4）主力军不能存依赖友军之心；（5）主力军与友军在战争中不能互相等待；（6）主力军应设法去同化友军；（7）如友军有反叛□□□于必要时，应毫不迟疑地先解决友军而后对付敌人，否则后患堪虞，实为失败之主因。

D. 加紧特务工作，善用暴动战术——在暴动的战斗中须善于出奇制胜，以少击众。故：（1）应有特殊的武器（如炸

弹、地雷等)；(2) 应有巷战的计划与准备；(3) 应有优良的侦探工作；(4) 应善于破坏敌人的交通；(5) 应善作扰乱后方的工作；(9) 应多用偷营、袭击、佯攻、包抄等方法，而少作正面的攻击。

E. 猛力进攻，逐日求得新进展——保守与退却，均是灭亡的征兆。故：(1) 应于拂晓或深夜迅攻敌人之不备，以取得意外的胜利；(2) 若敌势较弱，而我们武力又稍多时，则应乘初发动时最高度的勇气中先攻敌人主力军，以免逐渐增加斗争上的困难；(3) 若敌力雄厚，而我们武力又极微弱时，则应先袭击敌人最脆弱处，以提高群众勇举，而动摇敌人阵线；(4) 在每次受挫折后，必须尽可能以谋反攻，而且努力取得相当胜利，甚至最小的胜利，以免群众因受打击而颓丧起来；(5) 在胜利后必须继续乘胜进攻，以免涨群众的□恣，而给敌人以反攻的机会；(6) 进攻敌人，须以精锐集中于一点，可易获胜。

F. 掠取武器以扩大实力——革命的军事力量，在未完全胜利之前，是绝对不及反革命势力之强大，尤以武器不足，是斗争中最大的缺点，故暴动一开始，即应特别注意掠取武器，不断的扩大实力。所以：(1) 开始暴动即应选取敢死队猛力袭击军械局、弹药库、造枪厂等机关；(2) 当战争时善用敢死队迅速冲锋，以夺取敌人的枪弹、机关枪、大炮等；(3) 多派农民伴〔扮〕着十分老好模样，设法接近敌军，为之作挑夫、响〔向〕导等，而乘机夺取其武器；(4) 作战部队每一枪必须佐以徒手或刀矛一二人，一方使自己的枪不易损失（因为死亡一个马上可以补上一个），一方亦可乘胜多夺得敌人的武器；(5) 各部队每日均须点验枪支最少一次，察其有无遗失损坏，并详告保存修理和应用的方法；(6) 煽动敌军兵士，提枪跑回工农方面来；

(7) 每次胜利后，应尽量扩大实力；(8) 将失败时，即须注意搜集良好武器，密藏以备后用。

G. 注意警戒，防被敌人包围——暴动爆发后，敌人每每调集大军，大举包围。我们必须注意：(1) 不论日夜，皆须有严密的步哨；(2) 深入敌人防区，侦查一切；(3) 暴动军应常聚集于一地；(4) 暴动军应多方面袭击敌人，使敌人莫知我们实力所在；(5) 特别珍藏良好武器与特别保护指挥机关。

H. 有计划的退却以减少损失——我们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应退却，除非已经是敌人大举包围，我军完全解体，或群众死亡过多，弹药无法接济，否则是决不能轻易退却的。就是退却亦应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退却，而非闻风先逃，各自奔避。所谓有计划的退却，即是说：(1) 绝对不投降；(2) 绝对不乱跑；(3) 绝对听从命令，依次互相掩护而退；(4) 收集残部，入山□□；(5) 解散大部队，使其恢复旧业；(6) 暗藏枪支，保存秘密组织。

(十五) 政权问题——暴动的目的，是要夺取政权。但政权的形式及建设的时机，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兹分别说明如下：

A. 政权的形式——我们需要的政权是民主独裁制，是要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且实行革命的民众独裁的。这样，我们政权的形式，尚非因袭资产阶级的代议制，而应别开生面，另创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制。不过苏维埃政权在实施上，只要随着我们暴动胜利之大小而转变其形式的。即是说，在暴动之初期，我们的胜利尚极微弱，且不十分稳定，而仍在游击式战争状态中，只能建设一种临时的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他的组织原则，当然是根据苏维埃的民主独裁制，而其形式则极简单，仅由工农兵群众组织中，推举委员若干人组织之，而不经群众之选举成立大规

模的苏维埃会议，只有简单的委员会办事机关而已。但暴动的胜利，若能较长期的占领某县某市，或某重要区域时，则应迅速组织苏〔维埃〕政府，先由工农兵贫民群众选举代表，组织苏维埃会议，即是工农兵士贫民的代表会议，再由该会议产生负责办事的人民委员会，组织苏维埃政府的办事机关。不过此种办事机关是要绝对受苏维埃会议的命令与监督的，故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与内阁的关系绝对不同，而是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的。县市苏维埃应以工人为主体的，并吸引广大的店员兵士和附郊农民参加，使其确成为完好的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乡村苏维埃则以贫民为主体的，并吸引广大的中小农参加，亦可称为农民代表会议。

B. 政权建立的时期——临时政权的革命委员会，在暴动开始时，即应同时成立，因为他无异是组织暴动，指导暴动的机关，其主要工作只是：（1）如何发动广大群众，自动的没收土地；（2）如何指导暴动，进行游击式的战斗，解除敌人武装；（3）如何处理反革命的豪绅地主、资本家……等。但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工作，应多注意在建设方面，故应有政纲，而且事事当求合乎无产阶级的法定手续，减少暴动独裁的意义故，其成立必在暴动胜利较稳定之后。因为若成立过早，可以〔能〕陷于忽略军事战斗而使群众转移注意于选举，倾向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成见，因而减弱革命的独裁，以至于党的领导权之危险。但苏维埃组织，亦不可借口于军事尚未了结，基础尚未巩固，而故意迟延推挨下去，这是要增加暴动中的军事投机主义，使工农的暴动完全变成攻城夺地的军事行动。故关于组织苏维埃的时机可具体规定如下：（1）暴动势力已占领县城或县市而维持至一日以上尚无意外危险时，可即建立县市苏维埃政府；（2）暴动势力已占领该

县的多数主要乡场，战斗持一星期之久，而仍在继续向前发展时，可即成立乡区苏维埃政府（即农民代表会）；（3）暴动区域虽不大，但确为全县的经济上或军事上的中心地点，且已经维持一星期尚有进展希望时，可即成立乡苏维埃政府。

C.此外关于政权问题，尚有应注意之点如下：（1）在一切政权机关，绝对的起党团作用，严禁同志的个人活动；（2）在一切政权机关，绝对肃清一切腐化恶习，办事手续应特别简单敏捷，且切合群众的需要；（3）政权机关的办事人，应绝对工农化，尤其在衣食住方面，应与工农无异，且常与工农群众多接近；（4）尽量发挥群众的意识，绝对不能以政权机关压迫群众的越轨的革命行动；（5）对□□问题绝对不能有没收标准的限制；（6）特别严重的注意军事财政及粮食问题；（7）迅速颁发革命政纲及各种有利工农有利革命的文告，并多作文字与口头上的宣传；（8）尽量扩大本党与工农和军事的组织；（9）严厉肃清反动分子，绝对实行革命群众独裁；（10）相当利用非阶级的技术人才，而予以严重监督。

（十六）暂行政纲——各地应详细讨论，如发现不实用处，应迅速报告省委，以便斟酌修正，并须根据此政纲详定本县暴动时更具体的政纲。

A.政治组织

（1）根本铲除封建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建设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2）苏维埃政府是工农民主独裁制的政权。

（3）凡二十岁以上的工农兵士贫民及一切革命的平民，不论性别、籍贯，在当地居住者，均有选举权。

（4）地主、买办、富商、豪绅、店主、庙主、僧道、教

士、高利盘剥者，旧的文武官吏，一切剥削人者，及一切反动派（如国家主义派、新旧右派、诚学会以至工贼、奸商……等），均剥夺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废除旧的一切行政、司法、警察……等政府机关，及一切旧有的政治制度，并取消旧有的一切政治特权。

（6）苏维埃政府有管理所辖区域内一切特权。

B. 军事组织

（7）解除军阀团阀及一切反革命的武装。

（8）解散一切旧有的雇佣军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

（9）革命的工农普遍武装起来，并依军队编制组织之。

（10）组织政治警察，专负镇压反革命、拱卫政权的任务。

（11）工农革命军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是革命的自愿兵，应以觉悟的革命的工人农人为主要成分。

（12）工农革命军中当组织独立的集权的军需供给机关，由苏维埃政府直接管理之。

（13）工农革命军与政治警察中，当绝对实行党代表与政治部的制度。

（14）工农革命军的财政收支，将由兵士委员会监督之。

（15）工农革命军的军官，得由兵士委员会推举之，但须经上级机关之核准。

C. 土地与农民

（16）无代价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完全归组织苏维埃政府的劳动平民所公有。

（17）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归之于农民，租田制与押田制完全废除，耕者有其田。

（18）分配土地权归农民代表会议（即乡苏维埃），其分配

标准视每户农民的耕种力而定，不许任何农民霸占多地，雇人耕种。

(19) 一切祠产、庙产、会产、学产、官产、公产及一切教会的土地，一律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

(20) 一切森林、矿产、盐产，完全归苏维埃国家所有。

(21) 整顿水利，改良灌溉，防止水旱，预防饥荒等工作，由农民代表会议执行，并由苏维埃国家赞助之。

(22) 苏维埃政府要发展农村合作事业，建设农民银行以改良农村经济。

(23) 苏维埃政府要尽量供给农民的耕牛、农具、肥料、种子。

(24) 苏维埃政府要颁布保护雇农、苦力的法律，并努力设法保障苦力、失业者的工作。

D. 产业与劳动

(25) 军阀、官僚、买办、豪绅及一切反革命派的财产，完全没收，为苏维埃国家所有。

(26) 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公司、矿山、盐井、铁路、轮船等一概没收为苏维埃国家所有。

(27) 散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改良贫民生活，救济失业的劳动者。

(28)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手工工人、店员的工作，至多不得超过十小时，夜工六小时。

(29) 颁定劳动法、工厂法及社会保障法规，并绝对厉行之。

(30) 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及与生活程度相适应的增加工资的比例。

(31) 规定每星期休息一日，一切革命纪念日及新年节期日亦完全休息，照发工资。

(32) 工厂归工人管理（造币兵工厂、药厂例外），绝对保障工人的监督生产权。

(33) 女工产前产后休息八星期，照发工资，并由苏维埃政府特别补助之。

(34) 未满十五岁者，不应工作，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青年工人的工作时间，为每日六小时，同样工作得同样工资。

(35) 废止野蛮陈旧的学徒制度，一切工作技能，由苏维埃政府设立职业学校教育之。

E. 经济政策

(36) 废止一切旧有的财产机关及捐税制度。

(37) 取消一切捐税厘金。

(38) 取消一切苛约债务。

(39) 在军事时期，得由农民代表会议斟酌实际情形征收农民剩余粮食，以充军饷。

(40) 禁止私人买卖粮食、燃料、食盐，由农民代表会议公买公卖之。

(41) 糖、茶、肉类、布匹、棉花及其他日用必须品的价格，概由苏维埃政府规定之，严禁奸商任意抬高市价。

(42) 苏维埃政府的财政，完全公开。

(43) 苏维埃政府除向有产阶级严重征收产业税外，只有轻微的单一的统一税制，每年仅于收获后征收一次，以办理地方一切建设事业（如水利、交通、教育等）。

F. 社会政策

(44) 绝对废止不平的阶级制度，歼灭一切不劳而食的寄生

阶级。

(45) 苏维埃政府应尽量维持革命的秩序，并特别保障工农兵士贫民的安宁。

(46) 政治警察在搜索反革命时，应尽量保障一般平民的安宁。

(47) 苏维埃政府对潜伏的反革命的生命财产，不负任何保护责任。

(48) 苏维埃政府应尽量增加教育经费，发展乡村义务教育及城市的平民教育。

(49) 苏维埃政府应于工厂和乡村中，尽量增设通俗图书馆、阅报室、俱乐部、电影院、说书场、新戏园等文化机关，并尽量多派宣传员、化装讲演队等深入各工厂各乡场各街道，以普及革命的和常识的教育。

(50) 苏维埃政府绝对保障一切革命团体之自由，并赞助其发展，但亦绝对歼灭一切反革命的组织。

(51) 一切革命的民众运动，苏维埃政府均极愿赞助之，并当给以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且绝对保障其安全。

(52) 苏维埃政府应迅速地严密调查户口，以便分配粮食，房屋及一切日用品，并即举行结婚、生产、死亡及迁移的登记。

(53) 凡军事时期破坏的桥梁、道路、电线等，苏维埃政府必尽量于最短时期恢复之。

(54) 苏维埃政府当努力于筑路、修堤、清洁、防疫、救火、防灾等公益事业，以增进工农贫民的幸福。

(55) 苏维埃政府要将一切没收反革命的大房屋、大公馆、给予工农贫民居住，不取租金，并尽可能为之建筑公共食堂、公共澡堂，制备火炉、风扇、家俱、厨俱及一切应用品。

(56) 凡一切不能自谋生存的危弱废疾，概由苏维埃政府分别供养医治之。

(57) 苏维埃政府当建立大规模的养老院、育儿院，为工农兵士贫民赡养其父母、子女。

(58) 工农兵士贫民的一切意外灾祸，概由苏维埃政府负责救济赔偿之。

G. 外交政策

(59) 没收帝国主义在川的一切银行、公司、工厂、商店、学校、医院、交通机关及教会财产。

(60) 收回帝国主义在川的海关、盐税、邮电等管理权。

(61) 驱逐停泊川江的外国兵舰，并没收其商船。

(62) 驱逐一切反革命的外国教士、医生、经营工商业者及一切奸细。

H. 其它

(63) 苏维埃政府绝不干涉人民的信仰自由，但严禁僧道教士干预政权、教育权，及其他一切欺骗剥削行为，并从文化上宣传宗教的流毒。

(64) 一切婚丧等仪式，苏维埃政府绝对遵守人民的习惯，但必至政府机关注册，以便统计户口。

(65) 苏维埃政府绝对保障人民的离婚、结婚自由，严禁父母家长无理干涉之。

刘坚予：《四川政治及党务报告》*（节录）

（1928年5月4日）

南溪农民抗捐武装斗争

今年三月间在南溪东乡因农民反抗驻军筹垫军款，由党团在农协中鼓动，当即号召了群众二千余人，最初用请愿名义向县城出发，行至场上，遇团总出来干涉。这个团总是一个著名的豪绅，农民积怨甚深，见其阻止农民请愿，即由群众起来将他毒打一顿，并将其住宅打毁。民团前来弹压，又将民团枪支提去十余支。于是中止到县城请愿之计划，将所有武装农民编成游击军一连，形成了一个游击战争。但领导同志最初没有暴动的准备和决心，临时又没有计划，并没有提出没收土地，屠杀豪绅口号和办法执行，也没有继续加紧群众工作，于是此游击军遂变成一种土匪性质之行动，没有正确出路。省委得此报告（关于他们一切行动计划没有详细报告），当即决定他们要坚决实行没收土地，尽量屠杀豪绅，转变此一战争，进入土地革命，并以此种游击部队到处去发动群众起来，并加紧各乡农民群众组织，以为援助。同时自井工人罢工方先〔失〕败，并决定南溪与宜宾农民斗争应与自井工

* 刘坚予即刘愿安，1928年4月主持中共四川省委工作。这是他5月出席党的“六大”路过上海时向中央的报告。

人斗争汇合，决定在该三县适中地点设一特委指挥此种工作，派刘远翔同志前往任书记。待刘同志到南溪，前项游击战争因为没有正当出路，似已消沉，又决定重新发动起来，很鲜明的执行土地革命任务。但有几个负责同志反对甚力，最后将县委书记开除，并处罚几个同志，才决定重定日期发动。据昨接重庆省委来信，很简单消息说南溪业已发动，很屠杀了一些豪绅地主，受驻军围攻，已向叙永方向退却。详细情况，还有待于省委将来正式报告。

宜宾农民抗捐武装斗争

今年三月中旬，宜宾白花场农民起来反抗军队筹款，同时宜宾城内党发出宣言援助，并鼓励全县农民起来。驻军当即将同志李筱文、李家勋二人捕获处死，并派兵到白花场镇压，与农民发生一次武装冲突。因城内机关被破坏，县委解体，指挥无人，事前又没有很好布置和准备，于是白花场农民完全为驻军镇压下去，县委至今还未恢复，也没有详细报告。现川南特委已到该地召集同志，整顿县委。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3期）

中共川南特委扩大会议关于 政治问题决议案

(1928年)

扩大会议听了省委代表全国政治报告及特委川南政治报告之后，大会认为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联合向全中国工农阶级进攻的形式〔势〕十分严重，不过，在他们的联合战线同时也充满着矛盾与冲突，尤其是国民党各系和各派政客互相间的矛盾与冲突最为广大。□□中国工农阶级群众在本党领导之下，站在国民党残酷白色恐怖面前，越发增加其革命奋斗精神与□□而且不断的有许多由极贫苦工作出身的士兵，从反革命军队中倒戈来在红军方面，与工农一起为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而奋斗，这足以证明中国工农兵革命潮流之高涨，同时，更足以证明本党新策略——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之完全正确无误。

四川外受帝国主义外货侵略的影响，内受国民党军阀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联合的单独的剥削压迫与战争□□的痛苦，遂致工商业的凋零，经济恐慌，民生困难，一般中小资产阶级都呻吟于苛捐杂税之下，岁岁不可终日。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和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剥削下的工农，再加上今年川西北的旱灾，川南一部分旱灾蝗灾和川东的战祸，更是痛苦万分。所以神兵蜂起于东，教匪啸聚于西，十万工人罢工于自井，反抗资本家的剥

削。几千乃至几万农民群起反抗军阀的苛捐杂税和地主的过分剥削与压迫，于绵阳、中江、罗江、南溪、南川、涪陵、万县、宜宾、大竹、邻水、射洪各地，逮捕知事，逐走驻军，捕杀土豪劣绅并烧毁其房屋……这些严重表示四川工农革命热潮之高涨，而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实是工农阶级唯一的出路。

川南，以地势言，为川西南门户；以经济言，为工农业生产产品——盐米煤糖麦——重要区域。有广大的盐业煤矿运输和马路工人，有江、南、高、洪、雷、马、古、叙……等十二县极贫苦极需土地革命的农民。川、滇、黔三种军队虽因防区问题而利害有所冲突，时时有发生战斗的可能；地方民团与军阀军队虽因垫粮垫□而利害相及，矛盾颇多；然而他们在反赤战线上是始终如一的，联合起来用最残忍的白色恐怖压迫和屠杀我们工农阶级的先锋战士。□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面，本党川南工作应该力求切实与深入。过去，川南各地党部及其党员群众，对本党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新策略，多未能彻底明了，对于暴动问题更多认识不清楚，不是宜宾的盲动和玩弄暴动，便是如南溪的党部怕领导群众的自发斗争面临于等待主义的错误。甚至有不肯艰难困苦地作工农群众有基础的组织工作，而重视土匪及其他运动，欲以土匪及其他的力量完成暴动使命的。此外，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征〔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工作，几乎完全抛弃。今后，当积极纠正过去一切错误，切实相信工农民众的伟大力量，积极而有计划的进行土地革命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之宣传与活动，工农兵群众广大之组织，健全党的组织基础，强大党的指挥力量，努力一切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反军阀战争的运动，用各种方法征取小资产阶级群众在党的周围，坚决的领导工农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以致〔至〕于政治斗争，由各地另〔零〕碎的斗争汇合成川南全川以至于全国的总暴动。

暴动是最危险的阶级斗争，是有条件的。要在工农群众组织有深厚势力的地方，要是一切力量——工农兵的联合——已经配制〔置〕妥当。工农兵有热烈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要求，乡与乡、县与县有相当的联络，而敌人阶级又无强大武装势力可以打碎我们革命势力的时候，才可以暴动。须知党的责任是在宣传组织训练工农阶级群众并领导其斗争，抓住小资产阶级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我们不应该忽略暴动，但也不应该玩弄暴动。要从领导工农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过程中去积极准备暴动。绝不可停着斗争而等待暴动条件之成熟与到来，我们应该紧紧地坚决地踏着土地革命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大道勇猛的前进。

（原件存内江市档案馆）

中共川南特委扩大会议 关于农民运动问题决议案

(1928年)

中国东南各省近几年来资本主义虽渐发展起来，然中部和西部各地仍纯为农业经济社会。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家，中国人口农民占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以上，而□的土地却完全为一极小部分的人封建的特权阶级——地主阶级所〔有〕。农民在这种私有财产私有土地的□□之下，经过地主阶级长期的压迫与剥削，于忍无可忍的情况中，而有年来激烈的农民革命运动之崛起。中国革命重要的是在解决土地问题，故农民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中实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年以来，海陆丰、东江、海南和湘粤赣毗连一带地方农民之武装暴动，实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建立苏维埃政府，组织革命的红军，扫清一切封建势力，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湖北、江苏、河南各地农民有组织的暴动和四川农民普遍全□的自发斗争，如火如荼高涨着的□□，都是证明农民对土地革命有极切之需求，而对地主阶级国民党军阀勾结帝国主义之压迫与剥削，实有不能再忍一日之势。

川南农民生活之痛苦，不减于湘粤赣鄂苏豫皖的农民，尤其是川东川北的农民，川南农民革命性之强烈，也不在东南各省农

民，尤其是射洪、绵阳、罗江、中江、涪陵一带革命农民之下。例如南溪农民因反对国民党军阀苛捐而武装暴动起来，及其失败后尤自动的竭力发展农民协会之组织，越庆符以抵宜宾，前仆后继准备再举，并速〔要〕本党领导他们向敌人阶级继续反攻；荣县农民因激于军阀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屠杀自己和宜宾农民之义愤严重，提出解除反革命军队武装的口号；最显著的为五保镇的农民，因无本党同志在该地领导他们暴动，即自动的武装起来向团阀地主土豪劣绅进攻，震昏荣县的反动社会；威远三多寨农民的减租，长宁县农民的要求暴动，反应〔映〕各县农民异常之容易接受土地革命之宣传和□□□要求革命，都一一摆在我们的面前。其□固然也有因南溪暴动失败畏缩不前的如富顺农民，厌心的如宜宾的农民，如此有少数所谓农民领袖之言行，并作〔非〕一般农民之意□。所以宜宾各地农民一经本党同志之解释与领导，亦即恢复组织继续进行。过去各地党部组织不健全，土地革命既然不能彻底了解，对农运无具体计划，对农运工作也缺乏实际主持人材，而农民革命热情□高，经以（原文如此）缺乏实际之宣传组织教育训练和领导斗争，而多方面都无相当的进步。今后川南农民运动应有下列计划之规定：

1. 下川南二十七县，外加威远、荣县、犍为，应划分为两个中心区域。第一个中心区域为自贡，以资、内、富、隆、荣、威附之。因为自贡有广大的群众和农村警卫队（即民团）之组织，每县平均有枪□万支、武装所有权虽属地主，而掌握此武装者都为最大多数的佃农和农村无产阶级，我们的企图工农联合起来造成一个割据区域，势不能不特别注意资、内、富、隆、荣、威各县之农运（自贡工人运动自当绝对注意），建立伟大的农民群众组织和工农的伟大□……□中心区域为泸、南、宜，以纳、

叙、高、珙、庆、长、古蔺、古宋、犍为……附之。因为泸、南、宜、犍不特为川西南门户，交通锁钥，并且是政治中心和工业县之所；南六县地瘠民贫，不特社会经济艰难，农民很多桀〔勇〕善战。如能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同时即普遍的严密的进行农民协会之组织，则江南各县贫苦农民群众必然在党的领导之下热烈地斗争起来，对建立泸、南、宜割据区域必将予以极大的帮助和得到极大的成功。至于一般农民不特有革命之要求，而且有很充分的革命行动（如南溪、宜宾农民再接再厉的暴动），若泸、南一旦为在工农兵的掌握中，则川南全部可以建立割据区域，推进全川总暴动的高潮，而给敌人阶级以最严厉之打击，甚而至于完全消灭敌人阶级。这两个中心区域的划分，是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建立割据区域以前工作之准备。倘若有一个中心区域动起来，另一个中心区域当然也动起来，才能建立全川南暴动的割据局面。

2. 为加紧农民运动，势不能不赶〔赶〕快培养农民实际人材。为培养农民实际人材，必需〔须〕组织农民训练班，抽调当地农运同学和农民活动分子同志，给以农民问题在理论上和在实际行动上以切实之教育，并集中农运人材分配到两个中心区域重要县份——富、内、资、隆、荣、威、及泸、南、宜、犍、江安、纳溪、叙永、高、珙、庆符、长宁——有计划的勇敢的进行农运工作。

3. 编印农民宣传大纲或党告农民群众书，作农民同志和农运同志宣传的□□□□

4. 编印农民协会组织大纲和农民赤卫队的参考。

5. 在农民协会下，须组织农民赤卫队保护农民阶级的利益，使农民渐进的军事化。赤卫队重要分子应是贫苦而健壮的贫苦农民。

6. 非中农（佃农或自耕农而仅是自给者），贫农雇农民协会

应以贫苦农民为重心，一律不准加入农民协会（原文如此，疑与前句颠倒——编者）凡农民协会会员应该就是农民协会的组织员和宣传员。

7. 在农村中农民运动就是党的中心工作，每个同志都要为此伟大的工作努力奋斗。党对广大的农民群众，要有广大的土地革命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之宣传，广大而又严密的农民协会之组织。要坚决的积极的领导农民日常生活经济斗争以至于政治斗争，要在斗争中去发展农民协会之组织与深入农民之教育训练工作。

8. 农民协会与党的组织各不相同。党是有阶级觉悟有战斗能力的先进工农分子的结合体。农民协会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组织，凡是中农、贫农、雇农、赞成农民协会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阶级的，都可以加入。党是经过农民协会间接的指导农民，不是直接的指导农民群众工作。凡农民之新入党者，即须为他们解释清楚，免得仍如过去将党的组织与农民协会混为一说。

9. 农民协会须在党的指导下切实而有计划的进行，他对于农民的宣传煽动和组织工作，站在农民前面领导农民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以致〔至〕于政治斗争，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扫除一切封建势力。

10. 党与农民协会都要特别注意农村政治、经济、阶级分化、农民生活，及农民、地主武装组织及其数量、质量之调查。

11. 有一部分农民协会组织的县份，须于个半月内一律组织成立县农民协会。有党的组织而无农民协会组织的县份，须于三个月内组织成立县农民协会。

12. 农村警卫队（民团）分子十之八九是劳苦的佃农贫农与农村无产阶级。各地党部须切实的积极的坚决的有具体计划，如到他们中间去宣传煽动，使其分化；择其最好者吸收党，次者吸

收入农民协会；竭力进行破坏反革命武装，以便夺取地主阶级武装武装自己。

13. 农民协会须尽量吸收农妇加入，权力〔利〕义务一律平等，使农夫农妇都集合在一条道上，坚决地为土地革命而奋斗。

(原件存内江市档案馆)

中共川南特委扩大会议 关于兵士运动问题决议案

(1928年)

I. 士兵运动的重要与川南士兵生活。在中国革命已经到土地革命深入建立割据区域争夺城市的一阶段，为要建立无产阶级城市领导权，消灭敌人武装努力，兵士运动是占极重要位置的。在这几经波折而未形成四川军阀大混战，已因种种原因而形成积极酝酿的时期了。但是内部的冲突，部队的叛变，政治的紊乱，金融的恐慌，民生的困苦，这许多现象〔可〕看见反动军阀势力之动摇，军阀制度和反革命政权，在极速的崩溃中。最近刘文辉部与邓锡侯在省城发生械斗，刘湘部之唐潘三也在重庆城内发生冲突，范郭赖部队之给养困难、时有逃跑哗变之现象，就是一个好例证。就是川南属内对之（原文如此）冷（寅车）张（志芳）覃（小楼）之胡黔之岑（炯昌）（原文如此）内部也可看到许多事实。冷部逃兵极多，处罚最残酷。除冷八师官兵因历史关系较好，其余就连伙食都困难供给。胡部在宜、南、江安、南六县一带士兵极苦，多变成土匪，劫掠以维持生活。岑部在叙、蔺、宋、纳，因地瘠民贫，又滥委匪、团为防军，以致其本部不能多打起发，不容易乱敲竹杠，因此生活也就很困难，逃跑也是很多。总之川南军队除廿四军团防区较多，生活稍裕外，余则困苦

到十二万分。一般士兵受了这种牛马不如的待遇，已经不知不觉地起了一种新的觉悟，倘若经过我们的宣传，必容易被我组织。

II. 士兵的内容及士兵运动的方法

A. 士兵的内容 1.新自农村破产出来及失业工人无法谋生而去当兵者，容易接受革命的宣传。2.曾经受过工会农〔会〕的洗礼或暴动败走的工农（如南溪、自贡、宜宾的工农）而去当兵的，更富于革命情绪，更容易接受宣传。3.军队中之“老资格”的兵，他们久经战阵，经验较多，因此取了“新毛汉”的信仰。这种士兵顶有作用，不过比较不容易接受宣传。4.地痞流氓借当兵为名，趁战时可以“打起发”又可达到其吃喝嫖赌之欲望，平时勾结私贩，包庇和运土私货从中取利者，这种士兵不易接受宣传。5.土匪军队，可以为军，亦可以为匪，如胡若愚、岑炯昌两部都是这样。虽以〔也〕易接受我们的宣传，但须特注意其阶级之背影。6.护卫队□兵及手枪队□□，该长官的亲属最忠于官长者，不易接受宣传。

B. 开展士兵运动的方法 □□的编制，以排为单位，在一排中必须有一部中心力量，就是会写会讲或者老士兵，他能替兵写信或助其作事。士兵对这部分人极端崇拜，我们要能够抓住这部分士兵，便容易发展士兵运动。士兵富于英雄思想，很重义气，多用拜把换帖各种方式来团结群众，尤其土匪军中用这种方式是极易收效的。在自井的军队，休假日士兵多在各盐区附近之市上啜茶饮酒，可派工人同志去和他们周旋。在泸、隆、内各县军队，休假日多在戏场，可派人去联合。尚有许多军队□驻□在乡村里的，尤与农民发生密切关系，毫无介意惊异的心里，可派农民同志去联合。综结以上所说，大会规定士兵运动如次：

1.特委必须即建立士兵运动委员会，特委□□在省军委指导

下，负责进行士兵运动。2.在反革命军队中，士兵组织以连为支部单位，排设小组，小组至多不得□□人，除同组人外，士兵同志不得互相□知道某某是党员。团设特派员。只开小组会，不开支部大会，也不开支书和组长联席会。3.士兵组织的发展，须求各连各排之普遍，能做到所在军队每排都有个小组，□有很大的力量，不必再图发展，而要注意到没有同志的排以同去（原文如此）发展的工作，对于积极的非党分子，可用各种名义如拜□同师俱乐会等去团结在党外的群众这个一方面可以团结无党群众。

（原文如此）。4.士兵工作，须特别注意秘密工作。禁止保有名单文件及一切可作证据的□□。一切只是□记于心，传于口□□□此才能保证秘密之安全。5.军队之同志绝对禁止与军队以外的同志发生个别的关系。6.详细调查士兵宣传使其同情土地革命和工农的苏维埃政权，并且同工农联合起来，为工农兵利益而奋斗。8.（原文如此）士兵运动的口号：①发清欠饷，②按月十足付饷，③反对刻[克]扣军饷，④增加军饷每月二十元，⑤反对长官打骂士兵，⑥有病不出操，⑦病兵伤兵要求医药费，⑧兵士不打工农——穷鬼不打穷鬼，⑨不替军阀当炮灰，⑩屠杀屠杀工农的反革命长官，⑪士兵参加工农暴动，⑫士兵要分土地，⑬反对杀逃兵。

（原件存内江市档案馆）

中共川南特委扩大会议关于 宜宾暴动问题决议案

(1928年)

1928年（应是1927年——编者）12月宜宾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根据群众组织及宜宾的政治任务，决定宜宾暴动在1928年3月。扩大会议之后，农民部召集扩大会议，认为过去由一万余农协农民底减至二百余人，决议组织一行动委员会指挥抗捐（预征粮税）。第一步即指定同志十余人，联合会匪数十人合提百花场收款军队一排人武装，再发动各场即开始暴动。此事因联匪失秘，军队知道是应开拔回城，此事便告终止。本年阴历1月4日，省委来信指定佑之为书记，调去何人可后，在这一月（正月）内党完全失掉领导工作人，仅有一个挂名的非常□委员，城市工作因此停顿，对于支部只文件上之指导而已。至列宁纪念日全县动员宣传，正月双十铺七八百人抗捐游行示威胜利，有组织农民群众增加到一千余人。而非常常委便在此时承认为行动委员会，用土匪杀大塔团总，以发动各场农民一直到暴动。各场自大塔杀团总后，准备等待大塔发动后即开始进行暴动。当时行动委员会决定以大塔土匪为发动暴动的先锋队，可是□□到大塔时，因团防将大塔一匪同志之叔捕去，故即停止开动而减少了群众许多勇气。反革命派更派军队围攻东西北三路，抄没同志家产，捕杀城乡本党员。

于是全县白色恐怖笼罩〔罩〕下来，所谓先锋的大塔始终未与任何一种反革命派作战，不过杀了少数侦探而已。宜宾新县委第一次开会（二月廿六日），筱文适于是时被杀，会议无法举行，新县委未得组织成立，故宜校^①组织瓦解，至于无法收拾。十余日（南溪暴动）后由南溪转宜之数同志将城内组织及南岸组织恢复起来，不顾主观客观环境，分派同志在城内外纷纷举火烧城，贴标语和散传单，于是又遭第二次的逮捕，团的组织被秘□……□杀校长□烧学校举行暴动，又遭第三次的逮捕，党团组织破坏，直至现在城乡党团的组织尚未实际恢复到十之三四。

大会认为宜宾当时主客观暴动条件全未具备。既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组织，而且是农民革命情绪低降的时候，也没有相当的工人运动和士兵运动的基础。党组织的数量不少（三百多同志），实〔质〕量则差。且县委指导机关自人可出后，幼〔佑〕之未到以前及到后又赴省扩大会去一月，中间几至无人负责。而军阀预征粮税本来与农民不发生很严重的关系，二三月间的烟苗捐虽关系农民疾苦浅深，□而时期甫至（刚才二月），催收尚未如何紧急，农民反抗热潮尚未等到极高度。在这种情形下面，党只有很细心很敏捷地考查农民协会会员由一万减至二百人的原因，农民当时的实际生活及实际要求，用多种方法去向他们宣传解释团结奋斗之重要，领导他们日常生活的抗捐之经济斗争，以恢复广大的农民协会组织，推进农民的革命高潮，进而至于夺取政权的武装暴动。根本不应该去联络土匪向白花场军队进攻，以发动各场一直到所谓宜县的暴动。因为这样发动群众组织毫无基础，只是以土匪为原动势力之军事投机的盲动。土匪根本没有阶级革命的观念，所〔以〕当土匪的叔叔被捕，土匪便即刻不动；土匪不动，

^① 宜校指宜宾县党组织。

群众的热情减低。而暴动不成，养成农民不信任自己的力量，发生极浓厚的土匪作暴动原动力先锋队的倚性，尤其错误。当党的组织刚刚恢复起来，而又在宜宾城厢内外举火烧城，说是暴动，不特完全表示农民意识的盲动，并且是一种无重〔要〕意义的极简单的报仇行动（因宜宾南溪暴动的失败）。完全是玩弄暴动而不是革命的宜宾的党，先后都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所领导，根本不了解本党土地革命苏维政权之新政策。对暴动的认识完全错误。不懂得暴动的目的是在夺取政权，把暴动当作一种很平常的罢工，于□示威看待，随时随地只要自己想暴动便暴动起来，以致将党与农民的组织，弄得破坏不可收拾，实极盲动和玩弄暴动，不信任工农阶级自己力量之大错。大会议决对于当时宜宾县委非常委员行动委员会及改组织后的好暴动和团在县委员会 宜宾县委（原文如此）应于认极严重的警告。

（原件存内江市委档案馆）

中共川南特委扩大会议关于 南溪暴动问题决议案

(1928年)

扩大会议听了南溪暴动报告后，认为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

今年南溪农民为反对烟苗印花税而武装暴动，实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群众不得已而自发的斗争。缘今年正月（阴历）政府军队下乡向农民催讨烟苗印花捐甚急，一般土豪劣绅的民团长也帮助军阀来压迫农民，农民以无力缴捐，且受军队民团两重剥削压迫，不胜其苦，遂自动团结起来，以武力保障自己利益，反对军阀民团交逼缴纳的烟苗印花捐。如自成团（此地只有团的组织）农民要解决民团大队部，罗龙场（党的县委机关所在地）农民要解决提驻军队的武装，宋家山（隔党的县委机关只二十里）农民要在欢迎知事团练局长及驻军营长的欢迎会中枪毙知事团练局长及营长，并解决随行一连警卫军队的武装皆是。这每次农民热烈而又急切要求斗争暴动，每次均为革命委员会及党或团县委一二委员（因河北只有团的组织）所非难所阻止，因此农民群众对于本党发生怀疑，大部分消极的就纷纷退出农民协会（由正月到二月十七日农民协会由七千人减至二千人）；一部分积极的则准备自行发动，并武装趋〔驱〕逐本党同志，说他们只

想来混饭食而不领导他们暴动（如自成团的农民）。正月十五日宋家山牟家坪两地农民居然自己暴动起来，打了牟坪团总并解除了牟家坪民团的武装，结果虽然交涉还枪，然而民团团总是受农民一顿白打了事。

自农民武装驱逐本党同志，一部分消极的退出农民协会，一部分积极的准备要自己发动起来以后，党才决定领导他暴动（阴历又二月初五日）。为着暴动，说需要调查党的指导力量和整理各项工作，故决定要在十六后才能暴动。当宋家山一个同志（农民领袖）家丧，许多农民都前去祭吊，政府军队一连开拔前来，说因为共产党在那儿开会，把数十桌丧席食得精光。农民大愤，立刻调集二百多农军将一连军队包围，鸣枪迫令缴械，伤士兵二人。军队一弹未发并很恐慌。后由当地党部（支部）下令强迫农民撤开一条路，让军队安全退走，农民益愤！为着暴动，当时党县委员负责同志洪墨生与某某等主张联络覃小楼和胡若愚。后来团的县委书记□□以汉王山土匪助动不确，遂主张不动，并同其他同志□□等说宜宾同志（因当时省委派□□到南溪任县委书记及几个在宜宾事变后到南溪工作）来强□南溪暴动。不久农民烟苗印花捐已缴（□□是农民自己缴的，一部分是地主代缴的），愤恨之余，故不仅□□驱逐我同志。待特委书记自渝过南溪，认为非积极领导农民斗争不可，又决定动，及其离南西上，县委同志又以先锋之土匪发生问题，又主张不动。继又决定动，但前次决定动的时间已因故又改期。及革命委员会书记被捕，县委同志说干不起来。至特委派□□同志来□重振旗鼓，决定要动，初决又二月十五日改至十七日先攻李庄（此时李庄有一连人，城内有两连人），再进攻城。十七日因两路军事不相联络，所以有一已迫进李庄又下令撤退。十九日晚再动，是晚仍未取得联络退

去，二十日早又才进攻李庄。殊我们这次决定暴动日期都先为敌人所侦悉，敌人已先有备，夹攻我们，我乃败退占据牟坪三日。是役死敌二十余，杀土豪劣绅十余，农民和同志共死十余人，特委委员曾君杰被捕已死，南溪暴动即于此结束。

南溪农民暴动后，威远、荣县、宜宾、庆符的的农民都激发起来，纷纷组织农民协会，积极的准备向敌人进攻，甚至有实际进攻行动的，都是南溪暴动给农民群众以好的影响。

至于党在此次事变中则做了下列许多错误。

第一，根本缺乏领导革命精神和革命积极准备，以致由怕领导农民暴动而抑制农民革命，并犯了等待主义的错误。南溪全县当时驻军只有一营（城内二连、李庄一连），地主阶级武装非常脆弱无力。除李庄外其他农村和乡场我们都可垂手而得，因为当时农民协会群众已在七千以上，被影响的农民尚多，若是党在当时能由抗捐的宣传更进而作土地革命的宣传，能由抗捐宣传在农民热情最高的时候进而实行领导农民抗捐斗争，以至于土地革命的武装暴动，党不但能博得农民热烈的拥护，并且可得到暴动的相当胜利。因为自己根本缺乏领导革命的精神和准备革命，所以革命的客观环境虽然已有相当的成熟，但自己不敢起来领导，还想要等待，等待自己党的组织弄好，（平时为什么不积极组织？）指导力量调查清楚，（自己指导力量何常〔原文如此〕调查，即需，平时为什么不调查）客观环境更好时才动。所以抑制农民自发的斗争，□次阻止农民向他的敌人——民团、军队、地主知事的进攻，甚而至于在农民包围缴械的军队，都要强迫农民撤开一条大路准其逃走。这是多可耻的行动！及至农民以党不领导他们斗争及抑制其暴动，保□了敌人的力量，由怀疑本党而驱逐本党同志时，党才决定暴动。决定后又四次主张不动，又三四次变更其行

动日期，极动摇胆却〔怯〕之至，这又是何等可耻的行动！非特犯了等待主义的错误。

第二，相信军队土匪的力量而不相信自己工农的力量，暴动以土匪军队为主力为转移，更是不懂暴动的真意义，完全是一种暴动军事投机军事行动的错误观念。暴动必须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其他为副力，才不失为工农革命的暴动。否则不是军队投机便是土匪的劫掠行为，完全没有工农革命的意识。县委同志们于决定暴动之后，有的说要去联络胡若愚、覃小楼，有的说土匪不动，不能动，这些都是充分表示不信任广大的农民群众的力量，而却相信反革命胡若愚。

（原件存内江市档案馆）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文件

(1929年2月12日)

(上略)

四川农民运动决议案

(略)

(五) 今后农村的策略总路线

1. 大会一致接受第六次大会农民运动决议的精神，因为六次大会关于农村阶级的分析的立场和对农村各阶级的策略路线完全是正确的，在四川应该切实的遵守执行。

2. 目前党在四川农村中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的一切日常生活斗争，在斗争中去扩大宣传发〔展〕组织，正确的宣传土地革命、武装暴动的意义，经过日常斗争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实现土地革命的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3. 从农村中一般的形势看来，反军阀反捐税的口号是最为一般农民所拥护的。目前党的工作路线是以反军阀〔反〕捐税的口号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农民群众统一战线，同时进行反豪绅地主的斗争，指出豪绅地主剥削农民和勾结军阀的罪恶，使农民反豪绅地主阶级的意识更加明确、坚决，从反军阀战争一直发展到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4. (略)

5. 反军阀反豪绅地主的斗争中，应该引进富农来参加，使他能中立，不要故意的过早使他走入反革命的营垒，但这不是要牺

牲贫农和雇农的利益，抑制贫农、雇农对富农的斗争去牵〔迁〕就富农。我们能够引进富农参加革命，唯一基础是坚决的领导反军阀、反捐税的斗争，能够在革命斗争中（铲除一切捐税）或者〔获得〕最大限度减捐减租的胜利。富农虽然对剥削贫农、雇农方面同时有些损失，仍然是可以赞助革命的，不过随时要准备防止富农的叛变，在富农叛变的时候，应必须迅速的转变策略，坚决反对富农。

6. 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的唯一条件。……

7. 雇农应尽量成立雇农工会，单独发动雇农经济斗争，建立农村中无产阶级基础，要特别提出雇农的经济要求。

（六）土地革命与部分要求

1. 四川佃农大概占全体百分之七十左右，当然大多数农民是需要土地的，但因为农民运动落后，农村中经济斗争很少，所以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意识还很模糊，还没有自觉地起来要求土地，因此土地革命还不能在农村中成为广大群众所热烈拥护的行动纲领。但这决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要宣传土地革命，反之更应该有系统的去深入土地革命的宣传，因为将来农村斗争一发展，多数农民必然自动的急剧的走上土地革命的阶级〔段〕。党这时必须加紧土地革命的宣传以促进这一过程。

2. 要促进土地革命阶段到来，使农民对土地有自发的要求的热情，现在必须多提出部分的要求口号（减租减押，反对加租加押和地租、一切苛捐），发动日常斗争，逐渐提高农民反对地主的情绪，从斗争中去打破农民对地主的封建关系（主观的关系）和畏惧地主，依赖地主的心理，同时要把每一个部分要求联系到土地革命上面。

3. 宣传土地革命，必须纠正过去一切不正确的宣传，和笼

统模糊的宣传（如没收一切土地口号等），应当使党的土地政纲尽量通俗化，经常有系统的去扩大宣传。

（七）农村斗争策略与战术

1. 过去农村斗争，陷于无暴不动，无动不暴的观念，斗争起来便是武装冲突，不能够武装暴动便无法斗争。今后农村中工作主要路线是加紧日常斗争，去逐渐的组织农民，提高他们阶级觉悟和斗争组织，因此日常斗争战术策略的运用，成为最主要的问题。

.....

8. 农村斗争很容易走向武装冲突，每一个斗争开始，即应对武装斗争有适当准备。如果遭敌人的暴力压迫，群众情绪激烈，拿起武装来的时候，应该采用游击战争的方式。游击战争并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他必须凭借广大群众的基础，出于群众的热情和决心。游击战争也不是组织一部分武装暴动队伍，拖上山去或者变为流□，转战四方。他的正确运用，是把有武装的农民编制起来，隐藏在群众中间，或者一面仍耕种田地，在晚间或敌人力量薄弱的时候，出来袭击敌人；白昼或敌人力量大的时候，又在群众中隐藏起来。如此昼伏夜出，飘忽无常的随时向敌人袭击，劫夺军队民团的武装，袭击军队民团的营舍及豪绅地主的家屋，打杀收捐官吏、兵役，屠杀压迫农民的豪绅地主，没收民团的、军队的款饷，及豪绅地方〔主〕的财产，同时作广大的宣传鼓动。用这样削弱敌人力量，实现斗争口号。

.....

（八）反军阀反捐税运动

.....

2. 现在全体农民都拥护反军阀反捐税的口号，党必须坚决去领导这些斗争，才能争取广大群众。要能夺取这些斗争的领导权，党必须先看出农民的要求，比任何人先提出农民反军阀及反

捐税的具体要求来，自然农民群众会走到党方面来。这是党夺取群众，夺取领导权的唯一策略。

.....

(十一) 民团土匪问题

.....

2. 民团应分别常练与壮丁练，各用不同的方式去工作。常练应该遵守破坏反革命武装的原则，派遣同志或农协会员打入，扩大土地革命及^①豪绅地主阶级的宣传，鼓动练丁反对队长、教练，要求增加月饷，改良待遇的斗争，建立秘密党的支部和群众的组织；对于壮丁〔练〕当吸收在农协里面，把所有的武装在农协系统之下，秘密编为农民赤卫队的组织。此外应该经常站在农民利益方面提出反对设立常练，反对抽丁、出操、派守隘口、马路口号，鼓动斗争，以破坏民团的组织。

3. 对于教〔匪〕、土匪、袍哥的策略，决不应采用领袖的联络，及幻想依赖利用土匪为革命主力，作一切军事投机的把戏。经常应该打到下层群众中去，揭投〔透〕教匪、土匪领袖的一切欺骗黑暗的行动，指出他们荒谬的思想和主张，宣传土地革命及正确的革命暴动的出路，在思想上夺取其群众。应该在农民中公开批评土匪、教匪思想行动的背谬，要极力纠正农民中的土匪、教匪的倾向。

4. 在农民游击战争和暴动中间，对土匪、教匪可以保持相当的联络，但绝对不能依赖为主力，并且在必要时与可能时应解除他们的武装来武〔装〕农民。

.....

(摘自中央档案馆存《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四川档案馆编)

^① 此处文字似有遗漏。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通告第七号

(1929年3月26日)

特委暨全体同志：

全国革命形势自广东暴动以后，反动势力受到革命运动的恐吓，暂时调息了他们内部的冲突，团结一致的向革命势力进攻，革命运动遂因这样强的敌人攻击而遭受很大的失败。但是反动派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制，始终只能以极残酷的白色恐怖来镇压革命，不能施行改良政策来缓和革命，所以革命运动虽然受到暂时的挫折，但并不能根本消灭革命，只有使革命酝酿更广大、更激烈的爆发。同时他们内部的矛盾，虽然因镇压革命而暂时调协，然根本无法调和，必然要爆发更残酷的战争，所以反动统治并未能因打击革命而得到稳定的发展。济南惨案以后，遂又表现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象征，反动势力自己的矛盾又明显的爆发出来。帝国主义内部，日本积极进行独占北方的政策，与美国的利益根本冲突，因此美帝国主义遂有先与南京政府勾结订立关税条约，利用中国资产阶级打击日本。同时日本的政策对于英国在长江的利益，也是莫大的恐吓，所以英国促使他的工具——桂系军阀极力向北方军阀张宗昌等进攻。另一方面英国勾结军阀资产阶级政策，也是对美国的不利，所以英国帝国主义也就利用桂系打击代表资产阶级的南京政府。所以现在各帝国主义都在勾心斗角的互相斗争，在国民党的反动阶级的内部也是这样。济案以后不久便

打到北京，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根本不能调和的冲突又爆发起来。一方面自然是地盘的分配政策的抢夺，然而最根本的还是对于企图消灭革命势力的根本政策的矛盾。在封建地主阶级认为要完全消灭革命，只有继续残酷的压迫政策，所以国民党第五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西山会议派与桂系主张停止一切群众运动，所以连一个中央政治训练部都要取消，蔡元培提出停止青年运动的议案。资产阶级认识非常清楚，以为这反动的政策只能镇压革命运动于一时，决不能消灭革命，只有促进革命更激烈的爆发，要是在革命激烈爆发的时候，必然要一直走到危害他的存在，所以他坚决反对封建阶级的政策，而主张以改良政策来消灭革命，就是企图让群众在革命以外走一条改良的道路，于是革命自然易于消灭。在打到北京以后，便毅然执行他这种企图，召集所谓裁兵裁□财政之大会议，同时对外进行实际是延长不平等条约的修约运动，更在群众中广大的宣传——如革命胜利等——来和缓群众的革命情绪，来吸引群众——尤其是以资产阶级从革命路上走到他的改良主义之下；在五中全会中提出恢复民主同反帝国主义的提案，同时建立统一集中的政权——因为他必须有统一的集中的政权才能施行他的改良主义——取消政治分会等。这样的政策，当然是封建阶级所不能容忍，五次会议并因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取反革命的领导权而破裂。在表面上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策似乎不同，然而实际上根本同样的是要消灭革命，不过根据他的阶级观念不同而所取策略也就不同罢了。所以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会重新起革命的作用，那就要中了资产阶级的圈套而会发生根本断送革命运动的策略。我们认为资产阶级的策略对于革命的危险较封建阶级的策略还要危险，所以目前革命运动发展的主要的劲敌还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所以我们应该加

倍的努力向他进攻。(现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已渐次的发展到四川来。)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冲突的结果，因为双方准备都未充分，尤其是资产阶级的人物已被收买了，这样南京政府必然执行封建阶级的政策而更趋于反动，这将要促起群众更大的愤慨而更团结于革命方面。同时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冲突，必然更加准备将要爆发更大的更残酷的战争，所以反动统治必然更加无法稳定，更加走向崩溃的前途。革命势力方面，从济南惨案以后，工人群众就走到街上来示威，小资产阶级群众——学生、商人等，又恢复了停止很久的排〔外〕货演讲运动，工人的经济斗争也发展起来。各处苛捐杂税的繁重剥削，加紧了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先所依靠（原文如此）已由失望而走上反抗之途，到处都有开会请愿、罢市等斗争发生。农民运动虽因反抗统治阶级的清户政策而遭受打击，但是因痛苦日深，必然有更大的爆发。尤其是兵士群众经过长期农工斗争的影响与生活的日加痛苦，而自觉的革命化，现在各处不断的事变已经都带有明显的革命的色彩，兵士群众要走向革命方面来是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力量。现在各种革命运动的发展，各种革命势力的团结，必然还要高涨，虽然还不强固，但是必然很明显的、必然不停止的向前发展。因此我们断定革命高涨必然不可避免的到来，而且是很快的到来。

现在四川的形势，正是全国缩小的一幅画图，并且更形严重，还更利于革命的发展。

第一，统治阶级的冲突，因派别的复杂早形成一种混战的局面，且已开始在下〔川〕东混战。这个混战将蔓延全川。这个混战将削弱反动统治力量，使之由无法稳定趋于崩溃之途。

第二，群众受了残酷的剥削，已经到了无可生存的余地，工人工资的减低，农民租税的繁重，兵士毫无餉领，尤其是苛捐杂

税的剥削与金融的紊乱，使士兵群众走向破产就死的道路，除了革命更无丝毫出路。最近自井、泸县、成都各地许多工人新的罢工，南溪、宜宾、涪陵、南川、丰都、射洪、绵竹、蒲江、泸县各县农民的自发暴动，城市小商人的罢市抗捐（如现在的自井的小商贩的抗劣币铜元运动和成都商民协会的抗缴战费运动），各地学生教职员的争发饷和争教育经费的罢课运动（如成都），都明显的表现火山将要爆发了。

第三，尚没有资产改良主义的影响，使群众更易于团结到革命的方面来，所以四川现在整个的局面实在快要到了革命火山在我们前面大爆发的时期。其所以还没有，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尤其是要主观力量的坚固的党，还没有使各种斗争汇合起来。革命高潮的爆发和革命的彻底胜利，不是只要客观环境的成熟，尤其是要主观力量的坚固，要有坚决工人阶级意识的领导。现在四川革命的客观条件的确完备成熟了，但是主观的力量太薄弱，如果不积极加强主观条件的工作，将要使革命运动成为流产，将要使革命斗争不能形成一个总的汇合，而遭受敌人各个击破，最后就是要断送革命，整个的革命。所以四川的目前主要的政治任务，就是要开展坚决的群众的革命，认识争取群众，组织群众，同时要加强党的组织，发展党的组织，使广大的群众都团结在党的口号之下，来使群众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不成为零碎的行动，而汇合起来成为将来的武装暴动，推翻现在的统治，建立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的总的大爆发。这就是我们目前唯一的任务，这是目前工作总的方针。各级党部必须明确目前革命主观的力量的薄弱而认识目前严重的任务，坚决的加速的去完成这一任务，然后才能促进革命更快的到来，领导革命的彻底胜利。如果不即刻起来加紧去到群众中去，切实的做群众的工作，领导群众的斗争，

发展群众的组织，有计划的积极的去布置准备，或者种下侥幸成功的心理，结果将不只是延展革命爆发的时期，甚至使革命流产失败。

上面指出目前党的总任务，是夺取广大群众，准备将来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是如何？第一，夺取群众就是要夺取群众思想上的领导。现在全省广大的群众在客观上都热烈的有革命的要求，但是没有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去领导他们，所以容易跑到豪绅、富农或者富有煽动力的会匪（如神兵教民）的影响的下面去。所以目前党的策略最主要的是努力扩大党的宣传，坚决的正确的提出党的口号——推翻国民党军阀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政权，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给农民等，在群众中作广大的普遍的宣传，使群众脱离豪绅富农的影响而走到我们领导之下来。第二，以斗争来夺取群众，组织群众。所谓夺取群众，决不是和平的组织宣传工作，而是要利用群众各种迫切的痛苦的零碎的要求，发动群众的斗争，领导这些斗争，从斗争中扩大党的总的宣传口号的影响，从斗争中把群众组织起来，然后才是正确的实现夺取群众的任务。第三，夺取群众必须利用各种公开机会——如国民党号召的各种群众会议及各团体召集的会议、请愿运动等——公开的机关——如各种社会的组织，不管他是反动的或是黄色的，只要他有一点群众，都必须设法打入进去来扩大党的宣传。总之稍有一点公开的机会，都必须尽可能的利用，决不可固步自封，陷于狭隘范围的秘密活动。因为必须如此党的宣传才能深入群众。不过我们要找着各种活动的机会，去开展党的政治宣传，但决不能降低政治口号去找各种公开的机会。党的政治口号是：“反对国民党”。倘若现在因为是在找公开机会，便暂时放弃了革命的党的口号，那就是很大的错误，在于利用广大群众迫切的要求的口

号来引导向党的总的口号方面去，那是很显然的。第四，夺取城市最重要的是城市工作，尤其是工人群众的工作。工人群众没有很好的基础，夺取群众的任务就无法实现，所以现在应当努力纠正，避免城市工作的困难，完全跑向农民中去的倾向——各地过去在客观上带有这一种错误的倾向。所以目前工作的重心应该是几个重要城市——万县、重庆、泸州、宜宾、成都、绵竹、资中、内江、遂宁、阆中，以及几个重要工人区域，如自贡、五通桥。上述各地党部组织和省委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和最大的努力，去建立这几个区域的工作。

最后要指出来的全省政治的形势，军阀已经成为广大的群众所厌恶的东西，反对军阀已经为一般民众共同的心理，所以全省将来革命的高潮的到来，必然是反对军阀的统一的爆发，所以应该以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贫民真正的民众政权，为一切工作和一切斗争的总的口号。无论是工人斗争，农民斗争，反帝运动，反苛捐杂税运动，兵士的索饷运动，以及各种群众零碎的部分的运动，都必须加紧这一总的口号的宣传领导。城市小资产阶级反苛捐杂税斗争，学生教育经费独立斗争，工人经济斗争，农民夺取土地斗争，兵士改良生活斗争……这些斗争党要加紧领导，使群众在各个斗争中都坚决的要推翻军阀政权……一齐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总的反军阀斗争的大爆发而促成革命的高潮，一直到革命的彻底的胜利。但是将来能否实现这一任务，是看现在的工作任务如何？现在的群众工作如何？

自川战爆发以来，全省的政治形势愈趋严重。本来全省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贫民历受苛捐杂税、预征钱粮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已经痛苦万分。近来更因勒派战费，强迫拉夫及战争骚扰，已经激起了各种民众反对战费、反对拉夫及反对军

阀战争的运动。尤其是自贡、资、内，各地革命大小的爆发必然很快的就要到来，地方暴动的前途，将是随处都有。要实现地方暴动和地方政权之建立，川南应以自贡为中心，尽量加紧该地的盐业工人的经济斗争、小商人反劣币斗争、商民抗捐斗争、学生择师与教〔育〕经〔费〕独立斗争、农民抗捐斗争，以及各种群众的反军阀战争的斗争；同时加紧自贡周围和资中、内江、隆昌、荣昌、富顺、荣县、泸州、宜宾、南溪的农民协会广大的革命宣传组织和武装暴动一切技术上的准备。川东应以涪陵、南川为布置暴动中心区域，除积极在该地进行夺取广大的工农士兵的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努力准备武装暴动外，并须加紧綦江、巴县、长寿、万县、丰都、江津、合川、邻水、大竹各县广大工农士兵贫民群众之争取与武装暴动之准备，酉秀黔彭还须有适当的布置。当着暴动中心区域革命开始时，各地方，尤其是临近的各地方，须一致暴动起来，爆发广大的群众斗争以为响应，从各方面破坏反革命敌人的进攻。此时军队中党的组织，必须有条件的领导所影响的兵士群众一致暴动起来，投降到农工方面，与工农汇合，向着反革命势力猛攻，一致很坚决的为推翻国民党军阀政权，建立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给农民……而奋斗。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2期）

怡生特委给省委报告

——军事形势和军事工作的布置（节录）

（1929年6月28日）

（上略）

（一）军阀混战暂告一段落，而新的战争之准备，又必然在酝酿中，因而军阀之整顿部队与搜刮金钱和准备炮火，实为军阀们目前主要之任务。

（二）七混成旅为邓系军队之有力部队，邓之注意此部队，当然朝夕在其念中，然而此部队之革命化内部尤多C·P，且此部队之反军阀运动，与能动摇军阀统治，实有相当势力，且为军阀政权之最大敌人。罗泽洲处之绝缘，邓锡侯要此部队到川西，李其相之经济封锁，及李最近到成都赴二十八军团结会议等多项，均足以证明此部队之外交绝缘与危机四伏，李若回来决心解决此部队，破坏C·P组织，逮捕屠杀C·P，大有箭在弦上之势，这完全表示是阶级冲突。

（三）大多数兵士虽然穷困到极点，然犹自忍饥挨饿，因政治宣传深入之故。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方经济来源既断绝，一方革命兵士无正确之领导，则群众之自发兵变，有〔一〕触即发之势，党必将成为群众的尾巴，党的政治信仰破产，此为意料中事。

(四) 邓氏用难题给李其相做，要其解决第三师，又有解决五混成旅谢德堪之谣，而所驻客军如杨子惠、何杨两部，大有被李逐客之趋势，与〔以〕致李谢何杨等，对李非常戒备。李在遂宁年来极尽搜刮之能事，不仅劳苦的工农不满意，而一般土豪劣绅亦受李之高压极不满意，李之在遂一带政权实在含有极大的动摇崩溃。

(五) 部队已达到日食三餐几乎成问题的时候，士兵的革命的情绪，又属高涨之时，而部队既有马上被解决的危机，李的政权且含有崩溃的重大危机。凡此一切已证明目前环境已成革命兵变之前夜之现象。虽然省委曾指示须尽量避免在此危境地的兵变，然而经济断〔绝〕，兵士群众将有断炊的危险，只有无法出兵变之一途。

(六) 特委经过数次讨论，并经过两次军事会议，特委始最后决定如下：

1. 用反军阀战的形式举行革命兵变，而反军阀战争，必须说到反土豪劣绅，但是反军阀战争是目前行动的主要口号，反豪绅是游击战争的主要口号，并号召广大群众参加这一斗争。

2. 逮捕遂宁城军阀首领及其家属，索款后分别杀之，并焚烧征收局□一切田契，盘尽鑫记银行存款，以摧毁军阀统治的信仰。

3. 很敏捷的攻蓬溪缴除反动武装，佯言攻西充、顺庆，依然经遂潼南岸，进□武胜合川，暗渡邻水，且进开丰石，以符省委东下之指示。

4. 兵变开始，即宣布工农革命委员会名义，即刻成立工农红军，散布党的十大政策，特告民众书，工农革委告市民、告兵士、告农民等传单，并张贴各种标语。红军所到地方，打破一切

厘金关卡，焚毁一切田赋契约，发动农村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坚定工农群众信心。

5. 斗争倘如失败，将此队伍潜伏遂潼蓬一带乡村运动，广〔扩〕大游击战争，以保存此革命势力。

6. 失败后的收容掩护，李同志负责（此人经省委代表介绍到特委的），在事前并由李拨土匪队伍和手枪百余支帮助行动。

7. 通知合川党部及准备响应援助，此点并希望省委迅速通知特委所到地党部注意一切为盼！

（原件存四川省档案馆）

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 告四川全体同志书

(1929年6月28日)

(一)

同志们：

本党第六次全国大会指出中国革命在现时阶段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因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打倒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两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的主要口号，是取消帝国主义一切特权，没收外国资本在华的企业和银行；土地革命的主要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这两大任务都没有超越资产阶级范围，而客观上是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但中国资产阶级已完全叛变革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所以他的发展的前途，将要转变而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目前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阶级联合，采取极野蛮的屠杀政策镇压革命。自广州暴动失败后，中国革命旧的高潮可说已经过去，但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内部冲突无法避免而日益剧烈，中国革命在客观上应该解决的任务又没有任何一个解决，工农生活无法改善，只是趋向斗争而复兴革命运动，这些都足证明中国革命新的高潮是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因此党在目前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很艰苦地有耐心地深入群众

中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斗争，团结千百万群众于党的周围，以促进革命高潮之更快到来，推翻帝国主义及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权。大会并重新提出改造党的组织，建立无产阶级坚固的基础，反对一切不正确的政治倾向及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这一分析与指示的正确，在一年来的事实，已经很明显的证明。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表示诚恳地全部接受，并愿号召四川全体同志在策略上工作上努力实现这一任务。

省委第二次扩大会根据六次大会的精神与指示，认为四川的政治经济情形与全国没有原则的差异，党的策略凡能适用于其他各省者，亦能适用于四川，不过因地处偏僻，产业特别落后的关系，亦有不少特异之点。大会分析四川政治经济情形，有以下的现象：

第一，四川农业与手工业联合的旧经济基础，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与全国一样地走入动摇崩溃的状况。

第二，因为交通不便产业落后的关系，四川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封建势力，在政治上形成军阀制度，在经济上仍旧保存地方经济之残余。

第三，新式产业不发达，旧式手工业又已逐渐破产，商业经济虽然长期有很大的发展，但为了军阀防区捐税制度之束缚，战争的影响，近年亦逐渐衰落。

第四，旧式手工业与农村经济受资本主义的侵入而逐渐破产，新式工业在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束缚之下，不能畅然发达，因之形成巨大数目的失业农民，一部分流而为兵匪教民，一部分增加了城市贫民的数量。

第五，在地方经济残余保留的经济基础上面，四川的封建政

治得有牢固的存在，形成防区割据的形势。军阀为欲扩大自己的防区及剥削范围与防范他人的侵夺地盘起见，不能不添兵购械，扩充军队；军队增加，餉款支绌，即出之一战；战争结果，交通梗塞，工商业停顿，失业人数增加，军阀扩充部队，作乱的工具又添多。这样循环下去，所以形成四川十余年来，岁无宁日，日无宁夕的战乱局面。

第六，四川产业落后，资产阶级的力量虽然不大，但受全国资产阶级的影响，的确已有一部分豪〔豪〕绅地主的军阀接受了他的意识而有采取改良主义的倾向，虽然他的全部实现是很少可能性的。但因历年四川人民遭受了极度的压迫剥夺急求改善之时，是很容易受其欺骗愚弄，因之改组派第三党在四川有发展的可能。

扩大会在分析四川的政治经济之后，指出四川埋藏有极大数量的劳苦群众，这些群众在客观上都迫切需要革命，只待党去发动与领导。同时四川政治经济的矛盾与危机，比任何省区更加剧烈；反革命力量，比任何地方都要脆弱，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四川更比较薄弱；幅员宽广，交通不便，都使革命发展有很多的可能。四川新的革命高潮在客观上有更先到来的可能。因此，四川党在目前的总路线是：建全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战斗力量，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征〔争〕取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发动并领导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及自发暴动，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准备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实现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政权，完成中国革命在四川一部分的工作和任务。

(二)

同志们！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第六次全国大会的精神和指

导之下决定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针，经过极详细的研究与讨论，是十分正确的，是我们四川全体同志今后工作及一切策略决定的准绳。我们每个党员都必须加以深切地研究和了解，然后才能正确的运用，才能经过党的组织在群众中发生更大的作用。同时要使这次大会的精神贯彻，使党在四川的工作能有很大的发展与深入，我们更必须要自我地批评与检查过去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第一，是没有明确的政治路线。过去四川的党严格的说是不懂得站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阶级立场去分析并了解四川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形来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只知道分析军阀豪绅[豪]绅间人与人的冲突，故军阀战争爆发[时]党即企图号召不相适应的过早的武装暴动，走向军事投机；反之则认为环境不好，陷于和平发展的状态；有时白色恐怖到来，党又激于英雄气概，实行报复政策。工作没有重心，结果在客观上完全变为跟倒群众跑的尾巴主义。因为这样的原因，要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即陷于盲动的错误，要纠正盲动主义，又复活了机会主义。这由于四川党的政治意识太浅，不了解四川的实际情形，将党的政治路线运用到实际上去，找不到明确政治路线，当然要影响工作之不能进展的。

第二，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在四川有其深厚的历史，严格说每个党员脑子里或多或少地都还保留一些遗毒。不相信群众力量，依赖政治势力，采取合法运动，偏向军事投机，到了斗争紧要关头，党不去领导斗争而反压抑斗争，甚或临阵脱逃；为了要讲所谓统一战线——其实是迁就一二少数反动领袖，不惜离开自己的阶级立场，牺牲党的独立政治主张，以为提出党的政治口号是会使群众脱离。这在客观上完全是被人利用，党只有失掉群众信仰与群众隔离，工作自然不能群众化，党的基础自然无法创

立。最近虽经中央历次的提醒与纠正，但仍保有深厚的残余，这是亟宜注意的。

第三，是盲动主义。四川过去因为不了解武装暴动的正确解释，发生了不少的盲动主义的倾向，在许多斗争中有显著的事实。不估计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不了解工作的布置与配合，在反机会主义潮流之下，只凭少数〔人〕的英勇的气概，就轻举妄动起来，陷于无动不暴，任何斗争，一开始就在布置武装暴动，认为不如此即是机会主义。实际群众并没有起来，根本不知暴动为何物，自然不会来参加暴动，遂使暴动成为少数人的冒险行为，只有走向失败。结果反动势力高涨，连日常斗争都要消灭而不能发动起来。许多盲动失败的地方一直到现在还未能完全恢复起来，这对于党是有很大的损失的。

第四，是对国民党的幻想。自武汉政变国民党全部反动后，党决定退出国民党并号召工农群众揭破国民党的阴谋与罪恶，推翻国民党反动的统治。但在四川执行起来都异常之没有决心，并对国民党保存不少的幻想，以为国民党内的汪精卫派、邓演达派多少不一总还有点革命作用。故有些同志在国民党省指委会成立时要求登记去作政治侦探，有些党部甚而还想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去做工农运动。因为这样的结果，在策略上就忽视了反国民党的工作，给予改组派第三党以更多的活动机会，这不能不说是党过去很大的过失。国民党无论那一派，至多只不过企图以改良主义来缓和革命消灭革命，在客观上完全是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延长生命，结果同样地只有走向反革命的道路。我们不但不能怀什么妄想，希望他们再有一分革命的作用，我们应坚决地号召群众，揭露国民党各派反动的事实，加紧党的政治宣传，争取被反动领袖麻醉蒙蔽的群众到党的周围来，这样才能完成党的任务。

第五，是命令主义与包办主义。四川的党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力量，但亦犯了浓厚的命令主义与包办主义的毛病。每个群众组织差不多都是由上而下，由党指派几个同志成立上级机关，很少是由群众直接选举出来或由斗争中产生出来，机关内的职员十分之七八是同志，任何斗争的发生，并不交群众去讨论去决定办法，只由几个同志商量决定，通知或命令强迫群众执行，结果党是超阶级的。群众认为党是他们以外的神秘组织，胜利至多认为是几个共产党员英勇的行为，群众看不出自己的力量，失败则怨恨党脱离党。这些都是命令主义及包办主义的遗毒，党今后是要严加纠正的。

第六，是忽视反帝运动。反帝工作本为党主要任务之一，过去四川的党，可说是忽视这一工作而没进行，至少是没有计划地系统地去加以领导。济南惨案及五卅惨案很可以发动广大群众起而参加，但党却少注意这一工作，仅有的成都及其他各县的反日组织，亦陷于形式主义、机关运动，工作未能群众化，完成其在政治上组织上的任务。不知道在反日运动中同时去指出英美帝国主义的阴谋与诡计，在客观上是帮助了英美帝国主义，尤其不知把反帝工作与工农日常斗争联系起来，结果失了很多征〔争〕取群众的机会。

第七，是对军阀战争策略的错误。反军阀战争的总路线是采取失败主义，四川的党还未能全部了解这一意义，在策略上犯了推动军阀战争，延长战祸，违反阶级利益的错误；不知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发动工农日常斗争来影响兵士的倒戈，彻底消灭军阀战争，只望于战争中形成割据局面，偏向军事投机主义。这一错误虽已纠正，但遗留于党员群众中尚为不少。更有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以为军阀战争到来，革命的客观条件具备，党即应

组织武装暴动；一则坐等军阀战争，认为要军阀战争到来，才能进行一切工作。这两种倾向均足以妨碍党的争取群众的工作。

第八，是忽视地方政治斗争。党的目标是在完成中国革命，促进世界革命。但要使党的工作能够深入而群众化，只有加强地方政治斗争，代表群众的利益，取得接近群众的机会，去宣传组织他们于党的周围。四川过去非常忽视这一工作，尤其是各地方党部，偏重全国全省政治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对于本地的政治情形，不去加以分析和了解，自然更说不上领导什么地方政治斗争。因此党始终陷于小团体的气习，而不能变成行动的群众的政党之组织。

同志们！上面指出这些在政治上的倾向与错误，是与此次扩大会的根本精神和路线绝相违背的。我们必须站在六次大会及此次扩大会的立场之下，与这些不正确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严厉地纠正这些错误，才能正确的运用大会的决议与精神，才能走上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道路。

(三)

同志们！过去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的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但是党的组织不健全，还未能布尔什维克化，所以才接受了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容许这些意识蔓延而发展，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四川的党发源于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之时，产生于极封建的四川社会之中。“三三一”以前只有国民党运动，钻进党内来的差不多完全都是小资产阶级和官僚政客。一九二七年秋季四川临省〔委〕成立后，虽然纠正了这些错误，走向工农的发展，但适值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已完全反动而镇压革命，工作上遭受异样的困难，仍未能树立党的阶级基础。中间

虽然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会议精神指导之下曾提出过改造党的组织，然陷于形式的执行，仍未能将党由小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这次大会检查四川全党四千余同志，农民及智识分子的成份占了百分之八十左右，小资产阶级的意识，随时都有向上发展之可能。扩大会议认清了这些事实与原因，坚决提出改造党的组织，建立无产阶级的基础，排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布尔什维克化，才能杜绝不正确的政治倾向之发生与蔓延。因此扩大会在检查政治路线之后，并进而考核过去组织中的缺点和现象。

第一，是和平运动与和平发展的观念，在四川一般党员群众中牢不可破。他们都认为在群众未组织好以前是不能领导斗争，斗争失败是要使群众胆怯，影响工作不能进行，于是就采取了先组织而后斗争的机会主义原则。在群众中工作惧怕斗争，回避斗争甚至于阻遏斗争，只做些所谓组织工作，和不激烈的宣传工作；甚或有些替工人农民做呈子打官司，模糊阶级意识，增加群众对现政府的幻想。殊不知党与群众的力量只有从日常斗争中才能扩大，革命高潮只有从日常斗争中才能发展出来，党与群众关系也只有从斗争中才能建立起来。不要斗争永远不能真正获得群众，永远不要梦想革命高潮之到来，所以党在四川是不能够行动，是没有斗争力量的。

第二，是忽视城市工作偏重乡村运动。这在主观上虽然没有这一倾向，但因城市中反动势力较强，职工运动难于发展，客观上不能不偏向乡村工作。因为这样避难趋易的结果，无产阶级基础未能建立起来，农民分子及智识分子占了绝大多数。农民意识笼罩全党，遂发生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成党的不健全，涣散而无力量。

第三，是不懂得民主集中制之正确的运用。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的主要原则，但过去四川的党不懂得正确运用这一原则，以为秘密工作时代，一切事情必须集权，于是不相信群众，工作永远建筑在少数的活动分子身上。同时下级亦只望上级派人去工作，于是在组织上就发生了家长制委派制的毛病。在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报端民主化的倾向，党的决议可以自由反对，自由不执行，无原则无目的地批评诋毁指导机关，不服从上级机关之指导。前者虽经纠正，但尚有深厚的遗毒；后者正在萌芽而有发展之势，实际都是极不正确的倾向，都是要妨害党的工作之进展的；

第四，是雇佣革命的观念。党只需要少数职业家担负党的日常工作，至于在群众中工作的同志，应当不离开社会职业而为党工作，方能深入群众，组织群众。然而有许多同志，竟有一种雇佣劳动的观念，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就不工作，有些自己家里有钱或者可以在亲友处想办法的同志而亦要向党领生活费；许多失业的党员纷纷要求党派工作解决生活，不明瞭革命是自觉的而不是雇请的。革命职业家的意义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解决个人生活。这在党内是一种极严重的现象。

第五，是改造党的形式主义。四川的党虽然接受过八七紧急会议的精神，提出改造党的口号，但实际是没有切实执行这一任务，从未坚决的引进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保存一种旧的组织观念，使党始终停留在一种命令委派家长制度之下。分配工作始终相信脑筋中几个旧习的人，而不相信下层中产生出来的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引进工农分子参加指导机关，亦陷于形式主义的错误，只机械的找些工人分子进来，而不加以积极的教育与培养，不分配负责的工人同志以党的工作，结果仍

然由几个知识分子包办。或则在形式上召集会议改组，实际仍然是旧的人物。象这样改造党等于没有改造的。

第六，是党员与指导机关的对立。四川的同志不明瞭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以为党的指导机关健全，指导正确，他才积极参加工作，反之指导机关若不健全，或不满意于一、二负责人，即表示消极而不工作。不站在党的立场，无原则的恣意诋毁指导机关，而不知党的指导机关是由党员群众产生的，党的指导机关能否健全，不是建筑在几个负责人身上，而是建筑在全体同志的监督与帮助之下及党员对党的责任心。因此，党的指导机关若有不正确的地方，党员不但不应悲观消极，不负责的诋毁，而应积极地贡献意见，或经过组织系统提出质问与批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党的机关之健全，否则在客观上是破坏党的组织的行为，在党的纪律上是不容许的。

第七，是个人意气之争。四川的党并没有发展过政治的争论，然而许多地方，都常常有许多无原则的小资产阶级意气的争执。这种争执或是□拾许多小问题来互相诋毁，酿成重大的纠纷，或是因私人争执，形成消极怠工，都影响到党的涣散破碎，损失党的战争破量（原文如此）。要统一党的意志与行动，必须坚决与这种小资产阶级意气之争奋斗，无情的消灭这些这在（“这在”二字疑为衍文——编者）坏党的组织的行动。

第八，是乡土观念。四川是极浓厚的封建社会，党生长发育于这一环境之中，当然免不了要反映一些封建思想到党内来，所以乡土观念感情结合在党内仍然不能消灭。因为是同乡同学的关系，竟至发生横的关系，公开党的组织，互谈校务，议论个人；或者不应公开的同志而公开，应保守秘密的事件而不保守秘密，破坏（“破坏”二字疑为衍文——编者）客观上

是泄露秘密，破坏党的组织的行动，在过去的党内亦是一种极严重的现象。

第九，是个人与组织分不清楚。例如某个负责同志态度不好，或与他私人感情恶劣，即认为党没有办法，表示退出；又如上级批评某个党部在工作中的错误，某个同志若是过去负责人之一，他必须起而申辩；又如某个同志必须要在某地工作，不然即以为工作一点也不能进行。这些都是由于没有把组织与个人的关系弄清楚，所以才发生这些错误的现象。

第十，是把党看成济难会。许多同志因失业穷困，专门找党来解决生活问题；又有些因自己的患病，也要向党来借医药费。殊不知党并不是救济机关，替同志解决生活问题的职业介绍所。党的工作主要是在群众中，而不是在党部，决不能人人都派作党部的工作。加之同志们如继续不断地脱离了社会的职业，便不去找社会的职业，则党成了和群众没有关系的党，党的工作永远是不能群众化的。

第十一，是坐等革命高潮到来，而不艰苦耐劳的去做群众工作。认为政治经济的矛盾冲突，工农生活之益加痛苦，新的高潮是不免的要到来，这固然是客观条件上的事实。但是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迟早，与到来时能否得到彻底的胜利，必须决定于革命的主观力量。如果群众力量增高，的确可以促进高潮的到来更快；如果群众的力量薄弱，或许革命要到暂时的消沉。所以我们只有很艰苦的有耐心的去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然后才能促进革命高潮。若只是坐等革命高潮就要到来，而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客观上简直是妨害革命运动。

第十二，是同志工作求效过速的心理。尤其是新加入党分

子，他们对工作急进，自然是好的现象。因为工作求效过速的原因，容易感觉失望、空虚而致心灰意冷，不能做艰苦耐劳的群众工作，这在工作上也是有妨害的。

第十三，是消极怠工。有些同志观念动摇，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或者看了党内组织力量薄弱，于是就心灰意懒，不愿积极工作，这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殊不知党不是那几个人的，决不能因为党的组织一时不健全的现象，即放弃自己的政治生命。同时革命力量可说是天天都在向前发展，只有我们能够深刻地去了解群众的情绪及阶级结构与转变的形势，是很容易发动广大的革命运动，用不着消极悲观，消极只是一种堕落的倾向。

同志们，上面指示这些组织上错误的倾向，决不是几个人的错误，完全是农民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反映到党内来的结果。有些虽加纠正而尚未肃清，有些还正在滋长，这些都足以破坏党的组织，妨害党的工作。我们每个同志都要加以深切的认识而站在革命的立场，起来与这些倾向作坚决的奋斗，肃清这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增强党的战争力量。

(四)

同志们：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一致站在六次大会精神指导下，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及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作坚决的奋斗，一致拥护中央一年来政治的分析与指示。扩大会尤其是要在中央正确的指示之下，在组织上要把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扫除干净。只有这样才能使四川同志全体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精神之下，一致工作起来。

同志们：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认定中国革命及四川革命的高潮

是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全国政治经济情形的矛盾无法减免而益加剧烈，已复兴了极普遍的工农革命斗争。在四川，因为军阀相互的冲突与无厌的搜括，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向工农日益加紧其剥削进攻，已经发动了许多伟大的革命斗争，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加紧一切工作，以适应这不可避免要到来的革命高潮而获取伟大的前途。我们应该正确地去实现扩大会的精神与决议，经过党的组织，在群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很艰苦地有耐心地深入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创立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征〔争〕取千百万的劳苦群众于党的周围，以促进并适应革命高潮到来而完成党在中国及世界革命的伟大使命。

省委第二次扩大会按照中央的指示及四川全体同志共同意识的委托，指出今后四川全党同志一致奋斗的工作目标：

一，建立无产阶级的基础。要使党有力量，要使党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加强，能够战胜小资产阶级的意识，首先就要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基础。到产业工人中去建立坚固的党的支部，增加党的工人成份，集中注意于全省产业区域重要工人区域的党的组织的健全，造成党的新生命，这是目前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路线。

二，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一般同志的政治的水平线。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的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同时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这是从积极方面引进同志参加工作，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出路。

三，党员职业化。失业同志应该设法找到职业，党亦应尽可能的帮助同志去谋职业，无职业技能的还要学习，特别注意到生产机关中去做工，同志也应互相介绍工作。要使同志不依赖党生活，

自谋职业，能够接近群众，深入群众中去把党的影响扩大；同时也能够把群众的意识正确的反映到党里来，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

四，支部生活的改造。政治的宣传鼓动，群众的组织，只有支部才能深入日常斗争，只有支部才能灵敏的领导。如果仅仅上级党部定些空洞的计划，发挥几种宣传文书，而支部不起作用，党和群众终久没有接近的机会。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政治报告、纳党费就算完事，最紧要的是讨论一切政治问题与工作问题。无论一工厂、一学校、一军营、一农村、一街道，范围虽小，却有他的不同的环境与工作方法。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的运用，首先要了解一切的实际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必须能充分执行这些任务，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每个同志都成为群众的核心。

五，秘密工作的注意。过去四川的党，对于秘密工作有两种极端不同的错误：一是完全不注意秘密工作，陷于合法运动，使党无斗争力量；一是误解秘密工作，完全把党的组织及同志都秘密起来，老死不与群众往来，陷党于失掉接近群众组织群众的机会，使工作不能扩大与发展。殊不知党的正确秘密工作是建筑在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之上。在公开工作中不要忘掉党的宣传，忘掉扩大党的组织及其秘密性；在秘密工作中不要忘掉接近群众深入群众中去，扩大群众组织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质言之，秘密工作的正确路线是要在极广大的群众中去建立保存党的独立的秘密的组织，而不是对群众采取关门政策，或者把党的组织在群众完全公开起来。因为这样的结果是给予反动派以压迫的缝隙，是要破坏党的组织的。

最后扩大会提出下列的口号，要求四川全党同志一致的拥护

与执行！

1. 拥护第六次大会的精神与决议
2. 拥护四川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精神
3. 详细研究第六次大会及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
4. 坚决执行第六次大会及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一切决议案
5. 反对机会主义的残余
6. 防止盲动主义
7. 肃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8. 建立四川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
9. 到工人群众中去到产业工人中去
10. 党员职业化
11. 发展党内政治讨论
12. 发展党的理论教育
13. 健全支部生活
14. 切实改造党的组织健全指导机关
15. 坚决反对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16. 闹个人意气的滚出党去
17. 完成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18. 艰〔坚〕苦耐劳的去发展群众工作
19. 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20. 夺取千百万元的劳苦群众
21. 促进革命的高潮
22. 领导革命彻底胜利

四川省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

1929年6月28日

(中共新都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原件存新都县文管所)

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 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节录）

（1929年6月28日）

（一）农村经济破产与农民的痛苦

1. 四川农村经济自帝国主义商业资本侵入，新式工业品逐渐代替而破坏了农村手工业，“农业商业化”，农村生产产品被操纵于商业资本之手，农村经济长期在急剧的崩溃过程中，农民的痛苦，也一天一天更加剧烈。

2. 农民日渐破产，土地逐渐集中于新兴的地主阶级（这些地主多半是官僚、军阀及一部分商业资本家），土地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地主阶级手中。地主利用其由掠夺而来的土地，向农民实行封建剥削，地主所收的租额通常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最低者亦不下于百分之五十，在有些土地肥沃的地方（如川西内十大属）租额高至百分之八九十。一般的都须纳一定的押金（通常佃一亩田需纳押金十元至十四元），押金是无利息的，押金多的，纳租也较少，收获量多的纳租也更多。总之地主对农民的剥削，通常除农民所费的种子、肥料、牛工、农具而外，仅能留给一小部分收获品，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如果无押金或少押的农民，连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能维持，必须兼营副业或作苦工。

3. 军阀的财源大部分取之于土地，都是直接、间接剥削农

民。除了正粮附加粮税而外，有预征、借垫军款月捐、清乡费、开拔费、军服费、马路捐、烟捐（不种烟的也一样勒取）、佃当捐（稳租捐或顶捐）、牛头捐，更有所谓北阀费、戡乱费。这些捐税有些完全按户勒取于一般农民；有些虽然由地主担负，实际上仍然转嫁于佃农；有时更直接由佃农代出。除了军队的捐税而外，还有民团的捐税，如田亩捐、谷担捐、枪支子弹费、团练月捐、免役费等等，农民终年劳动无所得，不足以偿付捐税。

4. 地主负担的捐税完全转嫁在农民身上，加租加押、加土租、加典钱，是近年普遍的事实。因为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无地与少地的农民日多，工业不发达且日趋衰落，不能吸收广大的失业农民，失业农民除了流为兵匪而外，还有大部分挤着在乡村，争佃一块小小的土地，苟图生存，争佃夺佃之事日多。地主更容易利用农民争佃夺佃之争，而加租加押，实行其残酷的剥削，使农民生活更加痛苦。

5. 商业资本侵入农村，使农业“商业化”，农民出卖自己的生产品，与购入必要的生活品，常常要受商人、囤户贱价钱勒收，居奇贵卖的垄断剥削。农民因租额日高，捐税日重，随时都感困穷，有时生产品尚未收获，早已以贱价出卖空仓；有时除纳租还债而外，剩余的粮食不能维持口食，又不得不以高价向地主买回。货币作用在农村中日益增大，农民时常感受资本缺乏，借贷资本因此在农村中实行其高利剥削，每月利率有达六、七分的，谷利每千斛有到八九石的，甚至有借银一元，每场（三天）即须给利银两角至三角的。普通中农受高利贷的剥削，不上两三年便不得不破产。

6. 在军阀战争中间，除了更加重捐税的剥削而外，因为交通阻滞的影响，使农村输出品如丝、桐油、山货药材，都无法运

销，壅塞市场，价格日落。外来工业品如棉纱、布匹等，则以运输困难，价格日涨。农民〔卖〕出产品，不能换得相当日用工业品，整个农村，形成了入不敷出的破产现象。

7. 军阀豪绅地主阶级除对农民实行封建的剥削而外，并科以封建的徭役。拉夫充役，办冬防，操壮丁，守马路，守隘口，按户派丁（自然地主和纳了免役费的富农和一部分中农除外），并不给以任何报酬。农民除了整日勤劳而外，夜晚还要担任这些无代价的苦役，尤其是农民最大的痛苦。

8. 农民除了这些痛苦而外，更加上战争匪祸的蹂躏，天灾（去年川西北的旱灾，今年三四月间各地的苦旱）的为虐，贫农简直不能自存，中农逐年亏累，日趋于破产。最利害的如长寿、垫江及梁山、大竹的一部分，以及夔巫一带，农民许多都抛弃了土地，流走四方，变为土匪神兵。四川农民这种不可忍受的痛苦，使农民不得不迫切的需要革命。

（二）农民阶级的分析

1. 农民大概可以分为富农、中农、贫农（小农、最小农）四种。

2. 富农在全川的数量很少，许多偏僻小县富农尤其少，甚至没有。富农中佃农为多，自耕农较少，因为自耕农土地多的多半变成地主，而以其土地佃给他人耕种。富农通常雇用农工六七人至十余人，除了纳捐纳租而外，通常有剩余。这些剩余资本的累积，或用来购买土地，或用来经营囤买及小企业，如囤粮食、收买丝茧等原料品转卖于商贩，开油房槽房等，或用来经营借贷业。并且有些富农把所佃土地留取一部分最好的而外，以其余转佃于贫农。所以富农是农村中的剥削者，并且带半地主的性质。但他们同时又受地主军阀的剥削，在四川因为农村阶级斗争还不

十分明显，富农一般在反军阀、反豪绅地主斗争，尚有相当的革命作用。但他反地主只能限于反对加租加押，要求减租，反对土地制度的急剧解决——土地革命。在农村斗争剧烈时，富农很容易走向反革命。

3. 中农在四川比较的多，通常雇用农工二三人至四五人，每年收入在年丰或捐税较轻之时，可以小有余积，平常仅能出入相抵；受军阀捐税的剥削最利害，反军阀地主的要求最热烈，不反对土地革命，但反对平分土地。

4. 小农在农村中也比较的多，经常不用雇工，每年收入仅能维持生活；遇天灾重税即不能支持，常需借债、借谷或出卖空仓以为弥补。最近数年因农村急剧破产，亏累日积，时有破产的危险。他们反军阀反地主都很激烈，更反对高利贷。他们生活痛苦，是由于土地不足，要求土地革命很急烈，革命情绪很高。

5. 最小农在农村中也多，每年土地的收入，除纳租上税而外，简直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兼作苦力或季节工人。他们担负捐税较少，所以反对捐税的情绪比较薄弱，而反豪绅地主富农剥削的情绪特别高，对于土地革命更是急剧的要求。

6. 四川地主经济富农经济都较少，所以雇农数量也比较少，他们唯一的要求是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待遇。不过，因为过去雇农没有独立组织，雇农单独的斗争很少，阶级意识尚不明确。

（三）过去的农民斗争

1. 四川过去的农村斗争，无论是党领导的斗争或是农民自发的斗争，不出下面几个形式。

2. 第一种是以军团冲突形式爆发的抗捐反军阀斗争。这些

斗争虽然是含着农民反军阀的意义，但是领导权属于〔豪〕绅地主，并不是为了反抗军阀——当然更不是为了解放农民；他们只是藉反军阀反捐税的口号，利用群众的力量，以推翻不能代表他们这一派豪绅地主利益的某一个军阀，或者威吓当地军阀，使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这种斗争多半是在豪绅地主阶级得到他们的利益之后，及〔即〕半途妥协出卖了农民。

3. 第二种是以教匪神兵的骚乱、暴动的形式形成的反军阀（所谓杀灰狗儿）反捐税（所谓打倒百货厘金）斗争。这些斗争充分是游民和农民意识的领导，无目的、无组织的、无计划的盲动，旋起旋灭，常常是毫无结果的失败下去，或者被领袖所出卖，收编为军阀民团。

4. 第三种是农民自发的武装抗捐直接行动。这些斗争，容易很快的转变为游击战争。但因为每每不了解游击战争的正确运用，党的领导不充分，初起即遭优势的反革命武装扑灭；或是形成了游击战争以后，没有正确的领导和指挥，脱离了群众，变成了土匪。

5. 第四种是农民的日常生活斗争。这一斗争形式，除川南最近有几处地方外，其他各地都很忽略，没有能够经常发动起来。在川南几处斗争中，都不出反捐税、反对加租另佃的口号，且少联系到土地革命的宣传，并有合法运动的倾向。

6. 总结过去农村中斗争，普遍很缺乏日常斗争，尤其是经济斗争，斗争口号不出抗捐抗税，尤其没有建立真正无产阶级的领导。

（四）过去党在农村中的工作

1. 四川农民运动方才开始，即遇着资产阶级国民党叛变革命，与豪绅地主阶级一致向工农群众进攻。党在农村中还没有丝

毫基础，便遭受反动潮流的压迫；农民还没有反地主的觉悟和决心，地主阶级便早已多方的防止农民的反抗。这是党在四川农村中的工作比较困难的地方。

2. 虽然客观上有些困难，但党在农村中工作没有进展，还是由于主观上有些缺点。

3. 第一是没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不能从农民群众日常生活问题中去发展斗争，扩大宣传，发展组织。许多地方是利用民团豪绅的势力去发展农运，结果反为豪绅民团所利用；有些地方是借教匪去发展组织，结果真正的群众日益隔离；更有些地方还在利用国民党的关系去作农运，全是农会的运动，没有群众的基础。

4. 是不了解农会的意义，组织方法异常机械，不能利用各种方式，根据群众的需要去发展组织，仍然守着国共合作时代的工作方式，幻想很有系统的去组织各级农协会，结果只是形式的组织，不合群众的需要。有些地方在过去盲动主义的路线之下，把农协认为〔是〕暴动的组织，陷于极端的秘密形式，不能引起广大群众。有些地方把农协认为是一个吸收同志的机关，并不注意去健全农协的本身的组织，使他没有力量去领导广大群众。

5. 只有临时的简单的鼓动，没有系统的宣传工作，不能认识群众的需要提出正当的口号。客观上是常常接受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只提出抗捐抗税的宣传，没有土地革命的宣传，没有党的政治宣传，甚至连抗捐减租的宣传都没有。有大多数地方又只是机械的模糊宣传土地革命(并且多加以误解)和武装暴动，不能把这些口号与群众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群众望而却走〔步〕，不能接受。

6. 第四，除川南少数地方外，没有发动群众日常斗争，尤

其最重要的缺点没有日常斗争，除了群众感情觉得坐等暴动预约土地而外，平日毫无组织的必要，因之组织日就涣散，以至于消灭。尤其是没有发动农民的经济斗争（佃农减租减押，反对地主剥削，贫农反对高利贷，反对地主富农，雇农要求加工资等），不能提高贫农的阶级觉悟，从斗争中显出豪绅地主对农民的一切压迫。所以农民仍然在豪绅地主利用影响之下，用笼统的反军阀的宣传隐蔽反豪〔绅〕地主的斗争。

7. 第五，农民的自发斗争不能事前有计划的去领导，有时只是跟着群众做一个“尾巴”主义者，有时连尾巴也做不到。不了解游击战争的方式和作用，有些地方农民斗争一起来，便去玩弄暴动（如绵竹），有些地方害怕武装斗争（因为农村斗争很容易变〔成〕武装斗争），常常不自觉的回避斗争，抑制群众。

8. 第六，党与农协的工作不分别，党包办农协，命令农协，不去扶助农协成为真正的群众组织；不发展农协组织，而滥发展党的组织，党与农协完全分不出来，甚至许多农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党员或是农协会员。

（五）今后农村的策略总路线

1. 大会一致接受第六次大会农民运动决议的精神，因为六次大会关于农村阶级的分析的立场和对农村各阶级的策略路线，完全是正确的，在四川应该切实的遵守执行。

2. 目前党在四川农村中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的一切日常生活斗争，在斗争中去扩大宣传发展组织，正确的宣传土地革命、武装暴动的意义，经过日常斗争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实现土地革命的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3. 从农村中一般的形势看来，反军阀反捐税的口号是最为一般农民所拥护的。目前党的工作路线是以反军阀反捐税的口号

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农民群众统一战线；同时进行反豪绅地主的斗争，指出豪绅地主剥削农民和勾结军阀的罪恶，使农民反豪绅地主阶级的意识更加明确坚决，从反军阀战争一直发展到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4. 过去党在农村中工作客观上是代表农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富农和中农）的要求，很少代表过贫农的要求。在一般反捐税斗争中，贫农表示不积极参加，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多数与党和农会隔离。今后必须把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建立贫农领导中心，作为农村工作中第一个主要任务。要不断的发动贫农对民团豪绅地主富农及商业资本、借贷资本一切日常生活斗争，在反军阀反豪绅地主的广大斗争中，特别提出贫农的经济要求，尽量引进贫农群众参加反军阀斗争，并且以贫农作领导中心。这样才能使广大贫农群众积极的围绕在党的周围，成为农村斗争的基本力量。

5. 反军阀反豪绅地主的斗争中，应该引进富农参加，至少使他能中立，不要故意的过早使他进入反革命营垒。但这不是要牺牲贫农和雇农的利益，抑制贫农雇农对富农的斗争去迁就富农。我们能够引进富农参加革命的唯一基础，是坚决的领导反军阀反捐税的斗争，能够在革命斗争中铲除一切捐税，或有最大限度减捐减租的胜利。富农虽然对剥削贫民雇农方面，同时有些损失，仍然是可以赞助革命的。不过随时要准备防止富农的叛变，在富农叛变的时候，必须迅速的转变策略，坚决反对富农。

6. 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的唯一条件。联合中农的基础，仍然是要建筑在坚决反军阀反捐税反豪绅地主斗争上面，一面要纠正过去一切不正确的宣传口号（如没收一切土地，均分财产等等），使中农不致于离开我们。

7. 雇农应尽量成立雇农工会，单独发动雇农经济斗争，建立农村中无产阶级基础。要特别提出雇农的经济〔要〕求。

(六) 土地革命与部分要求

1. 四川佃农大概占全体百分之七十左右，当然大多数农民是需要土地的，但因为农民运动落后，农村中经济斗争很少，所以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意识还很模糊，还没有自觉的起来要求土地，因此土地革命还不能在农村中成为广大群众所热烈拥护的行动纲领。但这决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要宣传土地革命，反之更应该有系统的去深入土地革命的宣传。因为将来农村斗争一发展，多数农民必然自动的急剧的走上土地革命的阶段，党这时必须加紧土地革命的宣传，以促进这一过程。

2. 要促进土地革命阶段到来，使农民对土地有自发的要求的热情。现在必须多提出部分的要求口号（减租减押，反对加租加押和地租及一切苛捐），发动日常斗争，逐渐提高农民反对地主的情绪，从斗争中去打破农民对地主的封建关系（主客的关系）和畏惧地主、依赖地主的心理，同时要把每一个部分要求联系到土地革命上面。

3. 宣传土地革命，必须纠正过去一切不正确的宣传，和笼统模糊的宣传（如没收一切土地口号等）。应该使党的土地政纲尽量通俗化，经常有系统的去扩大宣传。

(七) 农村斗争策略与战术

1. 过去农村斗争，陷于无暴不动，无动不暴的观念，斗争起来便是武装冲突，不能够武装暴动便无法斗争。今后农村工作主要路线是加紧日常斗争，去逐渐的组织农民，提高他们阶级觉悟和斗争组织，因此日常斗争战术策略的运用，成为最主要的问题。

2. 日常斗争的意义，是为农民争取更切迫的利益，使农民知道党和农协不但能够领导他们革命，获得土地与政权，并且目前便能够给他们以很好的策略与组织，获得切迫的部分利益；使最落后的农民也能够逐渐围绕在党和农协的周围，受党和农协的领导。所以日常斗争必须用最巧妙的策略战术，争得胜利，应该绝对纠正不计胜利的盲动、骚乱的倾向。

3. 发动日常斗争，党应该经常注意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要求与痛苦，留心一切机会，很迅速的捉住机会去鼓动斗争。便是任何一个农民受了一点小小的屈辱压迫，都是我们发动斗争的机会，不可轻于放过。一个斗争的机会到来时，党应该立刻有计划的提出适当的口号，拟定鼓动宣传的要点，分配同志到群众中去作广大的宣传鼓动。经过党的支部活动，动员农协会员，到群众中去作系统的鼓动宣传，有可能时，应召集群众的会议，扩大宣传。

4. 斗争的口号，必须是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最易为群众接受的，必须简单、明瞭，使最落后的农民农妇都能懂得。在斗争中自然应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把部分要求联系到党的政治口号；但绝不可机械的背诵党的口号，尤其不能把宣传口号用作发动斗争的口号，作斗争的要求。

5. 领导斗争，在有农协组织，农协能够获得大多数群众拥护的地方，自然应使农协来领导；如果农协的组织异常狭小，或是简直不能公开，即应该以农民临时的组织（如农民代表会、农民请愿团、反捐税同盟、反团阀同盟……等）领导斗争，避免反动的压迫，求得斗争的胜利。

6. 斗争的主要原则，应该代表群众的组织和力量，绝对禁止个人英雄式的领导，和对政治力的依赖。斗争的方式，应利用

赶场的日子号召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群众的请愿，包围团防局、豪绅地主住宅等直接行动。此外还可采用罢集（如反抗捐税而同盟不赶场不出卖□谷物）、罢耕（地主加押加租，全体农民同盟不佃他的田地）等等方法。

7. 农民因为住居散漫，生活不集体化，群众斗争很难持久。在一个斗争如果发动群众不充分，难于持久战时，应该使这一斗争有相当的胜利而谋结束。再从新整顿群众的组织，加强群众团结的力量，用另一口号发动新的斗争。

8. 农村斗争很容易走向武装冲突，每一个斗争开始，即应对武装斗争有适当的准备。如果遭敌人暴力的压迫，群众情绪激烈，拿起武器来的时候，应该采用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游击战争并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它必须凭借广大群众的基础，出于群众的热情和决心。游击战争也不是组织一部分武装队伍拖上山去，或者变为流寇，转战四方。它的正确运用，是把有武装的农民编制起来，隐藏在群众中间，或者一面仍耕种土地，在夜晚或敌人力量薄弱的时候，出来袭击敌人；白昼或敌人力量大的时候，又在群众中藏隐起来。如此昼伏夜出，飘忽无常的随时向敌人袭击，劫夺军队民团的武器，袭击军队民团的营舍及豪绅地主的家屋，打杀收捐官吏、兵役，屠杀压迫农民的豪绅地主，没收军队民团的饷款及豪绅地主的财产，同时作广大的宣传鼓动，用这样去削弱敌人力量，实现斗争口号。

9. 在斗争中应该尽量扩大党的宣传，把斗争的部分要求口号，联系到党的政治口号上去，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口号。但扩大党的宣传，主要的方法是动员每个同志到农民群众中去，作有系统的宣传和解释。有时极通俗的传单和画报也是必要的，如果在农运薄弱的地方，当斗争中间，在文字上公开党的名义，足以

防〔妨〕害斗争的进行，吓退群众时，应该不用党的名义发布宣言传单。然决不是说不采用其他方法（如口头的个别的谈话）去公开党的政治面貌，扩大党的政治宣传。

10. 在斗争中应留一部分党员和一部分农协的干部，隐藏在下层群众中去作秘密活动，绝对避免全部公开，准备在斗争失败、白色恐怖到来时，仍旧能够作一切群众的活动。

（八）反军阀反捐税运动

1. 过去反军阀反捐税运动，大半是由豪绅地主的领导形成军阀冲突的形式。对于这种冲突，党内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第一认为这完全是豪绅地主所领导的，我们不该去参加，坐让农民群众去受豪绅地主的领导；第二是无条件的与豪绅地主联合——讲联合战线，牺牲党的政治主张和贫农的利益，跟着豪绅地主瞎跑，同样断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这都是极庸俗的机会主义的路线。

2. 现在全体农民都拥护反军阀反捐税的口号，党必须坚决去领导这些斗争，才能争取广大群众。要能够夺取这些斗争的领导权，党必须看出农民的要求，比任何人更先提出农民反军阀反捐税的具体要求来，自然农民群众走到党的方面来。这是党夺取群众，夺取领导权唯一的策略。

3. 如果党不能应时领导而由豪绅地主富农发动反军阀捐税的斗争时，党必须领导群众参加，夺取其领〔导〕权。在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应该号召农民用独立的名义和组织（农协及农军等）参加这一斗争。应该尽量指责豪绅地主利用农民的野心和作用，及半途妥协出卖群众的必然性，使〔反〕豪绅地主的斗争，与反军阀的斗争同时进行。在农运薄弱的地方，党应动员群众参加到豪绅地主阶级所领导的群众中去，扩大反豪绅地主阶级的宣传，推动群

众坚决斗争到底，用群众的力量把〔豪〕绅地主的领袖推翻，转变到我们的手中来。

4. 农民反军阀反捐税的斗争中，同时要注意与城市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及对士兵的宣传鼓动，使农民斗争容易得到胜利，而不致独立失败。

（九）农民组织问题

1. 农民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建立绝对多数农民群众反军阀豪绅地主的统一战线。农协必须成为广泛的群众组织，应纠正过去狭隘的极端秘密的组织形式。但要以贫农为中心，坚决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2. 农民的组织在工作豪〔毫〕无基础的地方，应该尽量利用各种公开的可能去发展组织，如用平民教育、农民识字运动、乡村文化运动，去组织农民读书会、识字班、武术会、娱乐部或农民原始的组织如土地会等等，在各县甚至一县之内，不必用一个统一的名义，幻想有系统的组织形式，使他能够适合农民的兴趣和需要，吸引广大群众。经过斗争和组织发展之后，可以成立县农协或农民委员会，把这些小的组织统一起来。

3. 在农民组织异常薄弱不健全的地方，应该以市郊及重要场镇交通要道，规划为中心区域，集中力量整顿这几个中心区域的组织，洗刷原有的不良分子，重新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发展组织，加紧领导斗争，以几个这样的中心工作区域的工作，去影响其他的组织，振作群众的情绪。其他各地也同样应当布置中心工作，力戒零星散漫发展的毛病，以免分散力量。

4. 在经过斗争失败的地方，应该尽量解释斗争失败的原因，使群众知道健全组织与扩大组织的必要；发动极小的斗争，保证其胜利，以振〔作〕群众畏怯消沉的现象，恢复组织。如果农协

的组织遭受压迫，群众畏惧不敢加入，可以经过农协会员利用各种公开的方式去组织群众，逐渐引导他们选个〔进入〕农协的组织。

5. 一个广大群众的斗争（如抗捐等）到来时，如果没有农协的组织，或农协的组织还未成为群众的组织，或农协组织很难公开号召群众，即应该以临时斗争的口号（如抗某种捐款大同盟，驱逐某个豪绅的大同盟等），去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在斗争结束后，没有农协的地方即可变为农协的组织，有农协的地方可以吸收广大群众发展农协组织。

6. 在农民斗争发展，农民有武装的需要与要求时，应开始农民赤卫队（名称不一定是赤卫队，自卫团等等名目都可以）的组织，把有武器的农民编制起来，给以必要的训练，在农协领导之下，经常成为农民自卫的组织。

7. 农协组织中应该特别注意农妇及青年农民的组织工作，在农协中应该设立妇女部、青年部及妇女支部，并帮助青年团发展各种青年农民的组织。

8. 雇农应成立雇农工会，雇农少的地方也应在农协内成立独立的雇农支部。雇农工会应与农协在组织上、斗争上保持亲密的联系，经常互派代表出席。应尽量使农协赞助雇农的要求，但绝不能迁就农协中少数富农的利益，而牺牲雇农的要求。

9. 农协应有健全的指导机关和下层组织。区乡农协应经常开会，讨论各种农民实际生活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中，给农民以政治上、组织上的训练。

10. 农协应当注意培养干部人材，以坚实农协本身的组织基础。

（十）农民宣传问题

1. 农民宣传工作主要的方针，是克服落后群众一切封建思

想，迷信观念，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消灭农民的怯懦、狐疑，崇拜偶像、迷信领袖，不信任组织的力量，以及帝制、神权、听天安命等等思想。

2. 同时要在农民〔中〕极力揭破改良主义（如重庆农民银行的组织改组派，“二五”减税的口号）的欺骗，并揭破有些地主小恩小惠对农民的麻醉；从斗争中根据一切事实，显示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残暴面目，打破农民对地主的宗族、亲戚关系，主客关系。

3. 宣传中心口号是土地革命，要以具体实例分析地主土地的来源，以及地主压迫农民的事实，经常有系统的根据具体事实，农民本身痛苦，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影响。

4. 经常宣传工农联合的意义，使农民了解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解放。

5. 对农民的宣传应避免抽象的说教，当多搜集一切事实材料，使党的一切政治宣传更实际化，具体化。

6. 农民宣传品，应多用歌谣与画报，用极浅显短简的短句。各地方党部及农协应经常为农民出版一种刊物。

（十一）民团土匪问题

1. 民团纯粹是豪绅地主的武装，如果我们不能争取民团，是决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但夺取民团绝不是扶助同志去取得民团队长、教练的职位，而是要夺取民团的下层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

2. 民团应分别常练与壮丁练，各用不同的方式与工作。常练应该遵守破坏反革命武装的原则，派遣同志或农协会员打入去扩大土地革命及〔反〕豪绅地主阶级的宣传，鼓动练丁反抗队长教练，要求增加月饷，改良待遇的斗争，建立秘密的党的支部和群

众的组织。对于壮丁当吸收在农协里面。把所有的武装在农协系统之下秘密编为〔农〕民赤卫队的组织。此外应该经常站在农民利益方面，提出反对团款，反对设立常练，反对抽丁出捐，派守隘口、马路的口号，鼓动斗争以破坏民团的组织。

3. 对于教匪土匪袍哥的策略，决不应采用领袖的联络，及幻想依赖利用土匪教匪为革命主力，作一切军事投机的把戏。经常应该打入到下层群众中去，揭〔露〕教匪土匪的领袖的一切欺骗黑暗的行动，指出他们荒谬的思想和主张，宣传土地革命及正确的革命暴动的出路，在思想上夺取其群众。并应该在农民中公开批评土匪教匪思想行动的荒谬，要极立〔力〕纠正农民中的土匪教匪的倾向。

4. 在农民游击战争和暴动中间，对土匪教匪可以保持相当的联络，但绝对不能依赖为主力，并且在必要时与可能时，应解除他们的武装来武装农民。

5. 教匪常常有跃跃欲动之势，有时也能够发动群众起来暴动。在教匪的暴动中，若果有广大群众基础时，我们应尽可能的赞助，并以农协的组织去影响他们，使他们在农协领导之下行动。同时加紧下层群众工作，公开党的政治主张，批评教匪领袖荒谬的主张和行动，夺取其群众，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之下，走向革命的斗争。

（十二）党在农村中工作

1. 过去党在农村中工作的发展，多半建筑在乡村中有地位的同志（民团队长、教练、乡绅等）身上。这些同志因为他的地位和顾虑环境的关系，不自觉的形成和平发展，趋避斗争的现象，并且不能深入群众，为了职业的关系，更不能够依照党的计划选择重要区域去发展组织。今后发展农村工作，必须有计划的

选派工人同志和能够农民化的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工作，做小贩，经常有系统的去作宣传组织工作。此外也可以利用举办乡村教育或寒暑假的机会，派遣学生同志到乡下工作。

2. 党在农村中的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雇农和农村手工业者）或〔半〕无产阶级（贫农）构成，他是要保证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领导转变向社会主义前途的。农协的组织是民权革命阶级〔段〕中绝对多数农民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在苏维埃成立之后，农协必然消灭。党和农协在组织上的作用，必须有严格的分别，要严厉纠正过去党即农协，农协即党，以及滥发展党的组织，不发展农协组织的现象。小资产阶级、中农分子必须在极严格的条件之下才能吸收入党。党与农协的组织必须严格分开，党只能经过党团及党农村支部的核心作用，去保证党对农协的领导。

3. 省委应恢复农民委员会之组织，为专门计划建议搜集材料的机关；各级党委之下均应斟酌设立农委。

4. 省委农委要经常指示各地方党部作秘密的农村调查，并整理此项调查材料，随时作精确的统计，以为分析农村经济政治，决定农民策略的根据。

5. 对于乡村苏维埃的建立与组织，游击战争的方法和运用，以及农村斗争战术策略的具体运用，省委应编发详细的解释书，供给在农村中工作的党和同志研究。

（中共新都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原件存新都县文管所）

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 四川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案*（节录）

（1929年6月28日）

I、四川政治经济的分析

（一）四川形势与全国形势

（1）四川政治经济形势与全中国是一样的：

四川政治经济的结构及其形势，并不与全中国有迥然不同的性质的差异。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破坏了手工业与农业联合的旧经济基础；本国新式资本主义生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束缚之下，不能发展；资产阶级特别不成熟（原文如此），已经走向反革命；封建政治经济的残余存在，土地逐渐集中于地主阶级手中，无土地与土地少的农民日渐增多……一切、一切，四川都是与全中国一样的。大会否认“四川有独特之政治经济形势”的说法，这一说法，很容易使四川政治策略路线脱离全党的总路线而走入极危险的歧途。

（2）但四川有许多特点必须正确的估计：

不过四川因有些特殊的自然条件和革命发展的阶段落后，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共同性质之下，有很大的程度的差异。譬如新式工业特别不发展，资产阶级非常脆弱，封建政治更浓厚，农村阶

* 原文小标题后正文未分段。

级分化还不十分明显，一切政治经济的矛盾更加剧烈等等，都证明“质”的共同之中有“量”的差异。这些差异——也可以说是四川的特点，我们必须加以正确的分析和估计，才能使党的策略路线的运用更加正确的合于实际。

（二）四川经济状况

（3）帝国主义商业资本侵入，使农业与手工业长期在崩溃的过程中：

四川近几十年中受帝国主义商业资本投资的影响，使旧有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渐走向崩溃的过程中，日趋破产。

（4）商业资本发展，但工业资本非常不发达：

少数轮运便利的商埠如重庆、万县，已日渐资本主义化，帝国主义的投资与吸收原料，使商业小资本长期有很大的发展。但工业资本非常之不发达。帝国主义在四川尚限于投货，不能移殖资本，全四川除了重庆一家日本丝厂，找不出第二个外国工厂。本省的新式工业更非常之少，除了官营的军事工业，如成都的兵工厂、造币厂，重庆铜元局，以及重庆、万县、涪陵、江津、嘉定^①、成都少数丝厂而外，没有其他的新式产业。四川交通不便，机器的输入与成品的输出都感困难。加上政治经济的纷扰和紊乱，这是四川工业不发展的主要原因。

（5）新式手工业颇有发展：

大工业虽然不发达，但新式手工业因市场的激刺，却有相当的发展，如小机械厂、翻沙厂、铁木机织布厂、织袜厂，近年以来，日渐增多，都证明新式手工业之发展。

（6）农业在地主封建剥削之下完全是小农经济：

农业在四川还是在地主土地私有制之下实行其封建剥削，自

^① 嘉定即今乐山。

然物租是普遍的形式(除了资中一二县外)。土地虽然逐渐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但仍然分给若干佃农耕种,生产方法完全是小农经济。不但大农业公司、土地公司没有,便连地主经济、富农经济,也占极少的成份。

(7) 全川范围农业和手工业还占经济的主要成份:

四川本省的工业既不发达,洋货与本国新式工业产品,虽然逐渐侵入,有征服农业与手工业的趋势,但因为失了交通便利的条件,还没有能够深入。在全川范围说来,新式资本主义的生产,还不能代替农业与手工业的小生产。四川输入的货品,除了棉纱而外,其他都不是一般的必需品。几种主要的必需品中,如布匹、面粉、食盐、燃料,都大部分是由本省的——甚至是一个地方的——手工业小生产供给。所以手工业和农业在四川还占着经济上主要成份。

(8) 地方经济的残余仍旧保存:

因为手工业和农业还是经济上主要的成份,商业资本还不能统治地方市场,因之地方经济的残余,仍旧能够保存着带有很浓厚的资本主义前期市场的性质。

(三) 四川政治形势

(9) 四川政治是军阀豪绅的统治:

在城市的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面,在保着地方经济的残余的经济基础上面,自然特别容易使封建政治能够牢固的保留。四川的政治完全是代表地主的军阀豪绅政治,他们的剥削,大部分是对于农民的封建剥削。他们为了巩固这种剥削统治的地位,蓄养多量的佣兵民团,用极残酷极野蛮的手段,压迫工农贫民。

(10) 但因为资产阶级在全国政治上比重增大,军阀豪绅相

当的接受资产阶级政治影响：

但因为近来资产阶级在全国政治上比重增大，四川军阀——尤其是刘湘——及一部分豪绅，都相当的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也多少采用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改良口号、改良设施欺骗群众。不过接受的成份是异常之少，改良主义在政治经济矛盾异常之大的四川，更少实现的可能。

(11) 地方经济的存留使军阀握有绝大的地方政权，形成防区割据：

地主经济的存留，使四川军阀分为许多分防割据的头目，又使每一个地方的豪绅地主阶级能够在当地握有绝大的权力。无数多头并立的军阀、民团，把四川分割为无数的“国度”，各有不同的政制、刑法、关税、币制。这种封建分防的政治，更加助长地方经济残余的保存，使资产阶级不能得着统一与集权。自代表北方大地主的北洋军阀政权崩溃以后，四川的政权愈加分离，而分权于地方小军阀，豪绅民团的权力亦日渐增大。

(12) 军阀豪绅为了扩大剥削范围，形成循环不已的混战：

这些军阀为扩大大大的剥削范围，随时发生地盘分配的冲突。为了扩大自己的防区，为了防备他人的侵夺地盘，不能不增加军队；军队增加，饷款支出，更不能不扩充地盘，形成循环不已的混战与对于民众更残酷的剥削。甚至民团与民团也同样为了地盘与权利，时常互相冲突，发生斗争。

(13) 农民失业日多，形成大量的兵匪，为广大数量的军队民团基础：

军阀豪绅地主对农民的残酷无情的剥削，使农村经济日益崩溃，农民破产失业者日益众多。工业既不发展，不能吸收广大的失业农民，这些农民只得流为兵匪。这样不但军阀有更多的佣

兵，去扩充他的军队，即流为土匪教民，其出路亦终于为军阀民团所收买，变为军队团防，帮助军阀豪绅地主更向农民进行剥削。广大的兵匪由军阀豪绅地主剥削农民而产生，同时又是巩固军阀豪绅地主对农民剥削的基础。

(14) 工农贫民痛苦很深，但还未能形成有力的组织力量；

在残酷的军阀豪绅政权压迫剥削之下，一般工农贫民的痛苦，非常之大，农业日趋破产，工业不能发展，工业后备军的数量众多，使工人阶级畏惧失业的痛苦，不得不忍受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农民也不不得不在乡村中为争佃土地受地主残酷的剥削。军阀战争的循环不已，工商业的危机日渐增大，捐税的增加，经济的枯窘，尤其使工农及一般贫民生活日益恶化。但因为一般的思想落后，又没有健全的党去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所以他们还未形成有力的组织，起来推翻军阀豪绅的统治。

(四) 社会各阶级的结构与分析

(15) 资产阶级溶和于封建势力之中，在政治上的作用非常小；

资本主义生产特别不发达的四川，资产阶级自然也更加不成熟。资产阶级中间，一半是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有利害的共同；一半是豪绅官僚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有密切的关系；可以算作民族资产阶级，简直是绝无仅有。所以他们自来就没有发生过革命作用，早在全国资产阶级未背叛革命以前，即成为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的一种反革命动力。他们虽然也受一切军阀政治的束缚与榨取的痛苦，但他们只有将这种痛苦转嫁到工农和城市贫民身上，并且勾结军阀官僚从中渔利。重庆商人每次垫借军款，都由军阀许以极大的税率，陆续从勒取于农民的捐税，勒取于城市贫民的房捐公债偿还，他们实无异假手军阀向农民及城市

贫民行高利贷的剥削（其他各地城市工商业者，借垫军款都大概是这种形式，不过没有利息，或利息很少而已）。所以四川的资产阶级完全支持地主阶级军阀政权，一致向工农城市贫民剥削，他们与封建势力很少有什么冲突，完全溶和于封建势力之中，他们本身政治上的作用非常之小。

（16）但全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反映到四川，日渐扩大，不容忽视：

不过资产阶级在全国政治上比重日渐增大，反映到四川的政治上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意识和影响，也日渐扩大。虽然实现的可能性很少，但他们的改良口号，仍然能够欺骗群众，增加群众的幻想，这是改良派在四川能够活动的基础，决不容我们忽视的。

（17）农村阶级分化还不十分明显：

农村中间因为农民运动落后，所以阶级分化，还不十分明显，一般农民还是在反军阀反捐税这一口号之下，形成一个战线，反地主的斗争，大多数还隐蔽在反劣绅土豪这一模糊口号下面，没有明确的认识。但在许多经过斗争的地方，农民已逐渐提高了反地主的意识，除富农外，都很热烈的接受土地革命的口号。

（18）富农在目前有相当的革命作用：

反军阀反捐税是富农很急迫的要求，地主加租加押的剥削，首先是向富农进攻，所以在反军阀反地主的斗争上，目前有相当的革命作用。但富农反地主的斗争，只须要地主部分的让步（如减租减押），而绝不敢触到土地制度的急剧解决，因为富农多半是有土地出租或分租于农民的。

（19）中农贫农都热烈要求革命：

中农贫农受军阀的剥削，都异常利〔厉〕害，一天一天在破产过程中。贫农尤其感受资本与土地缺少，必须到城市中作季节工人，或在乡村兼作苦力，才能勉强维持其痛苦的生活。他们都热烈要求革命，而是每次斗争中的先锋队，尤其贫农对土地革命的要求，非常热烈。

(20) 城市贫民数量激增，是一部分广大的革命群众：

商业资本与城市手工业在一个长的时期中比较发达的结果，在几个大都市中，人口逐渐集中。但商业与手工业近年以来，又遭受战争、捐税、交通阻滞、币制紊乱的影响，而且趋于衰落，城市贫民数量因之激增，要求革命也非常迫切。这些城市贫民

(小商、摊贩、独立劳动者)是亚于工人阶级的一种革命的动力，他们的要求是反对军阀、废除捐税、减低物价、稳定金融及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他们虽然因为组织散漫，不能成为领导革命的主力，但他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必定能够热烈的参加革命，是一部分广大的革命群众。

(21) 上层小资产阶级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必然走入反革命：

上层小资产阶级如中等商人、小工业主人、自由职业者等，虽然也反对军阀反对封建势力，但他们是接受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他们只能算是资产阶级的左翼，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以后，在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的过程中，他们必然是随着资产阶级走入反革命的营垒。

Ⅰ、过去的经验与错误

(五) 过去工作中的错误

(1) 过去四川工作没有建立群众的基础：

四川革命运动，由五卅革命高潮中发展出来，党也在五卅运动中建立起来，那时全是革命潮流高涨之际。但因为四川革命运动落后，还没有成为一个能够领导群众的行动的党，始终没有发动广大群众的巨大斗争，党也没有建立群众的基础，只是在少数城市中成为一些小团体的组织。

（2）第一届临时省委成立才开始群众工作，但陷于和平发展失掉群众：

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第一届临时省委成立，才开始建立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工作，在资产阶级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完全陷于极秘密状态之中，然党在组织上仍然得着很大的发展，建立了群众的基础，这证明四川工农群众是异常需要革命的。但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征〔争〕取群众的路线，各地组织都在和平发展状态中，空谈暴动，忽略日常斗争，工农群众在极迫切的革命要求中所得于党的领导的，只是口头上土地政权的预约，自然逐渐离开了党。

（3）不懂得利用公开的可能，失掉工作中心：

尤其在政治路线的运用上，不懂得利用公开的可能，失了征〔争〕取广大群众的机会，在大城市中秘密活动异常困难，于是工作发展上偏向容易发展的地方。在全四川来说，几个主要的城市，如成都、重庆、万县、泸州、顺庆^①等处，工作均形落后，有些偏僻小县反转发达；每一地方也是乡村工作发展，而城市工作落后，形成不平衡的发展，使工作失掉中心。

（4）第一次扩大会议后发生盲动主义的倾向：

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召集，正当着工农生活日益痛苦，神兵教匪异常活跃的时候。党因为和平发展，忽略斗争的结果，失了群

^① 顺庆即今南充。

众，找不出工作上正确的出路，容易走入另一极端的错误，发生盲动主义的倾向。第一次扩大会议春荒暴动的决定，虽然性质上只是一种农村游击战争的发动与领导，然而误用暴动的名词，客观上形成盲动主义。“二一六”成都屠杀，“三九”重庆事变，随着又有叙府^①、万县破坏惨杀，在党内更激起一种报复主义的倾向，不要群众，不顾群众，不肯艰苦忍耐的去作征〔争〕取群众的工作；只是以军事冒险玩弄暴动，图快一时，形成了“无动不暴无暴不动”，愈加忽略日常斗争，拒绝利用公开，工会、农会变成极狭小的秘密的暴动的组织，更加隔离了群众。南溪暴动、叙府暴动、涪陵暴动，一直到绵竹暴动，都先后以缺乏广大群众的基础，没有城市工作的配合而完全失败。

（5）绵竹暴动失败后发现盲动的错误，但仍然没有找着正确的路线：

绵竹暴动失败以后，党内逐渐发现盲动的错误，然而仍然没有找着正确的政治路线。失败的情绪反映到党的组织上，部分同志发生动摇和叛变，或者酿成党内的纠纷，以致于十月省委的破坏，一时全党陷于零乱的状态。

（6）临时省委成立发生军事投机的错误：

成都临时省委仓卒成立，正遇着同盟军战争将要爆发，在政治上又发生军事投机的错误，不反对军阀战争而反促成战争的爆发，不估计群众的情绪和力量，单纯计划的军事的割据，完全失了阶级的立场，复活机会主义的路线，在工作上形成忽视群众工作的倾向。

（7）十二月会议后虽在第六次大会精神下工作，但盲动主义机会主义仍遗留很深：

^① 叙府即今宜宾。

十二月紧急会议改组临时省委，在第六次大会新的精神之下，政治路线比较能够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但因为组织残破，指导机关不健全，长期陷于清理组织中，各地工作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倾向，仍然潜伏很深，而以另一形式出现。盲动的余毒，只看见军阀混战的冲突，即以为第六次大会所分析的新的革命的高潮业已到来，我们可以马上实现地方暴动与政权；机会主义的余毒，则以为新的革命高潮会自发的到来，我们现在只须做和平宣传，发展组织的工作，坐等革命的高潮到来。这两种倾向都同样是忽略日常生活斗争的发动与领导，始终没有完成征〔争〕取群众的任务。

（六）过去四川的革命斗争

（8）工人在革命失败后情绪低落，党不能运用正确的罢工策略斗争，不能起来：

在“三三一”以前，重庆、成都工人曾经有很多的斗争，但这些斗争，都是日常的经济斗争，很少有政治意义的斗争。党在这些斗争领导中，更缺乏党的政治宣传，从日常斗争中提高工人群众阶级的政治的觉悟，尤其利用政治力量，援助工人斗争的胜利，使工人群众不信任自己阶级的力量而倚赖政治的势力。“三三一”事变以后，工人群众失了政治上的倚靠，不了解自己团结的意义，不信任自己阶级的力量，长期在消沉状态中，畏惧斗争，连自发的斗争也很少起来。中间虽曾有去年一月自井盐工的大罢工，成都黄包车、生纱、粗丝工人的罢工，都因为罢工策略不能正确运用，口号过高而失败，工人斗争情绪愈加消沉。一直到最近两三月来，成都独轮车工人、自井盐工、泸县机织工人，又重新抬头，爆发了许多大小斗争，但党的政治宣传仍感不够，工人群众还没有认识自己阶级力量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意义与

必要。其他各地工人，一般仍很消沉，畏惧斗争，尤其是产业工人中，更很少发动斗争。

(9) 一般农民斗争都是反捐税斗争：

一般农民斗争，都只是在反捐税这一口号之下发动起来，党没有能够领导这些斗争深入到土地革命的阶段，客观上只是代表中小地主和富农的要求，很容易为豪绅地主阶级所利用，形成军团冲突，变成一部分豪[豪]绅地主阶级与另一部分豪绅地主阶级争夺反革命政权的冲突。

(10) 绵竹暴动、南溪暴动因为不了解运用游击战争的正确形式形成玩弄暴动：

绵竹暴动、南溪暴动、蒲江抗捐运动、雅安抗捐运动，虽然是农民直接的革命行动，但这些行动中群众发动不充分，没有城市工人的配合，没有破坏反革命军队，都缺乏暴动的具[充]足条件。这些行动，应该是正确的运用游击战争的形式去削弱反动的力量，实现斗争口号，发动更广大的群众起来。但在当时没有能够了解这一斗争形式的运用，形成玩弄暴动，以致初起即遭失败（如绵竹暴动、雅安抗捐运动）。或是群众自发的形成游击战争（如南溪暴动、蒲江抗捐运动），但党没有能够很好的领导，使这些游击战争逐渐脱离群众而土匪化。宜宾的三次暴动，完全是无计划的骚扰盲动。

(11) 其他许多农民斗争都是游民神兵意识的领导：

丰都崇德乡的农民暴动，更带有很浓厚的游民神兵的意识。其他许多农民自发的斗争，都是游民神兵散匪意识之领导，因无目的、无计划而旋起旋灭。他们的斗争口号，也还是不出反抗捐税——所谓打倒百货厘金。

(12) 城市贫民小商学生的斗争，没有引进广大群众参加，

没有工人阶级领导；

近两年来也爆发了一些城市贫民、小商人、学生的斗争，最激烈如像前年成都市民的反劣币运动，成都学生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都形成群众的直接运动。但缺乏引进群众参加，尤其是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所以都始终没有结果而失败。

(13) 一切斗争都缺乏党的政治宣传，没有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没有适当的配合；

一切斗争中间，一般的缺点，都是缺乏党的政治宣传，工人阶级没有取得领导地位，发动群众不充分，没有引进广大群众参加，尤其是没有适当的配合，没有在一个斗争中间，号召工农兵士贫民联结起来，形成工农兵士贫民总的革命斗争；没有把一个地方的斗争，扩大宣传，引起全四川革命的群众的同情和援助，使任何斗争都遭统治阶级的各个镇压而击破。

Ⅲ、目前形势与党的总路线

(七) 目前全国政治形势

(1) 目前全国形势是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阶级反革命领导权之争夺；

目前全国形势是豪绅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资产阶级主观的意识是要求统一与集权。但因为本身力量的脆弱与不成熟，只能勾结一部分豪绅地主阶级，以推倒另一部分豪绅地主阶级的政权。如蒋介石之联冯倒桂，又结合阎张来倒冯，汪精卫等改组派联冯联桂倒蒋的政策。所以在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争夺政权斗争中间，仍然包含着豪绅地主阶级军阀混战的形势，这一混战的前途，只有使中国更加混乱、分裂。即使蒋介石得着胜利，南京政府能够有形式的统一，也决不会消灭豪绅

地主阶级的政权，完成真正的集权和统一。

(2) 资产阶级不能消灭豪绅地主阶级，中国只有更加混乱分裂：

资产阶级永远不能消灭其敌人豪绅地主阶级的势力。因为这一势力是由帝国主义扶持着的，他——资产阶级——也不得不尽量向帝国主义投降，以希冀与他的敌人对抗，当然更没有力量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3) 资产阶级不能推翻帝国主义也不能实现改良主义：

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与封建势力，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永远很少实现的可能。

(4) 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要到来：

一切政治经济矛盾，永远无法消灭，这是新的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将要到来的真实基础。

(八) 目前四川的政治形势……

(5) 四川只有长期陷于战争混乱的状态：

在这样全国总的形势之下，四川也只有长期陷于地方割据，军阀混战的混乱状态中间。资产阶级在全国政治上得不着统一和集权，并且永远循环不已的勾结一部分封建势力，希冀推倒另一部分封建势力，使四川的军阀永远也是□人勾结着国内一部分政治势力（如现在二刘与蒋介石勾结，同盟军与冯桂改组派勾结），在四川互争雄长，混战不已。四川军阀战争在目前虽暂时停顿，但决不能使军阀战争消灭，并且正在各自进行其与省外军阀勾结的手腕，准备酝酿更剧烈的战争，将要随着蒋冯战争的进展而爆发。尤其是每个军阀增兵、购械、扩充军队，财政困窘，必然循环不已的发生防地分配战争。

(9) 军阀混战使工商业危机增大，捐税益重，工农贫民生

活愈加恶化：

在近两年来，因为省内外军阀混战不断的爆发，交通时时断绝，影响工商业危机增大。川江上游轮船在一九二六年有三十余艘，今则只有七八艘小轮，去年每轮每月该走四五次，今则只走一二次，很明显的证明商业的衰落。因为商业衰落，工业也随之降下，丝厂纷纷歇业，自井盐灶停煎停推，纺织的铁木机架数日渐减少，工人大批被开除失业。仅能维持现状的一些小手工业，因为营业不旺，更加紧向工人的剥削进攻，工人畏惧失业，不得不忍受非常的痛苦。军阀为了准备战争和参加战争，尽量向农民、城市贫民加紧剥削，捐税层出不穷，名目繁多，至于不可纪〔计〕数，苛捐重税更使一般人民购买力缺乏，工商业不振，金融枯竭，物价腾贵，工农贫民的生活日益恶化。

（7）工农贫民革命情绪在军阀战争中重新高涨：

在最近半年来，一般劳苦民众革命情绪已渐次振起消沉的状态，自井盐工几次的罢工，泸县织布工人的斗争，川西独轮车工人的斗争，工人群众重复走到街上来示威游行，以反抗军阀资本家。宜宾暴动失败以后，现在农民又团结起来，恢复了二千多农民的组织，作抗捐示威运动。荣县、威远、内江都发生农民抗捐，反对加租夺佃的斗争。尤其荣县农民已经有了广大的群众组织（一万六千余人），作过许多群众的斗争。雅州、彭山有农民武装抗捐运动，南六、宣汉农民游击战争日益扩大，丰都农民公开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农民赤卫队）。此外成都商人的抗捐运动，成都学生的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运动，以及许多地方神兵教匪的蔓延扩大，凡此都证明自绵竹暴动失败以后，工农群众革命低落的情绪，在军阀战争和加紧剥削中间，又重新高涨起来。

(九) 现在四川还没有革命高潮……

(8) 现在四川还没有革命高潮：

现在四川还不能说已经有了革命高潮。第一军阀豪绅的本身虽然有极剧烈的冲突，但他们的统治基础还没有到崩溃的程度，军队民团差不多还整个在军阀豪绅手中，用来压迫革命。党没有能够夺取得广大兵士群众与民团过来，反革命优势的武力大过革命力量。

(9) 工人革命情绪比较低落：

第二城市工人阶级革命情绪比较还很低落，尤其是大都市产业工人群众，现在只是初从日常斗争中振起了消沉的状态，他们的要求尚只限于日常生活的改良，还没有用自己的力量起来推翻统治阶级的决心和勇气。

(10) 农人〔民〕斗争意识还很模糊：

第三农民斗争意识还很模糊，斗争的中心口号，只是反抗苛捐杂税，还没有废除一切捐税，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农民苏维埃的明确认识与要求；更没有土地革命，彻底推翻地主阶级封建统治封建剥削的决心。

(11) 革命发展不平衡：

第四城市工作与乡村工作发展不平衡，工农兵士工作发展不平衡。在全川范围来说，大都市中心区域的工作，始终没有建立，许多巨大斗争，都只能在偏僻地域反动统治薄弱的地方发展。这些偏僻地域的斗争，不能得着广大的影响，推进全川范围总的革命高潮。

(12) 党的力量薄弱：

第五党的组织削弱而不健全，领导革命的先锋队本身不健全，当然不能促进革命高潮到来，也无法完成他应有的任务。

(十) 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

(13) 资产阶级政治影响增大：

全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比重增大，反映到四川来，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亦日渐增大。四川资产阶级虽然特别脆弱，不成熟，但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没有建立起来，阶级分化不明显，党的政治宣传缺乏，使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活跃，能够很容易在四川增殖起来。近来改组派的活动，非常活跃，在重庆、成都几个大都市，能够相当的取得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并且取得部分产业工人群众。

(14) 改良主义口号能够欺骗群众：

改良主义虽然在四川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改良主义的口号，是能够相当欺骗群众的。尤其在斗争的地方，改良口号与革命的口号，在群众很难分别出来。这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口号，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必须加紧从斗争中揭破他的欺骗，扩大党的宣传。

(15) 必须加紧反对资产阶级：

反对资产阶级，才能使革命不致为资产阶级更狡毒的方法消灭。

(十一) 征〔争〕取群众的总路线

(16) 多数群众在非无产阶级意识领导下：

过去党的群众工作做得非常之坏，在有些地方，党在组织上虽然能够征〔争〕取了一部分群众，但在政治上始终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大多数群众还在资产阶级地主富农以至于神兵教匪游民意识领导之下。

(17) 〔征〕争取群众是目前总路线：

党要完成他的任务，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不能凭藉

党，必须凭藉广大群众，所以征〔争〕取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的绝对多数，——围绕在党的周围，是目前党的政治总路线。必须动员全党艰苦的实际的长期忍耐去作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必须加紧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加紧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从斗争中去扩大党的宣传——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宣传，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从斗争中去扩大党和革命群众的组织。经过日常斗争，促进阶级分化，提高一切被剥削阶级群众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促进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

（十二）征〔争〕取群众的敌人

（19）争取群众的敌人第一是不信任群众的观念：

争取群众最危险的敌人是党对群众一切不正确的观念和错误的关系。第一是不信任群众的观念：一切工作不向着群众而偏重上层领袖的联络；在暴动及斗争中间，则迷信武力及个人恐怖；对反动组织的破坏工作，则专用挑拨离间的手段，或是机关地位的夺取，与机械的破坏。不能够认识群众的力量，在群众中作系统的工作，用群众力量以克服一切困难。

（20）第二忽视群众组织的作用：

第二是忽视群众组织的作用，以为群众组织只是党吸收同志的一个机关，丝毫不注意群众组织本身组织与工作的健全，滥发展党的组织，不发展群众组织，以为党便可以代替群众组织。许多群众组织永远陷于感情的互助的私人团体形式，不领导他走向革命的政治群众组织。

（21）第三命令主义与包办主义：

第三是命令主义与包办主义，不在政治上巩固党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只是去干涉群众组织的独立。不经过党团和支部的作用说服群众，而是以党部命令群众组织的指导机关，以指导机关命

令群众。群众组织一切决议行动，不经过群众的讨论，不要求群众了解，只是由党员去包办。群众组织对外发布宣言，组织下的群众反不知道宣传的意义，甚至群众参加斗争示威游行还不知道为什么事。

(22) 第四机关运动忽视群众工作：

第四是机关运动，忽视群众工作。许多地方都没有真正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而只有工会运动农会运动，空招牌的庞大机关，不坚实的组织，丝毫不能尽组织群众的责任。党必须坚决肃清这一些不正确的观念，才能开辟争取群众的道路。

(十三) 政治路线的正确运用

(23) 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

没有政治路线的正确运用，仍然无法完成争取群众的任务。第一必须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应该尽量用尽一切公开的可能去争取广大群众。不管什么形式的组织，只要有群众的，只要能够接近广大群众，党都应去参加。拒绝参加任何组织，恐怕污损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实际上是一种躲避群众的畏怯心理，机会主义的表现。但同时不能为了找得公开机会，为了迁就落后的群众而降低党的口号。必须巧妙的系统的扩大党的宣传，从每一个事实每一个斗争中间，去指出一切反动口号、改良口号、落后思想的错误，从反动派影响之下夺取群众到党的方面来。

(24) 部分要求与党的政治口号的联系：

第二要使群众部分要求与总的政治口号联系起来。发动群众斗争，必须在群众热烈要求的、群众能够接受的部分要求上面提出具体的口号，但同时联系到党的政治口号，提高群众的觉悟与要求，使他们逐渐围绕在党的周围。

(25) 战胜群众合法运动和平主义观念：

第三群众一切合法运动，和平主义的幻想，不能迁就群众的意思而放弃党的批评，应该严厉的批评以战胜群众的落后思想，但不应该只是消极的批评，甚至因此拒绝参加。若果群众还有很浓厚的和平合法观念时，党只有领导他们从事实上从斗争中去打破他们的幻想。必须能够使这些策略很适当的应用在每一个实际问题上面，才不致离开群众，或者随顺群众，为群众所争取而不能争取群众。

(十四) 小资产阶级问题

(26) 过去忽视了城市贫民的工作：

城市贫民——下层小资产阶级，在四川小生产社会中是一部分最广大的数量最要求革命的群众，是城市中间一层次要的革命动力。党过去完全忽视了这一工作。

(27) 对小资产阶级解释与策略的错误：

过去对小资产阶级的解释与策略，异常之模糊而不切实。第一种倾向，把自由职业者、商人、学生等，认为这即是全部的小资产阶级，偏重这些工作，没有注意下层小资产阶级中的工作。第二种倾向，认为城市中除工人外，都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不了解下层小资产阶级是一样被剥削者，是无产阶级在城市中的同盟军。

(28) 组织城市贫民，赞助其要求：

今后必须特别注意城市贫民中的工作，尤其是许多小县市工人很少的地方，应该把这部分群众组织起来，赞助其抗捐抗税，反对高利贷，反对抬高物价，反对滥铸劣币，要求一切政治自由的斗争，使他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29) 对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策略：

至于对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应该遵守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之路线。

(30) 革命知识分子学生应相当注意：

革命的知识分子、学生在目前四川还有相当的革命作用，应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发展各种革命团体的组织在党的周围，领导他们参加工农革命运动。

(十五) 革命高潮与地方政权的前途

(31) 四川政治经济的危机与矛盾更剧烈，革命高潮有更早到的可能：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新的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要重新到来，并指出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有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更先到来，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前途。四川政治经济的危机与矛盾，比任何省区更加剧烈，反革命力量比任何地方更脆弱，帝国主义势力在四川也比较薄弱，地域广大，交通不便，使革命发展有更多的可能，在客观上革命新的高潮在四川更先到来，实现地方政权的前途，这是可能的。但这一前途，并不会自然到来；若果党的组织不健全，即使到来，也不能得到革命的胜利。

(32) 必须加紧争取群众工作才能实现：

党在目前须加紧争取群众工作，〔开展〕经常日常斗争，以促进这一前途的实现。

IV、党基本任务

(十六) 党内工作

(1) 党内工作主要任务是改造党的组织加强战斗力：

党内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改造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战斗力。第一必须坚决实行洗刷党员中消极、动摇、不参加实际工作的分

子出党，改造党的质量。第二有计划的发展新的分子，必须多从斗争中吸收，尤其要注意大产业工人的发展。第三继续改造党的指导机关，引进工人分子参加，健全指导机关工作。第四提高党内政治教育与训练，严格消灭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以及派别私人意气之争执。第五建立中心区域工作，加强地方党部工作。第六改造支部，适合产业支部原则，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第七实行党员军事化的教育训练。

(十七) 职工运动工作

(2) 职工运动应夺取绝对多数工人围绕党和工会：

职工运动必须有坚〔艰〕苦的系统工作，使绝对多数工人群众围绕在党和革命工会的周围。应该利用一切方式组织革命工会，引导工人原始组织走向革命工会，打入有群众的反动工会，夺取其群众。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加紧领导日常斗争，扩大党的宣传，提高工人群众阶级觉悟，战胜一切落后群众的封建思想。

(十八) 农民运动

(3) 农运中心口号是反军阀反捐税同时要反对地主：

农民运动的主要路线，是以反军阀反捐税口号，去发动广大群众，同时加紧反地主的斗争，造成农民反军阀反地主的统一战线。一方面要加紧农民日常部分要求斗争，联系到土地革命口号，经过日常斗争走上土地的斗争。

(4) 加紧部分要求扩大农民组织：

要扩大农民组织，使成为广泛群众组织，以贫农为中心，农民斗争很容易走到武装的阶段。

(5) 领导游击战争和自发暴动：

党应有计划的领导农民游击战争及农民自发的暴动，使他走到最高的组织性。

(十九) 军事工作

(6) 建设工农武装破坏反革命武装是军事工作两大任务：

建设工农武装，破坏反革命武装，是军事工作的两大任务。有工农组织的地方，应成立工农赤卫队（名称或叫纠察队自卫团）的经常组织，给工农分子以武装训练。破坏反革命武装，工作当有计划的输送党员和工农积极分子到军队民团商团中发展党及革命士兵组织，发动日常斗争，扩大党的宣传。各个地方支部都必须有兵士运动工作。

(二十) 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

(7) 引进广大群众参加反帝运动，要坚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指出资产阶级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的罪恶：

过去一般的忽略了反帝国主义运动，在少数地方反日运动中，也没有联系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反日工作只是和平的排货运动，没有扩大没收外国银行企业，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宣传。今后党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反帝国主义运动，应该指出要坚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没收外国银行和企业，废除外债，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更须在反帝运动中，暴露资产阶级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的罪恶，引进广大群众来参加，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8) 发动各种反军阀斗争：

四川工农贫民一般在军阀残酷压迫剥削之下，反军阀运动是四川党的中心工作。党应该经常发动广大群众各种反军阀斗争（抗捐抗税、反战争、反对干涉人民一切自由等），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作用，在反军阀中间，暴露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罪恶。每一个反军阀斗争，都应指出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之必要，作广大的宣传。

(9) 反军阀战争是目前中心口号：

目前尤其要以反军阀战争为中心口号。对于军阀战争，党绝不能促成，而是应以工农斗争消灭军阀战争，号召兵士群众起来反对战争，扩大“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宣传。

(中共新都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原件存新都县文管所)

四川省军委通讯伟字第一号、 觉字第二号（节录）

——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策略总路线的指示*

（1929年6月28日）

（上略）

（一）策略总路线问题

1、党在反革命军队中工作总路线，省委在前告维川^①同志书已说得很详，即是我们的最后任务，是争取士兵群众，在工农武装暴动时起来参加工农武装暴动。平时若果没有革命高潮时，反革命军队中党能〔的〕力量决不能幻想他随时可以兵变，单独可以起来暴动，成为革命的主力，靠这军事力量去完成革命。

2、只有在三个条件之下，可以举行革命兵变，但这种兵变的意义决不是我们应有的经常的工作任务，这只是在逼迫到使党有破坏组织、脱离群众的危险时，不得已而发动一个兵变，使他尽量发挥他积极方面的作用，走到最高的组织性，尽他最后的作用。

3、兵变之后，只能形成游击战争，努力去实现革命政纲，削弱反动力量，发动工农群众起来。如果广大工农群众起来，自然可以走暴动的前途，建立地方政权；但兵变之初，当工

* 副题为原编者所加。

① 维川，指江防军第七混成旅中的早期党组织，旷部兵变前夕，中共四川省委将维川军支改为怡生特委。

农群众并未发动起来的时候，决没有地方暴动之可能，更不能幻想去由军事力量包办苏维埃建立地方政权。

4、 在我们决定策略之先，有首先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即是群众革命的情绪和党的组织力量。如果我们分析只注意客观的形势，而不估计主观的力量，那是非常危险的。若果群众革命的情绪真是高涨，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健全，无论什么客观的困难，我们是可克服的，至少也不能一败涂地，能够作有计划的退却。若果群众没有真的革命情绪，党的组织太薄弱，无论客观条件怎样具备，我们终必归于失败，并且会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所以在兵变的每个条件中，应该切实估计到主观力量。若果主观力量薄弱，只有尽可能延长准备时期，加紧宣传鼓动组织工作，以加强主观力量，决不是只要兵变条件到来，便不择时期不作充分准备，即马上行动起来。

5、 关于维川工作，省委自来认为决不能永久保持，迟早必遭人解决，破坏党的组织（因为维川过去组织工作太坏、太不秘密，只要环境一变即有破坏组织的危险），不然只有走到抑制群众斗争，顾全环境脱离的危险。所以省委屡次指出维川工作，都要他加紧〔暴〕动的准备工作。但截至目前止，省委始终不认为他的组织和群众工作都已健全到了可以动，动后有更少失败之危险的地位。所以省委始终指示维川，要时时刻刻准备危险的到来能够即刻行动，行动后有更多胜利的可能，但始终未允许能够即刻行动。维川过去工作同志有一最大不良的倾向，即是环境稍稍不好，即要无条件的干起来，环境稍一顺利，便又忘了未来的危险，丝毫不注意准备工作。这有很多成分接〔即〕是接受科一个人的个性影响。省委附带在这里希你们为省委共同反动〔对〕战胜这一倾向，希望你们不要也落入旋涡。

6、从你们报告，你们对于这一路线并未充分的了解和运用（其理由事实后面分段细说），这是省委应该重新提出来，希望你们充分讨论和注意，因为这是决定一切策略的前提。

（二）目前形势估量问题

1、省委对于维川目前和最近将来前途形势的估量，仍然认为：（A）目前敌还不会有解决部队的决心；（B）在最近将来若果邓、黄、李、罗等没有出路时，将会要解决这一部队，但解决的结果，只是撤换官长、清共，绝不会把整个步〔部〕队解散，至多是插花改编；（C）党的组织力量还很薄弱，一切准备更缺乏；（D）部队经济困难，若果没有办法，确有崩溃的危险；（E）如果投罗或其他解决，今后防地伙饷问题是有可能的，不过因他们自己财政困难，所以做起来比较困难。

……

3、你们的估量，省委认为许多是从主观的成见去寻求佐证，并不是客观分析，有许多过份的估量，把目前危险说得非常之大，把将来的胜利也夸张得非常之大。如一方面说敖、罗诸旅四面包围，被解决的危险，祸悬眉睫，并且移下东都不可能；一方面说李其相政权已将崩溃，你们可以捉李，可以在遂宁有建立苏维埃的前途。这样自相矛盾的估量，完全是危言耸听一厢情愿的说法，以证明你们应该动和能够动而已，并不是正确的和客观的估计和分析。（下略）

4、关于部队以外的形势和力量的估计，省委认为是工农群众毫无基础，其他反革命军队中毫无基础，决说不上有什么帮助的力量，同情的力量。所谓力量，须我们在群众中有力量。你们所举的如谢德堪、渊、李、何，教匪领袖，都是些领袖的联络。这些领袖在目前当然不妨因种种利害冲突、私人关系而同情我们，假

若我们真的鲜〔明〕旗帜干起来，他们——尤其是谢、李站在他们阶级立场上，恐怕不但不能同情我们，或许还要一致联络起来，围攻我们。即使他们个人真的信仰和同情，但没有群众拥护，军阀地主阶级能不能把他们赶〔干〕掉？（以下略）

5、综合你们的估量看来，除上面指出的过分夸张和自相矛盾而外，你们还〔有〕几点最严重的错误：（A）是没有仔细估量兵士群众情绪，我们党的组织力量。群众情绪另说。组织方面你们只说有若干人，支部数目尚不知道，至于组织健全与否，能否发动并把握着非党群众更丝毫不提，所以在你们工作中也简直不提到如何鼓动兵士群众，如何加强组织力量。如果主力毫无力量，不管敌人怎样矛盾崩溃，同情帮助力量是怎样多，都会完全失败的。你们仿佛认为这个部队是我们的，丝毫不成问题，如果这样，你们会一败涂地。（B）不向着群众，只看见些领袖估计敌人和友军的力量，完全没有提及群众二字，所以在你们目前准备工作中除了做工农群众工作外（说得也很简单而不充分），没有提及怎样向反革命军队中、兵士群众中做什么工作。在斗争走到武装斗争，这一工作比什么还重要。（C）只估计目前如何危险，将来有什么前途，完全没有认识我们的力量不够的很，所以完全忽略怎样加强自己力量的准备工作。有将来军事计划、行动计划之拟定，没有目前准备工作计划的拟定，忘却现实而去幻想将来（虽然是最近的将来），这是如何危险的事！

.....

（三）目前正确的策略路线

根据党的总路线，根据目前形势正确的估量，省委的决议如下：

1、这一部队目前尚无被敌人解决的危险，但工作太红，决难

保持到等待革命新的高潮到来，参加工农暴动，尤其目前因经济困难，有无法支持之势，应即决心准备在最短期内发动革命兵变。

2、但目前党的组织尚薄弱，群众革命情绪未高涨，其他反革命军队工作，当地工农群众工作，都是无基础，一切准备未充分，如果马上便发动，必归失败。所以目前工作的任务，应该积极加紧准备工作，发动群众起来，尽可能使这一工作有充分把握，发动后能支持较长的时期，有更多胜利的可能。

3、在目前为要使我们准备工作有更充分时间，不致为敌人武力压迫，或经济困窘，应运用策略与战术，与罗、杨或其他任何人都应周旋，在不妨碍我们的工作以迁就于他人的条件之下，尽量去联络、应付并取得援助以至于归编。

4、发动之时机问题，应以经过宣传鼓动工作及小斗争，把兵士群众情绪重新发动起来了，一切准备大体妥善，反革命军队及工农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始能认为成熟的时机；此外只有在敌人确有解决部队的决心，已布置进攻的时候，才能无条件的发动。时机决不能只看客观条件，你们决心待李归即动之主张，省委不能允许。

5、发动之后只能形成游击战争，不能在未曾把广大工农发动起来以前幻想地方暴动及与敌人大部队作正式攻击。

.....

（五）行动后政权路线等问题

1、省委不同意你们估量有在遂宁建立地方政权的可能，你们仍应坚决去作游击战争，必须真正发动了工农群众，才能有政权建立之可能。尤其苏维埃政权，是民众政权的形式，必须由民众选举出来，绝对禁止滥用苏维埃旗帜，使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在群众中堕丧其信仰。苏维埃组织，必须在一个地方固守一星期以

上，群众已发动起来，有了自己的领袖，才可召集群众会议产生，但还不可过迟，使群众自己的政权，不能建立。目前你们还只能是建立乡区苏维埃，不可轻易建立县苏维埃，更绝对不许全省性质的苏维埃。

2、发动之后必须鲜明旗帜，才能发动群众动摇〔反〕革命军队，以后绝不能暧昧不明。

3、路线问题，省委只能告你们一个形势，让你们决定：

(A) 川南工农情绪异常高涨，荣昌、威远农民游击战已发动了两三万农民，军队简直不敢下乡，豪绅民团都逃入城内，自井又发生大罢工，如果你们能到川南，其作用非常之大，不过资、内有重兵，当然不可能通过，但闻黄逸民有调你们到简阳之说，也是有可能的；(B) 其次能到川东，党比较稍有基础，但邻、合有重〔兵〕，通过不容易；(C) 取道川北，敌兵自然薄弱，不过那里没有丝毫群众基础，且道路崎岖，给养困难。请你们估量自己的力量，调查附近军队，及酌量将来游击战布置来决定。

4、省委的意思，你们发动后自然先去遂宁乡间作游击战，如不能支持，再采定一路线认形成朱毛式的行动。如果集中军队作整个运动，那只有川北敌人空虚，才有可能。如走敌人重兵区域，一定会被截击，使首尾不能相顾而溃败。如分散为小的游击队，向同一方向分道出发，采取敏速行动，使敌不知向何路截击，则走川东，走川南都有可能，不过这必须组织上确有把握，能在统一指挥下分途独立行动。

(下略)

世仁 君伟

(摘自《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卷，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印。)

为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全旅兵士 举行革命兵变宣言*

(1929年6月)

全四川的工农兵士及一切贫苦民众们：

四川国民党军阀之一——邓锡侯统治之下的江防第七混成旅全旅兵士现在举行革命兵变，投向工农，组成四川第一路工农红军了！他们撕毁了屠杀工农象征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高举镰刀斧头红旗在川北一带执行革命政纲：推翻了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废除了一切厘金捐税；实行工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发动工农及一切贫苦民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并且准备帮助工农兵士贫民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这一个兵变使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在革命群众面前吓得发抖！使全四川的工农兵士贫民都增加了革命的勇气和热情！这是四川国民党军阀统治崩溃的开始，这是四川工农革命成功的信号！这是一个有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意义的革命行动！

无疑的，这一个兵变，是江防七混成旅革命兵士群众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和领导而执行的。但是，共产党应该号召全四川的

* 此件系四川省博物馆馆存资料（红字油印，仅存一页），缺落款。从残存件内容判定，此宣言是中共四川省委借江防军第七混成旅举行革命兵变，向全川工农兵士及贫苦民众发出准备全川暴动的号召。

工农兵士贫民起来认识这一兵变的正确意义。这并不就是工农群众的武装暴动，这还不能完全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实现工农兵士贫民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尤其是革命的工农兵士贫民不应该幻想靠着红军的力量来解放自己，而放弃了自己艰苦的工作，不团聚自己的力量，不准备工农群众自（己）动手的武装暴动。

工农兵士贫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阀正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一切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用最野蛮最残酷的手段屠杀工农，压迫工农运动，压迫一切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剥夺民众的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他想延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延长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对工农的剥削。他更无限制的搞捐税、循环〔环〕不已的爆发互相间的混战，加重工农兵士贫民的痛苦。工农兵士在国民党军阀统治之下，现在已经痛苦到了极点，工农兵士贫民要想解除自己的痛苦，要想使全中国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什么和平请愿，促开国民会议，都证明是毫无效果的手段。什么救国护党，改组国民党，都证明是欺骗群众和缓革命的把戏。工农兵士贫民唯一的出路，只有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政权，所以共产党屡次号召工农兵士贫民加紧团结自己的力量，准备武装暴动！

武装暴动不是凭借少数人的英雄式斗争，不是凭借一部分武装力量的军事投机。它必须是建筑在广大工农群众极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勇气上面，必须有广大群众起来与统治阶级拼死命的决心。自然在暴动中间，必须瓦解军阀的军队，使军阀压迫下的兵士投向工农方面来，帮助工农攻打压迫工农压迫兵士的军阀长官。但，这决不是暴动的主力军。并且必须有了工农群众自己英勇的斗争，才能影响到兵士群众，才能瓦解军阀的军队。

中国国民党军阀本身的冲突矛盾，无法稳定其反革命的政权，重税苛捐，混战的结果，加重工业危机，加速农村经济的破产与崩坏〔溃〕，使工农贫民失业破产日多，生活更加痛苦，这必然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四川政治经济的危机和裂痕更大，尤其要使工农群众不得不很快的实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但是在目前工农群众的组织还没有扩大坚实；在革命几次失败后，一部分群众还没有回〔恢〕复革命的勇气；一部分群众还沉溺在改良主义的麻醉之中，幻想有和平改良的道路；尤其工农兵士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没有适宜的配合。革命在全省范围内，现在还没有广大的群众的基础。一切革命的工农兵士贫民，在目前不是要马上起来暴动；而是要加紧团聚自己的力量，坚实自己的组织，准备武装暴动。共产党目前的任务是在帮助工农兵士贫民组织群众的力量，领导群众从日常斗争中锻炼出战斗力量和组织，使全四川的工农兵士革命运动有平衡的发展，准备实现全四川的武装暴动！

虽然在四川全省范围内，还不能马上实现武装暴动，但当着一部分工农兵士贫民在极深的痛苦压迫之下，自发地起来向统治阶级爆发武装斗争的时候，共产党是没有理由不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共产党是群众的党，不能违背群众的要求，不能象一般机会主义者一样，报怨群众“不该拿起武器来”，而抑制群众的行动。

过去江防第七混成旅的兵士群众在军阀长官逼迫之下，参加了无数的军阀战争，牺牲了许多兵士的性命。而在国民党军阀所谓“国民革命成功”的旗帜之下，所谓“改良兵士生活”的政纲之下，使兵士最低的饷款也不能领到，甚至连伙食都不能维持。兵士群众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力量驱逐了克扣兵士火饷，虐待兵士的反动长官，由他们自己宣布废除肉刑，组织士兵

经济委员会管理军队财政。一切军阀都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千方百计要想解散这一部队，歼灭这些革命兵士。兵士群众们饱尝了军阀的虐待和压迫，（受尽了）军阀战争的害。在前途有被解散被歼灭的危险，眼前有火饷断绝，日食不给的痛苦，他们反抗军阀的情绪高涨到了极点，他们再不能一天在军阀压迫下过生活，他们不得不立刻起来发动革命兵变。虽然在这时工农武装暴动还不能马上起来，但共产党在这时是不能违背这些革命兵士群众的要求的。它只有领导□□走去与工农□□，用游击战争实现革命的政纲，削弱□□□□的力量，扩大革命的宣传，发动最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实现地方（以下残缺）

（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中共川西各县代表会议关于 农民问题决议案

(1929年7月)

(一) 农村经济破产与农民的痛苦

整个的中国因为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农业与手工业联合的旧经济基础，使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川西自然也是在这一个总的经济趋势之下，农村经济日趋于崩溃，农民生活一天一天更加痛苦。

尤其川西因为产业落后，交通不发达，在近几年来基于下面几个原因，更加紧农村经济的破产，比任何地方更为厉害：

第一，外来的工业品已经摧毁了旧日农村中的手工业，成为农村经济中的主要成份。这两年来因为战争捐税，币制紊乱，汇兑率增高，川西交通特殊的不便诸种原因，工业的价格异常腾贵，同时农产品的价格异常低落，使整个农村经济形成巨大的入不敷出的现象，而日趋于破产。

第二，川西的工商业比较川东各地更不发展，因之军阀捐税的剥削，完全以农民为主要对象。在川东下川南沿江一带，盐税护商统捐二五税等等税款，占军阀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川西则这些税款为数甚少，军阀税款收入的大部分完全取之农民，所以川西农民所负的捐税名目更多而款额更重。这也是促进川西农村加

剧破产的主要原因。

第三，军阀捐税无厌的剥削，外来工业品无限制的输入，使货币作用在农村中日益增大，借贷资本因深在农村中施行残酷的剥削。川西农村中经营高利贷者，不仅是地主、富农，还特别有种种借贷的商人，其利率之高竟达百分之多，这也是农村经济急剧破产的一个原因。

第四，自去〔年〕以来，川西有许多地方因旱灾的关系，农业欠收，尤以绵竹等县为最，农村经济自然更日趋于崩溃。

在上面这些原因之下，地主因为受了农村经济破产的影响，一切损失都转嫁在农民身上，用加租加押种种办法，残酷的剥削农民。川西内属因为有水利的灌溉，田土饶沃生产丰富，自来地主剥削农民已经非常厉害。在四川任何部分，农民纳租额大都是百分之五十至七十，川西租额特别高至百分之八九十。农民仅得的百分之一十至二十的剩余收获品，还不能算是农民的收入，只算是押金的利息（川西所谓的“扣租”）。若果合押金算来，农民是把全部收获品都供献给地主，而自己只能得点小春杂粮的收入。再加以近年加租加押剥削进攻，农民的痛苦愈加增剧，达于极点。

近十余年来农村经济日趋破产，自耕农逐渐破产失去土地。更因为川西土地肥沃，军阀豪绅投资于土地者很多，因此土地日渐集中于地主阶级手中。农村人口增加，和失掉土地的农民日多，在川西新式工业不发达，现有手工业日趋破产的状况下，这些无土地的农民，不能被吸收到都市工业中去，只有挤着在农村中，争佃一块小小的土地谋生存，地主以更容易利用农民的争佃夺耕来加重剥削，使农民在任何残酷条件之下，都不得不忍受。在崇宁有佃田十余亩，中人钱竟需索至九十□之多的。这一方面看

出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是如何迫切，二方面看出农民的痛苦是如何剧烈。

地主阶级因为经济上的剥削地位，在农村中形成极野蛮的封建统治阶级，更利用他们的暴力(民团)极端压迫农民。在军阀捐税之外，更有团款、枪枝子弹费、免役费等等剥削；对于贫农并科以封建的徭役，如冬防、团操、守马路等等苦役，这些尤其是农民最大的痛苦。

总之川西农村经济是一天一天的在加剧崩溃过程中，川西农民的痛苦，也随之一天一天的增高，这是客观上农民运动最容易发展的基础。

(二) 农民运动自然的形势

川西农民生活既异常痛苦，当然要自己寻求一条出路。因为党在川西农村中的工作异常落后，不能领导农民走上正确的工农民权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道路，所以川西农民在近几年来常常形成两种自然的趋势。

第一种是受豪绅地主阶级所领导的军团冲突、抗捐运动，这些事件都是建筑在全体农民群众反军阀捐税的意识和要求上面的，但是领导权属于豪绅地主阶级，并不是真正为反抗军阀——当然更不是为了解放农民，只是藉反军阀的口号，利用群众的力量，以推翻不利于他们这一派豪绅地主的某一个军阀，或者威吓当地军阀，使他更能代表豪绅地主阶级剥削农民。所以这种运动多半是由豪绅地主阶级半途妥协，出卖农民的利益而失败。

第二种是受教匪土匪所领导的反军阀运动，这种运动□□是受教匪土匪的游民意识所领导，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没有组织的行动，只是无意识的盲动和简单的骚扰，结果当然只有失败。

除了上面两种形势的斗争而外，在川西农民中没有其他的组

织，也没有其他的斗争，所以农村阶级分化异常模糊，当然更说不上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因为除了反军阀的斗争而外，没有农村的阶级斗争，所以佃农反抗地主，雇农贫农反抗地主富农的意识异常微弱。虽然农民受地主剥削异常厉害，对土地的要求非常迫切，但还不能自动的走上土地革命的阶段。

（三）过去党在农村中工作

川西农民运动方才开始，即遇着资产阶级国民党背叛革命，与豪绅地主阶级一致向工农进攻，党在农村中还没有丝毫基础，便遭受反动潮流的压迫，农民还没有反地主的觉悟和决心，地主阶级便早已多方防止农民的反抗，这是党在川西农村中工作比较困难的地方。

虽然客观上有这些困难，但党在农村中工作没有进展，还是由于主观上有许多缺点。

第一，是没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不能从农民群众日常生活问题中去发展斗争，扩大宣传，发展组织。许多地方是利用民团豪绅的势力去发展农运，结果反为民团豪绅所利用；有些地方是借教匪去发展组织，结果真正的群众日益隔离；更有些地方还在利用国民党的机关去作农运，全是农会的运动，没有群众基础。

第二，是不了解农会的意义，组织方法异[常]机械。不能利用各种方式，根据群众的需要发展组织，仍然守着国民党时代的工作方式，幻想很有系统的去组织各级农协，结果只是形式的组织，不合群众的需要。有些地方在过去盲动主义的路线之下，把农协认为是暴动的组织，陷于极端秘密的形式，不能吸引广大群众。有些地方又把农协认为是一个吸收同志的机关，并不注意去健全农协本身的组织，使他没有力量领导广大群众。

第三、只有临时的简单的鼓动，没有系统的宣传工作。不能

认识群众的需要，提出正当的口号，大多是完全接受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只提出抗捐抗税的宣传，没有土地革命的宣传，没有党的政治宣传，甚至连抗租减租的宣传都没有。有少数地方又只是机械的模糊的宣传土地革命（并且多加以误解）和武装暴动，不能把这些口号与群众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群众来而却走〔步〕不能接受。

第四，没有发动群众日常斗争，尤其是最主要的缺点。整个川西几乎没有一处有日常斗争，群众感觉得除了坐等暴动预分土地而外，平日毫无组织的必要，因之，组织日就涣散，致〔至〕于消灭。尤其是没发动农村经济斗争（佃农减租减押反对地主剥削，贫农反高利贷者地主富农，雇农要求加工资等），不能提高贫农雇农的阶级觉悟，从斗争中显示豪绅地主对农民的一切压迫。所以农民仍然在豪绅地主利用影响之下，用笼统的反军阀的宣传隐藏了应该反豪绅地主的斗争。

第五，农民自发的斗争不能事前有计划的领导，有时只是跟着群众做一个“尾巴主义者”，有时连“尾巴”也做不到。不了解游击战争的方式和作用，有些地方农民斗争一起来，便去玩弄暴动（如绵竹），有些地方因为害怕武装斗争（因为农村斗争很容易变成武装斗争），常常不自觉的回避斗争，抑制群众。

因为上面的缺点，所以现在党在川西农村中的工作不但没有进展，而且一天一天的陷于绝境。武装斗争失败的地方，农民大多数都异常消沉，甚至于埋怨党和农会。同志也感觉得既然不能得着暴动的胜利，便无法进行工作，没有斗争的地方。农民得不着一点现实的利益，大多数都离开党和农会，认为党和农会都是些空谈家，所有宣传，农民都以为“好是好，只是办不到”来作答复。在这样情形之下，若果川西农运再不能找出一个新的路线，

便只有完全瓦解。

（四）今后农村工作的策略总路线

本会议一致接受第六次代表大会农民运动决议案的精神，认为六次大会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立场和对农村各阶级的策略路线，完全是正确的，在川西应该切实的遵守执行。

目前党在川西农村中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一切日常生活斗争，在斗争中去扩大宣传，发展组织，正确的宣传土地革命、武装暴动的意义，经过日常斗争，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实现土地革命的武装暴动。

在川西——即整个的四川亦是同样——农村中一般的斗争形势看来，反军阀、反捐税的口号是最为一般农民所拥护的，目前党的工作路线是要以反军阀反捐税的口号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农民群众统一战线；同时进行反豪绅地主的斗争，指出豪绅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和勾结军阀的罪恶，使农民反豪绅地主阶级的意识更加明确坚定，从反军阀斗争一直发展到土地与乡村政权的斗争，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

过去党在农村中工作，客观上是代表着农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富农和中农）的要求，很少甚至完全没有代表过贫农的要求。在一般反捐税斗争中，贫农表示不十分积极参加，因此广大贫农群众多数与党和农会隔离。今后必须把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建立贫农领导中心作为农村工作中第一个主要任务。要不断的发动贫农对民团豪绅地主富农及商业资本借贷资本一切日常生活斗争，在反军阀反豪绅地主的广大斗争中，特别提出贫农的经济要求，尽量引进贫农群众参加反军阀斗争，并以贫农作领导中心。这样才能使广大贫农群众积极的围绕在党的周围，成为农村斗争的基本力量。

川西因为军阀捐税的剥削特别厉害，另一方面农民运动异常落后，还没有促进农村阶级的剧烈分化，所以富农一般都还有相当的革命作用。在反军阀反豪绅地主的斗争中，应该引进富农参加，至少应该使他能够中立，不要故意的过早使富农走入反革命营垒。但这决不是要牺牲贫农和雇农的利益。抑制贫农雇农对富农的斗争（如反高利贷，雇农要求增加工资等）去迁就富农。我们能够引进富农参加革命的唯一基础，是坚决的领导反军阀反捐税的斗争。能够在革命斗争中，废除一切捐税或有最大限度减捐减税的胜利，富农虽然在剥削贫农雇农方面同时有些损失，仍然是可以拥护革命的。不过一方面随时要准备富农的叛变，在富农叛变的时候，必须迅速转变策略，坚决反对富农。

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唯一的条件。□□中农的基础，仍然是要建筑在坚决的反军阀反捐税豪绅地主斗争上面；一方面要纠正过去一切不正确的宣传口号（如没收一切土地，均分财产等等）使中农不致于离开我们。

川西内属土地肥沃，富农经济比较的多，所以雇农的数量并不十分少，虽没有很正确的统计，但大概占全数农民百分之三十左右。所以应该尽量成立雇农委员会，单独发动雇农经济斗争，建立农村中无产阶级基础。其他雇农较少的地方，应于农会中成立雇贫支部，在反军阀豪绅地主中，要特别提出雇农的经济要求来。

（五）土地革命与部分要求

川西佃农大概占全体农民百分之七十左右，加以人口增加，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当然大多数农民是需要土地的。但因为农民运动落后，农村中经济斗争很少，所以农民反地主阶级的意识还很模糊，还没有自觉的起来要求土地，因此土地革命还不

能在农村中成为广大群众所热烈拥护的行动纲领。但这决不说我们可以不要宣传土地革命，反之更应该有系统的去深入土地革命的宣传，因为将来农村斗争一发展，多数农民必然自动的急剧的走上土地革命的阶段。党这时必须加紧土地革命的宣传，以促进这一过程。

要促使土地革命的阶段到来，使农民有自发的土地要求的热情，现在应多提出各种部分要求的口号（如减租减押，反对加租押、加地租及一切苛例等），发动日常斗争，逐渐提高农民反地主的情绪。从斗争中去打破农民对地主的封建关系（主客的关系）和畏惧地主依赖地主的心理，同时要把每一个部分要求，联系到土地革命口号上面。

宣传土地革命必须纠正过去一切不正确的宣传和笼统模糊的宣传，如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等等。应该使党的土地政纲尽量通俗化，经常有系统的去扩大宣传。

（六）反军阀反捐税运动反军团冲突等

过去反军阀反捐税运动大半是由豪绅地主的领导，形成军团冲突的形势。对于这种冲突，党内发生各种不正确的倾向：第一种认为这完全是豪绅地主所领导的，我们不应该去参加，坐让农民群众去受豪绅地主的领导；第二种是无条件的与豪绅地主讲联合战线，牺牲党的政治主张和贫农的利益，跟着豪绅地主瞎跑，同样断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这都是极庸俗的机会主义的路线。

现在全体农民最热烈拥护的是反军阀反捐税的口号，党必须坚决去领导这些斗争，才能争取广大群众。要能够夺取这些斗争的领导权，党必须先看出农民的要求，比任何人更先提出农民反军阀及捐税的具体要求，自然农民群众会走到党的方面来。这是

党夺取领导权唯一的策略。

反军阀反捐税的斗争是很容易走到武装斗争的，〔所〕以斗争一开始即须准备武装冲突和游击战争的领导（关于游击战争的任务与其方式，完全遵照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农民运动决议案之决议）。但武装斗争决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他必须有广大群众的基础，由群众的感情和决心自动走上武装斗争的阶段。党在中间只是使他采取更有组织的行动，事前有很好的准备，加以充分的领导。在农运薄弱的地方，若果缺乏广大的群众极热烈持久的斗争情绪，应该避免少数人的军事冒险的武装冲突，可以在相当的胜利条件（如抗捐运动得到最大限度的减让等）结束斗争，再团聚力量作新的斗争。

如果党不能及时领导，而由豪绅地主富农发动反军阀反捐税的斗争时，党必须领导群众尽量参加，夺取其领导权。在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应该号召农民用独立的名义和组织（农协及农军等），参加这一斗争。应该尽量指出豪绅地主利用农民的野心和作用及其半途妥协出卖群众的必然性，使反豪绅地主的斗争，与反军阀的斗争同时进行。在农运薄弱的地方，党应动员群众参加到豪绅地主所领导的群众中去，扩大反豪绅地主阶级的宣传，推动群众坚决斗争到底，用群众的力量把豪绅地主的领导推翻，转变到我们手上来。

在农民反军阀反捐税的斗争中，同时要注意与城市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及对士兵的宣传鼓动，使农民斗争容易得到胜利，而不致孤立失败。

（七）农民组织问题

农民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建立绝对多数农民群众反军阀豪绅地

主的统一战线。农协必须成为广泛群众的组织，应纠正过去狭隘的极端秘密的组织形式。但要以贫农为中心，坚决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农民的组织在工作毫无基础的地方，如金堂、广汉、新都等，应该尽量利用各种公开的可能去发展组织，如用平民教育、农民识字运动、乡村文化运动去组织农民读识字班、武术会、娱乐部，或农民原始的组织如土地会等等。在各县甚至一县之内，不必一个统一的名称和有系统的组织形式，使他能够适合农民的兴趣和需要，吸引广大群众。经过斗争和组织发展之后，可以成立县农协或农民委员会，把这些小的组织统一起来。

在农民组织异常薄弱不健全的地方，如彭县、灌县、郫县、崇庆县等，应该以市郊及重要场镇交通要道规画为中心区域，集中力量整顿这几个中心区域的组织，洗刷原有的不良分子，重新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发展组织，加紧领导斗争，从这几个中心区域的工作，去影响其他的组织，振作群众的情绪。其他各地也同样应该布置中心工作，力戒零星散漫发展的毛病，以免分散力量。

在经过斗争失败的地方如绵竹县，应该尽量解释战争失败的原因，使群众知道健全组织与扩大组织的必要，发动极小的斗争，保证其胜利，以振起群众消沉畏怯的现象，恢复组织。如果农会的组织招〔遭〕受压迫，群众畏惧不敢加入，可以经过农会会员利用各种公开的方式，去组织群众，逐渐引导他们走向农会的组织。

一个广大群众的斗争（如抗捐等）到来时，如果没有农会的组织，或农会的组织还未成为群众的组织，或农会的组织很难公开号召群众，即应该以临时斗争的口号（如抗某种捐款大同盟、驱逐某个豪绅的大同盟等）去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在斗争

结束后，没有农会的地方即可变为农会的组织，有农会的地方可以吸收广大群众，发展农会组织。

农民组织中应该特别注意农妇及青年农民的组织工作，在农会中应该设立妇女部、青年部及妇女支部，并帮助青年团发展各种青年农民的组织。

（八）民团土匪问题

民团纯粹是豪绅地主的武装，若果我们不能夺取民团，是决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但夺取民团绝不是扶助同志去取得民团队长教练的地位，而是要夺取民团的下层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

民团应分别常练与壮丁，各用不同的方式去工作。常练应该遵守破坏反革命武装的原则，派遣同志或农会会员打入，去扩大土地革命反豪绅地主阶级的宣传，鼓动练丁反抗队长教练，要求增加月饷改良待遇的斗争，建立秘密的党的支部和群众的组织。对于壮丁，应当吸收在农会里面，把所有的武装在农会系统之下秘密编为农民自卫队的组织。此外应该经常站在农民利益方面提出反对团款，反对设立常练，反对抽丁出操、派守隘口马路的口号，鼓动斗争以破坏民团的组织。

对于教匪土匪袍哥的策略，决不应采用领袖的联络，及幻想依赖利用土匪教匪为革命主力，作一切军事投机的把戏。经常应该打入到下层群众中去，揭破他的领袖的一切欺骗黑暗的行动，指出他们荒谬的思想和主张，宣传土地革命及正确的革命暴动的出路，在思想上夺取其群众。并应在农民中公开批评土匪教匪思想行动的背谬，要极〔力〕纠正农民中的土匪教匪倾向。

在农民游击战争和暴动中间，对土匪教匪可以保持相当的联络，但绝对不能倚为主力，并且在必要与可能时，应该解除他们的武装来武装农〔民〕。

川西教匪常常有跃跃欲动之势，有时也能够发动群众起来暴动。在教匪的暴动中，若果有广大群众基础时，我们应该尽量的赞助，并以农会的组织去影响他们，使他在农会领导之下行动，同时加紧下层群众工作，公开党的政治主张，批评教匪领袖荒谬的主张和行动，夺取其群众，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之下，走向革命的斗争。

（九）党在农村中工作

过去党在农村中工作的发展，多半建筑在乡村中有地位的同志（民团队长、教练、乡绅等）身上。这些同志因为他的地位和领导环境的关系，不自觉的形成和平发展趋避斗争的现象，并且不能深入群众，为了职业的关系更不能够依照党的计划选择重要区域去发展组织。今后发展农村工作，必须有计划的选派工人同志和能够农民化的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作工，做小贩，经常有系统的去作宣传组织的工作。此外亦可以利用举办乡村教育，或寒暑假的机会，派遣学生同志到乡村工作。

党在农村中的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雇农和农村手工业者）或半无产阶级（贫农）构成，他是要保证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领导，转变向社会主义前途的。农会的组织是民权革命阶段中绝大多数农民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在苏维埃成立之后农会必自然消灭。党和农会在组织上的作用，必须有严格的分别，要严厉纠正过去党即农会，农会即党，以及滥发展党的组织，不发展农会组织的现象。小资产中农分子，必须在极严格的条件之下才能吸收入党。党与农会的组织必须严格分开，党只能经过党团及农村支部的核心作用，去保证党对农会的领导。

中共川西各县代表会议 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

(1929年7月)

一、军事工作的重要性

根据目前党的政治任务，争取广大群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军事工作大会认为有严格注意的必要。因为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发展到工农阶级武装暴动打倒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工农民主独裁——苏维埃政权——的阶段。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虽已日趋动摇、崩溃之途，但他们为着自己阶级利益，为掌握着广大的军队民团商团，将与我们工农阶级作最后的斗争。广大的军队民团商团虽大都出于工农阶级，理应一致站在工农方面向反动的统治阶级斗争，惜其阶级觉悟尚无相当的发展，故尚为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所利用，而为其特权阶级的利益奋斗。中国工农没有受过武装训练，缺乏暴动技术，就是将来的红军亦必须加入大部分的现在兵士群众。为着破坏这反革命的武装，使这广大的反革命武装中立或同情来参加工农革命运动，保障工农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新胜利，党不应该□□〔只从〕消极方面纠正过去军事投机的错误，并须在积极方面对于如何打击敌人武装，如何扩大工农武装、建立红军与其他关于军事的问题□□〔筹〕建有整个的规划与指挥。所以军事工作在革命运

动中实站〔占〕着极重要的地位。若是只注意工农运动，而忽略军事工作，将无以保障工农革命的胜利。所以工农及军事运动在党的工作中要同等的重要，应该是平衡的发展。

二、过去对于军事工作的错误

(1) □□军事工作的意义。没有完整的军事工作就是简单的兵士运动——兵士群众中的政治鼓动宣传，党的组织和□□兵士群众的组织……川西川南都普遍的□□□及同志和一般□□都认兵士运动为特殊部门，而不是地方党部工作之一。

(2) 以为先有军事然后才有兵士运动、民团工作；以为先有大分队长然后才去做民团运动。这种由上而下的工作方式，完全失掉了群众运动的意义。

(3) 以为反革命军队中工作是建设的而不是破坏的，因此不曾在军队中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发动兵士群众斗争，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去争取广大的兵士群众，迁就环境与军官同志，成为一般军事工作同志们的通病。

(4) 革命虽很发展，阶级斗争虽尖锐化，但党员并没有军事化，工农武装训练亦没有。

(5) 反革命军队中，党的组织发展不普遍且松懈，秘密工作方法和习惯都非常缺乏。

(6) 对于农村的游击战争，完全缺乏有计划的领导甚至完全没有领导。

三、兵士运动的目的和策略

A、兵士运动的目的

(1) 打进军队民团中商团中去扩大党的政治鼓动宣传，提

高兵士团丁群众对于官长的阶级仇视，破坏反革命军队纪律、威信、权力和系统。

(2) 团结广大兵士群众，发动经济政治斗争，使兵士群众认识国民党军阀政权，了解工农革命的意义，实行工农兵联合，同情工农阶级的一切斗争，并参加工农阶级夺取政权的武装暴动。

B、兵士运动的策略

(1) 党在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原则是破坏的而不是建设的。对于军阀战争须绝对遵守“失败主义”的原则，不帮助任何方面军阀，只采取两方并倒的原则工作。

(2) 不管是同志领导的反革命军队或别人所领导的反革命军队，我们在兵士群众中工作，应该利用一切机会，绝对的扩大政治鼓动宣传（口头的与文字的），并发动士兵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斗争。从思想上行动上争取广大的兵士群众，团结他在党的周围，准备随时可以在党的指挥下面参加工农革命破坏反革命的一切统治。

(3) 当地或临近工农斗争有激烈发展或已开始武装冲突，快要进到武装暴动，建立地方政权时，党在军队中的组织须坚〔强〕的勇敢的领导士兵群众哗变，倒戈到工农方面去。

(4) 当内部斗争已经引起广大兵士的同情与参加，而当地又很少驻军时，亦应举行哗变，领导士兵群众发动工农斗争。

(5) 当地在军队中的组织力量被敌人探悉，形〔行〕将被敌人解决的危险时，亦可举行哗变，领导兵士群众向工农运动较有基础的区域移动，与工农发生密切关系，利用游击战争方式，发动广大的工农战争。

四、兵士生活的痛苦

广大的士兵群众最大部分都是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他们因为破〔产〕失业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迫于不得已才投到反革命军队中来〔去〕充兵。军阀雇佣着这许多饥寒交迫的工农分子，压迫剥削工农和贫民，所以他认为雇佣的兵士完全是他的奴隶牛马，生杀予夺任自处理。在经济方面，每月只有六块大洋的薪饷，七折发出，实际只得到四元二角。这四元二角钱都要被军阀们克扣至几月不发，每月只发给一点伙食费和最低限度的零用钱。一般兵士实在食不饱穿不暖和病兵伤兵军队中不给他们尽心医治（军费被军官侵吞），兵士自己又没有钱就医，所以兵士生活痛苦加剧，逃兵数量也成正比例的增多。军阀们为防止兵士逃跑，所以目前一般的严格防止兵士的行动，星期日和纪念日都很难放假，即使放假也必须由班长率领出营，有意见不准发表，逃兵就要枪毙。一般兵士群众对军阀极示不满，极想解除自己的痛苦，但大都没有找得解除痛苦的正当方法——团结广大兵士群众举行革命的兵变，参加工农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权，打倒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而只幻想着打战发洋财，以遂其升官发财的幻想。

五、士兵运动的宣传口号

A、宣传的内容

为容易使兵士接近宣传起见，应多指出其本身的痛苦，官兵生活的不平等，鼓动其阶级的仇恨。不要像过去国〔民〕党的军队中的政治宣传，讲什么“爱国”“牺牲”“系统化”和“纪律化”……在战场上卖劝世文。要认清我们的宣传是破坏反革命的军队

纪律、威信、权力和系统的，而不是建设的。第一须宣传兵士的出身；第二是宣传兵士的生活痛苦；第三须宣传官兵生活的不平等；第四须宣传兵士的出路。

B、宣传的口号

(一) 政治的^①

- (1) 杀尽一切压迫虐待士兵的军官!
- (2) 没收一切军阀财产分给士兵和贫苦的工农!
- (3) 参加工农革命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给农民和革命兵士!
- (4) 一切政权归工农代表会议的苏维埃!
- (5) 打倒欺骗兵士，欺骗工农的国民党!
- (6) 反对牺牲兵士性命的国民党军阀战争!
- (7) 以阶级斗争消灭军阀战争!
- (8) 组织兵士委员会或革命兵士联合会参加工农的武装暴动!
- (9) 回到民间去与工农兄弟们联合起来!
- (10) 兵士是工农的出身!
- (11) 兵士是有退伍的自由!
- (12) 反对不为兵士谋出路的裁兵!
- (13) 按月照发饷!
- (14) 发清欠饷!
- (15) 增加军饷!
- (16) 关饷不要劣弊!
- (17) 反对克扣伙食!
- (18) 反对欺骗和剥削士兵的储金!

^① 原文如此，疑“(一)政治的”为衍文——编者。

- (19) 拿皮鞋缚腿来!
- (20) 官兵生活平等!
- (21) 经济公开士兵监督收支!
- (22) 提高兵士生活改良衣食住!
- (23) 改良卫生条件增加医药费!
- (24) 照发伤兵抚恤金!
- (25) 设立兵士俱乐部!
- (26) 设立兵士图书馆!

六、兵士运动的对象和方法

A、兵士运动的对象

(1) 新自农村破产的农民，城市失业的工人因无法谋生而去当兵的兵士，懂得劳苦民众的痛苦，容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2) 曾经受过工农训练因参加斗争及暴动来当兵的兵士，更富于革命性，更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

(3) 军队中的老兵，久经战阵富有战争经验，因为与上级官无关系，尚未升迁者，容易取得新兵的信仰，也比较容易受革命的宣传，而且可以号召广大的兵士群众。

(4) 护卫队兵贩子和土匪化的兵士（即由土匪招安成军的）关系复杂，大都不可靠，只可对他们作宣传，吸收入党须十分慎重。

B、兵士运动的方法

怎样到反革命军队中去谋活动（在未打入军队中去以前）？

(5) 利用军阀招兵补兵的机会，派积极忠实勇敢的活动的工农或知识分子加入军队中去当兵活动。

(6) 利用军阀招补兵的机会，派同志藉充当夫役、运兵、

录事、看护兵加入活动。

(7) 利用军阀招兵补兵及办军事训练班或军官学校的机会，派同志去应考，或设法取得下级军官佐等职务，以求活动。

(8) 在军队驻扎的地方设立酒馆茶馆和贩卖纸烟小贩，以接近兵士，企图活动。

(9) 在战区中与军队往来的时候，派人到农村中使农民给他们送茶送烟，以接近兵士，企图活动。

怎样在军队中发展党的组织（打入军队以后）？

(10) 首先注意军队中的最进步分子，用各种方法去联络感情，以发生兵士委员会或兵士联合会的组织，以求发展。

(11) 经过斗争宣传以后，选择最进步的分子吸收入党，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在支部未成立前，党的策略就运用这兵士群众的组织去实现。但每周可以不开会，因为开会多，一则容易破坏秘密组织，一则容易使兵士群众失掉对于该组织的兴趣。

怎样发动兵士群众的组织斗争？

斗争是推动群众、组织群众、训练群众、争取群众的绝好办法，也可说是唯一无二的方法。所以要争取广大的士兵群众，必须要发动斗争和领〔导〕斗争。但怎样斗争呢？第一须懂得利用发动斗争的事实和领导斗争的方法。

(一) 发动斗争的事实

(12) 当军官虐待（打骂）兵士强迫服从的时候；

(13) 当军官侵吞军饷兵士鼓噪的时候；

(14) 当病兵伤兵没有医药治疗不安的时候。

(二) 领导斗争的方法

斗争须要动员全体或最大多的群众才能得到胜利，但领导斗争的方法是怎样呢？

- (15) 须避免不成熟的武装冲突；
- (16) 须有最大多数的群众动员才能斗争；
- (17) 用全体或最大多数请假或退伍的办法；
- (18) 用全体或最多数罢操（不上操）或不散操的办法。

七、民团商团运动

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民团商团是保护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压迫工农和城市市民的一种武器。他在农村中阻碍农民运动的发展，在城市阻碍工人和贫民的运动的发展，我们要打破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民主独裁，对于农村的民团和城市的商团，也应该采取绝对破坏的手段。不过民团商团组织非常复杂，有（A）团丁完全为农民者（此指门户练）；（B）土匪改变者；（C）溃兵改编者；（D）招募编成者；（E）完全由地主子弟亲戚组织者（以上指常练）的种种区别。所以我们的工作，也应该看民团成份的性质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方法，对（A）种应完全用农民运动的口号与策略去影响他；（C，D）两种应以与兵士运动的方法去工作，（B，E）两种，尤其是（E）种很困难，工作最主要的是要以工农群众的力量去消灭他。因为发展工农群众运动，扩大工农斗争，是瓦解民团商团主要的策略；其实同样的是动摇反革命军队组织和使兵士中立、同情并参加工农革命的最主要的策略。如果工农斗争不发展，决难单独进行民团商团运动。

八、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工作和秘密工作

A、组织工作

党的组织工作，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是含有极重的政治意

义的。党不单需要有革命的政策，同时需要有能执行革命政策的革命组织。若是没有好的组织，是不能实现好的政策的。所以反革命军队中党的组织工作值得我们非常注意。其组织的系统是：

(1) 排设小组，以五个党员组织。但在一排中如超出五人以上至六七人时，而环境许可，仍可编成一组，否则编为两组，各直属连支，而组长在工作上经连支允许后，得发生相互关系。有时亦可以按信任程度或相识的条件（指已经彼此互相发生党员关系者而言）编组。

(2) 连设支部，当两排有小组织（织字疑为衍文——编者）时；

(3) 营设正副特派员，当两连有党的支部组织时；

(4) 团设正副特派员，当两营有党士兵组织时；

(5) 旅设正副特派员，当两团有党士兵组织时；

(6) 军中团员一律编入党部组织，不另成立团的组织；

(7) 发展组织须力求普遍，切忌畸形发展，如第一第二两排有党的组织时，第三排亦须发生党的组织，营团同此类推。

B、秘密工作

反革命军队中工作环境，比一般的环境困难，我们在反革命军队中作破坏工作，如果不注重秘密工作的技术，很容易为敌人所发觉，所破坏。秘密工作应注意下列各点：

(1) 反革命军队中党员不得自由与军队外面的党员发生党的任何关系——自由谈党务，谈别的同志，彼此互相公开党员资格……等。

(2) 同在反革命军队中的这组党员和那组党员不准自由发生党的关系，不准自由互相公开党员资格。

(3) 各级党部不准保存党员名单，遇必要时只宜保存秘密记载的党员名单。

(4) 一切命令应多用口头传达。文字通知，非不得已时不能使用，一经传达使用后的通知书或决议文，须即刻烧毁。

(5) 各级党部只有纵的关系，不应有横的关系，更不应有越级发生关系。

(6) 党员的教育训练，应在小组会议中，或个别谈话中。举行文书联席会，或组长联席会，不当举行多数人的训练班，也是破坏组织上的秘密，不应该举行。

九、党员军事化的问题

党的任务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党员应该军事化。因为中国是志愿兵制度，一般人民是没有受过军事教育的，如果不军事化，便不能领导工农做夺取政权的武装暴动，所以党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如就城市和乡村团操及到军队中去入伍……）以接受军事教育，使自己军事化。

十、工农武装组织与武装训练

为完成工农联合夺取政权的武装暴动□□目前就应该开始建立秘密的工农武装组织——工农赤卫军（选择工农阶级中，强健勇敢牺牲奋斗的进步分子组织起来，受工农会之统率与指挥），并利用一切方法和机会给以初步的军事知识——射击、侦探、步哨、袭击、巷战……之教育训练。

十一、领导游击战争问题

农民斗争起来很容易走到武装冲突的情况，在这富有反革命武装——民团的四川农村中，而各种条件尚未具备，未能举行地方暴动的时候，游击战争实是初期发展农民运动的利器。过去党

对游击战争的领导，很少注意，今后各县军事特派员或军委应切实参加准备积极领导斗争。

十二、红军组织问题

在工农联合的武装暴动，地方政权建立以后，应该即将工农赤卫军和参加暴动的军队改组为红军。在暴动中由反革命军队中倒戈过来的军队须加以改编，改编在红军里。红军的组织原则，应该是征兵制，以工农分子充当。目前过渡用志愿兵制。红军兵士应有一致的服从办法，官长应尽量工农化，以受过相当军事工作的工人去代替旧的军官。红军应绝对服从苏维埃纪律。

十三、党的军事组织

根据六次大会军事运动决议案，军支应受县委管辖，县委设军事特派员，并须参加常委工作。有兵士运动的地方，须即组织兵士运动委员会，受军事特派员之指挥。军事特派员由省委军事委员会指派。在有工农赤卫军组织和游击战争已经发动的地方，须设军事委员会。军事特派员或军事委员会应当受县委的指导，但同时要直接受省委军事委员会的指挥。

十四、军事调查工作

一个革命的党，不但要懂得自己阶级的力量，同时要懂得敌人阶级的力量，为要懂得敌人真实的势力，必须对于敌人反革命军队民团商团的策略主张，行动组织，武装战斗能力等等，须于以极精密的调查。要根据这调查所得的实际，然后才能定出我们的策略，及时的工作路线……等来。

（中共新都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原件存新都县文管所）

C·Y川西扩大会关于农村青年 工作决议案（节录）

（1929年7月）

1. 农民运动的现势与党的策略

（一）土地革命继续的仍为中国革命阶级中的主要社会内容。这句话在四川的来看，也是一样的而没有两样。因为在四川的社会完全是一个农村经济社会制度的社会，同时被一般土地私有者的土豪劣绅垄断了农村经济政权和农村统治权。而一般的农民完全是在被（被字为衍文——编者）压迫阶级和剥削之下过活。

土地的根本矛盾，是在千百万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和土地极少的农民群众（半佃农）上面。

（二）利于农民运动发展之主要转变。

1. 川省的多派军阀间不断的战争与经济的破产。而资产阶级地主与反革命势〔是〕时胜利，农村统治阶级直接压迫加剧，以致农民群众的生活，日益恶化。召〔照〕以上条件的关系，故无地的农民有高度的要求和自动的起来争斗，如川西的彭山农民自发的抗捐运动和川东的农民自动要求土地抗税抗捐多〔各〕种斗争。这都是利于发展农民之主要转〔特〕征。

2. 近来川省的农民运动之发展，虽有高度的彭〔澎〕涨和斗争范围的扩大，但多地（原文如此）发展不平衡。在川西

也有一样的趋势。

3. 川东的农民运动，所表现出来的要求很明显的差别。就川东的农民要求是直接的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和要求土地消灭苛捐杂税。在川西方面，大都是感觉苛捐杂税很利害和压迫者之坏，所以他的要求是只要把苛捐杂税消减……还没有感觉需要土地的要求。

II. 农村工作之错误和缺点

在中国农民运动中过去党与团都有很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在整个的四川也还是一样的，所发生不好的倾向和错误该谈点，现在川西只是农村工作没有开始，但我们在这未开始以前需要知道这些错误以后，才能够纠正过去之错误和今后防犯。在四川农村工作之大的错误和缺点有以下各项：

（一）盲动主义……盲动主义在八七会议以前喊出来的口号是机会主义，但在八七以后纠正机会主义的极端，又发生了一种所谓盲动主义。直到现在的四川农村工作也发生了不少的盲动主义，如像在川东的各地的暴动，都可以证明了，大者在农村工作未开始的川西，也要严加防犯盲动主义的残（余）与复活动（动为行文——编者）。

（二）农村工作不是是无产阶级组织领导之下，同时没有计划的按照着一定的方向发展，而且还有避难就易的怠惰趋向。在许多重要的地方，如川东的重庆、涪陵暴动，川西的成华，川南的芦〔泸〕自^①等都有这种表现。

（三）农村工作只有少数的英雄侠客式的号召和行动。如像在川东的南川农村工作，又如丰都、涪陵各地的暴动，都是几个人的“英雄主义”造成的，所以□军归于失败。且完全没有群众

^① 成华，指成都、华阳，芦自，指泸州、自贡。

的参加和影响，同时没有艰苦的群众工作路线，并没有这深入群众加紧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启发群众的日常斗争。

（四）团的工作没有深入青年群众，缺乏对青年工作的正确认识与适当的宣传，因在川东川西川南有时（原文如此）青年工作的错误观念。

（五）团在农村的负责同志，不明瞭武装暴动的意义，以为武装暴动都是作一种破坏的工作。同时对农民的宣传都是说暴动起来有饭吃有衣穿，能够抗债及一切捐税，但是结果始终为〔归〕于失败的。能（能字疑为衍文——编者）把团在农村中的信仰失去以后，农民不相信党和团了，无形中的演出了一个党和团脱离群众的一种大错误。

（六）团忽视农村青年的特殊要求。同时忽视农村儿童团少年先锋队之组织和领导工作。

Ⅲ. 今后对于川西农村青年工作的方针

在川西的农村青年工作在过去根本完全忽视，而没有切实的注意此项工作。所以现在对川西的整个农村青年工作完全从新的开始，有计划的方法的干去。同时目前农村工作中总的路线是加紧发动农村日常斗争，加紧群众的宣传组织，准备群众的秘密武装，领导游击战争与自发暴动。纠正盲动主义、和平发展及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在通□的路线之下去争取成千万劳苦青年群众，以土地归公的口号动员广大的青年团结在本团的周围，准备群众起来参加斗争，尽量扩大与巩固农协，充实农协中的青年的工作。在斗争中提出并争〔取〕青年农民的特殊要求，对农民自发的斗争与暴动〔必须〕积极参加与领导……大范围的革命高潮之发动。

（一）农村工作布置。

农村工作的布置，必须集中力量于重要城市四乡以及产业区域附近的汽车路与其他交通路线，尽量的向着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共同的方向进行。其他的地方当不是可以放弃而且是同时并进的，必须力求深入和扩大其影响。在这种情形之下必须抓住中心工作，但，中心工作必注意两个条件：

1. 须以农民受痛苦和压迫剥削极深的地方。
2. 须以政治经济重要的地方。

(二) 农村工作的主力——农村工作的主力当然不成为问题是建筑在贫农雇农的身上，同时并须集中力量向大的共同敌人——土豪劣绅进攻。但我们应当注意农村阶级的分化。因为在斗争中，不可免的一件事实。在农运未开始的川西并须特别的注意，从在农运正开展时即须准备阶级斗争。在富农已成为反动力量时，必须对豪绅地主一样的对着富农进攻。如有农协的地方，特别注意富农把持农协的领导权。

(三) 农村青年工作的正确认识——在川西过去根本没有认识农村青年工作之〔重〕要，同时认为农村没有青年工作的错误倾向（原文如此）。但经此次的扩〔大〕会认为川西的农村青年工作极为重要，同时认为团在农村青年工作中的根本澈□工作——在川西的农运尚未开始，以后农运稍有发展的地方，须切实注意是吸收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积极的参加土地革命的斗争，青年的利益要求的注意主要部分是□在土地革命要求以内的，在青年□特殊要求利益的斗争只应当是发动青年同时在□□种情形之下……起来向土豪劣绅斗争。

(四) 雇农工会——在川西的农村工作积极进行当中，如雇农的教育广大的地方和农村斗争已经深入下来了，同时已经为贫农领导的地方，必须建立雇农工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川西的党和

团在农村中的基础。雇农工会的会员可以加入农民协会，与工会发生直接联系。手工业工人及□□可以加入雇农工会，在雇农工会内同样设立青年部，其工作与农民协〔会〕大致相同。

（五）少年先锋队与劳动儿童团——在川西的农村工作未有开始以前，虽然说不上什么东西，不过以后农村工作扩大时必须切实的注意此项工作。在少年先锋队是一种武装训练的青年组织，这种是最好的青年组织形式。但少年先锋队必须在当地的农民协会的指导之下，没有农协之处可以独立存在，但必须发展农协的组织。今后少年先锋队之主要任务是：a、准备参加武装斗争，是少年先锋队之主要任务，b、少年先锋队是以青年贫农雇农为基础，但必须成为最一般化群众化的组织。劳动童子团是在农村中劳苦儿童群众的组织，在农村斗争中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六）（略）

（七）农村青年的各种补〔辅〕助组织——发展公开或者是半公开的青年的组织在目前农村工作中有极大的意义。在组织的名称如农村俱乐部，武术团体，把友会，兄弟会，青年联合会，反基〔督〕教大同盟，小学校际联合会等。这些组织，应当成为党和团及革命农协的影响传到青年群众当中的桥梁，这些组织应当团结在党团农协周围及口号之下。

（八）农村宣传工作化——……主要任务是传达的（的为衍文——编者）土地政纲使之通〔俗〕化，并且必须与目前日常斗争部分要求□□群众认识土地政纲的正确，关于青年本身利益应当有扩大宣传，但是宣传口号要与整个川西一般口号相联系，不是孤立的提出打倒土豪劣绅。

（九）游行工作（略）

（十）民因土匪中的青年工作——民团土匪的〔青年〕和□□

与贫苦农民有联系的，我们必须领导加紧下层工作宣传和组织。并将土地政纲切实的详细告诉他们，切实执行。

（十一）农村青年妇女工作——川西的农村青年妇女的工作须切实的执行。可极力发展姊妹会，放足会，妇女读书会等辅助组织之发展。

（十二）青年儿童的要求：——

1. 青年儿童不能为地主服务。
2. 增加儿童的工资。
3. 改良儿童的生活和待遇。
4. 牧〔区〕须给牧童家庭□费。
5. 反对打骂牧童青年。
6. 农村□□牧童言论雇农出版自由（原文如此）。
7. 宣传工作之根据农村实际情形和青年农民的切实要求 进行。宣传工作〔是〕目前川西团的宣传工作之主要任务。

（中共新都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原件存新都县文管所）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荣县农民斗争 经过致中央报告(节录)

(1929年8月11日)

(一) 斗争之前——荣县在党的领导之下，组织有一个县农民协会，组织的农民有四千余家，共一万六千余人。农协是公开的。农民曾经作过许多次斗争，最初是反抗民团抽各种捐款（如牛捐等），斗争方式是群众的示威游行和包围团局，包围团总住宅等，都得了胜利。继后的斗争的对象，逐渐转向地主，中心口号是“反对加租改佃”。因为近来地主受了军阀捐款的剥削，尽量向农民取债，加农民的租，农民不允许则以改佃来恐吓。今年一月曾因反捐税反地主加租改佃，被知事捕去农民三人，农协立即号召了农民二千余人，入城进行示威，到知事公署胁迫知事将被捕农民释放。当时党和农协都发了许多宣传品，农民情绪很高，党和农协在群众中树立了很大威信。后来县知事请示刘文辉如何处理，刘复电和平处理，于是县知事也不得不出示禁止加租另佃。农民不断地做了许多小斗争，一直到五月二十五日有屠杀的惨剧发生。

(二) 五·二五事件——荣县县委给川南特委的报告：“我处本月二十五日双石桥横遭贪官土豪军阀屠杀，兹将屠杀情形，今后对付计划及请求事项，详细报告如次：

(1) 荣市农协的事：原委之〔是〕当地土豪赵某向某农友退佃，县农协即派××同志前去领导斗争，决调二、六、十三区农友于二十五〔日〕游行示威。土豪赵某早已得知消息，即勾结团正龙某请求驻军赵营派了兵一排断场驻扎，于二十五日农协得此消息，队伍已在途中矣。乃停止游行，派人与驻军交涉，得驻军坚决不干涉的信息后才继续前行，到达场上，在逼近驻军的空地开会。在开会当中，捉得土豪赵某拘禁于会场中，驻军一排始终未加干涉，并表示对农民同情。团正张某看见驻军不理，农协势力大，即逃匿。是日知事因收粮带有弁兵四名，在双市十二里之汪家滩，张某密派人到汪家滩告密，于是荣县农民为革命而流血的第一幕惨剧便于此开始。

(2) 农友被屠杀的情形：七百多个手无寸铁的农民正在情绪高涨的时候，忽然主席被派来弹压屠杀的便衣马弁一掌推倒，接着枪声一响（朝天）便被人拉到驻军营盘里去了。指挥见着这种情形，马上高声指挥群众不得擅自离会场，在未下解散令以前，群众见着也遵守指挥的命令，毫不动颤，秩序井然。便衣马弁叫把群众指挥拉到营盘内去，群众以为领导他们的青年都已牺牲了，便马上叫起来了。一个农友执着扁担，劈头一下，向着那个马弁（共只两个马弁）打去未着，反而被弁兵连枪击死了。另一个农友愤恨他，一扁担打去，打着他的手，几乎把连枪打掉了，顺手一枪这个农友也就被击死了。还有一个农民手里没有家伙，跑过去从后面把那马弁抱着，却被旁的一个马弁击死了。两个凶恶的马弁，屠杀农友的刽子手，见农友们前仆后继的勇敢异常，连忙冲出逃走了。群众情绪更加高涨，马上拿的拿柴，搬的搬草，要烧双石桥。驻军见此情形，就出来干涉群众不要烧房子，向群众说：‘你们积极的准备好了，这样没有什么益处，你

们干时我们就马上掉转枪头先打起来。’群众此时才有秩序的退出场去。这个时候，△△两同志也翻窗子跑了，而去分头报告学校〔即县委〕和县农协，因未经开会，向他们解释，他们才回去了。

……

（6）伤亡及失踪的调查：当日会场中马上击死二〔三〕人，伤十余人，失踪三十余多，抬入医院内继续死去四人。

（7）请求事项：请马上通知〔自井〕、威〔远〕两校于最短期内召集他们的所有短枪，并许我们发生关系，以便以赤色恐怖答复白色恐怖，不然不日群众要瓦解，学校也很危险呀！”

（三）川南特委对荣县报告的指示——“紧急报告收到，兹经常委讨论指示如下：

你处这次的惨案，是几月来日常斗争的必然结果，我们曾经料到你处难免有这样的惨案发生，尤其在围城以后。所以前次我们对你处的指示，非常着重在准备游击战争、坚实农民组织、努力士兵运动；在党的基础上，我们屡次指示加紧工运，加紧训练工作……工作上的这种布置，原来是准备由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发展到武装暴动之路线，至少也要在反动派武装压迫之时能够从容对付，不至于手忙足乱，破坏党的组织。现在你处的白色恐怖已由知事老爷集聚全县土劣地主的意识手段，由几名马弁而实施起来了！这在你处的环境必然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此我们的工作方式应该是很大的转变。我们估计你处的环境，大的方面，刘自乾^①还是不暇顾及后方，川南各县仍是空虚，马上开大兵到荣县来做个怎样是不会有的事体，而且这在刘自乾看来也不必要，同时他亦不轻易为此，他还时在用‘和平了解’的手段来麻醉群众。知事与驻军是冲突的，尤其是前次闹县后，我们看见这次驻

^① 刘自乾即刘文辉。

军的下乡不〔干涉〕主义，就可以知道，驻军很想把得罪人的事搁在知事头上，使知事受群众攻击，而自己在旁取巧，对群众送秋波（自然其中的兵士是真正同情于农民的）。因此现在没有驻军下乡剿办农民的事，最近也不会有的。知事因为前次衙门被围，以及几月来土劣地主向他们的叫唤，特别是这次下乡收款，土劣包围献贿了结，促成他们压迫农民摧残革命的决心。但知事除了几个马弁而外，还有什么呢？自然此后他要继续勾结土劣团保压迫农会，但此次团保对事变不敢先于发难，必须借着知事的几个马弁，也可想见土劣之无多大力量了。且农会布满全县，土劣自卫不暇，当然全县土劣联合大清乡的办法，马上是绝对不会发现的。并且你处的土绅没有政治上的集中的领袖，要想对农民实施一种统一的反动政策，一时也是不可能的事。总而言之，此次你处事变的发生是因为几月来你处斗争的结果所引起的土劣的一种脆弱的反攻，假手于知事的马弁，还谈不上这是荣县的大反动局面的到来。拿事实来观察，你处惨案了后，下乡的现象不过是便衣队的捉人而已（反动派以为几个头儿捉去了就无事了），并未有其他大规模的恐怖事件继续开始。至于群众方面呢？你处群众组织已达五六千家之多（人数计在一万五六千，自然无工人组织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同时经过几月来斗争的训练，也不是完全散沙可比，就是这次惨案中事实的表现，我们也看到群众的勇气与团结，惨案后群众也没有瓦解崩溃的现象，这是一种很大的力量。我们认为你处现在的群众力量，只要我们领导得好，运用得好，是可以克服目前的脆弱的反动力量，而开展群众更进一步的战斗，获得一个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局面，直走到武装暴动的最后胜利的前途。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的策略应该是：用游击战争的方式，击退目前的白色势力，冲破目前的反动局面，提高

群众的革命情绪，继续斗争向前，扩大党的宣传，再争取更大多数的群众于党的周围，积极准备地方暴动的条件……准备走上地方暴动之路。

……

A. 党内工作与群众运动：

(1)、(2)、(3) (略)

(4) 军委努力工作起来，积极派选农民中武装与熟悉技术的分子，积极收集农民中的武装，从事于农民赤卫队的编制与建立，使农民有战斗力的独立的武装，不致受土劣压迫，茫无所以，而任其屠杀或仅以个人的扁担去抵抗。□□□□兵运，兵士对农民已有相当的同情，你们应该进一步取得兵士群众，在组织上造成工农兵的联合战线。应该设法派□人到兵营中去宣传兵士，组织兵士。纵不能进兵营中去，亦应设法派人从事兵运，在外面与兵士接近，吸收最进步的革命兵士入校，组织兵营支部与兵士的群众团体，使反动兵队下乡无所施其残暴，并且做得好，真可以做到‘你们干起来，我们倒转枪口就是’的程度。努力团丁运动。团丁是十足的土劣压迫农民的武装。这种武装，我们只要破坏了，乡间的武装障碍就可以肃清。现在你处农运，这样□法，团丁运动当然有充分的可能，你们应该努力进行，多使团丁加入农会，或在常练组织军支或革命团体；武装不能建立，至少使豪绅土劣同武装集中不扰，或不敢集中，造不成豪绅土劣直接恐怖的局面。

1. 对付惨案与执行游击战争。在目前你处既无大的白色恐怖，只是便衣队下乡的暗捕，意图捉去几个领袖，或下乡威吓一下，便可以消灭荣县的革命，而真过太平的幸福，其实他们这种办法最适于我们游击队的，我们应该立即组织游击队，消灭敌人的便衣队。各农协应该派出侦探，专门侦探敌人便衣队的活

动，喊出‘四处捉杀便衣队’与‘便衣队下乡来，大家拿锄头把他打死’的口号。游击队在战术上，不与驻军或团防作正面攻击，应多在侧面袭击他，使反动派无法安身，而增高群众革命情绪。我们不为反动派的便衣队所骇退，反应该骇退便衣队，使之不敢下乡。游击战之行动，是打杀著名土劣，缴便衣的枪，截杀知事，实行〔对〕地主的土地革命，保护群众开会，不纳欠租，不缴捐款……并且在此游击的进行中，还应该注意农民武装的扩大，准备未来红军的基础（游击战争进行大纲前曾抄寄一份）。

2. 游击战争应该与群众大会联系起来。群众大会在目前是非常有作用的，能够多在游击战争的厉行与相当保护之下，常开大会鼓动群众，是使群众情绪提高的一个良好办法。我们不应因为这次惨案，就无条件的停止群众大会的进行，或停止群众的示威运动的进行。我们应以游击战争与群众行动作亲密的联系。如果游击战争与群众运动分开了，就会变成下流的军事投机主义。游击战争应该发动群众起来走向战场上去。

3. 农民组织与农民武装（赤卫队），应该划几个中心区域来集中力量，紧密联络，使反动派无论如何不能摧毁而被其各自击破。因为我们的力量如果散漫，最容易招惹反动派来施行各个击破的诡计。我们应该在人力财力〔上〕注意这件事的进行。

4. 扩大惨案宣传。向县公署提出赔价（死者抚恤，伤者医药及其家属的救济，团保须向农民道歉），全县及邻县的大规模的宣言标语漫画，把空气吹得极高，致使反动派畏而屈服或潜逃，以争回农民既得的利益与今后斗争集会之自由等。自然这个宣传的主要点，应该是口号适当，如提出〔赔〕偿要求，集会的斗争自由，提出罢免欠捐款的要求，同时政治口号亦应该联系上去（至少在群众中的口头宣传应该如此）。宣传的对象当然是工

农兵士团丁以及小资产阶级大众。

5. 邻县联络，由特委通知附近。你处〔自〕井、威〔远〕、宜〔宾〕、内〔江〕四县的工农会，〔发〕宣言，并举行募捐（一百二百均可）、派代表来荣慰问等办法，以资实习几县工农兵士的联合。特委暂时许可你们与这四县发生平等关系（但只限于你们对方常委的必要关系，绝对禁止私人往还假借学校）。关于你们的工作决定与人才调遣绝对报告特委。这是组织问题，请你们与你们关系的各县，须特别注意。因为你们的一切行动经过特委指导过程，特委以便对省委及川南大会负责。

6. 游击战争必须〔有〕相当的利器，我们是注意到的，但这问题的解决，还是要你们自己去搜集，尽最大限度的可能，设法收集。我们已写〔信〕到宜〔宾〕、威〔远〕、〔自〕井三处分头借取了，你们接信后，可分头派人去接洽。至于是否能够做到，当然我们还不敢担保，因为这几处的枪，都是我们同志私人的。”

（四）省委看了川南报告的回信

（1）省委看了川南对荣县的指示，认为南特^①对荣县事件前途的估量是太乐观了。譬如说到刘文辉不会开大兵来荣，刘会以和平了事来麻醉群众，知事与驻军有冲突等。这些估量，现在已由事实证明了南特估量的错误（如派张回荣）。所以估量上有些错误，全是由于不了解群众斗争的尖锐化之后，统治阶级虽有矛盾冲突，也要暂时弥缝下去来一致镇压革命，统治阶级也再不会用和平手段来放施其麻醉的原故。

（2）因为有上面估量的错误，所以对于这一斗争发展的前途，估量得也太乐观，认为能够克服目前脆弱的敌人，有地方暴

^① 南特指川南特委。

动胜利的前途。敌人目前虽脆弱，但他们的力量必然随革命的力量高涨而高涨的。本地豪绅地主阶级，虽本身力量脆弱，但其代表人军阀不能不以全力来援助他的。荣县农民斗争若果不断的高涨，刘文辉必定要调大兵来加以极厉害的镇压，消灭农民的革命，说农民能够克服敌人是决不能够。至于地方暴动的胜利，必须这一地方在地理上有可以支持的有利条件，必须有城市工人阶级有高度的革命潮流和有组织的组织力量，必须在全省每一个区域内都有了相当的革命高潮，能够动摇牵制敌人。第一二两个条件荣县都是没有的，第三个条件目前军阀的冲突尚暂时弥缝着未曾爆发（如果革命高涨，他们并且会暂时团结起来），尤其除了荣〔县〕、威〔远〕、自井工农情绪稍好而外，其他异常低落，所以也是没有的。这样是决难使荣县农民的斗争在一个短期能够发展到地方暴动。

（3）省委对这一斗争前途的估量，认为如果有正确的策略领导，使群众斗争有相当的组织性，是可以保持群众情绪，形成一个长期的游击战争，但决不能消灭敌人。自然能够长期支持下去，发动广大群众，党在全省范围内（至少川南一带）能够在各地方加紧工作，是可以在一个长期斗争之后，有地方暴动的前途。但以现在情形看来，三数月来是没有可能的。若果我们不能在各地方加紧工作，甚至完全没有可能，即荣县农民的游击战争，也会被敌人消灭下去。

（4）但省委也同时反对有些同志的悲观主义，认为荣县的斗争绝难长久的支持下去，因此要在赔偿惩凶的相当条件下面结束。荣县农民与地主军阀经过了长期斗争，现在斗争已到了武装的冲突异常尖锐化的阶段，只有农民斗争完全被镇压下去，或者农民能够完全把军阀地主推倒，在这中间绝难有相互的调和让

步。现在反革命力量不能完全把农民镇压下去，农民也不能推翻反革命力量，只有形成长期的游击战争式的斗争。若果要希冀有和平了结之日，必然放弃长期斗争的准备，弛懈了群众斗争的情绪，终于会为敌人的狡计（如雅州抗捐时，驻军派人出来与农民讲条件，使农民不备而乘隙进攻，将农民完全镇压下去）和暴力把我们击溃。

（5）根据上面的估量，省委认为荣县目前英勇斗争的同志和农民群众应该准备长期艰苦的斗争，不要幻想在最短期可以得到完全胜利，也不要幻想能够和平了结。这样的幻想是容易感觉失望而消融了目前紧张的情绪归于消沉的。应该排除求速效的侥幸心理和一时的感情冲动、意气用事，耐心艰苦准备长期与敌人周旋。

（6）因此目前荣县的实际任务和工作是：

1. 有计划有组织去领导农民游击战争，作长期的准备，关于游击战争策略的战术的运用，省委同意川南特委的指示。

2. 把农民的组织完全秘密起来，要保留一部分同志及农民领袖，不参加〔外〕部工作，只留在群众中秘密活动；严密和整顿农协的组织，经常有系统的进行组织训练宣传鼓动日常斗争工作，不要为了进行游击战争放弃了经常工作（游击战争只是少数有组织的农民协会指导之下进行）。

3. 扩大土地革命及秋收的抗捐宣传，准备在秋收斗争时，爆发全体农民的抗捐运动。这工作省委将另有详细的通告指示。

……

（五）省委对荣县县委的指导——这时川南特委已决议撤销，省委已经派有巡视员到荣县。因为没得着报告，省委在报告〔知道〕荣县斗争已发展成游击战争（详情后面说），而军阀又纷

纷去镇压，恐怕斗争失败，特派一个军事人才去帮助，并给了下面的指示：“昨得川南特委报告你处荣县斗争情形，又于报上看见你处之农民斗争情绪之热烈与反动派压迫之利〔厉〕害，省委认为此次你处农民斗争，确实是从日常斗争中发动了广大群众对地主阶级形成极剧烈之阶级斗争，与其他各地抗捐运动不同，有极重大意义。省委虽然未得你处详细报告，但不能不就各方面情形和推测，予你们以指导，保证此次斗争有最高组织性而得到最后的胜利。

（1）你们要明确认识游击战争的意义绝不是建立经常的一部分军队去东西游击，这样必然要发生几个缺点和错误：a、树立目标招敌人攻击；b、给养伙食困难，稍久必遭农民厌恶；c、容易脱离群众，变成土匪。所以游击队必须隐藏在群众中间，时出时没，使敌人不测，不脱离生产，免发生伙食等困难。但一方面要注意有很好的联络，在统一指挥之下，能够很敏捷的行动。若果有些农民根本不能再在群众中隐藏起来，自然只能编成经常游击队，拖上山去，但必须只留很少的人，很好的枪，仍然要与农协发生很好的密切关系，接受农协指挥；其余的人枪，仍应尽量藏在群众中，与这一游击队策应，共同进行，千万不可把大多数农民枪支，都拖上山去。这决不能持久的，会使农协工作根本塌台。游击战时必须同时扩大宣传，应该没收地主财产作军队餉款，缴地主及军队武器，削弱敌人力量，对反动的地主民团军队官吏应该屠杀，但要纠正大烧大杀倾向。游击队即称赤卫队，不必另立名目。

（2）你们要注意不放弃经常工作。各区支负责同志仍应在区支所在地督促，并加紧经常的宣传组织工作。农协负责人，亦应使一部分留在当地工作，若果当地实在不能立足时，应互相掉〔调〕换。总之要有经常工作，不要把全部人材力量，都去做游

击战争，而脱离了广大群众，使党在农村中工作完全坍台。并且若果没有经常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游击队单纯的军事工作，必定无法能保持长久支持和最后胜利。

(3) 农民与地主斗争，现已走到最高阶段，你们提出土地革命作行动口号，游击战争中应实行烧毁田契、债约、毁田界、没收土地的工作，并作广泛宣传，必须这样才能发动广大贫农群众，深入土地革命。但若果没有大多数农民要求时，不应平分土地。此外对雇农加工资，八小时工作，改良待遇口号，应单独提出来。

.....

(9) 斗争失败后，党内容易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a.是大家拖出去当土匪，或实行游击战争，把经常工作抛弃了；b.把党的机关迁到偏僻地方“空山”，放弃了城市及大市镇工作。这都是脱离群众的逃避主义，应该严厉纠正。关于a项，应只分配一小部人，中间留二三有力同志领导，暂时拖上山去，其余不十分红的均应回到农村中来做经常工作，红的分子与别乡或附近各县调换地方工作。b项，县委机关仍应建设在城内，区委应建筑在大市镇上，各级机关可以建设在同志家庭，并多设几个，设立健全交通，作相互间联络。交通员最好是农妇或青年农民（必须加以简单训练），以避免敌人注意。

(10) 兹派高同志来参加你处常委，他并懂得军事，可以担任县委军委，或军事科责任。关于军委组织由他向你们当面报告。川南特委前发军委组织系统，是错误的，应加以纠正。

(11) 你们无论斗争胜利与否，都应开始准备秋收时全县抗租运动。关于这一工作，省委另有通告详细指示。

(12) 你们今后与省委关系应特别密切。另有一封信指示一般的技术。

（六）五·二五事件之后农民的骚动（以下是据荣县派来的同志口头的报告）

五·二五事件以后，驻军和知事即逮捕了农民领袖三人（均系同志，内有省委委员陈××），枪杀一人。县农协普遍的宣传鼓动，在东南区的农民完全骚动起来了。农民天天开大会，编成一个游击队，把地主的武装通通缴了，共得了二百多支步枪，并烧毁了几个地主的房子，屠杀了最反动的地主、团总二十余人，并宣布废除高利贷约，把放高利贷的人拿来游街。又因为驻军的便衣队下乡捉人，每每藏匿在烟馆，把所有的烟馆也打毁了。那时所有的地主豪绅团总都跑到城里去了，乡间成了农民的天下，党的宣传品贴满了四乡，喊出了组织苏维埃的口号，所以成都报纸上宣传荣县已组织苏维埃了！

（七）骚动的停止，军阀的压迫 城内驻军、知事、豪绅地主开会商量镇压农民，大家请驻军去，驻军长官说人少恐怕兵心不稳。知事要团练局长带民团去镇压，局长说：“你们（指知事与驻军）是外县人，打出祸走了就是。我是本县人，将来农民寻仇，如何能保身家？”大家面面相觑，结果是请刘文辉派大兵来。在农民骚动之中，荣县县委召集了一个扩大会议，议决停止这种骚动，一面继续扩大宣传，一面整顿坚固农民组织，以免军队到来的大牺牲。随即召集了一个县农协的扩大会议，用党的名义建议于农协，农协接收〔受〕了，并通过今年秋收“见打平分”（即对成分租）的决议，准备秋收再干。随即将武装藏匿，游击队也解散了，党同时也将干部分子过红的调到西北乡去发展农运（因西北乡组织薄弱）。到了刘文辉派了一旅兵到荣县，下乡沿门搜捕，没有捉到一个党和农协的干部，捉了三四十人去关起，都是毫不相干的人，有些是活动分子的家属，有些简直不是

农协的会员，后来陆续释放了。

（八）斗争的蔓延与影响 荣县农民骚动中，威远的农民也起来骚动。威远五里浩农民也是为反对加租改佃与地主斗争，地主向官厅控告，派差捉去农民二人。农民当时召集千余人，将差吏打死一人，重伤二人，将被捕农民抢回。后来军队开来清乡，捉去农民十余人，实行连保连坐以镇压农民。内江农民也跃跃欲动的要想起来，被地主豪绅先下手，把农民领袖（党的县委委员，区委书记）一人捉去关起。

（九）斗争之后 此次荣县农民畅快的骚动了一次，而毫无损失，所以农民情绪并未低落，许多没有农协的地方，也起来要求组织农协，党也吸收了许多积极分子贫农。农村中现在仍有小斗争。不过党的干部分子，有四五个简直无法在该县立足，而逃出来，县委指导工作颇受损失。现已由省委另派人去工作，召集了一次扩大会，重新选举了县委，目前正在积极整顿乡区支部工作。省委并要他们特别注意工运工作，和兵运的开始，农运普遍的发展。

（十）结论 此次荣县农民斗争，在四川农运中，确是一个新的纪元，即是脱离了过去在中小地主影响之下的抗捐运动，而开始反地主的直接行动。发动群众很充分，组织也严整，尤其是退却时，非常有计划，所以在严厉的白色恐怖下面，没有受什么损失。至于他们的缺点，我们认为当农民骚动时，只有消极的行动，没有积极的起来，公开的组织农民的政权（苏维埃自然不持久，但给农民的影响一定很大）；并且没有鲜明提出土地革命口号，作广大宣传和行动；对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宣传，也不能十分普遍深入，这都是很大的缺点。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3期）

四川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 第七混成旅兵变失败的决议案（节录）

（1929年11月）

（上略）

（一）总的估量和批评

1. 省委据党在目前加紧准备武装暴动的群众工作之政治路线和维川军支工作被敌人发觉实际的情形，一贯的是要维川军支准备随时可以动员兵士群众，反抗军阀压迫的行动；但同时一直到维川发动兵变的时候，却始终否认他们已经到了能够而且应该行动的时机，虽然曾经尽可能准备领导他们万一非干不可的兵变。全会认为这一总的路线无疑是正确的。

2. 因此维川军支竟在准备太不充分的时候，在客观上偏向有意的脱离省委的指导而发动兵变，充分表现盲动主义倾向之严重存在。军支在游击战争行动中，又发生极庸俗的机会主义，毫无原则的向一些地方的军阀豪绅地主妥协，抛弃一切游击斗争的革命任务，失去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因而在很少坚决斗争意志的逃避行动中，断送了可作革命辅力之一的红军武装。

3. 二全会认为形成这一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一元二面存在着的错误行动中之主要原因是：

第一，省委和特委对于维川军支的政治环境，没有充分的了

解，因而没有正确的分析和估量，致在指导上表现得不坚决不确切。

第二，省委和特委在政治的指导上都表现得不健全，尤其是党在游击战争中的政治任务与游击战术上缺乏明确的认识与指导。

第三，党在红军中组织极不健全，宣传教育工作也欠普遍和深入。

第四，领导这一行动的特委工作同志特别不了解群众的革命情绪，不信任群众力量，迁就上层同志的意志，凭英雄式的聪明来玩政客手腕的把戏，因而很少有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指导工作、发展工作方式。

第五，一般工作同志，开始就不信任有胜利的前途，没有取得胜利的决心，自取失败主义。

第六，省委没有于事前号召全川党部发动斗争来积极援助这一行动，使部分的斗争汇合成总的政治斗争的勇气与决心。

（二）红军失败的原因

红军失败原因最主要的是事前没有充分政治和组织的准备工作，简单的技术工作也没有充分准备。

至于在行动中失败的原因，就政治意义上说：

1. 没有坚决执行土地政纲，对于反国民党反军阀反豪绅地主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影响，很少扩大和深入到游击战争区域的群众中去，形成向军阀豪绅妥协，完全成为军事投机的行动。例如在蓬溪释放了国民党官吏，在罗泽洲防地内禁止骚扰，得罗津贴伙饷，在南部新镇坝没收的铜送与罗泽洲，在营山老林场、双河场，在渠县三汇送团军阀的枪，拉交情等。

2. 没有破坏军阀军队的组织系统。例如红军成立后，仍未

改变师团营连的旧有编制，勤务兵马弁等的待遇，仍与军阀军队相同。

3. 没有厉行赤色恐怖，促进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例如沿途对土豪劣绅国民党主要分子均置之不理。除了在南部流马场、新镇坝举行两次赤色恐怖之外。

就组织基础上说：

1. 命令主义的充分存在。例如许多军事行动，团长同志都不知道，关于政治问题很少开大的会议来解决。

2. 党的支部等于瓦解，失去党在红军群众中的作用。例如红军成立后，原来军中干部分子大都调作党代表，而原来支部，因红军改编，将旧有军队系统变更，而党的支部亦因以瓦解，以致党的支部在群众中失掉作用，简直忽略最主要的组织工作。

3. 没有建立革命的群众组织，兵士不能自觉的拥护革命，红军编制后，兵士依然不能为自身的利益团结起来。

4. 特委没有经常的会议与集体的指导。例如特委的会议很少召集有力干部参加，而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指导，因行军的关系，负责人常前后参差，致指挥上是不集中的。

5. 迁就上层军官同志，忽视了群众力量。在军官动摇时，党不能转变策略领导群众脱离其指挥掌握，坚决走向革命胜利的前途。

6. 军需粮食没有公开的精密的经济组织进行有计划的没收征发和集中分配。例如所得之款与物品，没有使士兵群众明了，而高级军事负责人的阔绰仍如昔日，致士兵群众甚至于一部分党员群众都怀疑与极端不满意。

就军事行动上说：

1. 不随时随地争取进攻敌人的胜利，用以鼓舞革命情绪的

高涨。

2. 长时期的紧急行军，使兵士十分疲劳和恐慌。例如并没有强敌跟追，即有也还距离很远，但一味的向前狂奔急走，弄得每一个士兵在烈日之下一日要走百余里。结果自己造成内部的恐慌，饥饿与疾病也随之而至，因此怨言遍于全军。

3. 放弃弱敌。例如在西充在南部红军如进攻确有胜利把握的，但红军总是向前奔走。

4. 误解分开行动，使力量削弱。例如在营山双和〔河〕场将四连之众分出，大部则渡渠河，致失联络而投罗泽洲。

5. 行军不采用纵列行进的方式。例如红军经常的方式，是一个纵队的形式，一旦遇敌，则首尾不能相顾。

6. 不注意敌情和地形的侦察，轻易进攻。例如进攻梁山猫儿寨，对于敌人的战斗能力与地形，在事前毫无侦察的确，轻易进攻，一次失败不足，继以二次之失败。

（三）红军失败的教训

1. 应更积极的认识游击战争，加紧党的准备和领导工作。

2. 游击战争只有取得政治的胜利，同时才能够得到军事的胜利。

3. 没有好的党的和群众的组织，决没有正确的行动。

4. 没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保障红军的胜利与保障党的政策之贯彻是不可能的。

5. 游击战争确能发动群众，同时也只有坚决执行土地政纲，才能号召群众起来。

6. 四川军阀统治的脆弱，的确很少联合一致消灭革命武力的可能，不过必须主观上有坚〔艰〕苦奋斗的决心，才能保持胜利。

7. 在军事上必须学习朱毛游击战争经验，采取分开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的战术。

8. 行军应采用纵列前进的形式。

9. 四川交通困难，省委应注意规定各军支不同的具体工作路线，培养军支工作同志独立工作的能力。

10. 投到革命方面来的反革命军队必须改编，并须掌握在党的极可靠的军事领袖之手，驱逐其摇动不可靠的军官。

11. 应开始注意党员军事化而特别重要。

12. 应号召全党同志和工农兵士群众研究红军的建立等。

(下略)

(摘自《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卷，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印)

中共四川省委刘坚予给 中央的报告（节录）

（1929年12月27日）

宜宾县委于8月20日派人到成都向省委报告，该地农民坚决要做减租斗争，县委认为没有武装力量，并有一个土匪同志江少甫新叛党投编为警卫队大队长，认识活动分子很多，恐怕一行动起来，便有危险，非常犹豫。而农民坚决要干，县委也只得决定干，来省委请派人助款并请对工作给以指示。那时省委在成都机关已撤消，因这一工作特别重要，召集未走常委开会，讨论权宜给以指示。认为宜宾自来一贯有不动则已，一动便是武装暴动的倾向，两年来曾经做了多次盲目的行为，牺牲很大。并且宜宾工作自来有借土匪保镖的错误，自来县委即靠江少甫保镖来做农运，保镖的叛了，于是便畏惧斗争，很明显是不信任群众力量。目前农民要起来减租，当然应该起来积极领导，但决不应是故意的幻想作大的武装斗争。固然农村斗争容易走到武装冲突，我们应该有武装准备，但决不是故意去惹起武装冲突，自求残杀。所以指示他们这一斗争应该是一个日常斗争，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号召群众示威运动，用群众示威、罢市等方法，求达到减租的胜利。我们的路线是在减租斗争中争取群众，并扩大土地革命宣传，发展并坚实农协组织。对此次斗争策略，指示他们不要单纯

提出一个减租口号，这只能得到佃农的拥护，而失了广大的贫农和雇农，所以中心的口号应该是抗捐、减租、抗债、雇农增加工资。省委指示他们，要由农协提出一个具体的斗争纲领，包括农村从雇农到中农的要求，向群众鼓动宣传，造成农村统一战线，动员广大群众来拥护这一斗争。此外，对农民武装的问题，也详细给他们说了，是告诉了农民赤卫队组织。对破坏民团，也有指示。省委并派了一个同志（参加过荣县农民斗争的）去参加县委工作，还准备派一个军事人材去（但后来因无人未派去），殊不知他们来人及省委回信尚未到，斗争业已爆发了。

发动的起因是由于农协宣布了减租，有一个地主来捣麦子，农民不肯，当时集合了十余农民把地主〔打〕了一顿，并将地主的儿子扣留在农协。地主去报告农村警卫队，农村警卫队开兵来捕去两个农民，并向群众开枪示威。当时农协即召集各处农民及所有武装（中间夹杂一些土匪）约二千余人，枪二百余支，将警卫队及驻军一连包围，并且农民在各处收缴、逼借地主枪支，并有围攻焚烧地主住宅事件。那时警卫队及驻军非常恐慌，由警卫队长江少甫（叛了的□□）出来交涉，农协提出减租、取消高利贷等条件，都承认了，被捕农民也释放了，只是农协要驻军缴枪一个条件未承认，最后农协对这一条件准备让步。突然军团乘农协不防，开兵向农协袭击（进攻前一夜曾向农协致谈判决裂的文书，借口农民在交涉中还在围烧地主住宅。农民最初要进攻军团，农协负责的同志，误于交涉有效，不许进攻，到此时才通告各级农协，谈判破裂，准备应敌，而敌人已至矣。）当时许多匪队把最好的枪支（农民缴得地主好枪，不会用都给与匪队）带去，不肯应战，剩下些农民应战，当被驻军打死三十余人，于是完全溃败。

（摘自《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3期）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 农村斗争战术的指示

(1930年2月)

1. 农村斗争战术的重要意义。农民群众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站在目前党争取广大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总任务之下，非争取广大群众不可。农民群众所受痛苦最大（除工人外），对于革命要求非常迫切，是工人阶级巩固的同盟军，所以无产阶级革命非领导农民来参加，很难成功，征之于巴黎公社和二月革命之所以失败，便足以证明。因此农运工作，在目前工作中要占重要位置之一。但要农运工作能迅速而正确的发展，非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斗争，以解除他们切身的痛苦而促进他们的阶级觉悟，绝难办到。斗争又要有正确的斗争战术，才能得到胜利。所以农村斗争战术，在目前工作中，便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之一。

2. 农村斗争的特点。农民是一种下层小资产阶级（富农在外），生活习性非常散漫，但因为受剥削和压迫特别厉害，所以要求斗争也非常迫切，而冲动性又很激烈，故他们在斗争中所表现的有以下几个特点：（1）革命情绪很容易高涨，但也容易低落；（2）群众很容易团聚，但也很容易分散；（3）要求大致相同（自然也有单独的要求）；（4）斗争的方式多数是抵抗

的；（5）盲动性很浓厚。

3. 决定斗争战术的条件。确定斗争战术的条件有以下四点：

（1）斗争战术是要根据党的政策适合实际情形而确定的，因此实际情形变更了，斗争战术就要随之而变更，但仍须根据党的政策，否则更是错误的；（2）每一斗争必须事前确定它的任务，斗争战术就是拿来达到这一任务的，所以斗争战术的确定，应该以达到斗争任务为条件；（3）斗争战术不但要拿来实行，而且是要能生效的，因此它的决定，就不得不要适合实际情形和针对敌人的策略；（4）斗争战术是拿来使斗争很快而且很顺利的得着胜利的，所以它的决定不得不运用敏捷的手段和巧妙的方法为条件。

4. 建立农村的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这一问题的范畴并非农村斗争战术，而是农运政策之一，但对战术非常重要，所以分两项说在下面：（1）农村斗争应该以贫民做核心，中农做同盟，雇农做领导；富农能在革命的农会指导之下一致向地主阶级斗争，应该使其参加，但须严阵预防他的反叛，同时要发动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2）要实际照着前一项做到，非提出共同要求和单独要求的口号不可，因为不提出共同要求的口号，则统一战线不能建立，不提出单独要求的口号，不但无产阶级的领导不能建立，而且单独的斗争也不能起来。

5. 确定斗争的口号。每做一斗争必先确定这一斗争的口号，而且这一斗争口号的确定，应该捉住这一斗争的重心和群众迫切的要求，而且还要含有深厚的阶级意义。至于这一斗争口号程度的分寸，应该正确估计敌人和群众的力量的比重而决定。（对自己夸大，对敌人轻视，都是要归于失败的。）

6. 以群众团体的力量去保证斗争的胜利。敌人向我们进攻完全靠武力，我们向敌人进攻，就不可专依靠武力，轻易与敌人

武装冲突，虽然农村斗争很容易走到武装冲突。我们应该团结广大群众极力准备群众武装，发动并领导一切群众的日常斗争和政治斗争，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以群众游击战争方式打破敌人的压迫，开拓我们胜利的前途，保证斗争的胜利。因为群众团结得坚实，才可以防止敌人分化我群众的力量，才可以逼迫敌人让步。

7. 准备斗争要点。准备工作做得不好，可以影响斗争行动的胜败，因此准备工作切不可忽视。至于准备斗争时应该注意以下四点：（1）将确定的斗争口号极力向群众鼓动，使群众的斗争情绪高涨，而有需要这一斗争的迫切要求。（2）应该深入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环境的实际情形。（3）不但平时应注意群众组织问题，而且准备时尤当注意群众行动的组织问题，如指挥团交通队，赤卫队，侦探队，救护队，以及群众的分队组织，都应有计划地去准备进行。（4）行动时的许多技术问题亦应很严密地去准备。

8. 发动问题。发动是斗争的开端，宜注意时间和空间的决定，特分述于后：（1）在群众斗争情绪被鼓动起来时，应立刻有计划的去发动这一斗争。（2）应择敌人力量单弱，我们（包含群众在内）力量较好而政治影响又大的地方发动，但其他各地亦须继续响应才有力量。

9. 斗争中的问题。斗争中的问题很多，特于重要的分述如次：（1）斗争行动时，应该依照确定的行动路线，很镇静的去执行，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实际情形的转变，而更改斗争战术以适合于斗争的胜利条件。（2）当敌人用欺骗手段对群众时，我们应该立刻揭穿其黑幕而使群众很坚决的斗争下去。（3）敌人看见群众的力量很大，每每用缓和的方法，口头应允群众的要求，

到群众走散或情绪低落时，则毫不实行。此时我们应号召群众用兑现的策略，马上将胜利的条件确定下去，要敌人签字立刻执行，以打破敌人的阴谋，而准备第二次的斗争。（4）当斗争起始农民被敌人捕去关起时，我们应该集中群众去逼迫敌人释放和得〔答〕应提出的要求。但在斗争激烈而敌人用武装来逮捕群众领袖或干部分子向群众压迫时，则群众宜暂时分散，而群众领袖或干部分子此时应深入到群众中间，积极准备更多的群众以继续这一斗争。（5）在行动时应该注意秘密的技术工作和对敌人的侦探工作，因为要这样行动才能顺利而不致于遭意外的损失。

10. 结束问题。每一斗争的结束，宜注意以下三点：（1）农村斗争经过的时间宜短，所以结束也愈快愈好。（2）同性质的斗争在一处得着胜利结束，其他各处的也可以照样的逼迫敌人结束。（3）应注意得到小的胜利，以发展更大的斗争，不宜幻想办不到的胜利，以致全盘失败。

11. 结束以后的问题。斗争结束了，当然不是胜利，就是失败。若是胜利了的话，当然又要分小的胜利与大的胜利。得着小的胜利，就应该用“以守备攻”的战术，以提高群众的革命精神而准备第二次的斗争；得着了大的胜利，就应该用“以攻备守”的战术，以激起群众继续奋斗的精神，而逼迫敌人实现敌人答应条件。若果是完全失败了，就应该注意收容和恢复群众组织的问题，主要的路线应该找着群众干部分子来开一个会议，使他们认识这次斗争失败的错误和讨论出今后工作的出路，并特别注意领导他们做小的斗争以恢复群众的革命情绪。

12. 各处斗争的汇合与先后斗争的联系。农民群众要求普遍的很多，每一斗争起来，当然不止一处爆发，各处爆发之斗争，应该特别注意汇合起来，斗争才能发展，势力才不孤单，要这样

才容易得着胜利。农村经济非常复杂，农民要求当然有时间性的不同，所以斗争一定是先后连续的爆发。此先后爆发之斗争虽然种类不同，但在宣传上组织上应该起精密的联系作用，才能促进群众更深刻的阶级觉悟和尽力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的任务。

13. 斗争收获的结算。每一斗争的最终收获，并不是简单在斗争本身的胜利与否，自然斗争本身的胜利也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最主实〔要〕的是在群众经过这次斗争，政治认识和阶级觉悟与革命情绪增高没有，而我们究竟争取了多少群众入党和入群众团体。因此，无论在斗争前，斗争中，或斗争后，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注意很正确的很努力的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和准备领导第二次的斗争。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2期）

中共四川省委致二路红军游击队 前敌委员会信（节录）

（1930年4月15日）

I、目前川东革命形势及党的总路线

1. 在目前革命及其形势下面，四川国民党军阀统治，一天天走向崩溃，已经是很明显的事实，尤其是他们本身的矛盾冲突加紧，不能避免的要形成军阀混战，这更逼使军阀的统治愈形动摇，走向崩溃，予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四川各派军阀，因为防地分割的不平衡，为了扩大剥削范围，每个军阀都在匆匆于制造与准备战争，只是因为全国混战尚未开始，一时隐忍未发。现在蒋阎战争已正式爆发，同时这一战争是包括统治阶级各部分（从代表资产阶级左翼的改组派别、代表北方大地主阶级的张学良、段祺瑞、吴佩孚），是一个全国大规模的持久混战。四川军阀战争，在这个形势之下，无论如何是无法避免的。从各军的积极购械增兵，从军阀相互间的军政联盟会议（同盟军订定攻守同盟，召集第二次遂宁会议，刘湘的进行二刘财政统一，刘杨合作等），从各军向边界增兵布防（罗泽洲增兵邻〔水〕广〔安〕方面，杨森部集中渠县向卷洞门布防等），都证明这一战争是迫在目前。

2. 目前爆发四川军阀战争最积极的动力，第一是杨森六万以上部队无一县的防地必欲谋出路；第二是北洋军阀在全国抬头，

蛰居四川的吴佩孚努力谋图乘机再出，第三是刘湘成为此次战争的目标，他为了布防应战起见，亦着手统一下东。从这三个动力的推动，下川东成为目前全川军阀战争的开始爆发点。最近杨森表面说是集中部队奉令讨逆，假由万县出川，实际是面向刘湘梁山〔山〕万〔县〕部队攻击袭取下东；另一方面刘湘又在勾结杨森会攻绥刘〔即刘存厚〕，希望解决绥刘，将委属防地先予杨森，以免杨森局促无归，进窥梁山万。论杨森将来是与同盟军联合及与绥刘联合进攻刘湘下东防地，或是与刘湘合作解决绥刘（这当然是还要看局势变化及形势转变来决定），总之杨森欲谋一出路，不能不诉诸战争，而这一战争必然在下川东梁山万绥属一带开始，加以吴佩孚的推动，使这一战争在下东开始有更多的可能。近日杨森将川北军队集中渠县，出兵卷洞门，刘湘在梁山建筑飞机场，都证明战争的重心在下〔川〕东。同时刘湘为打通渝万交通，已经用政治手腕逼走郭汝栋，占领涪陵，必然更进上游要解决陈兰亭联传〔通〕忠、丰。王方舟的进兵鹤游镇及□□之交界地……以全部到涪陵，杨国桢以大部屯驻小耳山右岸，其作用决不单是剿匪，当然是进迫丰陈（原文如此）。陈兰亭之派兵出……及勾结南北两岸土匪，也同属是防御刘湘。加以赖心辉、向时俊军队时时想出据涪〔陵〕、丰〔都〕、万县一带，有先爆发全川军阀战争的可能。所以目前下〔川〕东更先爆发军阀战争，尤其是迫在眉睫〔睫〕，而下东军阀的统治的动摇，也较仍〔任〕何区域为急剧。

3. 下东一带因为交通便利，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更加深入，农业手工业破产也更为厉害；历年战争，土匪以及苛捐杂税之压迫剥削，较各地加甚，因此，下东工农群众痛苦特别深，革命情绪也特别高涨。如□□□□游击战争的发展，城口的占领，你们到罗云坝后，很短期间能发动群众起来，以及土匪神兵的普遍加多，

完全可以证明农民斗争的开展。党的政治影响相当扩大，已经影响到兵士的动摇，表示软弱无力，如刘存厚之部队数次兵变，涪陵的兵变，马颈子陈师部队向我们接洽，以及邱杨两部屡次剿匪的失败，随时有小部分的逃变等。这证明下东群众情绪高涨，已日益接近直接革命形势。

4. 只是下〔川〕东党的基础，至今仍未真实建立起来。中心城市如万县涪陵绥定的工作，却非常薄弱，工运没有基础，农村中党的基础太坏，大部分仍然跟着小地主富农的意识，只有抗捐运动，没有深入土地革命，或者是跟着土匪神兵瞎跑，盲动去作，也没有执行中心，一切工作都缺乏很好的配合与联系。这是主观上最大的弱点。

5. 根据上面形势，目前下东主要任务，是加紧建立城市工作，发展职工运动，组织工人同盟罢工；组织并扩大农村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中心部队兵士工作，组织兵变。把这力量和斗争，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争，反国民党的统治的广大群众革命运动之下，联系起来，去走上地方暴动前途。地方暴动的主要条件，是把乡村游击战争与城市工人政治罢工联络起来。目前农村游击战争有非常可能的发展，而城市工人运动，因为一贯的忽视，比较消沉，这是事实。但绝不应该长此注意农村，而忽视城市，因为没有城市工人的斗争和配合，是不会完成地方暴动，即是游击战争也难有发展的前途。但也不是说停顿着游击战去等待城市工运的发展，主要的政策是加紧城市工作以发展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发展的区域，要用游击战争的力量去向城市发展，影响和帮助城市工人斗争的起来；同样用游击战争的力量去影响统治阶级军队，使兵士瓦解变到革命方面来。

6. 目前主要的应该采取集中进攻的策略，所以游击战争要

绝对纠正逃避倾向、上山主义及分散力量、秘密枪支等不正确的路线。诚然目前我主观力量还薄弱，尤其红军游击队数量质量都不健全，不能与敌人力量对比。但是我们应了解和相信工农兵士痛苦都非常之深，而需要革命是非常迫切，统治阶级的基础已经动摇。惟有集中进攻的策略，使游击队集中向中心城市的发展，才能发动广大群众，瓦解敌人军队；才能使一切群众尤其是敌人队伍中士兵同情于我们，更加相信革命前途的到来，很快的走向我们；中立动摇的，更加动摇起来，不愿为敌人送死；即使反动的也会更加畏惧骇恐以致动摇。如果采用退让的策略，只有使同情的失望，动摇的稳定，而去依附敌人，及〔致〕敌更增加了向我们压迫的精神，我们终于是无可退守而死亡。

II、目前在下东工作的布置

1. 为了有计划的集中一切革命力量，以配合下东准备地方暴动，省委在下东工作布置上决定分划三个区域：

2. 第一个区域，包括绥属一带，以绥定（即达县）为中心，以……红军游击队第一路部队向绥定发展，在该区域内，扩大深入土地革命的游击战争，一方加紧绥定城市工作，……组织以绥定为中心的地方暴动。

3. 第二中心以梁山、万县为中心，包括忠州（即忠县）、开江、垫江、大竹一带，扩大发展游击队，在梁山等处实行游击战争，加紧万、梁城市工作及万、梁一带兵士运动，组织以万、梁为中心的地方暴动。

4. 第三个区域，以涪陵为中心，包括丰都、南川、彭水一带，以你处游击队在该县内扩大游击战争，向着涪陵中部以及长江一带发展；加紧涪陵城市工作，组织彭水丰都兵变，加紧建立涪陵□□的党的工作，一直到组织兵变。使这些力量能够集中起

来，组织以涪陵或丰都为中心的地方暴动。

5. 建立三个区域，目前应以扩大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解除一切反动武装武装农民，扩大红军，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深入土地革命，建立乡村赤色苏维埃区域，各向着中心城市发展，走到地方暴动为主要任务。在各个区域的工作，都普遍发展起来，都向着长江沿岸大城市大市镇发展，自然能够集中配合起来，形成一个伟大的力量，而有造成下东整个区域地方暴动的前途。这一前途在目前群众革命复兴，军阀战争到来时，只要我们能够艰苦的工作，正确的运用集中进攻的策略，是有绝对可能的。你处工作必须在这一工作总布置之下，实际布置，能够有胜利发展的可能。

Ⅲ、前委目前的任务与策略路线

1. 以前特委名义，既经省委决定改为红军游击队第二路前敌委员会，前委除管理军中组织外，并由省委决定将彭水及涪陵游击队，□崖、丰都、大江右岸一带地方党部划归前委直接管辖（但仍与该县委发生组织上的关系），并将与涪陵丰都县委发生友谊的关系。凡在这一区域内的军事支部一律受前委管辖。

2. 前委目前主要任务是发展游击战争，执行土地政纲，解除一切反革命军阀土匪武装武装农民扩大红军，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建立乡村苏维埃组织，扩大苏维埃区域，向涪陵丰都及沿江大市镇发展。同时帮助该区域内党的组织的健全和发展建立，准备与万源城口第一路游击队，忠州梁山第二路游击队，在忠丰一带长江沿岸联合集中，完成下东的地方暴动。

3. 前委要完成上面的任务，第一必须对目前的形势有正确的估计。固然目前我们不能自欺的把群众情绪估计得过高，将敌人力量估计得过低，但把敌人力量估计得过大，群众力量估计得

过小，是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如特委到罗云坝时，不认识马颈子陈部已经动摇，公安队亦多弱点，而过分畏缩，不能公开发展游击战争，以及涪陵县委认为罗云坝简直不能立足，非上山逃避不可，这都是没有认清敌人的矛盾和动摇，不信任群众力量的错误估量。前委必须明白认识目前军阀相互的矛盾冲突和统治基础的动摇，必须坚决相信群众痛苦已深，革命要求非常迫切，公开的、明显的、坚决的、彻底的执行游击战争，方能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愈加动摇军阀的统治。前委并且应当〔使〕每一个党内党外的群众都有这样坚决的信念，才能焕发革命的热情和勇气，而制胜敌人。

4. 必须纠正单纯的在军事方面的估计计算，不信任群众力量，以至不自觉的走到军事投机、上层领袖联络的错误。如过去县委只从表面上估计敌人军事力量，某处有军队若干，某处有公安队、民团若干，只从军事方面去估计自己力量，觉得枪械是如此之坏，子弹是如此之少，因而畏怯气馁，不敢公开扩大游击战争。以为只有得着彭水兵变或其他武装力量，才能生存，否则只有逃避，甚至取消。不了解敌人内部包含有许多矛盾而且已经动摇，不了解我们的力量是建筑在群众上面，不是建筑在武装力量上面，不了解只有公开、坚决、彻底的实现群众要求才能发动广大群众，只有广大群众为自己生存向敌人决死斗争，才是可以制胜敌人更坚利的武器，并且可以夺取兵士群众瓦解敌人军队的。譬如神兵并没有什么武器的，甚至于不要新式武器，往往能战胜强大的军队，这是群众力量伟大的证明。我们必须公开鲜明的旗帜，才能号召广大群众，必须要实现群众的要求（如过去特委在罗云坝只杀几个豪绅，没有没收粮食分配农民，这是不能实现群众的实际要求的）。群众感觉到在红军区域马上可以得着一

切，白色到来马上会失去一切，才会拼命的起来拥护红军与敌死斗。我们应该怕不能发动群众，不怕武装怎样薄弱。如果不能发动群众，甚至为了军事便利而不发动群众，急于向某处冒险进攻，乃至为了军事便利违反群众利益，不论武装怎样多，军事上是怎样强大等，仍然是要归于大败的。

5. 第三必须采用集中进攻的策略，向中心城市大市镇发展，这在上面已经说得很详细。你们必须不要忘了攻取当前的敌人（自然对力量强大的敌部不能用正面攻击，必须向中心市镇发展，对力弱的敌军尤须积极进攻击破）。我们不能进攻也就不能保守的，因为让敌人集中力量从容布置，我们坐以待毙，结果只有死亡；我们向荒僻地方逃避，让敌人占据资源充实的中心地带，坐待我们，从容向我们布置进攻，结果也只有死亡。因此不断的进攻，才能困扰敌人，才能发扬士气，而取得粮食枪弹之补充，才能制敌而不受制于敌。进攻敌人当然要兵力集中，统一指挥，才能迅速撞破敌人，不致遭敌人各个击破。

6. 必须坚决执行土地政纲，实现群众一切要求，如分配土地，分配粮食，屠杀豪绅地主，焚毁债约契约，打毁一切捐卡，废除一切捐税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够发动群众起来。尤其要站在大多数贫农雇农方面，要坚决反对富农。

7. 第五必须一切让群众自己动手来执行，如分配土地，分配粮食，屠杀豪绅，都必须交农协或群众的会议自己解决。当然一面要经过党团作用，保证群众的领导，纠正对群众的命令主义；但同时不能迁就群众的落后意识（如农民之保守观念，地方主义等），必须用教育说服战胜群众落后的意识。

8. 第六白色区域的工作，应与赤色区域同样的重要。游击队往往只注意游击区域中群众工作，在游击队未达到的地方，往

往听其自然，或者只叫他准备游击队到来的响应，不发动他们自己的斗争来配合游击战争。游击队经过了的区域，往往更是一切群众干部都随军而去，什么工作也没有了。甚至好象特委到罗云坝之后，只叫群众夜晚作一点引路的工作，及和平秘密的组织起来，准备暴动，完全没有去发动他们的斗争。这样群众永远只是坐等红军，依赖红军，不能够广大的发动起来，创造自己的力量，提高斗争的情绪，认识游击战争的意义。你们除了在游击区域更加紧群众工作，并须……派人到附近的区域发展群众组织及发动群众斗争，在经过后的区域，必须留一部分群众干部，继续发展并深入一切群众工作。

9. 对民团土匪的策略，前委必须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如拉拢上层领袖影响队伍的方式（如以前在罗云坝时委编民团等）。凡是民团土匪，只要我们力量能够解决的，必须解除其武装，解决其领袖，分散其群众。我们力量不能解决的，就必须扩大土地革命宣传和红军政治影响，并派人打入其下层（当然这一工作是困难，但这决非是没有可能，必须研究工作方法，战胜一切困难去执行），夺取和分化其群众。绝对要纠正上层联络，尤其严格禁止拖队伍方式，要以红军名称□□红军在群众的政治威信。在为了对付和牵制敌人必要时，对民团土匪队伍应审慎的利用之，但绝不能采为主力，更不能许以任何条件。

IV、前委目前工作的布置

1. 首先要解决的，即是你们游击队路线问题。省委过去曾要你们向崇德乡发展，但据最近细考查，崇德乡工作，虽然群众稍有基础，但还是不普遍而未深入，尤其该处偏于边境，非中心区域，给养粮食也感觉困难。你们当然要去发展崇德乡工作，集中农民武装，发动游击战争起来与你们汇合；但你们不应机械的

向一个目的地，不应采取一条路线向某处前进，尤其不应走山后穷僻小道求近到崇德乡。因为假使不能发动群众。即到了崇德乡，也是不能固守的；只要能发动群众，随处都可以生存。你们游击路线应该用“绕圈子”的战术，在清理镇、顺前乡、崇德乡、大江以南后山以北一带区域，纵横往复，均需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广大坚固基础，随时向着沿江大市镇如清溪场、南泥、马头子及色南发展。在每一个地方尽可能支撑，分配土地粮食及执行一切革命政纲，实现群众要求。遇强大敌人压迫时，我们自然不与他作正面斗争，应该暂时引退，最好是抄过敌人的后方去游击。敌稍一退去，或有弱点可乘，我们即可仍向原地发展。如是敌来我往，敌退我进，往复的游击，才能在这区域深入革命，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并且才能□□敌人，我们随时可以乘势进攻，摧毁敌部，夺取武装。若果采取直线的冒进，或向边地山间一直引进，对于所过区域如走马观花一样，群众绝不会发动起来，并且长期在敌人穷追迫逼之下，受制于敌，结果只有〔被〕消灭。要知道在敌人矛盾冲突不统一的形势之下，决没有公开的可能，我们尽有往复困难的道路和战术主要的原则（原文如此）。

2. 你们目前首先要波动式的向顺前乡、色南一带发展，打通与崇德乡的联系，与崇德乡农民武装力量集中汇合。但所谓汇合不是要你们向色南冒进，或绕山后走向崇德乡，而是要你们去发展或联络□□崇德乡力量出来，向大江发展与你们汇合，最好是崇德乡能自动的发展出来，在色南一带汇合你们。你们应即刻派人去崇德乡，把他们组织发动起来，要极力纠正崇德乡同志坐等红军到来的错误。

3. 彭水县委最近联合之某匪部备准解决向部，为土匪□□

告密，县委同志三人被杀，军支负责人亦逃散，现省委正派人去清理恢复。如你们已经接头，应指定其他组织正确恢复起来，依正确组织兵变路线，从日常斗争走向兵变。必须自上而下发动群众，绝对要纠正联络土匪军官领袖的错误。兵变之后应向丰涪南岸一带与你们汇合。

4. 你们应该派农民同志到清溪、南沱、马头子、色南等市镇及附近一带发展农运及手工业工人、苦力运动，组织游击战争，与你们配合。各地驻军、民团、公安队中，尤其要动员同志及农民打进去或寻找线索，组织兵变。退出罗云坝时，罗云坝亦应保全农协组织，继续发展工作及彭水斗争。你们如果不注意这些区域工作，而只注意游击队及所到区域，是不能发动群众，保证游击队□□□。

5. 你们对于现在这一区域土匪神兵必须有详细调查及系统工作，目前对可以解决的，必须解决其武装，扩大红军，以至逐渐分化、吸收、肃清这一带土匪，才有在这一区域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可能。

V、扩大红军及红军组织

1. 你们过去没有扩大红军，及另外建立游击赤卫队与红军游击队并立，分散力量，不能统一指挥，这是非常之错误的。目前必须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应把所有力量集中起来，统一编制为红军游击队第二路游击队，下面分大队、中队。游击赤卫队名义取消。赤卫队应按其性质在农协下面，依农协区域编制，在白色区域是农协经常自己的组织，游击红色区域是赤色警察作用。赤卫队经常受农协指挥，红军所到区域，赤卫队应听红军调遣。红军游击队仅是游击性质，不带地方性质，所以不应受地方农协或乡村苏维埃指挥。

2. 统一编制方法，要召集群众大会说明，红军编制指挥的是要征求农民自愿来加入红军，将所有自愿兵及原来兵士加入□□混合编制，然后依枪支种类分别武装；其余没有枪支发给的，并使其制备各种原始武装，或徒手编为先锋队或补充队。必须力求红军之扩大，不应以枪支为限制。在红军参加许多徒手群众是非常必要的，在技术上他往往可以作攻关先锋，不过不能与有枪兵混编，以免难于使用。

3. 红军的组织，第二路设路总指挥、党代表各一共同负责。在军事方面，必须使总指挥能集中指挥，总指挥〔部〕组织要依实际需要决定，切忌扩大乱设许多名义，应取少而精主义。总指挥部应设政治部，受党代表之指导，他在军中是实施政治教育的好机关，对所到区域，应有组织地方政权，帮助指导群众组织（如工会农协等）的任务。

4. 总指挥职务在钟鸣同志未回以前，即以赵启明同志暂时代任，路党代表即以陈静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由伊颢阳同志担任。前敌总指挥部不须□□□□去设立，游击赤卫队总部组织应立即撤消，原有赤卫队应集中编入游击队，仍留一部分（不必要枪或很少一点枪）建立罗云坝赤卫队，经常组织交农协管理。以后各地赤卫队均应成为地方性质的，由各地农协去组织管理，但须受红军指挥。

5. 随时应注意红军的扩大。红军的扩大不在只是武装的增加，更不是去拉队伍方式的拉拢土匪民团，而是应在群众中作扩大宣传鼓动，征求农民群众加入红军。应尽量使农民来参加红军，红军才能有广大群众，成为群众自己的。

VI、党的组织

1. 以前党在军中为最高机关，除指挥军中支部外，并直接

管辖涪陵小河右岸丰都大江南岸及彭水党的组织，前委应有计划布置配合这一区域工作。前委人选，省委照原来特委人选批准改为前委，即以梁歌、陈静、李旭堂、赵启明、汪王两兵士同志、尹颢阳同小冬各同志组成，梁李陈三位为常委。

2. 在游击队组织中，应设党的特别支部，受前委指挥。必须加紧士兵支部工作，使能保证党在群众中的领导。

3. 地方党部应于各大市镇建立健全区委，受前委指挥，发展党的工作。区委负责人不得公开担任外部工作，红军去后不得离开该地工作。无论军队或地方党的组织，即在赤色区域仍须注意秘密工作。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4期)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 四川军事工作致中央报告

(1930年8月)

一、各军阀割据的区域

四川分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共百零七县。川东范围居十之八九是刘湘的防区。刘湘之二十一军部驻重庆，割据有重庆、綦江、长寿、涪陵、丰都、梁山、邻水、万县等十六七县，除酉阳属赖心辉，黔江、彭水赖心辉、向成杰各属一部，忠县属向，璧山属陈书农，江津属刘文辉等外，余均为刘湘防区。川南整个范围均为刘自乾（即刘文辉）防区，刘文辉二十四军司令部设在成都。川西范围属四分之一为邓锡侯防区，四分之一是田頌尧防地，四分之一是刘文辉防地。邓锡侯之二十八军司令部设成都，割据有新都、广汉、绵竹、新繁、崇庆等十余县。田頌尧之二十九军司令部设在川北之三台，在川西割据有什邡、德阳等数县。刘〔文辉〕割据有简阳、资阳等数县。成都则为邓田刘三人共管。川北范围居十分之六是二十八军防区，十分之三是二十九军防区，十分之一是刘存厚与杨森防区。二十八军割据有遂宁、合川、顺庆等十八九县。二十九军割据有三台、盐亭、绵阳等八九县。刘存厚割据有绥定、宣汉、万源、城口等数县。杨森仅渠县

一县。二十八军因系统复杂，因此又形成川北的几个割据。如李其相（即李家钰）之边防军总司令部设遂宁，割据遂宁、蓬溪、潼南等数县，陈书农第三师又割据合川（师司令部设此地）、武胜、铜梁、大足、璧山等数县。罗泽洲之第十一师又割据顺庆（师部驻顺）、广〔安〕、岳〔池〕、蓬〔安〕、营山等县，即李、罗、陈之割据。

二、各地反动军队及民团土匪的力量

四川最小的县份都至少驻有一连以上的军队，一营以下的民团；中等县份则至少驻有一团以上的军队，一万以上的民团；头等县份则至少驻有一旅以上的军队，五至十万的民团。但民团不一定头等县份数量多，次等县份亦有多至十万者。兹将四川各中心城市及农斗（农民斗争）发展和民团力量特大的地方军事力量报〔告〕如次：

成都邓〔锡侯〕、田〔頌尧〕、刘〔文辉〕各驻一旅，邓、刘各有一手枪大队，一特种营，此外尚有公安一大队，卫厂两大队，商团一团，民团两团（在乡的民团不在此内），统计成都的军事力量约两万五千人足。顺庆驻一旅，一特种营，手枪队，商团一队（约两百人），公安一队（约两百人），民团全县约两万武装，统计顺庆军事力量约二万八千人。合川驻有两团，一特种营，一公安队，商团一队（约百人），民团一队（约百人），全县民团约万人，统计合川军事力量约一万四千人。重庆驻有手枪六中队，两大队三分队，教导师，潘文华旅，警备司部队，两卫厂队，商团一团，民团两团，手枪一大队，公安一大队，此外川康团务干部学校约一团，二十一军官学校约四团，重庆城内军事力量约两万人，全县尚有瓷器口谭文林全旅，炮兵一团，工兵一团，运输、特务各一大队，民团约四万人，统计全县军事力量约六万四千人

足。万县驻一旅两团，一手枪大队，特种营，约八千人力量。梁山一旅人，民团约四万。涪陵兵一旅，民团约两万。自流井警备司令一团人，荣县驻一旅。宜宾驻护商大队（约一团人）。遂宁驻有李其相部一师，一手枪大队，炮兵、工兵各一营，民团约一团，全县约二万人，统计军事力量四万人弱。綦江、南川各驻兵一团，民团两县约十余万人。四川土匪力量最大的地方是川南的高、珙数县，约四万人，武器统计亦约二万。川西的邛崃（民团转变）土匪约二万人，枪约万支。川东的梁〔山〕、忠〔县〕、丰〔都〕、涪〔陵〕一带，大股匪以周燮卿为首领，人数亦约万余，枪支约七千余支。其他如十人至百人的股匪，全省几无县无之。

统计四川军队有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二十，新二十等六军和刘存厚、向时俊等杂色部队，人数约二十四万强。民团力量据1929〔年〕11月份川康团务管理处的统计报告，川康民团力量三十万，川西十八万，川南十万，川北三十万，统计八十八万。但实际川东亦不过十六七万，川北不过二十万，川西不过数万，川南不过三四万，统计约四十万强。土匪数量统计约八万，神兵约二万。

三、各地农民斗争情形

四川农民一向斗争急〔激〕烈的地方是川东的涪〔陵〕、梁〔山〕，川西的绵竹，川北的射洪、合川、万源、城口，川南的南溪、荣县、宜宾等处。兹将各地农民斗争情形写于次：

A、梁山

梁山的农民在国民党军阀捐税层出不穷的剥削之下，在地主大利盘剥之下，生活日趋恶化，已经不能再忍受军阀、豪绅、地主的压迫与剥削的时候（一九二九年），恰好又接受了旷继勋部兵

士举行革命兵变的政治影响，知道了要解除一切痛苦，只有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实行土地革命，根本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有可能，因此农民的行动，一天一天的革命化，要求革命的情绪，也一天一天的高涨起来。在旷继勋领导的红军（1929年7月）刚到梁〔山〕的时候，数万以上的农民群众起来响应红军。可是红军因为犯了游而不击或击而不游，游击中妥协军阀，更不发动群众斗争；和为了军事的便利，不顾政治进行；为了军需恐慌，扰害贫农等种种的严重错误，因此结果不到十天而流产了。红军虽然是被反动派消灭了，但广大的梁山农民群众革命的情绪是不能消灭的。不仅群众的革命情绪没有因红军失败而稍为消沉，而反为了红军失败而高涨起来，因为他们已经认识了红军是自己的军队，国民党军阀军队是压迫工农的反革命军队。他们在1929〔年〕8月秋收时候，曾经组织过抗租军，与军阀地主作拼命的斗争，可是四川党不能利用这一革命的客观充分条件来领导他们走上更正确的路线，致使结果遭受失败。

正因为梁山农民革命的情绪日益高涨，斗争日益扩大与尖锐化，因此反动派对于梁山的农民群众不得不采取野蛮残酷的手段来压迫他们，同时也不得不相当施以改良（如相应的减点租）来欺骗他们，企图镇压他们的革命情绪和消灭革命化的前途。可是农民群众的行动刚刚与反动派的企图相反，他们正因为一切自由均被剥削〔夺〕，感到严厉压迫的痛苦，同时军阀积极备战，到现在对农民的剥削更不能稍为放松，因此也使之感受生活日益恶化的危险而需要革命的心理日益迫切，而行动也日益革命化了。目前梁山成千累万的农民群众正在加强他们的团结力量，准备为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而与国民党军阀、地主豪绅、资本家作最后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B、涪陵

涪陵过去的农民斗争与梁山农民斗争有同样的发展，甚至还要急〔激〕烈。他们在一九二九〔年〕九月曾经组织过千人以上有三百〔支〕步枪的赤卫队，可是因领导的同志犯了专门带领群众□□，□□，丝毫不做党的政治工作的错误，结果亦遭失败。赤卫队败后，他们革命的情绪，一点没有消沉，而且他们反地主大利益剥削与减租的斗争日益扩大与尖锐化了。1930〔年〕3月郭汝栋部队出川前，即加紧对农民的剥削。是时农民（罗云坝的）即组织了六百人左右的抗租军，拼命与地主作武装的斗争，到五月即联合了郭汝栋两排人枪的革命兵士，组成了现在涪陵罗云坝两千以上群众三百以上步枪的四川第二路红军。其余涪陵尚有广大的农民群众，都在积极准备响应红军，参加红军。

C、南溪

南溪党在农民群众中过去即有广大的组织基础，自经过一九二八年的农民暴动，在完全机会主义策略路线的四川党领导之下遭受几次极严重的失败后，群众情绪一般的是消沉下去了。但到了一九二九年，农民群众因具有他强有力的经济与政治的原因，革命的情绪重复高涨起来，小的经济斗争是继续不断的发生，大的经济斗争（如广大农民抗租运动）日益发展，到现在南溪的农民斗争不开始则罢，开始则为政治的斗争。南溪的农民对我们同志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饭吃，要分土地，要没收地主的土地，要焚烧地主的契约，要杀军阀土豪劣绅，不需要什么减租和什么抗租运动了，为减租和抗租运动我们已运动得不爱了。”这不是几个农民的口气，而〔是〕广大群众的呼声。由此可以说明南溪的农民斗争，一开始即变成政治的斗争。现在南溪农民正在加强他们主观的力量，准备实现这一最后的斗争。

D、宜宾

宜宾党在农民群众中的组织，过去亦有广大的基础，农民在斗争历史上得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宜宾的豪绅不带三五弁兵在农村不敢行走。农村到处都贴满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标语。一些土豪劣绅恨农民恨入骨髓，同时也又畏入骨髓，因为宜宾农民革命情绪特别高涨，斗争日形尖锐化，所以白色恐怖比较严厉残酷。

宜宾农民在1929〔年〕11月与部分土匪联络，组织了千人和五百支枪以上的赤卫队，可是因为失掉党的领导，结果遭受失败。

目前宜宾农民一般的呼声，与南溪农民一般的呼声没有两样，同样是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大干起来，现正从事于努力组织农暴的一切准备工作。

E、荣县

荣县党在农民群众中的组织，过去同样有广大的基础。他们与地主豪绅作拼命的斗争，有长久的时间。在一九二九年秋收时候，曾经做过一次广大的抗租运动，几〔乎〕全县数十万农民都起来参加了，但几次的减租运动，因为不能满足其要求，结果转变成抗租运动，在抗租运动中与军阀豪绅发生过不少的武装冲突。总之，荣县农民特别是东西两乡的农民，革命情绪高涨而又高涨，斗争日益尖锐化，同时也日益政治化。

必然的，荣县农民革命情绪之高涨而又高涨。荣县年亲天干，春季又不能下种，秋季减少收获，农民生活日趋于艰难的地步。特别是今年遭受的春荒打击，秋收失望，已经使荣县农民生活无法维持下去。兼年来军阀粮税的加重，使农民所获不敷缴纳粮量〔税〕，地主的迫租更不稍为减轻与原谅农民，使农民生活到了绝顶恶化的地步。同时荣县农民相当接受了党的政治影响，特

别是朱毛红军和旷继勋部兵变的政治影响。荣县农民群众具有这些强有力的政治与经济的原因，因此一天一天的革命化，一天一天的团结于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来。

这样，真是不得不使军阀地主们丧胆了，真是不得不使军阀地主们对农民一面采取严厉的白色恐怖，一面施行改良的欺骗了。在1929〔年〕10月军阀刘自乾对农民说：“我筹军饷在地主身上筹，决不剥削农民的。”的确，刘文辉筹饷在地主身上筹，但是地主则在农民身上榨取。这种剥削农民的方法，仅仅只能欺骗自己，一点不能欺骗群众。而且相反的，正因为这样间接的剥削农民，更增加了农民对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一层认识，更益使之向着为推翻现在统治，建立新的政权——苏维埃政权——的总政治斗争途径而猛烈前进。

目前荣县的农民，特别是东西两乡的农民，要求革命的心理非常迫切。他们要求党组织农民起来编成红军，现正加紧这一工作的准备。

F、绵竹

绵竹农民最近亦发动了数千的群众的抗租运动，亦有转变成成为红军的前途，现正加紧团结他们的力量，准备他们最后胜利的斗争。

G、射洪

射洪农民在一九二九〔年〕三月，曾经发动过极广大的斗争，自动组织了数千的农民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反对重租重税，包围县政府，要求减租减税，向射洪知事要饭吃，斗争非常激烈。可是因失掉党的领导，结果是遭受了反动〔派〕的欺骗。

现在射洪农民群众，正在到处骚动，预备团结更广大的力量，发动更广大、更有政治意义的斗争。

H、合川

合川的农民群众中，党过去也有广大的组织基础。他们曾经做过数次的抗租运动，现在正与反动的地主作拼命抗租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他们组织了三百人以上的赤卫队，参加这次斗争的群众达四千人之多，现更日益增加人数，斗争日益扩大与尖锐化。他们已经准备在最近实行农暴，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

I、万源、城口

万源、城口的农民在军阀刘存厚统治之下，生活更是痛苦，农民负担特重，压迫也特别厉害，生活更是恶化。他们在一九二九年一月自动组织了数千人的抗租军，与地主军阀作拼命的斗争，到是年四月（原文如此）接受了旷继勋部红军的影响，斗争愈形激烈与革命化，参加的人数也日益加多，到十月万源全县的农民群众都已完全跑来参加了这次的斗争。在与军阀刘存厚部队接触时，他们得到百支以上的枪支。到今年一月改编了抗租军的组织，成立了四川第一路红军。

四、党在各地的军事力量和士兵生活与斗争描写

四川兵士一般的都相当接受了党的政治影响，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七混成旅革命兵变的影响，因此，四川无论那个军阀部队中的兵士，都有最低限度的经济斗争和普遍的兵变。如最近罗泽洲部队又哗变一营，王芳舟（即王陵基）手枪队之投向红军——贺尤部——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证明军阀军队之日形崩溃，反动统治之更益动摇。至于四川党在各地方的军事力量，仍非常普遍（详细组织报告不列内）。兹将兵士革命情绪特别高涨，斗争特别发展的地方，兵士生活及斗争情形描写于下：

A、江津

江津驻军一旅，系二十军的部队，人枪各足四千。该部兵士生活在物质方面比较优美，但精神方面很痛苦，一切自由均被官长剥夺，因此斗争特别发展，而且日益尖锐化与政治化。

该部兵士在今年一月四号，第四团六、八两连，曾经发动了一次兵变，可是因失掉党的领导，结果是遭受了反动派的欺骗，予以相当改良，使群众情绪消沉下去。但该部广大的兵士群众受了六、八两连事变的影响，已经认识了自己团结的力量。

B、合川、邻水

合川、邻水的兵士过去“反对毒打乱骂”、“要求伙食由兵士自己办”、“要求星期放全假”的斗争是时而发生。特别是一九二九年四月（原文如此）旷继勋部七混成旅兵士的革命兵变过后，兵士要求党号召兵变的情绪非常高涨。可是这时党因犯了严重的错误，制止群众的情绪，要群众与红军接触时再来兵变。后来因为红军未经合川、邻水而到梁山，致使少数群众因为革命的情绪特别高涨而盲动起来，致使反动派查〔察〕觉而大清共党，严厉实行白色恐怖，致使兵士群众的领袖被捕、枪毙，致使群众组织瓦解，情绪消沉。

现在合川、邻水两地广大的兵士群众革命情绪重复高涨起来，革命的斗争也复兴了。举行兵变，成立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已经成为他们最迫切的要求。

C、其他如新都、广汉、荣县、自贡等地的兵士群众都日益革命化。如荣县兵士开去镇压农民斗争时，他们对农民说：“你们如果很远听到枪声，便有人来捕你们，即赶快跑。我们兵农都是一家人，我们是决不想来压迫你们的。放枪便是告诉你逃跑的暗号。”再如自贡警备司令部的兵士对工人说：“你们暴动的时

候，我们一定来参加。”这些都是证明兵士日益倾向革命，反动统治的更加动摇而且将完全崩溃，都是可以证明四川的革命形势是紧跟着全国的革命高潮而复兴，已经迫近了革命的前夜，苏维埃的政权已将实现于眼前。

五、各地方党部忽略兵士运动

四川各地方支部都认为兵士运动是军委的工作，甚至认为兵士运动即是军事投机的一种工作，不认识中国军阀军队是雇佣性质，兵士多半是失业的工人和破产的农民，更不认识兵士运动在目前有特别严重的意义，因此在主观上再〔虽〕没有这一认识的错误，但在客观上一般的是放弃了与工农运动有同样严重意义的兵士运动。

四川省委根据这一革命的客观情形，对四川军事工作的布置，除建全省军委组织，加强军委指导力量，和建立巡视工作与建立单独的军事交通网等及一切技术工作由口头报告外，兹将一般大的布置情形报告如下：

A、建立军区军〔事〕委员会，管理并发展该区域一切军事工作。

省委第一次军事会议决议，成立五个军区。计第一军区（梁山军区），管理梁山、涪陵、丰都、忠县、两开（开江、开县）、万源、万县、城口、达县、宣汉等十余县；第二军区（江巴军区），管理江〔津〕、巴〔县〕、合川、璧山、武胜、铜梁、大足、永川、江津、綦江、南川、邻水等十余县；第三军区（自贡军区），管理川南各县；第四军区（顺庆军区），管理南部、蓬安、岳〔池〕、广〔安〕、遂〔宁〕、潼〔南〕、蓬溪、营山等十余县；第五军区（成华军区），管理成〔都〕、华〔阳〕、广汉、新〔津〕、简〔阳〕、资〔阳〕、绵竹等

十余县。同时决定每军区五人组织成，主席，秘书兼组织、参谋各一人，巡视员二人。

.....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2期)

四川省军委致中央报告

——六至九月工作大要（节录）

（1930年10月19日）^①

（上略）

在这当时主观客观的条件之下及全国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之下，尤其是中央指示的争取邻近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路线之下，省军委会议的结果，认为不〔能〕丝毫犹疑的全省行动起来，因而在当时的布置和计划，按照上述主客观条件，有如下的布置计划：

（一）将全省计划为五个军区：丰、涪、梁、万以东为第一军区，〔以〕梁、万为中心；武胜、潼南、合川以东以重庆为中心为第二军区；荣、威、资中以南为第三军区，以自贡为中心；金堂、德阳以西以成华为中心为第四军区；川北以顺庆为中心为第五军区。在第一军区内已有一、二路，决定由大鸣同志去立即发动梁山的第三路和第二军区内发动江津兵暴为第五路^②，重庆为第六路，合川为第七路，邻水为第八路；第三军区内荣城〔威〕为第九路，自贡为第十路；宜宾、南溪为十一路，南六县为十二路；第四军区绵竹为十三路，彭山为十四路，汉州及成都为十五路；第

^① 原文无年代，此年代为原编者判定。

^② 原文即无第四路。

五军区广安、岳池为十六路，蓬安、营山为十七路。计划在三个月内先后发动，以冲破死后〔寂〕的环境造成革命的巨潮。要实现这一种计划，如全省五人巡视传达这一工作精神和路线是不够的，当时决定召集全省主要军支、游击部〔队〕及地方党部军事负责同志开一联席会议，在总的政治精神确认之下，在策略路线深切讨论之中来纠正过去右倾不动的取消路线的错误，从这样讨论的会议中来实际布置各地的行动，发动全省的行动。召集的人数为十七，会期是七月十五，议事程序为政治报告及讨论军事工作报告及讨论苏维埃问题、土地问题等，此外分别讨论和布置各地行动。

……

4. 目前工作布置和计划。

一、恢复第一路游击战争和赤色区域（城口、万源）。因六月间失败之后，对城万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但在一年多的斗争历史上看来，无论如何是要坚决来恢复，并且失败都具备有至少比新发动的一处斗争要好的多了，因此已于九月初召集负责同志来省讨论恢复这游击战争的计划。不久接到他们来信，他们也决定去恢复，想现在已着手恢复去矣。

二、丰都的第二路，原因是负责同志不坚决执行省的指示来作，因报的恢复工作未达到省委的计划，于是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是很充分〔却〕等待去领导。如丰都驻军有三连以上的组织（就是第一第二路遣散打进去的士兵或同志），赤色区域并未被敌〔人〕消灭，赤卫队仍保留一部分埋藏的枪支及零件，只是没有子弹，仍旧〔是〕很精良的武装。因此决定立即派人去领导崇德乡这几个苏维埃和农协的斗争，加强并集中赤卫队的武装，扩大游击战争。另一方面组织丰都兵暴，致力组织这几连的兵变，形成游击

战争。再则由党坚决指示丰都县委发动北路仁寿乡农村斗争，组织游击战争，汇合或联结起来恢复第二路整个部队。

三、在梁山方面于九月后决定（梁山县委负责同志由省召集会议决定的），将忠州所藏的十余件头取去，恢复小的游击战争，恢复虎城乡南岳场这斗争区域，建立苏维埃政权，解决土地问题（原文如此）。

这三路发展的方向都是向万县、鄂西进发，以与鄂西打成一片，并健全下东军委以领导三路工作。

四、在上东方面——重庆：第一，就现有的赤色〔工〕会支部加紧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和训练；第二，加紧现在军支组织的训练和组织的扩大；第三，建立各部队中的士兵委员会和扩大士兵运动；第四，随着近郊农运工作来建立近郊农民武装。

五、潼南、铜梁游击战争爆发后，力求其扩大和深入，使之两县联系起来，在陈书农、李其相、刘文辉、刘湘四军阀的边境上成立赤色区域，威逼川省中心的重庆。

六、合川东路乡区农民斗争只是失败下来，据报告还未受到严重的损失，仍有恢复斗争的可能。合川军支的组织整顿之后，坚决的〔继〕续组织兵变（当然不是强奸式的干），与乡区斗争汇合，组织游击战争。发展的前途至少可以形成合川、江北、邻水三县的赤色区域。

七、整理江津其他两团的组织，加紧过去失败的训练，积极行动的教育，组织将来再次的兵暴或兵变，发动重庆南路的游击战争。

八、川南仍是照过去的布置，以自贡为中心，加紧自贡纠察队组织的扩大，附近军支工作的教育和训练及近郊农民武装组织和训练，荣县、威远的游击战争向自贡发展，与宜宾、南溪游击

战争汇合，发展自贡地方暴动。

九、宜宾、南溪坚决的纠正过去等待干的错误，和宜宾兵变组织游击战争，与荣威游击战争发展自贡地方暴动，与泸州农民汇合，发展泸州地方暴动。

十、川西方面，汉州兵暴后与绵竹农民武装汇合（现究发动与汇合否尚不知道，原来在布置时决定绵竹于八月份立即发动，汉州九月十五〔日〕以前发动，建立赤色区域）。

十一、彭县农民斗争区域于八月份决定立即发动斗争，组织一路游击战争，与川南宜、荣取得联系，建立赤色区域。

十二、在川北方面，以南部农民斗争和蓬安的兵士暴动汇合组织游击战争，建立南部、蓬安的赤色区域。

十三、组织广安、岳池的兵暴，发动游击战争，加紧顺庆工农组织和训练，发展顺庆地方暴动。

十四、健全下东、川南、川西、川北各特委军委，健全省军委交通网，纠正过去各自为战的错误。

十五、省军委本身健全对全省的领导作用，建立应有而不可缺的经常工作和机关。决定组织情形如下：

军委会五人，常委三人，以书记、秘书、参谋组织。军委会工作的分配：秘书兼组织一人，参谋一人，工农武装一人（由市军委书记担任），兵委一人（由市兵委书记担任，现在尚缺），参谋一人，技术工作二人。（下略）

（摘自《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卷，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印）

中共四川省合川县行委： 《合川地方暴动概略》

(1930年12月1日)

〔合川〕地暴之经过

1. 城市兵暴之经过

第一次兵暴是八月二十四号（星期五），当夜合川行委所管理之破坏队如南津街电线之破坏则完全办到，北门外则破坏了十分之七八，达耳门亦破坏了三分之一。（下略）

至兵士方面，原定当夜电灯熄后一致屠杀长官，举行兵暴，不料临时兵士均全休，均喁喁私语，互相等待。团特派员高子钧又以认为最好之第三营令其首先发难者，则暴动队之不见人。于是高子钧认为失败，竟不督促其他第二、第一营发动（闻当时有王□□三同志挨到长官室外准备下手矣），而卷款数十元逃跑不待合武行委、合川行委暴参部之命令而自由离开；（下略）

决定九月一日（星期一）举行第二次兵暴……决定以屈□秦□监督何□□领导张阳山各连兵暴，仍以范及新来之蔡□□领导第二团兵暴，以后一切政治军事会议计划，仍由合武〔行委〕主持，合川行委只居于监督地位，……决定发动之记号为电灯燃时，二枪响之〔后〕炮起。惟讨论放火时累有争论，如荣□同志主张以预防同志畏□怯起见，须在山上放火烧草树，既无人救火又多烧

两处兼无危险；伯〔先〕则坚持主张在城内放火，扩大影响，并可逼陈书农逃跑。及决定在城内放火时，柴□同志又主张由同志个人家起火，以免同志畏怯及旁人发觉之弊；伯〔先〕又坚决主张须在机房放火。俟后表现……王□□同志担负之小南街放火，王□□同下手及已点燃，不幸火刚上房又被扑灭。其下如丁□□二士兵同志所担负之衙门口放火，竟畏不敢动手。秦□□所担负之北门外裕祥宾馆放火，则由栈房而改为友□家中；但同时又因赵□之阻碍（以为在友□家中起火，恐影响来往的人尤其是他友妇），秦□又改为焚烧□侧之厕所靠近之高墙。绝不能近烧，引火于是以党报（《红旗》）宣传品等点火捆作为引火，将上复滥渣筋，刚淋油放火，突有人过，遂仓惶遁走。惊动行人，检视洋油引火《红旗》、宣传品等，轰传共党放火，大众警告，于是放火一事完全失败。放枪一事，原因由伯〔先〕主张以李□□及谭同志携手枪混入第二团（化装也来不及了），又不幸被长官发觉擒获，四处传令戒严，于是主要之第二营不能发动；而次要之张阳山，一方面打头炮之路□既未入营，而在营外之指挥唐、秦、何三同志又因遇着传令兵搜阅其戒严命令，又被该兵进去报告，因此指挥之同志又全逃。于是各处兵士又空等一夜，既不见火起又不听枪响，而形成第二次之流产。

2. 云门镇兵暴之经过

……戴愤而走到云门镇，交通不在，则亲往营门口去会同志，致长官捕获，收出日记名单，影响当地士兵组织。何子□令即暴动，不但计划不周，且命令未传达到，以致流产。

3. 狮滩场农民暴动之经过

□夜集合百余人枪，不及半日，分数处发动，……群众中之勇者□□□三次爬上城墙都无人继上，负责人也不督促，竟以为

天将破晓不干了。迨第二次集合则有七八十人，枪更少。……合川行委仍决定以农民围攻当地驻军（第五连之两排人），而使士兵同志从中响应，内外夹攻，屠杀其长官以发动其他群众。本来这两队人到当地已久，县委曾令秦□调查其来属（原文如此），秦竟不执行。现由县委直命军科转问士兵同志，始知其本有党的组织，且能影响半数群众者，乃派□学生同志前去，但当时命令并未传到。次日学生同志往问士兵同志时，又仅仅说到我们外面打来，你们内面干等简语，其它口令标记如何，如何集合竟未提及。以致当夜农民在外面开炮时（又未进攻）内面果然响应，但打了许久，竟未打出来，最后逃出一个兵喊道：“同志们，我们杀长官未能杀完，还有一个在营门口督着打，以致打不出来，请去攻营门。”而领导人又以子弹缺乏，未能立刻进攻。等进攻时营门士兵一齐打出，但又不能混着来，于是第三次暴动又归失败。合川行委因坚决组织第四次兵暴，其方法是：一、整理第五连组织工作，第二次兵变；二、动员李秉奎部下同志响应农民围缴李之枪械；三、三连接络三庙场武装共同作游击战争。但这一计划又因：1. 五连负责同志严春楚被枪毙无从进行；2. 李秉奎部下又分驻各地一时不能集中，难以下手了；3. 秦友□逃避三庙场之通信找不到，兼之顾向德团所有枪支完全集中，且追捕同志甚急，不能立足，于是四次暴动完全失败，而秋暴结束矣。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5年第1期）

内江农民协会秋收斗争宣言

(1928年8月)

亲爱的工人、兵士、农民及全体农民同胞们！

我们农民一年辛苦换来的秋收快要到来了！我们在这将要到来的秋收之前，我们想起：

我们农人，一天做到黑，一年做到头，一生做到老，为什么还要是红苕吃不饱，衣裳没有穿，房子稀巴滥，年年过这牛马不如的生活？军阀豪绅地主们，一天要做到黑，一年要做到头，一生要做到老，为什么却美衣玉食，高楼大厦，享不尽那神仙般的生活？

啊！他们不过是靠着几杆枪，几块田，威迫而无情的经常用苛杂重租重息压榨我们，把我们多数人千辛万苦做出的掠夺去供他们少数人的安乐。这种极不人道的行为，他们却认为是“天经地义”。

我们被军阀豪绅地主的残酷剥削已经整得够了！眼前秋收，又是军阀逼税、地主逼租、债主逼债的生死关头。我们欲忍受下去，奈如今年天干，收获的当然不够狼心狗胆的军阀豪绅地主们的无厌剥削。我们被逼得无路，只有号召我们全内江的农民坚决执行以下的各项决议：

1. 全县农民团结起来，实行秋收斗争！
2. 工人、兵士、贫民团结起来，保护秋斗胜利！
3. 实行见打平分！

4. 反对先称后种!
5. 反对加租夺佃!
6. 反对大利盘算!
7. 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8. 长年工资三百钁、零工一千二百文!

内江县农筹备处印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3年第3期)

中国共产党内江县执行委员会为秋收告农民书

(1928年8月)

全内江的农民同胞们：

残酷而无人道的地主们，历年来硬把万恶军阀给予他们的剥削，无情的统统转加到农民身上来，弄得农民们成年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正在哭天无路，哭地无门了！

那知老天不睁眼睛，又连施干旱，今年更秧子栽不到，红苕干得要死，粮食烧得火燃……果真是几十年来没有的大灾荒！

但是丧尽良心的军阀们，他在那里坐洋房，抱美妾，穿鲜衣，吃西餐……安闲的度他们还不满意的伟人生活，那有闲心闲力来管小百姓的呻吟痛苦，大开□□的减捐裁税；而残酷的地主们，也正想要圆他们长久发财的美梦，更那肯减租谷，让租钱，来活农民们不值一文钱的贱命呢！

农民们！你们成年辛苦快要结晶的今年秋收又要到来了，也正是你们纳苛捐纳重租的生死关头到来了！你们如仍旧靠军阀地主的良心发现，很驯服的乞怜他们减税让租，那末，你们将自走了九幽地狱，万劫不能超生了！不然，你们只有加紧团结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向军阀地主阶级强烈的反攻，从死围中杀出一条生路来，以求得你们穿衣吃饭的最后胜利。

农民们，不要怕！江西的省城南昌，湖南的省城长沙，已被我们的红军攻下了！只要大家努力，不久就会把四川和中国变成我们工农兵赤色的天下！

秋收斗争的口号是：

1. 全县的农民团结起来！
2. 实行秋收斗争！
3. 实行见打平分！
4. 反对加租夺佃另佃！
5. 反对先称后种！
6. 长年工资至少三百钿！
7. 零工至少一千二百文！
8. 取消一切捐税！
9. 反对大利盘算！
10. 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
11. 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农村苏维埃政府！
12. 工人兵士贫民团结起来拥护秋收斗争！

内江县执行委员会印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3年第3期）

涪陵县县民抗捐同盟大会通电

(1929年7月)

天祸吾蜀，兵匪相循，十余年来，几无宁日；搜刮之苦，剥削之奇，百余州县，涪为尤甚。计自郭军驻涪，积年以来，除巧立名目，所谓田捐、指名捐、禁烟登记与夫各关卡，每年征收数百万不计外，即以粮税而论，自前年八月自今，已由十九年预征至三十^①年。今日令下，明日勒缴，偶一推缓，捶楚立至。蚩蚩之氓，迫于淫威，卖妻鬻子，勉为缴纳，冀得一日息肩，稍苏民困。殊派款借款，层出不穷，提款委员，不绝于道。加以今年亢旱不雨，匪盗纵横，农困于野，商病于涂。现虽有雨可耕，低田禾稼，多已失时；高地粮食，早已枯死。言生聚则千疮百孔，言状况则十室九空。嗷雁横飞，哀鸿遍野；水深火热，待救维殷。乃郭汝栋明令皇皇，又筹过渡费四十余万，预征三十一、二、三、四年粮税，以半月为一期，分三期缴纳。最可怪者，一期内缴有回扣，二期内缴无折扣，三期内缴不惟无扣，且科罚金。夫三期既为限定之期，如期缴清有何罪而议罚？简单言之，真是一月之间征收四年粮税，缴清之后，以便另立名称。此种敲肌（骨）吸髓之法，不惟古今中外所无，即市井无赖，亦不肯冒此不韪以饱无底之欲壑。不意竟出于四川之国民革命军，竟出于自命为忠实国民党之郭汝栋！况自伊反防以来，两次亩捐，五年粮税，榨取人民几及百万。喘息未定，加此重累，吾民何辜，于此浩劫，

^① 民国纪年，下同。

里巷街衢，同声一哭，入地升天，何能逃死？惟于生机悬绝之口，出以铤而走险之谋，揭竿斩木，群起反对，庶几孤注一掷，或可倖生。今与全涪民众约：如遇军阀走狗，倚势滥团，勒迫吾民，为虎作仗〔仗〕，则杀之无赦。倘此辈良心难昧，而又迫于淫威，惟有相率辞职，以谢国人。至其部下士兵，尤为可悯，牺牲生命，仅获一餐，以珠弹雀，得小失大，倘能倒戈相向，诛此独夫，尤为群众所欢迎。三户亡秦，在此一举，蚁穴溃堤，寡不在大。全县人民，即以身殉，实所心甘。盖人民出钱以养兵，郭则拥兵以殃民，共和国家，宁能有此？所愿国民政府与省政府及川中各军将领，主张公道，各县民众，大力援助，青山不老，绿水长存，全县人民，感德弥暨。涪陵县八十万生灵同启。

涪陵县县民抗捐同盟大会 叩印

谨将本会所列办法列后：

(1) 对付——郭军剥削人民无停止之日，全县人民当一致反抗，自今日始，决不再缴钱一文。以后，任何军队所派任何款项，均将誓死反抗到底。如粮税一项，亦必待三十年之后再始按年完纳，若有富绅单独纳款者，吾人当群起诛之，以儆效尤。

(2) 组织

(a) 抗捐团——郭军枪不过数千，兵不过万人，我们当马上组织抗捐团，先由各场组织成立，联合各乡镇以至全县。若派兵压迫时，当联合作战。计枪支比较，多数十倍；人数比较，多数百倍。而陈涉、吴广乃能诛无道秦，以全县人民共除此贼，又何难之有？

(b) 暗杀团——譬如郭军筹款，常常利用滥团劣绅层层压迫，故横征暴敛所以才收良好结果。我们要认清此辈滥团劣绅为军阀之走狗，实人民之公敌。当于各场组织暗杀团，专杀一切甘为滥军作走狗（如劣绅滥团和提款委员等）。若该地人民力不能

除者，连境应联合一致，互相援助，为彼等铲除之。如该地姑息养奸而不实行者，应为人类所不齿，但亦为他处所不容。

(3) 宣传——由各地学校青年及阍境之好义急公者，向民众普遍宣传，暴露郭军之万恶，指示来日之隐忧，共谋后日之生路。如某处发生通电、宣言等，各地人民应当相继互出快邮代电和宣言，详录郭军之万恶，向当道及各省内外呼吁主张公道，并请当道及连县民众之拯救。

以上各项，我们组织就绪者，已遍全涪之大半，其未组织之区，当照此迅速组织，共同反抗，切勿延缓不前以自害。总之，郭贼拥兵自卫，毒害人民，我们当认定他为害人蠹贼，民众公敌。其假冒为革命军，也实革吾人民之命；其自命为国民党人，实不愧刮国民党人；其攻击共产党，也已实无异共产。共产党只共大资本家，伊则无贫无富，将我劳苦大众一并共了；不特共了，且将我们衣食强夺，奄奄垂毙了！此贼不出，何以生为？我们还不奋发起来，团结起来，共杀此贼，更待何时！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反抗可以求生，缄默即是求死。总不要相信他“人民固是困苦，争奈兵亦乏食”这种话。他在涪陵所刮民财，果以养兵，恐再加几万，亦不足用。他将此款不过作升官发财的养料，所拥之兵不过作为刮削民众的工具，是这种助桀为虐的士兵，就饿死也不值我们民众的怜恤他的。民众醒悟起来，我们非将此款抗脱势不甘休，非达此目的誓不终止！痛苦的民众们，大家团结起来，鼓勇前进罢！

我们这些言语，是为人民生活求解放的。若有人将此隐匿不发或损坏者，也就是人民的公敌，当大家痛除之。综上所述办法，愿我全县人民誓共守之。

(中共涪陵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原件存涪陵市档案馆)

中共巴县党、团执委会 印发的革命口号

(1928年9月7日)

抗租、抗粮、抗捐、抗税、抗债。

没收土地分给农民耕种。

反对克扣军饷、发清欠饷。

兵士不为军阀当炮眼。

工农兵联合暴动起来。

建立工兵苏维埃。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共巴县党、团执委

一九二八年九月七日

(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南溪农民暴动

南溪位于川南重镇宜宾、泸州之间。南濒南六县，北临自贡，过去交通闭塞，人民生活贫困，历史上反压迫、争生存的抗暴斗争此伏彼起，几无断息。1926年前后，在外读书加入中共党、团组织的李立之、包析城、周伯尧、张守恒等先后回县教书，在学校组织爱国师生学习马列主义，阅读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开展组织活动，培养、吸收了郭士先、张质夫等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团组织。随即成立了南溪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提出了依靠工农，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压迫剥削，反对苛捐杂税，迅速发展工、农运动的工作方针，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原中法大学学生胡明鑫、廖时勉、熊大猷、罗仲威等十余名党团员辍学返县。根据上级指示，于同年6月3日将党支部改建为中共南溪县委，李立之、廖时勉分别任党、团县委书记。不久，县委在玉皇观召开活动分子会，决定把工作转向农村，在贫苦农民中宣传革命，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团组织。会后，大批党、团员深入农村秘密活动，先后在贫苦农民中发展了党、团员一百一十余人，并在农村各地建立了八个党的基层组织。

随着党、团组织的大发展，农村的革命宣传活动广泛深入开展，一年多，在党组织领导下，先后在县城学校组织了“共产主义儿童团”、“同学会”、“学术研究社”，在社会上发起组织

了“南岸青年促进社”、“平民社”、“平民夜校”，印发《农民半月刊》等；南中师生举办了孙炳文烈士照片、遗著展览，编演《孙俊民先生之死》、《五卅惨案》等话剧；还派大批党团骨干利用教育局推行义务教育之机，到全县城乡进行革命宣传。特别是张守恒等在李庄等地，利用春节闹元宵的民间习俗，编演群众喜闻乐唱的革命车灯，唱词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阐明了革命道理，对群众进行了很好的教育。

在广泛深入进行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县委根据上级大力发展农民协会的指示，派洪默深去牟坪协助支部进行组建农协试点。通过深入发动，秘密串联，介绍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启迪了农民思想，提高了群众觉悟，农民纷纷踊跃报名参加。10月，第一个农民协会在牟坪建立。随即各地农村支部也抓紧开展工作。11月，省委巡视员蔡明钊到南溪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号召大力发展农协，建立农民武装，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县委进一步加强了农运工作的领导，加快了组织农协的步伐。到1928年初，全县二十七个乡镇，已有十五个乡镇建立了农民协会；并在长宁、庆符毗邻地区也建立了农协，会员达五千多人。1928年2月8日，在宋家乡川主庙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张守恒当选为主席。当时农村普遍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你拿扁担我拿刀，没有刀子拿撬撬；你拿枪，我拿炮，没有枪炮拿大刀；杀贪官，打土豪，闹农协，搞农暴”。歌声穿云裂石，充分反映了南溪人民在觉醒，群众要革命，预示着由于长期愤懑而孕育的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必将倾盆而至。

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共川南特委在宜宾、南溪组织农民联合暴动。1927年底，县委召开党团骨干会议贯彻这一精神。张守恒等一批党团骨干认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迫切要求

革命，应该因势利导，积极组织暴动。李立之等在县城的党员则认为群众发动不充分，党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和军事知识，主张暂不暴动。两种意见，久议不决。会后，张守恒等一批坚持暴动的党团员，成立了行动委员会，积极进行暴动准备。

1928年初，反动当局估派烟捐，派丁挨户勒收。广大农村群情激愤，民怨沸腾。县委因势利导，在城乡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捐斗争。特别是宋家、牟坪两乡，数百农民上街举行抗捐示威游行，找团总雷敬廷、陈跃先评理，痛打了狗腿子王建章，处死了两名逼捐的兵痞，砸了陈跃先的家俱，强夺民团十余支枪，牟坪区团总曾连璧被迫免去农民烟苗捐。

与此同时，张守恒等秘密进入民团活动，积极发展农协会员，培养、接收了表现突出的兵、官入党，并在宋家建立了党的民国支部。另外，还派张增元（次伦）出任李庄六团中队长。这样，我党通过他们直接掌握了这些民团，调整人枪，严格组训，为农暴准备了条件。

正在这时，中共川南特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根据《四川暴动行动大纲》，正式通过《川南暴动计划》，决定立即组织宜、南联合暴动，成功后将队伍拖向下川东与贺龙会师。县委再次分析了南溪形势，多数同志毫不动摇地坚决执行“春暴”指示，并决定张守恒、赵之祥（黄埔武汉分校学生）、洪默深（黄埔军校学生）三人在李庄天府堂秘密召开农暴军事会议，制订了军事行动方案。

川南特委为了坚决贯彻《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和《川南暴动计划》，又指派特委委员郑则龙到南溪任县委书记，加强组织领导；特委机关迁驻宜宾临阵指挥，并号召相邻各县派出武装，响应南溪暴动。暴动前夕特委又增派委员曾君杰、袁敦厚来南溪加

强暴动的军事工作。

根据川南特委的决定，南溪行动委员会先后在帅家沟、梁家湾开会，决定4月7日全县统一暴动，任命曾君杰为暴动军事总指挥，赵之祥为副总指挥，袁敦厚负责军械管理；王南陔驻守李端阻击长宁之敌；牟丙成驻守昆卢，作取汉王山准备。调整补充了个别指挥人员，强调严守纪律，保守秘密。

暴动前夕，县团练局长洪汉宗觉察到侄子洪默深的革命活动，骗其回家，押送县城幽禁，妄图抽薪止沸，以息民变。殊不知这样反而成了暴动的导火线，沿关圣殿一带农协武装，得知指挥员洪默深被禁，怒不可遏，便于4月7日上午，在曾文昭率领下奔袭洪的老家蛮洞湾，枪杀了洪汉宗的父亲洪辉廷、儿子洪丕德，收缴了洪家全部枪支，席卷全县的农民暴动就此提前打响了。

7日晚，牟坪农民在曾君杰、赵之祥率领下，分路出击，横扫反动势力。次日进驻场上，整编队伍。10日举行庆祝农暴大会，沿街红旗招展，标语满墙，到会二千多人，听了郑则龙、曾君杰、涂长春等的演讲，斗争了土豪劣绅，无不扬眉吐气，喜气洋洋。

9日晚，外东农民武装集结队伍，夜袭仙临，次晨攻打刘家乡，后经罗龙夜渡长江，在炮房头集结待命。

10日，宋家乡共产党员、民团中队长李安廷利用反动大队长李俊辉在场口集队之机，施计将他打死，插出红旗，宣布起义。由于团丁多数已秘密入农会，因此，积极响应，听从指挥。

先后两天，全县农民纷纷响应，数千群众揭竿而起，打出“川南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扛着刀、矛、土枪，杀贪官、诛恶霸、斗豪绅、惩土劣，革命怒潮席卷全县。仙临乡团总顾贡山被

活捉后，拒不交枪，群众当即镇压；牟坪土劣杨绍清隐藏枪弹，群众怒烧其房，搜缴了长短枪五支，银元三百多元，铜元一千多个；该乡团练大队长张国安同家人持枪顽抗，当场被农民军击毙其父、叔、弟三人。

暴动震惊了敌人，反动军阀派甘、邵两营武装昼夜兼程赶来镇压。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生死搏斗展开了。

在牟坪：10日庆祝农暴大会刚好结束，即侦得敌军两营从马家、宋家直扑牟坪，农民武装有遭合击危险。总指挥部立即派赵之祥、曾君杰各率两个中队农民武装，在观音寺、灵官坡分线阻敌。下午战斗打响，激战约两小时后，敌军迂回包抄，农民军腹背受敌，伤亡多人。加之农军组织松散，被敌冲散。总指挥部被迫撤转，在途中曾君杰、胡明鑫、胡明汉、曾文昭等领导骨干被俘牺牲。

在李庄：8日，农军伏击了过路敌军，包围攻打李庄。由于敌强我弱，敌军抢占了制高点，致使后山两路受阻，攻不进镇。另外两路攻入镇后，争街夺巷，激烈拚杀。不久，敌援兵赶到，农民军虽浴血奋战，拚刺肉搏，但武器低劣，伤亡惨重。特别靠江一线，被敌分割包围，背水作战，不少同志倒在血泊之中，有的被迫投河殉难。为免过大牺牲，指挥部下令撤退。

在宋家：10日，敌军一个连进驻场上，农民军组织二千余人重重包围攻打。敌军龟缩庙内据险负隅顽抗，相持三个昼夜不克。12日拂晓，牟坪、李庄之敌赶来，里应外合夹击农民军。农民军被迫突围转至龙船寺休整。敌尾追不放，农民军决战失利，全军溃散。至此，农民起义武装，在军阀、团阀、地主武装的围剿下，经过一周鏖战，终于失败了。

这次南溪农暴，是我党领导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

的农民武装斗争。虽然，由于敌人的围剿失败了，但是，它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教育了人民群众，锻炼了干部，揭开了川南革命武装的序幕，播下了武装斗争的火种。

（中共南溪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宜宾农民暴动

1928年1月，中共川南特委在自贡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关于当前形势和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指示，通过了川南暴动计划；组织宜宾暴动，以宜宾为中心，而宜宾又以大塔、双石铺为重点。3月，宜宾白花场七八百群众举行了抗捐游行示威，反抗反动军队强行筹款，游行队伍增加到一千多人。4月，县委农民部成立了行动委员会作为抗捐斗争的指挥部，准备利用土匪杀掉大塔团总眭少林后，各场相继暴动。宜宾城内党组织以中共宜宾县委的名义，到处张贴标语，发动全县人民起来参加武装暴动。敌人慌忙派出武装军警和谍查，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城区书记李筱文，县委书记李家勋被捕牺牲。同时，敌人又派军队分东西北三路围攻白花场。由于白色恐怖加重，大塔乡土匪迟迟不动，各场农民武装士气渐弱，致使暴动未发动就被反动派镇压下去。李筱文、李家勋牺牲后，张占云接任县委书记，刚恢复的党组织喊出了“以赤色恐怖回答白色恐怖”的口号，在暴动失败后即刻发动群众烧城，未遂。又采取杀校长、烧学校等恐怖手段。由于这些不顾客观实际的冒险行动，使宜宾党团组织又遭到破坏，宜宾暴动终于失败。

（中共宜宾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周舟整理）

邻水农民暴动

1926年7月，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读书回县的中共党员唐维、游雪程、游九川等在县城举办了暑假补习学校，吸收一批进步青年参加学习，通过唯物史观、新社会史观、科学社会讲座等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从中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邻水县特支委员会。

1927年春，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邻水在中法大学的三十多名师生（大部分是党团员）经过这场血的洗礼，相继回到农村，加强农民运动，并决定以长滩、大石和九龙、石稻等地为重点，积极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团组织，在很短的时间内，长滩乡发展了农会会员一千多人，石稻、石龙、石合交界地带发展会员二千多人。1928年春，全县党团员发展到二百多人，大区建立了区委，主要乡镇建立了支部，农会组织遍布全县，会员达万人以上。李家寨、凤泉寨、石庙等地还组织了儿童团。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先后派鲍叔（陈静思）、代维贞（危石顽）、霍鲁于（郝谦）等来邻水指导农运，准备暴动。1928年春省委决定举行春荒暴动，以邻水为暴动点。县委根据省委“以赤色恐怖答复白色恐怖”的指示，决定进行农民暴动，并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组织武装：一是通过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掌握民

团。1927年秋，临时省委派黄埔学生任纯儒回县夺取了九龙乡联防大队长职务。石稻区委书记万钧培养发展了该乡联防大队长万芳入党，直接掌握了这支有二十多人枪的团练武装。万芳还担任了我党特务队（又名特科队）队长，积极参加了打土豪等活动。二是建立党直接领导的农民武装。石稻乡特务队和丰禾乡农民武装队，各有十多人；兴仁乡也组织有长短枪十余支。农民武装建立以后，成为农民运动的中坚力量。三是加强民团、土匪的教育争取工作。1928年1月下旬，县委在石稻乡召开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布置年关宣传工作，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造成暴动声势。旧历除夕夜12点至天亮前，全县党团员和农会骨干一齐出动，三人一组，把事先写好的标语传单，贴到场镇、寺庙和人行要道上。第二天，人们看到到处都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土地归农民所有”等标语传单，纷纷奔走相告。

在进行了积极准备之后，邻水农暴发动了。1928年上半年，县委领导农民武装先后杀了大恶霸王昭烈和卢孟元。王昭烈是丰禾乡的大团阀，曾任伪团总，一贯鱼肉乡里，蹂躏女性，群众早已切齿痛恨。县委研究从王昭烈头上开刀，可以教育鼓舞群众，震慑土豪劣绅，夺取武器。于是，派刘之廷（裁缝，王昭烈的外侄）利用缝衣服的机会，到王家联系被王昭烈估占为妾的杨琴英里应外合。4月8日（农历润2月8月）任纯儒、龚绍波带领十名武装队员，手持马枪、大刀，深夜潜入王家大院。杨琴英把家里的狗关起来，打开后门，武装队员冲进王昭烈卧室，正值王昭烈同其大老婆睡在床上抽烟，武装队员举刀杀死了王昭烈，提取七子连枪一支和银钱若干。卢孟元是石稻乡团总，长期为非作恶，监视我地下党活动，处处与农会作对，曾因抓获我杀王昭烈

之武装队员冯金山，受伪县知事公署嘉奖。8月9日（农历6月24日）万芳带领特务队员夜袭石稻团税局，枪杀了卢孟元，缴获手枪一支，大洋一千一百七十元。

随后，敌人对农民运动进行镇压。杨琴英在王昭烈被杀后转移到王家场，于5月2日（农历3月13日）被伪团总游伟廷侦捕，绑送县衙钉“活门神”活活折腾而死。陈峻山、龚绍波、任纯儒等被迫暂时转移。万芳、冯金山、甘海棠等先后被捕牺牲。邻水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造成的乡村革命状态，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启发农民的革命斗争意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共邻水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田德州整理）

武隆桐梓山游击队

1928年，在深山峡谷的武隆县桐梓山冉家沟，出现了一支农民武装队伍，即桐梓山游击队。领导人是陈子光、陈子清。

武隆桐梓山冉家沟在外读书的陈子光、陈子清兄弟二人受到革命影响，思想较为进步。1927年八七会议后，他们与一姓董的军人和青荣光（连长）及一姓田的排长带着手枪、马枪，一同回到冉家沟，分别串联房族、亲戚朋友及同学等，准备建立革命武装。他们在涪陵县府弄到“委任状”，陈子光被任命为桐梓区团队队长，陈子清为区队附。他们利用合法地位，积极发动群众，1928年春，在桐梓山天台寺下殿楼上，召开一百多人的大会，宣布成立了桐梓山区队部，由区长刘理章管政务，“二陈”管军事。确定对五十多名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请了武宗培（合川人）当教练长。每天除进行军事训练外，还下乡组织粮草。一段时期后，区长刘理章感到失去了军权，提出要收回原区署的枪支弹药，解散队伍的主张。“二陈”坚持不给枪，队伍不散。从此更引起了刘的怀疑和不满，诬称“二陈”有野心，要争权夺利，甚至说“二陈”是共产党，公开与“二陈”作对。“二陈”只得把队伍拖到能攻能守的甘厢洞，不久又分一部分人住在冉家沟的马树坳文庙里。这时，整个队伍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正式定名为“桐梓山游击队”。下分三个中队，命蒋顺安为第一中队队长，侯越顺为第二中队队长，张海堂为第三中队队长。游击队农闲搞军

事训练，农忙回家搞生产。为取得有关方面的支持和扩展武装实力，“二陈”一方面与烂坝子神兵首领秦兴隆、左传合，白果铺的士绅陈世胜，彭水高谷的蒋岳森等部联系求得支持；一方面筹集武器，派人到涪陵、丰都等地购买枪支弹药，以武装队伍、扩大实力。此时游击队已发展到两百多人。

桐梓山游击队为打击区长刘理章及所属民团，达到抗捐、抗粮拯救群众的目的，曾几次与民团交战，打得刘理章日夜不安，到处躲藏。1928年冬腊月，游击队出兵围攻了刘理章团队驻地，当场打死保长李恒山，民团四处逃窜，刘理章躲藏于庙内，从后门爬出逃跑。这一仗震动很大，大长了游击队士气，灭了敌人的威风。

1929年春，游击队得知刘理章勾结火炉的清乡大队长杨畅时来报复的消息。“二陈”即联络烂坝子神兵首领秦兴隆、左传合，白果铺陈世胜、陈子仿，高谷的蒋岳森等武装，首先攻打火炉围击杨部，当场打死六人，打伤数人，士兵逃散，杨畅时带着残兵从万天宫庙内逃出，“二陈”率兵追赶至中咀方罢。

1929年的5、6月间，杨畅时不甘失败，重整队伍，再举进攻“二陈”，妄图消灭游击队。“二陈”得知情报，遂将游击队兵力分别埋伏在土地乡的水洞坡、牛耳埡口一带。当杨畅时带着队伍行至水洞坡时，伏兵骤起，突然袭击，杨见中计，即令撤退，后路已被陈世胜的兵力堵截。杨见势危急，夺路经龙坝方向逃窜。这一仗从上午打到傍晚，打死杨部连长廖九渝和士兵一人，打伤五人。

1929年7月，杨畅时在中咀组织一百多人的队伍，进行军事训练，企图再举进攻。“二陈”又率领游击队直赴中咀进行夜间袭击，弄得杨畅时一败涂地，独自逃跑。当晚“二陈”带领队伍

即返桐梓山，在途经沧沟时，枪杀了一惯作恶、欺压百姓的恶霸地主盛九章、盛九成，夺得长短枪二十多支，将粮食、衣物分给了当地老百姓和部分缺衣短裤的战士。群众拍手称快，游击队凯旋归（桐梓）山。

1929年冬，陈子光、陈子清率领游击队与秦兴隆、左传合部神兵，在丰都的厢坝一带，打击恶霸地主杨怀雍、李介顶、张玉珠等，缴获枪支弹药和骡马，没收了粮食等物分给穷人。

1930年2月，“二陈”再次带领游击队，攻打桐梓山的刘理章，打死刘的秘书江双清，缴获枪四支。刘隐藏于儿子家，瞒过了游击队的搜查，保存了性命。

1930年4月，“二陈”率领游击队部分兵力，前往烂坝子秦兴隆、左传合处联络交往，路过核桃坝的石庙，突被杨畅时、刘理章的民团截击。由于力量悬殊，又无准备，游击队失利，青荣光受重伤，被迫退回冉家沟。

1930年8月初，刘理章搬来涪陵驻军两个营，伙同杨畅时部进攻甘厢寨（游击队住处），激战两小时，游击队打死敌军王排长、赵排长二人。但因势力薄，黄××被俘，当即被杨畅时枪杀于关口梁子。“二陈”见情况危急，冲杀一条血路，突围至冉家沟寨祠洞。敌军紧追不舍，围困寨祠洞一个多月。强迫百姓砍来柴草堆在寨门口，点火烧毁寨门口的营房，掀石头封洞口，企图困死游击队于寨内。陈子清在一个黑夜，乘敌不备，带领着几名战士突围出来，联络了烂坝子神兵首领秦兴隆、左传合，高谷的蒋岳森等领兵来援，营救了游击队。

桐梓山游击队的活动，牵制了地方民团武装和部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这对四川二路红军游击队在丰都、武隆、彭水等边区开展“打富济贫”，建立“农协会”和“苏维埃政府”等，起到了一

定的配合作用。同时，游击队还为红军护理伤员。1930年6月1日，二路红军游击队曾派通信员熊盛业赴冉家沟寨祠洞与桐梓山游击队联络。6月20日，二路红军游击队向北转移时，留下十六名伤员和一名姓刘的医生，托请桐梓山游击队保护治疗。游击队派专人精心护养一月多时间，对二路红军是一个很大的支援。

桐梓山游击队数次打击民团，战败官兵，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震动。1930年9月17日，《大中华日报》登载说：“共匪陈子光、陈雅泉，分居涪陵冉家沟寨祠洞、甘厢洞、六板槽一带，与丰都神兵队长汪长清余党佐传合勾结，狼狈为奸。要求驻军廖、杨（刘湘部驻涪旅长廖海涛、杨国其——编者注）两部队派兵镇慑，以免临时无措”。1930年9月25日，该报又载称：

“桐梓乡共匪陈子光有众六七百人，每日夜间四方散发传单、反动标语，煽惑农民。并与丰都共匪汪长清余党勾结捣乱，里应外合，大举暴动，与清乡军为难，此匪不除，内患实大……”。1931年10月，刘理章为消灭游击队，嚎叫：“那个能够杀掉陈家兄弟一个，赏银元一千元，杀掉两个赏银元两千元”。他暗地收买了陈的部下戴汉清、杨顺成暗杀陈子光、陈子清。策划由戴、杨先去给二陈通消息，假说刘理章组织了大批队伍，不日要来围攻寨祠洞。唆使陈往厢坝方向转移，途中伺机杀掉“二陈”。不几天刘理章组织民团千多人，从土地坳出发，向冉家沟进军。当时陈子光、陈子清感到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兼之以前被围困的教训，带着二十多人提前向厢坝转移。行至南天门的三墩，时已天黑，找了一家民房住下。“二陈”未曾料到有内奸，睡至半夜时，被戴汉清、杨顺成用手枪打死于床上。戴、杨同时开枪打伤张海堂，立即逃窜。游击队其他战士逃到蒋岳森处，蒋得知“二陈”死因，不久即捕获两个内奸，立即枪决。“二陈”牺牲后，

部队群龙失首，不得已而解散。

(中共武隆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肖永辅、雷鸿鹄整理)

涪陵天宝寺农民暴动

中共四川省委为了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1928年，省委先后派皮斌、钟善辅等一批干部来涪陵加强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

1928年1月，皮斌调来涪陵后，县委安排他到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新盛镇（新妙）以小学教员为掩护职业。他同在校任教的团员郑益阳、陈竹筠和夏鹤松组成共青团新盛镇区团委，皮任书记。当时团的主要任务是在农村宣传抗捐抗税、减租减息，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武装斗争。

早在大革命时期，新盛镇在共产党员李蔚如的领导下，组织建立了“四镇乡”农民自卫军，其中三合场的田致远、大顺乡的杨昌国等领导的农军，是农民自卫军的骨干力量。1927年8月，李蔚如牺牲了，但他所领导的各乡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仍保存完好，农民自卫军武装力量没有遭到损失。广大农民群众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抗丁抗粮、抗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反对军阀的斗争。基于上述情况和条件，党团组织决定举行天宝寺暴动，还决定参加天宝寺暴动的人员于5月底集中，组建为“平民革命军”。其人员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三合场的田致远、田良才兄弟领导的民团队伍，这部分人员是主力，约二三百人，基本上是农民协会的会员，组织纪律性较好，有相当数量的武器。二是蔡德方率领的“绿林”队伍。这部分人虽然人数不多，

有破坏性，但作战能力强，对暴动持坚决态度。三是大顺乡的农民自卫军，这支队伍人数较多，基本上是李蔚如当年领导的民团成员，有一定觉悟，积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但李蔚如牺牲后，农民武装的权力被曾支持和赞助过革命，以后逐步走向反面的陈禹锡兄弟篡夺了。新盛区党团组织为争取这支武装力量参加暴动，仍委陈禹锡为大顺乡武装大队长。

县委对农暴工作十分重视，派出了由罗星樵、任锦时等组成的五人小组，赴新盛镇负责指挥天宝寺暴动的军事工作。五人小组成员都是黄埔军校的学员，具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实践经验，皮斌、郑益阳等负责天宝寺暴动的联络工作。

1928年春末夏初，驻涪陵国民党军阀郭汝栋同杨森在万县激战，郭汝栋的大部兵力已调往前线，涪陵城大本营十分空虚，由营长傅炳勋（共产党员）率领的一个营兵力守城。天宝寺暴动的计划是，暴动成功后，农民自卫军即与傅炳勋营里应外合，迅速占领涪陵城，然后取道石柱、黔江，把队伍开往湖北石首、公安，与贺龙领导的军队会合。

为了配合天宝寺暴动，各乡农民协会发动群众积极支援，他们响亮地提出“减租减息”、“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等口号。党团组织秘密地在学校发动学生组织进步青年成立宣传队，轮流到附近大顺、明家、三合等乡进行宣传，唱革命歌，演革命戏，揭露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发动农民起来抗捐抗粮，鼓励农民参加暴动。团区委还组织力量截夺了新妙税务所的银元八千多元。

1928年插秧时节，酝酿已久的农民武装暴动，终于发动了。田致远、田良才等在三合场带领农军，首先捕了恶霸地主戴松云、戴富州。蔡德方带人放火烧了戴富州的老巢。当天他们集

合农军三百多人，打着旗帜，把队伍开到明家至大顺之间的军事要塞——天宝寺。当天晚上，在大顺乡搞农运的杨昌国、戴北星等闻讯赶来天宝寺，田致远、皮斌等要杨昌国立刻回大顺去，转告陈禹锡，迅速率队响应。同时，还派宣传队和杨一道去大顺以扩大农军的影响。第二天一早，杨昌国、戴北星和宣传队员们到了大顺场，杨昌国向陈禹锡转达了皮斌对他的委任和率队响应暴动的指示。陈禹锡表示接受大队长的委任，但按兵不动。

田致远、田良才等抓了恶霸地主戴松云、戴富州等到天宝寺，戴家的人跑到新盛镇向恶霸、反动团阀头子陈雨耕报告，陈雨耕立即派人抓了田致远的父亲田沛霖。

由于敌人的镇压、陈禹锡的破坏及党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天宝寺农民暴动不久便失败了。新盛镇小学的几个教师均撤出学校。郑益阳回到了金银场，继续发动群众，组织民团，接受新的任务。

(中共涪陵市委党史办公室提供)

川南工农革命军独立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中共四川省临委制定了暴动计划。1928年4月，南溪数千农民暴动，坚持七天，在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长宁县率农民武装参加这次斗争的袁敦厚在起义失败后，即回长宁太平乡，和王泽嘉、袁海扬等一起，继续发动群众，开展农民武装斗争。1928年6月，又集结了三十多人的队伍，拥有长短枪二十支。太平乡团总袁国珍（袁敦厚的父亲）发现后，派徐成伍率民团前来围攻。农民武装打退民团后，乘胜追击，占领了太平场。袁敦厚捣毁了父亲开的纸火商店，登台发表了义正严词的演说，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动员了一些青年参加队伍。是夜，队伍宿太平乡大塆上，正式宣布起义，定名为川南工农革命军独立团，由王泽嘉任团长，袁敦厚负责政治工作，确定了打倒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同时，珙兴支部和继后的兴珙支部，分别在珙县孝儿场和兴文建武、石碑附近，先后建立了农民武装，逐步汇入川南工农革命军的行列。

工农革命军筹建时，王泽嘉通过其五哥王学勤（曾任花滩团总）出面，向南溪县团练局长李成章、毗芦乡团总马树宣等借得枪十余支。工农革命军建立后，先后夺取了三元乡地主胡右兴、张为高和高县赵滩乡民团的枪支，用以武装自己。王泽嘉又赴江安留耕向曾任旅长的魏弼舟买得土枪十支、子弹百发。魏并赠送

王泽嘉手枪一支、子弹十发。

为了筹集经费，工农革命军侦得珙县县政府要送税银往宜宾的消息后，即在庆符县沙河驿附近森林茂密、人烟稀少的打儿窝设置了埋伏。当税银挑子全部进入埋伏圈后，工农革命军立即行动，击散保镖武装，缴获银元四挑（每挑一千二百元）、生丝三挑和一批枪弹。

1929年初，王泽嘉、郭洪发率领工农革命军袭击了珙县垣丰乡，抄了珙县最大的地主豪绅黄寿山的家，震撼了全县。这时，珙兴支部吴必鼎率领的农民武装十余人前来会合。工农革命军逐步发展壮大，人员扩充到一百多人，转战到川滇边境。

同年5月，王泽嘉、郭洪发又率工农革命军袭击了长宁碛底场，缴获了团总的枪支，没收了七户豪绅的财物。长宁团务局长陈子方得悉后，急调警察中队尾追至栏杆石进行阻击。工农革命军奋起还击，击毙了警察中队的秦德伍后，顺利转移。

1929年6月，工农革命军开赴建武，与珙县支部领导的武装会合。11日，两支队伍在清凉寺召开领导骨干会议，决定合队，由王泽嘉任团长，袁敦厚负责政治工作。队伍整缩为四个支队，由郭洪发、王学勤、刘永吉、李国钊任支队长。会议研究了新的部署，由王泽嘉、郭洪发率主力留川南创建革命根据地，李国钊、刘永吉、王学勤分别率队在云贵边境配合行动。这时，工农革命军已扩充到三百多人。

清凉寺会后，得悉兴文团防前来围攻。王泽嘉等研究决定，将队伍撤出清凉寺，在附近的斯栗坪山上隐蔽。团防冲进清凉寺时，扑了个空，误认为工农革命军已远走，官兵躺在寺内逍遥自在地抽大烟。王泽嘉派文书吴定扬率十几名战士，装扮成“神兵”，包红头帕，戴红手套，扛大红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神速地

冲进清凉寺，吓得团防官兵滚岩逃命，工农革命军缴获了枪支弹药，打了个胜仗。

工农革命军派出的两名侦察兵，被建武民团大队长张伯常杀害于东门。王泽嘉、袁敦厚闻讯即率队攻占建武，处决了张伯常的父亲张友军，烧毁其庄园（桅杆营）。长宁团务局长陈子方，会同珙县、江安、兴文、筠连等县团练局，出动团防武装围攻建武。工农革命军领导人研究决定：在西门外玉屏墩设坚固哨堡，居高临下，控制全局；由郭洪发率队阻击南门之敌；雷步云、罗云分别带队防守东、北门。战斗打响后，珙县杨冠英的贴身保镖队长单巨涛，妄图抢头功，率先攻打南门。袁敦厚发现后，将单击毙在南门外新兵营水田里。郭洪发率队打开城门乘胜追击，迫使珙县、筠连团防往曹营方向逃命。首战告捷，士气大振。此时，敌军继续围困，伺机卷土重来。工农革命军在围城七天后，半夜从东门摸出，一枪未发，胜利转移到云南长官司，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1929年11月底，王泽嘉等率工农革命军攻占了孝儿场，夺取了团防枪支三十余，捣毁了团总和豪绅的商店，砸开了团防的牢门，放出了无辜受难群众。王泽嘉在街头向群众宣传：“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打富济贫，为穷人打天下的”。经动员有三十名贫苦青年参加了工农革命军。

工农革命军撤离孝儿场，经珙县、高县、庆符的边沿地区，甩开了敌人的尾追堵截，达到了长宁铜鼓寺。铜鼓寺座落在鸡冠岭尾龙群顶峰，三面悬崖，正面陡峭，地势险要，寺内有团防三十余人驻守。12月10日夜，王泽嘉带六名战士，避开岗哨，从后山埂小路摸上，爬进后窗，缴获了敌全部枪支，占领了铜鼓寺。陈子方闻讯，连夜率邻县团防和宜宾护商队驻沙河驿何星阶连数

百人，尾追而至，把守要隘，把铜鼓寺团团围住。激战一天后，敌人砍光周围几个小山头的树木，燃起熊熊烈火，照亮四周，以防工农革命军突围。深夜，工农革命军在寺门外高悬灯笼，烧了一堆火，拴了一匹骡子，虚设疑阵，迷惑敌人；队伍则从后山门右侧的老虎石旁，用绳索坠岩而下，往神农塆，下李家沟，摸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天亮后，陈子方发现只是一座空庙，仅有一匹骡子，气得捶胸顿足。

工农革命军离开铜鼓寺，天明到达太平场，又遇团防队长徐成伍率队跟踪包围。工农革命军机智地抛出两大包物资，乡丁忙着抢东西，工农革命军趁混乱之际冲出场口，突破包围，经相岭、万岭管，转向兴文。是年冬，在兴文大石盘召开骨干会议，决定在建武整训后，进驻凌霄城（山名），建立一个新的险要根据地。整训历时五十多天，由党组织负责人袁敦厚、吴必鼎等，定期讲政治课，并进行军事操练，提高了起义军的素质。在这里，工农革命军委任张汉清为建武乡团正（相当于乡长），作为创建红色基层政权的最初尝试。

凌霄山位于兴文县西南三十里，为兴文、长宁、珙县三县交界处，海拔一千多米，孤峰崛起，三面峭壁，望之如城，仅有羊肠小径可通，一条由龙碑坝，经弯弯曲曲的四十八道拐盘旋而上老寨门；一条由山后的五斗坝口，经断颈岩木桥到新寨门。山势险要，易守难攻。

1930年2月1日，王泽嘉、袁敦厚率工农革命军一百八十多人，持枪一百四十余支，进驻凌霄城。3月，陈子方率队赴凌霄山下堵守，并密报四川省政府称：“川南边区共匪叛乱”，请求派兵围剿。4月初，省政府指令两个配有迫击炮的正规营，由师参谋长兼宜宾县长沈眉荪率领，会同珙县、长宁、江安、兴文、

筠连、叙永、古宋等县团防数千人，集结在凌霄山下，安营扎寨，遍设卡哨，围剿工农革命军。4月8日，敌军开始攻寨。工农革命军凭借天险，居高临下，沉着还击，击退敌军多次进攻。中旬，敌军组织三十多人的“敢死队”，在迫击炮和机枪大力掩护下，从五斗坝向新寨门发起猛冲。工农革命军一个班埋伏在断颈岩后，以密集火力，打死敌兵近三十人于断颈岩前，全歼“敢死队”。敌军要求停火，愿送枪弹换回尸体。

“敢死队”被歼后，敌人强迫群众依山打竹篱墙，插竹签，撒“铁脚板”（铁菱角），遍设障碍物，继续围困。同时，先后派出王汉初（王泽嘉的六哥）、袁献芹（长宁县教育局局长）上山，劝说王泽嘉、袁敦厚听从“招抚”，被严词拒绝。接着，又向工农革命军战士喊话，引诱“招抚”。战士们巍然不动，粉碎了敌人的招降阴谋。

5月初，敌人强迫群众把凌霄山后五斗坝的一个小山头垫高两丈多，以俯瞰我阵地。6月初，敌人新筑的土台上，用迫击炮猛轰我阵地，给工农革命军造成了致命的威胁。

6月7日晚，工农革命军在粮弹将告罄的情况下，分两批组织突围。先由雷步云带二十余人从猫儿鼻梁悬岩处，用土布和绑腿连接，坠岩而下。王泽嘉、袁敦厚率全体战士，经老寨门沿四十八道拐而下。天明，目标暴露，敌人跟踪追堵。工农革命军行至横店子，袁敦厚在掩护战友转移时牺牲，队伍逐渐被打散。王泽嘉在蜂桶垌大树子垮牺牲，郭洪发受伤被俘。至此，川南工农革命军的主力部分，已经损失殆尽。突围分散隐蔽的工农革命军领导人和战士，均遭当地各种反动势力的疯狂镇压和屠杀。如珙县分批杀害了吴必鼎等二十余人，长宁也杀害了二十余人。李国钊等三兄弟，被滇军杀害于云南扎西顺河场河边。

工农革命军的余部——由王学勤率领的支队，继续坚持游击战，转战川南和滇黔边境，至1932年也遭到反动派镇压而失败。

(中共宣宾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潼南兵变

刘伯承同志领导的泸顺起义失败后，原起义军的瞿联承因被二十八军师长李家钰（后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改编，迁射洪太镇驻防，扩大为第五混成旅。这支部队在起义时受损失小，党组织保存比较完整。1928年，中央派李鸣珂回四川担任省委军委书记，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各地举行武装起义。由于李鸣珂曾在瞿团任过秘书，回川后便到瞿旅工作，并将共产党员赵子文、范弘先、李载浦、李伯容等都调到该部工作。该部十团团团长刘文仕、十一团团团长秦仲文等也先后入党。地方党组织在太镇也非常活跃，由共产党员组织了左派国民党射洪县党部，组织了“赤潮社”，编了《黑幕旬刊》等，公开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军阀的黑暗。李家钰知道这里共产党的力量大，常派人到太镇来侦察党的活动。

李家钰为了严密控制这支队伍，决定将五旅从太镇调驻遂宁北坝嘉禾桥一带，后又调驻潼南双江镇。兵到双江，省委又派了张秀熟、任逖犹（锦时）等一些干部到部队工作，通过对官兵进行深入细致的启发教育，从中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力量，争取把这支部队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李家钰妄图控制这一部队，又决定整编秦、刘两个团，突然派遣排、连、营基层军官二十多人到该旅任职。6月6日晚，党组织得知李已命令对刘文仕、秦仲文领导的两个团实行武力改编，立即决定拒绝改编，举行武装起

义。李鸣珂和军委成员任逖犹急速赶到双江，具体指挥起义。当晚9点钟，起义开始了，当信号枪响后，全旅各连一齐行动。枪声，“打倒军阀瞿联承！”的口号声，从四面八方传向瞿联承的司令部。瞿立即带了便衣兵从后门逃走。李家钰派去的基层军官被起义军统统枪毙了。暴动指挥部收缴了四十多挑子弹和五挑多银元。

起义后部队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第二旅，由刘文仕、秦仲文分任正副司令。党组织成立了前敌委员会，由特支书记赵子文任前委书记。为防范军阀部队的围歼，接着便从双江将队伍拉向重庆方向，到璧山屈家沟暂住，进行整顿。司令部计划渡江到綦江，向西阳、秀山方面进军，争取与湘西的贺龙部队会合。8月，在屈家沟召开的党支部大会上，还对入党的十多个同志集体举行了入党宣誓。

在此期间，反动军阀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这支革命武装的围追堵截。二十八军的李家钰与重庆的二十一军刘湘部对起义部队进行了前后合围，刘湘以重点兵力防守长江，扼住起义军东渡去路；何光烈部则以主力封锁嘉陵江渡口。面临这种形势，部队内部意见也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硬打过长江去，而刘文仕等却主张暂时投奔刘湘部队，等待机会再举行暴动。党组织研究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目前敌我力量悬殊，前冲过不了江，后退将被李家钰堵截。为了保存部队以待时机，决定采取暂时投向刘湘的办法，并立即将在部队里已经暴露了的同志转移疏散，未暴露的同志仍留在部队继续工作。李鸣珂、赵子文、李载浦、范弘先等都撤离部队，转移到遂宁、射洪等地。由刘文仕率领部队接受军阀刘湘改编。刘湘将该部队编为警备师，何光烈任司令，刘文仕任副司令。部队移驻重庆石桥铺一带，任逖犹、官清、晏雅

如、冷绍成等仍在该部进行兵运工作。

部队移驻重庆后，刘湘即密令何光烈以邀请刘文仕到城内开会为名，暗伏手枪班于吴公岩，将刘乱枪打死。何光烈伪称土匪刺死，还假开追悼会，以掩人耳目。会后立即对队伍进行整编，秦仲文、任逖犹、晏雅如、官清等都先后撤出该部。

(中共潼南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何维藩整理)

万县兵变

1926年冬，中共重庆地委（相当于省委）派李嘉仲、雷德沛、牟炼先到万县地区开展党的工作，三四个月时间，党团组织便有了发展，并积极开展革命斗争。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李嘉仲、雷德沛、牟炼先等，从万县先后转移到其他地区。

1927年秋，新的四川省委成立后，为了加强川东重镇万县的工作，年底，派曾参加过泸顺起义的原泸州党组织负责人曾润百到万县负责党的工作。

曾润百来到万县，很快便与万县的党组织以及在军阀杨森部队中任职的党员秦正树（伯卿）取得了联系。接着又接上了从武汉派回川的党员周伯仕的组织关系（周当时在秦正树兼社长的《万州日报》作编辑）。不久，曾润百又通过秦正树，同杨森军部手枪连连长、党员雷震寰接上了组织关系。

1928年3月，省委在党中央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影响下，制订了《四川暴动行动大纲》，要搞一次“弥漫全川的‘春暴’”。省委指示曾润百，限期在万县组织暴动。曾润百便召集秦正树、周伯仕、雷震寰和任志云（李嘉仲走时指派的万县党组织负责人）等开会，传达省委的指示。

当时，军阀杨森正在他统治的万县防区内大搞“清党反共”。曾润百等在白色恐怖之中，以大无畏的气概开始了战斗。

万县暴动，主要是策动军阀杨森的部队进行兵变。雷震寰是

杨森手枪连的连长，主要依靠他来具体组织。他串连了十多个手枪连的骨干，在太白岩下的纯阳洞以结拜弟兄形式，喝雄鸡血酒盟誓，宣传打倒军阀，劳工当家等革命道理。他们纷纷表示坚决跟随雷震寰走，一切听从指挥。曾润百又指派任志云等积极组织地方力量，配合暴动。

一切准备基本就绪，曾润百等研究确定：暴动时间定于6月22日（农历5月5日端午节）。草拟了暴动部队的布告，落款是“政治委员曾润百，司令秦正树，总指挥雷震寰”。暴动成功，便正式宣布成立“川东苏维埃”。暴动的具体作法是：首先占领杨森的长江银行，接着由雷震寰出面，以“荆轲刺秦”的办法，逼杨森就范。然后，一切变动由党组织进行决策，命令杨森出面执行。

6月13日（农历4月26日）下午，即暴动前九天，曾润百、秦正树、雷震寰、周伯仕等暴动领导人，在长江岸盘盘石下边一个长茅屋召集会议，二十多个参加暴动的骨干全部到会。会上详细研究了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具体部署。会开到天黑才结束。秦正树、雷震寰等先后离开盘盘石，曾润百便到上面一间茅屋内去继续考虑暴动的有关问题。这时，负责跑交通的牟焯昌对曾润百说：“马上就要起事了！今天的会，时间太长，参加会的人是不是都靠得住？这几天风声紧，你是不是转移一下？”曾回答说：

“暴动时间迫在眉睫，我决不能走。转移的事，以后再说吧！”他催牟焯昌快回城里书院街的联络点去，怕那里有事。牟离开后，曾润百独宿草屋内，当夜他就被军阀杨森的执法队逮捕了。同时，执法队还逮捕了雷震寰。秦正树闻讯立即转移，得以脱险。第二天早上，执法队又到《万州日报》编辑部抓走了周伯仕。

曾润百、雷震寰、周伯仕等被捕，是由于雷震寰连部的文书

上士向军阀杨森密告了雷震寰等“图谋不轨”。这个文书上士曾参加了在纯阳洞的拜把结交，知道雷等准备暴动的一切情况，为了向主子讨赏，便出卖了雷震寰等人。杨森如获至宝，立即布置执法队进行周密侦察。等到曾、雷等人在盘盘石茅屋开会后，便先下毒手，将曾润百、雷震寰、周伯仕等组织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及手枪连的十多名骨干一起逮捕了。

曾润百在万县被捕后，军阀杨森知道他是有名的共产党员，便亲自主持审讯，并施加酷刑。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在敌人的监狱里，他给家里先后写了两封意思大致相同的信。信中说：“我现在处于脚镣手铐之下，受过闻所未闻的惨刑……我之死是为革命而死的，我们的革命事业将来一定会成功的，请家里的人，不要因为我之死而抱悲观。”第一封信的末尾写着：“润百写于死前数小时。”第二封信的末尾写着：“润百写于死前一时”。

曾润百宁死不屈。杨森又亲自提审雷震寰，企图要他“悔过自新”，进行反共。雷震寰掷地有声地回答：“头可断，共不可反！”军阀杨森对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曾润百、雷震寰等无可奈何，下令将他们处决。

6月16日上午，曾润百、雷震寰、周伯仕和十八个手枪连的兵士一起被绑押到离杨森军部不远的鸡公岭大黄桷树边，英勇就义。

曾润百、雷震寰、周伯仕等二十一位烈士就义后，杨森将烈士们的遗骨暴之荒野示众。未遭逮捕的同志，动员万县的慈善组织“浮尸会”出面，向军阀交涉，将烈士们的忠骨收殓，埋葬于太白岩下。

（中共万县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杜之祥整理）

涪陵罗云坝农民暴动

1926年春，共产党员钟善辅按党的指示从成都回到家乡涪陵罗云坝，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吸收李焕堂、尹覲阳、刘伏洋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罗云党支部。

1927年11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派曾君杰来涪陵担任县委书记。又派出党员李仙舟、邵平阶到罗云协助党支部开展革命活动。当地农民每年3月3日，9月9日有拜土地菩萨的习俗。罗云党支部便决定以建立“土地会”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为此，党支部要求每人发展三至五个劳苦农民为土地会骨干会员，然后由他们去发展其他农民入会，以壮大“土地会”的力量。次年2月，会员发展到二百多人。

土地会按照罗云坝地形划分成上坝（新场）、下坝（老场）、铜矿山、干龙坝等几个活动区域，确定各地负责人，分别召集会员进行活动。李焕堂、刘伏洋等几个主要负责人轮流到各地参加活动。各地会员每隔三四天开会一次，地点经常变化，会议一般夜间举行，会场周围设临时岗哨，以防意外。党支部通过这种形式向会员宣传地主为什么富，农民为什么穷的道理，要求大家组织起来同地主阶级作斗争。党支部还规定，会议内容要保密，对家里的人也不能讲。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农民的阶级觉悟有所提高。1928年初，“土地会”组织已扩大到涪陵县龙驹、焦石、山窠、烂坝子、木根铺和丰都县仓峦、谯普等乡，会员达三四百

人，掌握长短枪六十余支。

罗云坝“土地会”联合周围各乡场的农民，计划在1928年农历5月份同时举行暴动。但暴动计划不慎泄露，罗云一带的恶霸地主豪绅与团防有所提防。如刘佑卿勾结“困山王”刘范君等恶霸地主，一面急忙购买枪弹，一面亲赴丰都包峦顺庆乡搬来团防武装，准备于6月21日（农历5月4日）在罗云清乡。

罗云党支部获悉上述情况后，立即向县委报告。县委及时派了党员曹义仁，团县委委员张德荣到罗云加强暴动领导。曹、张到罗云后立即召开支部扩大会议，决定6月17日（农历4月30日）提前举行暴动，由李焕堂、罗星吉、刘伏洋等具体领导。会议还制定了纪律，不准错杀漏杀，不准报私仇，不准乱拿财物，参加战斗人员一律佩带红布条。行动信号，以牛来寺、琴台寺和尚打钟烧早香为预备信号，听到吹牛角号各点即进入战斗岗位，文昌宫三声枪响开始行动。

6月16日晚，下坝、上坝、铜矿山、干龙坝分别召开会员会议传达支部扩大会的决定，把任务落实到人，作了充分准备。6月17日，罗云逢场的凌晨，牛来寺、琴台寺大钟敲响，土地会会员们立即起床吃早餐。牛角号吹响后，会员们立即带上红色标志，手拿长矛、大刀、步枪等进入战斗岗哨。罗云坝的各交通要道，布置了秘密岗哨，把罗云新场包围了起来；并派人分别监视了恶霸地主，待文昌宫枪响即动手。下坝参加暴动的会员在罗星吉带领下，扛着镰刀斧头红旗，向新场挺进。正午时刻，文昌宫响起了三声清脆的枪声，暴动开始，尖兵队员立即动手，罗星吉带着农民武装迅速冲进罗云新场，配合场内的尖兵队员捕杀了恶霸豪绅刘范君等。这次农民暴动，共杀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刘范君、刘树槐、刘涛仙等二十多人。

暴动的当天晚上，李焕堂召集参加暴动的人员在干龙坝青杠林里开会，决定为保存实力，防止敌人“围剿”，要大家把刀枪就地藏好，人员分散，各自到外地投亲靠友暂避一时。

6月18日，仓皇出逃的团正秦少堂、刘佑卿等人跑到了龙驹乡马颈子街上，分别向邻近乡镇团防求援。白涛区长杨德铨、包峦教练长张世昌、中心区周区长、朱家咀团防冉大队长、湛普谭鲁珍等接到秦少堂的求援信后，惟恐土地会危及到他们的利益，各带领团防兵共约数百人，于6月20日分进罗云“围剿”。秦少堂等也随清乡兵回到罗云镇压人民，重建了有三十多人的罗云团防武装。各地去的团防在罗云见人就抓，见财物就抢，凡是被嫌疑的人都抓去吊打，抓到参加暴动的人就残杀。6月25日下午，秦少堂等在罗云新场猪市堡一次杀害了土地会会员十二人。土地会暴动受挫，但党团员和土地会的领导人，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转移外地。罗云团正秦少堂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撤职处分。另派刘佑卿任团正，刘不敢上任，龟缩在县城里保命，请求尹颢阳代任罗云乡团正。尹颢阳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1929年春回罗云任职，刘伏洋任团防教练长。李焕堂、罗少清等共产党员也先后回到了罗云。尹颢阳、钟方仪分别担任罗云和干龙党支部书记。从此，罗云地方的领导权又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党组织以维持地方治安名义办团练，向地方派款购买枪弹，组织青年进行军事训练，为后来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在罗云建立创造了条件。

（中共涪陵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余洪顺整理）

绵竹农民暴动

1928年7月4日（农历戊辰年五月十七日），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中共绵竹县委组织和发动了农民武装暴动。

1927年，共青团员张治等在假期由成都返绵竹，在省委派来的李晏蟠、刘仁俊等的帮助下，将绵竹一批符合党员条件的团员转为党员，随即经省委批准成立了中共绵竹支部。1927年下半年，省委指派周壁澄来绵竹建立了直属省委领导的中共绵竹特支，并积极发展组织。1928年全县有党员一百四十余人，城乡建立了二十二个党支部和东南西北四个区委。在党的领导之下，先后建立了“怒潮分社”、“新生民导社”、“赤色工会”、“农民协会”和“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

国民党（左派）县党部是共产党员王干青任书记长，相继在县内建立了国民党区分部三十九个。中共特支联合国民党左派，以公开合法的名义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反动军阀对绵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人民进行疯狂镇压，党领导人民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1928年4月，省委为了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派黎冠英到绵竹建立县委，积极组织农民暴动。县委制定了绵竹暴动大纲，整顿了党的组织，组成行动委员会，主任黎冠英，委员王干青、李晏蟠、周壁澄、丁毅、骆显光（即骆是愚）等。同时省委又增派范东浦、贺宇生等十多人，携带手枪十多支来绵竹参加暴

动。行动委员会下设政治、军事、财务三部，黎冠英负责政治，史明理负责财务，范东浦负责军事并任总指挥，王干青、张民宽任军事副总指挥，以路（区）成立指挥部。

在组织暴动力量时，王干青到广济通过国民党左派人士王鹤斋同民团首领赵祝三会晤，争取他参加暴动。赵同意暴动时借部分枪支，王鹤斋尽力凑了二十余人、枪，听候暴动指挥。王干青又联络向晋侯、胡光彦支持农民暴动，以团正地位号召团防武装参加暴动。

王干青还通过张民宽（原是北路民团中队长）争取其部下谭尊五（任汉旺团练队长）支持农民暴动。

行动委员会组织了“怒潮分社”“新生民导社”的群众作为暴动主力，有武装人员三百多；又联络什邡、彭县、安县、罗江一带的“哥老会”及红灯教民参加暴动（后未实现），并组织城乡“赤色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儿童团”等组织的队伍五六百人参加暴动。

同时，县委又在南郊白衣庵内举办特别训练班，培训暴动骨干三四十人，授以军事知识及使用武器常识。经过紧张准备，定于7月4日（农历五月十七日）举行暴动，攻占绵竹县城，准备建立川西北苏维埃政权。

7月2日（农历五月十五日）绵竹逢场，行动委员会由骆显光、李晏蟠领导农民群众数百人，上街举行请愿示威。因当年天旱，田土龟裂，参加示威者均手执“干秧苗”或“干玉米苗”，集队经东河坝街、北河坝街、大北街、小北街、东街、大西街进入县衙，向国民党县政府请愿示威。农民要求减地租及青苗捐，城市商民住户要求到期开彩票等，并向群众宣传抗粮、抗捐、抗税。经过激烈斗争，县长被迫答应群众提出的减免捐税的正义要求，

取得了“三抗”斗争的初步胜利。示威请愿后，县委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健全县委、区委人选，讨论了暴动行动大纲和中心口号，各区（路）成立暴动指挥部，决定3日（农历五月十六日）夜举行暴动。各区（路）由区（路）委直接领导指挥行动，城内由丁毅、钟声清等组织暴动力量，城乡里应外合，预计次日拂晓攻下县城。

农民暴动分东北和西南两路进行。西南路由贺宇生、张治、王干青指挥。东北路由张民宽、范东浦、黎冠英、李晏蟠、史明理指挥，向晋侯为东路队长，胡光彦为西路队长，刘复高为南路队长。城西在蚕桑局，城东在三座坟纵火，作为暴动信号。

王干青、张治按计划到土门与胡光彦、刘温如会合，率队二百余人，枪五十余支直奔县城。途经土门乡邓家林税卡，被驻该处税收稽查员熊某阻拦盘问，暴动队伍当即夺取税卡枪支，并将熊某击毙，迅速赶到县城西外诸葛庙，按预定暴动计划焚烧蚕桑局（即地藏庵）房屋数间，霎时火光冲天。敌军曾启戎部早已设伏，我暴动队伍遭到疯狂袭击，被迫退至西外红刺藤，拟与东北路会师。东北路暴动队伍约三百余人，枪六十多支，首先在兴隆乡解除了附近哨卡武装，夺枪十余支，并击毙团练员王英等三人。张民宽、范东浦、李晏蟠率领暴动队伍赶至北门外沈家牌坊时，也遭到潜伏于华严寺、广化院的敌军疯狂伏击。由于东北路和西南路暴动队伍失掉联络，黎冠英、张民宽、李晏蟠等只好率队沿马尾河、老鹅林经东林寺向汉旺方向撤退。

暴动队伍撤至老鹅林，黎冠英召集了全体同志的会议，讲了此次暴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下一步整顿组织，准备进山开展游击活动的任务。赵利群等人从马尾撤退到遵道、城关等地作联络工作。黎冠英、张民宽、李晏蟠退至汉旺后，原来假意支持暴动

的谭尊五已得驻军“必须截击北退党徒，就地处死”的电令，假借护送三人转移暂避，将他们诱向马尾方向急走。黎冠英等三人于途中被杀害于大酸枣树下。东北路暴动队伍因失去领导，随即解散。

王于青、张治率西路暴动队伍在红刺藤一直坚持到拂晓，因孤军无援，无法进攻县城。又恐天亮难以掩护，只得由皇图寺经瓦庙子退回广济乡王家大院子。由于暴动队伍处境险恶，进退危难，最后只好遣散。贺宇生、张治、史伯康回到成都，王于青经什邡、广汉去成都、双流等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当城外举行暴动时，城内的丁毅、钟声清等人领导“怒潮分社”、“新生民导社”、工会、学生联合会的大批群众在东郊观音堂集会，到县中校、南河坝一带待命。这些赤手空拳的群众，在南河坝、县中校附近呐喊许久，只见城郊火光冲天，枪声密集，随即越来越远。天色渐亮时，群众各自哄散。丁毅等人由石滚河、天河沟去到张民宽家中，方知谭已将张、黎、李三人杀害，悲愤不已，立即寻路经广平寺去三官庙再到土门。当时，赵祝三正在西路一带搜捕共产党人。他们又由三溪寺翻山经朱家桥到什邡高桥，会见共产党员李刚后，转到新莹华山躲避了半月，才绕道彭县再抵成都。他们在成都参加了省委召开的绵竹暴动失败的总结会。会后，钟声清、向祁嘉回绵竹恢复工作。

7月5日，绵竹全城关门闭户，实行武装戒严，城乡遍布哨卡进行“清乡”，反动军阀曾启戎、王一，团防局大队长、公安局长徐子光，恶霸匪首谭尊五、赵祝三，率队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残杀革命人民。这次暴动中殉难者七人。

(中共绵竹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武隆火炉铺农民暴动

1928年2月，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在重庆召开时，决定在全省发动武装暴动。上川东以涪陵为中心进行武装暴动，由省委委员刘成辉负责。3月，刘成辉来涪陵任县委书记，兼丰（都）、涪（陵）、长（寿）、垫（江）特派员。县委研究决定，在罗云坝、天宝寺、金银场、火炉铺（当时属涪陵县福来乡）等地组织农民武装暴动。

为了领导好各地农民武装暴动，县委先后派出一批同志分赴各地加强组织领导。火炉铺派共产党员邵平阶，后又派外围组织的夏殿宇协助工作。

邵平阶、夏殿宇到万峰后，开展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参加农民协会的有邵益阳、邵征先等三十余人。农民协会组织起来后，准备搞武器，建立农民起义军。

4月，涪陵县委根据杨森、郭汝栋即将发生下川东之战的形势，决定在涪陵东西南北各地发动武装起义，趁机攻占涪陵，建立游击根据地。县委又派县农民协会秘书长、共产党员李仙舟来火炉铺加强组织领导。

李仙舟到火炉铺后，首先，通过封建袍哥的关系，借了当地绅粮罗正兴十多支枪。又利用了土匪头子杨畅时与区长张明堪的矛盾，争取杨共同打张明堪。李仙舟将这一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同意后，决定于7月4日（旧历5月17日）夜举行暴

动。计划分兵两路：一路由李仙舟、邵平阶率领农民协会会员三十余人，杀掉来万峰收款的区队长张涛光；一路由杨畅时率领他的部队一百余人，到火炉铺街上，杀掉区长张明堪。然后两路兵力，连夜集中肖家堡成立农民起义军，配合各地武装暴动，攻占涪陵。

7月4日夜，李仙舟、邵平阶带领农民协会会员三十余人，直赴天子坟，活捉和当场枪毙了区队长张涛光和两个区丁，缴获短枪一支、长枪两支，激发了农协会会员武装暴动的积极性。另一路，由杨畅时带一百多人，直赴火炉街上，冲进区府，缴获枪支三十多支。区长张明堪一听到枪声，就从后门逃跑了。活捉了张明堪的父亲张汝林和他的妻子张陈氏。暴动后，两路兵力，按原计划连夜集中到肖家堡，暴动取得初胜。

第二天，李仙舟召集邵平阶、杨畅时、邵楚侯开会，研究三个问题：一是交换暴动情况；二是研究对张明堪的对策；三是整编队伍，统一发枪，成立农民起义军，打富济贫、开仓分粮，准备攻打涪陵。

会议分析了张明堪的情况，认为他有可能带兵来围剿，或是派人来谈判。研究的对策是：带兵来围剿，我们就消灭他；派人来谈判，我们就提出以下条件：第一，不干涉农民起义军的活动；第二，停止对火炉、万峰人民追粮逼款；第三，赔偿损失五百元（银元）。答应上述条件，就释放张汝林和张陈氏。

杨畅时一听要统一整编成立农民起义军，就不干了。摸出手枪，要打邵平阶。李、邵立即离去，杨畅时追出门外，连发几枪未打中。李仙舟在岩洞里住宿一夜，第二天返回涪陵。火炉铺农民暴动失败，胜利果实便被杨畅时独吞了。

（中共武隆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射洪农民暴动

射洪是四川革命运动开展较早的县。1926年，在国民党川军五师二十四团中的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建立了射洪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太镇特支。1927年，新任太镇特支书记陈云庵在太镇开设“四海春”酒店，作为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同年底，张绵祜接任特支书记，配合川军中的地下党组织，主办了《射洪周报》和《黑幕》杂志，宣传革命，揭露敌人。同时，太镇特支积极在太镇、金华镇和郊区农民、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赤色外围群众组织。太镇特支依靠地下党员，同国民党左派合作，运用外围组织和进步报刊，组织业余剧团，向工人、农民传播革命思想，鼓吹反暴政，抗捐税，打土豪，争民主，争自由，喊出了“兵学农工商联合起来”等革命口号。这些革命宣传，为1928年射洪大规模农暴打下了有力的思想基础。

从1926年起，射洪连续三年大旱，军阀官吏毫不体恤民情，横征暴敛，有增无减。射洪县知事古之彦，更与军阀豪绅串通一气，趁火打劫，搜刮民财。广大农民束腹忍饥，怨声载道。

1928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全省暴动大纲，各地农暴、兵暴相继发生。射洪驻军地下党与太镇特支也加紧在兵士、农民和工人中进行鼓动，策动兵变、民变。是年5月，驻防射洪县太和镇的四川边防军第五混成旅在潼南双江镇举行武装起义，改名为“工农革命军”（后在重庆附近

被反动军队包围而失败)，太镇特支在金华镇、马家沟等地，发动农民、工人开展抗暴、抗捐斗争。1928年7月11日，距射洪县城三十余里的复兴乡农民，在进步人士李宾禹、贾永年、刘树勋等人的发动下，串联组织数千人，用黄荆、马桑扎成水龙，手持桔槁禾苗，肩抬“龙王”牌位，高举多条草龙，押着复兴区团总胡桢廷（古之彦的干亲家）赴县衙“打古祈雨”。行至武东乡时，又与马家沟盐工汇合，工农力量的联合，使“打古”队伍更加气势磅礴。队伍到达涪江东岸时，古之彦下令封锁渡口，但群众夺船而渡。古之彦又下令封锁城门，一盐工翻墙中弹牺牲，群众怒不可遏，勇士陈正堂等搭人梯越墙，打开城门，群众队伍怒涛般涌向县署。顿时，署内外桔苗堆积如山，锣鼓声震耳欲聋，群众高喊“打倒古县令，人民好活命”，强烈要求古之彦惩治贪官，向“龙王”牌位顶礼祈雨。古之彦拒绝，并将胡桢廷接入内衙庇护起来，以恶言威吓群众，并调驻军和县警队鸣枪弹压。但是抗暴群众越来越多，一批青壮年农民、工人冲进古之彦的县衙大堂及居住的后院，踢翻审案公桌，打碎大轿、烟具……，昔日威严的公堂一片狼藉，县令狼狈逃窜。驻军见势不妙，鸣枪威胁。愤怒的群众用拳头、木棒与驻军搏击，傍晚时分，驻军竟开枪打死赵天福等五人，打伤田泽云等十二人。但群众并未被吓倒，斗争愈演愈烈。古之彦见用武无效，便使用软法，指使能言善辩者，于城内摇唇鼓舌，“劝慰”群众离城归农。但众怒难抑，直到13日、14日，仍有成群结队、络绎不绝的群众进城示威，三四天内，讨伐古之彦，围攻县署的群众达数万人（次），声势之浩大为射洪历史上所罕见。

“打古揪胡”，县署被捣事件发生后，经中共太镇特支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秘密活动，由县城各机关法团（县党部执委会、县农

会、工会、商会、教育会等) 出面, 商讨了四条解决办法: (一) 肯定这次民变事件是古之彦、胡楨廷等贪婪敲诈所致; (二) 同意设坛祈雨; (三) 免除最近一次向民众摊派的军款; (四) 专人筹款办赈, 医治抚恤伤亡群众。决议当即向群众作了宣布。古知事见政务难以维持, 羞愧恐惧之下, 于14日午后一时, 约见驻军及机关团体负责人, 请求离职。即日晚, 古之彦卷款带着而逃。至此, 这次以农民为主体的“打古揪胡”斗争, 取得了胜利。

(中共射洪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涪陵金银乡农民暴动

1928年，“天宝寺”暴动失败后，共青团员郑益阳回到涪陵金银场家中，继续组织人员，发动群众，筹集枪械，于9月14日（农历八月一日）晚发动了金银乡农暴。

杨森在涪陵利用地方豪绅势力兴办民团，在各区成立民团大队部，以扩充地方实力。涪陵致韩乡人余测，在杨森办的政治军事学校学习时，经军事教官中共党员雷震寰介绍入党。1928年余测被杨森委为李渡三镇三乡（李渡镇、鹤游镇、大义镇；石龙乡、云集乡、致韩乡）民团大队长，大队部设在李渡镇川主庙，总计有人枪三百左右。余测接手大队后即在李渡和其他乡镇建立联队、分队，将一部分党团员安插为联队或分队的领导。郑益阳回金银场后，就被委任为金银乡联队队长，党员张体仁作联队指导员。从表面上看来，余测这支民团队伍好象是杨森的附属力量，实际上已是共产党直接控制和指挥的农民武装。

郑益阳、张体仁负责联队工作后，发动致韩、马鞍、金银等乡的青年参加民团组织。王慎德（金银石院人）、谭炳文（致韩人）、李良才（双庙人）、马仁等成为联队的骨干力量。开始，郑益阳等在金银乡一带向农民作宣传发动工作，准备举行暴动。但由于缺少武器和人员，郑益阳经请示县委书记游动斯同意，邀请曾参加过“天宝寺”暴动、现在新妙大顺、冷水一带活动的蔡德芳来金银一起行动。蔡德芳得到通知以后，先派出他领导的五

个人去金银，途经藺市时被逮捕，第二天即被杀害。一个多月以后，蔡德芳在鹤游坪，利用多种办法又搞到了六七支枪，带到了金银场参加暴动。

9月上旬，郑益阳组织暴动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便决定在9月14日举行暴动。9月14日团县委书记皮若农（即皮斌）来到金银，听了郑益阳、蔡德芳等人的汇报，才知已决定在当晚举行暴动。皮若农责备郑益阳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早请示县委？又见事情已定，也只好依了郑益阳和蔡德芳。这天下午，金银乡正赶过场。郑益阳、蔡德芳等人把将要捕杀的恶霸地主开了张名单，计划趁天黑以前，作好准备，要求参加暴动的人员，提前吃了晚饭，待命出发。

天快黑时，负责侦察的青年郑双二上场了解情况，见副乡长谢绍修和一些恶霸地主正在同仁茶馆里开会，立即报告了这一情况。晚上八九点钟，郑益阳率领暴动人员从东岳庙出发，跑步上场。负责警戒任务的队员封锁了场口，并以电筒光为联络的暗号。郑益阳等进场后，包围了同仁茶馆。这时，只有王须知还在茶馆内，当即被马仁击毙。场上枪声、呼吼声、奔跑声响成一片。约半个钟头过去，战斗结束。此次暴动除击毙王须知外，还打死了几个人，缴获了千余银元。

战斗结束后，郑益阳集合队伍迅速撤离金银场，宣布不准讲话，不许打电筒。由于暴动时枪声惊动了附近地主团阀武装，他们各在自己住地附近，向金银场方向开枪乱射。郑益阳带领参加暴动的人员，经几十里路的急行军，在深夜两点钟到达江边，渡过了长江。两个多小时后，天快亮了，皮若农等分析了形势，认为队伍不宜拖下涪陵，因城内反动军队的力量较强，难以立足，最好到重庆去找省委，较安全可靠。郑益阳执意要去涪陵，皮若

农只好同意大家暂时到涪陵，然后再去重庆。同时宣布了两条纪律：一、进城后，自己找亲戚家住下，不准互相往来，发生横的关系，以免暴露；二、每人把自己的通讯地点，用信交到县委联络点，以便同组织联系。

第二天一早，皮若农找县委书记游动斯汇报金银暴动的情况。当他们又转到西门外郑益阳的女朋友陈竹筠家找郑时，见郑益阳已被敌人捆绑着押出来了。游动斯、皮若农立即赶快离开。郑益阳被敌人逮捕以后，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不久惨死于狱中。

(中共涪陵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王应全整理)

丰都农民暴动

1927年10月下旬，省临委秘书长刘愿庵来到丰都，在县城里邓介仁家召开了党员会议，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并将丰都临时县委改为特支，由胡平治任特支书记，负责组织农暴。

丰都县崇德乡地处长江南岸的边远山区（即今崇实、栗子、茶元三个区、十六个乡），离县城一百二十余华里，地势偏僻险峻。由于反动政府横征暴敛，团阀和土豪劣绅残酷压榨，加上连年灾害，许多农民倾家破产，奋起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及时提出组织农民协会，用武力推翻反动统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财产，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贫苦农民很快接受党的主张，纷纷加入农民协会。到1928年6月，崇德乡的农协会会员已发展到近万人，在观音寺、磨刀洞、三根树（属石柱）建立了三个党支部，有党员四十多人。观庆庵小学、天竺寺小学、皮家场小学等成为党的活动据点。

崇德乡党组织派党员陈光鑫（通过其姑父熊润斋保正的关系）到县训所受训后，回崇德乡任连队副，以民团的名义，掌握了步枪一百多支和手枪三十多支。又派党员李文彬在小月坝（今五龙乡）团队中进行工作，控制了该团队的一百二十支步枪。还在回龙场野猫嵌铁厂运回毛铁一百饼，在五龙场和燃灯寺打造刀矛四百八十余把。

1928年7月，省委派朱抱清（芳淮）回丰都清理党组织，在

新城召开了党代会，成立了临时县委，由甘禹疏任书记，朱挹清任副书记兼组织。临时县委建立后，把组织农暴作为首要任务。

1928年8月，县委开会认真分析了崇德乡的形势，决定由甘禹疏负责领导暴动，朱挹清留城负责后勤及其他工作。还决定了举行暴动的时间、打击对象和行军路线等。不久，省委派来了两位同志(黄埔军校的学生)到崇德乡协助指挥军事。

9月26日，暴动队伍三千多人齐集在吉星场举行誓师大会。首先由甘禹疏宣布了县委的决定，成立农民起义军，甘禹疏任党代表，陈光鑫为总司令。接着由陈光鑫作了战斗动员，号召大家英勇杀敌。会上将各地暴动队伍统编为五个大队，十个中队，成立了一个敢死队和赤卫队，任命了各大队长、中队长和指导员。会后，暴动队伍按原定路线，向观音寺方向进发。

27日凌晨，暴动队伍到达高桥沟，包围了大土豪、团防头目冉竹堂的老巢，捉杀了恶霸冉子楨等七人，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烧毁了地契和房屋。旗开得胜，士气高涨，群众自动持刀矛来参加的很多。

28日，暴动队伍乘胜渡龙河，直上五龙场，与李文彬策动的团队二百余人枪汇合。接着，利川县“神兵”领袖李宽文带领三百多人枪，石柱三根树农协会李干之率百余人枪，长坡谭正位率一个大刀队，也先后前来会师。起义农军声势大振，在五龙场捉杀了两个土豪，开仓济贫。

10月1日，暴动队伍挺进大月坝，攻打团防局长郎瑞丰。郎事先得知消息，带着家小及团丁躲入山洞内。农军愤怒地烧毁了他的庄园及粮仓。为了占据有利地形，防止敌人反扑，司令部决定队伍开上栗子寨。

10月4日，起义军攻上栗子寨。寨上住着一千多户人家，纵

横六十余华里，有四十八道寨门。起义军上寨后，司令部驻八圣庙，其余分驻陈公坝、黄土坎、兴隆寺、土桥咀等地，以为犄角之势。并分派赤卫队严守重要寨门，将龙河沿岸渡口的木船全部撤至南岸，作好戒备。这时，三抚神主汪长青，彭水神主曾大菩萨，毛坪神兵大队长向珍五、王敬五和秦邦林、秦邦清，西寨的神兵领袖杜尤发、刘金田、廖超威等，都率领部下与起义农军汇合，寨内武装力量增至五六千人。

10月7日，县府知事杨昭与执法队长杨明带领一个团的兵力赶到大河坝，企图渡过龙河进攻栗子寨，镇压起义农军。郎瑞丰也急急赶来助阵。敌军在大河坝到廖家坝、南江渡、拔子塘等渡口，砍树扎浮桥强渡龙河，绕道上寨。

10月8日凌晨，敌军以五人一排的阵势沿着从场口到八圣庙的两里坡路，向起义军司令部驻地发起冲锋，当敌人攻进只距两丈远时，陈光鑫高喊一声“冲呀”！埋伏在各处的起义军才一跃而起，扑向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在厮杀中，砍死敌军三四百人，敌军纷纷丢下武器逃命。知事杨昭顾不得乘四人大轿，连夜逃回县城，急向驻万县二十军军长杨森告急求援。

栗子寨大战后，起义军司令部认为敌军将会卷土重来，于10月11日分兵两路转移，一路由陈光鑫带领主力从东路经毛坪，过暨龙河，绕皮家场后山到河面铺；一路由甘禹疏带领手枪队由南路上金龙寨，下毛坪绕道双碾盘到河面铺汇合。甘禹疏于晚间最后撤走，在途中和反动团防遭遇，不幸牺牲。

10月12日，杨森派旅长龙煥章率部取道石柱抵达长坡岭。13日，起义军大队长谭正位与敌兵接战，在激烈的枪战中战死。李大菩萨退至皮家场与陈光鑫汇合。后泡桐河寨被敌人偷袭攻破，起

义军决定各中队分散转移，避开敌军。

10月15日，敌军四处清乡。起义军大队长向少怀被捕，坚贞不屈，敌人将他五花大绑押至观音寺河边杀害。临死时，他毫无惧色。群众敬仰他的革命精神，于1929年10月为他建墓立碑，其墓联是：服桑梓义务；为民众牺牲。

10月20日，陈光鑫把起义农军安全转移疏散后，带着唐华清等四人最后撤出皮家场，准备去彭水联络力量。当他们正撤走时，不幸被团防头目石相典带领团丁包围，经过奋力血战，终因敌众我寡而被捕。陈光鑫本已遍体鳞伤，敌人又用铁链穿他肩胛骨，但他意志坚强，咬紧牙关，不哼一声。龙焕章又派兵将他押送万县，几经严刑拷打，陈光鑫始终坚定不屈，最后被杀害在万县河边。他就义时，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崇德乡的农民武装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宣传了党的主张，播下了革命火种。1929年春，原起义农军中队长王顺廷、李建儒等和陈光鑫的母亲一道，又组织农民一千余人，活捉并处决了石相典父子，为死难烈士报了仇。原参加崇德乡农民暴动的神兵领袖汪长青活动于丰都南岸大片地方，率领数千之众，一直打到县城对面的江边。1930年，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进入崇德乡，广大农民又一次掀起了武装革命的高潮，在回龙场、太平坝、坝周坝、核桃坝、犁地坪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中共丰都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雅安农民暴动

1926年底党就在雅安进行了有组织的活动，1927年成立了雅安特支，到1928年党员人数发展到二十人，多半是川南师范的进步学生。这年夏天，正值县政府要在农村举办平民教育，特支派人承包了这一任务，领取了经费，然后将党员分成几个小组，深入农村，在东南区和西北区分别办起了平民学校，并利用这一合法身份深夜到农村访贫问苦，从揭露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入手，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进而组织农民协会。几个月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达到数百人。

1929年1月，中共雅安特支根据省委关于加紧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精神，把特支委员和党员分别派到各地，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特支委员黄煜、何学全到南区沙坪、李坝一带；杨联升、林有鹤、杨学文等去东区合江、姚林一带；张登山等去西区紫石一带；汪永安等去北区上、中、下里一带。

这年初，正当春荒时节，雅安驻军与县政府加紧追收烟捐尾欠，激起农民反抗。南区孔坪乡农民，因平时受土豪兼团总吴绍奎的压榨，首先提出了“反烟捐”、“打倒恶霸土豪”的口号。

二月中旬，值春节之后，县政府下乡追逼烟捐的收款员，被孔坪乡农民杀死。特支及时地拟出了一个宣言，提出“反对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等口号，以油印传单的形式散发，扩大了影响。革命运动便在南区首先爆发了。

团总吴绍奎立即勾结驻军一个连对农暴实行镇压。沙坪、孔坪一带的农协会会员数百人纷纷拿起武器，在黄煜、何学全等领导下，准备迎敌。吴绍奎见农民势大，又利用在当地有影响的哥老会舵把子罗子舟向农民喊话，叫大家放下武器，回去做庄稼。在敌人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进攻下，缺乏组织训练的农民队伍就陆续自动溃散了。暴动领导人黄煜、何学全等四人在敌人搜山中被捕。东区农民武装二百余人在杨联升等领导下赶来增援时，行至雅安东郊大兴附近，与县长梁子敬率领的民团遭遇，农民武装被冲散，杨联升被捕。在敌人审讯时，黄煜、何学全、杨联升等三人均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雅安农暴遭到失败。

(中共雅安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周英哲整理)

潼南赤卫队

1928年秋，中共四川省委派江涛（当时化名汪兴武）到潼南加强军运工作。江涛对当地教民武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并争取了教民头目周世力倾向革命。经省委批准，于1929年3月正式成立了“潼南赤卫队”，周世力任队长，江涛任赤卫队党支部书记，夏益寿任团支部书记。赤卫队成立后，即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等口号来发动群众，在茶店、太平一带开展打土豪，惩恶霸，袭团防的活动，赤卫队很快发展到六七百人。

当时潼南驻军是李家钰的一个团，团长朱秉衡兼县长。他得知赤卫队活动情况后，派出营长庞泽率领一营兵力直扑太平“清剿”。赤卫队立即布置应战，江涛和周世力亲率赤卫队部分队员占据制高点，唐吉成带领一个中队埋伏在檬子垭。敌军接近龙多山制高点时，赤卫队居高临下，集中火力射击，加上唐吉成伏兵突起，敌人全军覆没，庞泽被赤卫队击毙于马老爷垭口。

赤卫队在龙多山首战获胜后，估计敌人会重新组织反扑，江涛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并转移到合川的三庙、龙凤等地。3月19日朱秉衡在李家钰的督催下，亲率一千人的队伍清剿赤卫队。当扑向龙多山时，连赤卫队的影子也未见到，气得朱秉衡下令烧了龙多山古庙。

赤卫队转移合川后，继续开展打土豪分财物的斗争，接连打

击了横行乡里的龙凤乡恶霸地主秦玉书，三庙乡大地主秦锡林，将获得的财物分给了当地农民。四乡农民奔走相告，赤卫队声威大震。不久赤卫队又返回潼南茶店、古溪一带活动。

1930年7月，省军委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和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的“左”倾盲动主义计划。拟在合川、武胜、潼南、蓬溪等地大力发动农民群众，组建游击队，联合成立长江上游特遣师，以牵制四川军阀兵力，配合进军武汉。潼南党组织立即开会作出决定，派出干部到各乡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不久省委指示取消建师计划，仍照赤卫队的形式进行游击活动。8月，由于采取全城大贴革命标语的“左”倾行动，使潼南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作为军事联络站的潼南书店被查封。

1932年3月，盘踞潼南的李家钰被刘文辉击败，退出潼南。赤卫队抓住城内暂无驻军的机会，夜晚进入城内，打开监狱救出共产党员邱茂等五人。4月，刘文辉部的楚松云团进驻潼南，由团附李松兼任县长。李松知道赤卫队的厉害，硬打不行，就暗设圈套，采取欺骗的办法，将赤卫队由东乡诱调到城关李家祠。再设“鸿门宴”，逮捕了赤卫队全体负责人；同时派兵包围李家祠赤卫队驻地。赤卫队员进行了抵抗，除当时牺牲者外，其余均被捕，分两批被敌人杀害于豆芽湾和金鸭坎。8月12日又将赤卫队的领导人江涛、周世力、唐吉成等杀害于潼南。

(中共潼南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平民革命军

1929年，川鄂地区遭受大旱，加之封建剥削，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各地饥民被迫不断起义。是年秋，忠县县委根据四川省委的指示，决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组织一支革命武装，并决定由共产党员秦伯卿组织领导。

秦伯卿，原名秦正树。1926年受四川重庆莲花池省党部的指派，到万县杨森部队工作。8月，朱德到杨森军部任党代表，秦多次向朱德反映杨森对北伐的态度。英帝国主义制造万县“九五”惨案后，秦积极参加后援会的宣传工作。1929年，秦曾同曾润百、雷震寰等一起，在杨森部队组织兵变，由于叛徒告密而失败。他秘密回到忠县石宝寨隐蔽，为了躲避敌人追捕，改名为秦伯卿。8月，根据省委继续组织武装斗争的指示，秦发动群众在石宝寨领导六七百农民，进行武装起义，打出“平民革命军”的旗帜，提出了“打富济贫”的斗争口号，活动于石柱县的临溪、王家坝、石家、黄水、鱼池、悦来、双河、西界沱，忠县石宝寨，万县武陵，湖北利川的忠路、小河等川鄂边广大地区，改造了这一带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大刀会，并与另一“神兵”武装“八德会”建立了联盟。因此“平民革命军”声势壮大，使国民党军阀及土豪劣绅大为震惊。

这年8、9两月，平民军两次攻下石柱重镇西界沱，10月又成功地袭击了万县武陵镇，打垮了这两个地方的团防武装，

没收了土劣豪绅的财物分给穷人。这三次武装斗争震动了川东，革命队伍进一步扩大。川军二十军第三师师长陈兰亭奉命派两个团进攻平民军，在西界沱后南木垭双方激战四小时，平民军予敌重创，同时自己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便主动撤出了战斗。

1930年8月，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奉省委之命，在总指挥李光华领导下，东征武汉，进抵石宝寨。秦伯卿率部加入，平民军成为红军三路游击队的一部分，秦伯卿被委任为副总指挥。

8月9日红军与追敌一个团和地方团防武装，遭遇于石柱之西乐坪，红军经激战后遭到失败。余部在“八德会”掩护下，部分回到了梁山、达县继续开展斗争。秦伯卿带着一部分旧部到西沱后山胡家大湾驻扎，采取办兄弟会、练神兵等办法聚集力量。忠县县委书记吴逸僧又指示西沱党支部帮助其筹建革命队伍。西沱支部便派熊明炳、梁国华等带上红军三路游击队遗留下来的枪支，发动四十多名青壮年参加了游击队。队伍很快又发展到四百多人，于1930年10月初，正式打出了“共产军”的旗号。

共产军成立后，忠县县委书记吴逸僧带着一批政工人员参加了部队，并兼任政委，潘元楷任参谋长，加强了部队的领导。部队下设大队、中队、小队。

由于秦伯卿领导的平民革命军在1929年两次攻打西界沱和万县的武陵镇，对敌震慑很大，因此，共产军的旗号打出后，敌人非常害怕。驻万军阀王陵基派一姓王的参谋长任石柱团务委员会督练长，坐镇西界沱。10月中旬，王团练上任后，就在西沱召集毗邻乡的团总、团正和劣绅百余人开会，策划镇压革命。共产军获悉后，也马上开会研究，决定包围并捣毁其会场，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当会议一开始，李叔昭率队冲入会场一阵乱打，熊明炳带队迅速配合。经过一场激战，共产军取得了胜利，缴枪百余

支。在这同时，政委吴逸僧连日带领共产军没收财主的钱财作部队的军饷，并开仓济贫，获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三天后王陵基派两个连清剿，共产军早已转移。

由于共产军的力量越来越强，声威越来越大，又加之这一带不少人都知道共产军的领导人秦伯卿是忠县石宝寨人，许多饥民和“土著”武装，都纷纷前来投奔。涪陵的鲁从龙、忠县复兴乡的刘安邦、刘国辉等也先后前来参加共产军。此外，共产军还派出政工人员积极开展匪运工作，教育改造了张范成（即张轩）、袁海清、万白萱带领的土著武装，与他们进行了联合。

共产军的纪律是比较严的，讲官兵生活平等，经济民主，不准拿穷人的东西，不准欺压老百姓，不准侮辱妇女，不准杀害穷人。但因队员中很多是从土匪部队改编过来的，当时，部队党的领导力量也还薄弱，改造的时间短，故仍有违纪行为发生。

1930年冬，共产军已成为一支拥有千余人枪的革命队伍。为了严密组织，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对编制作了相应的调整。将部队分为三路（每路相当一个团），每路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设三至五个小队。一路军由金克杰任司令，严觉生任政委，二路军由鲁从龙任司令，李叔昭任政委，三路军由刘安邦、刘国辉任正副司令。部队整编后，活动的地区扩大到酉阳、秀山、彭水、黔江，湖北的咸丰、来凤等川鄂边区。

军阀多次采用武装进剿都失败了，又采用招安的伎俩诱骗共产军。王陵基曾派人招降秦伯卿，许以旅长之职，遭到秦的断然拒绝。在利川活动时，湖北军阀徐源泉率兵来进剿，他与秦伯卿是留日同学，便写了封劝降信，许诺秦伯卿任师长，秦也坚决拒绝了。

由于军阀频繁围剿，1930年底，共产军根据四川省委的指

示，决定把部队开往鄂西与贺龙部队会合。在出发前，川东特委派吴霁霞来共产军视察和整顿部队。吴来后，发现共产军内一部分干部是原来的土匪头目，队员中有近半人也是过去的土匪。因此，吴霁霞和政委吴逸僧认为秦伯卿用人路线有问题，对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要进行整顿。秦伯卿对此有意见，认为用这些人，是通过党组织集体研究决定的，若把他们撤换了，就等于把二路军、三路军赶出了共产军，部队的战斗力就会削弱。因此，不同意马上整顿撤换干部。吴逸僧和吴霁霞便背着秦伯卿处决了鲁从龙，赶走了三路军。这样秦伯卿和吴逸僧就公开决裂了。1930年12月7日，吴逸僧带着李叔昭、梁国华、张东碧、熊明炳、金克杰、严觉生等一批政工干部和几十个武装人员，离开部队，回到了石宝寨，秦伯卿便带领共产军大部向鄂西挺进，去投奔贺龙红二军团。

共产军出发前，利川汪营的瞿庭带着十几名神兵来接共产军，张范成也从石家带着一部分武装来接共产军。于是，秦便汇合这几支力量，12月7日从西界沱胡家大湾向湖北进发。

共产军在行军中，为了胜利的到达目的地，一方面机智地与敌人周旋，避强打弱；一方面沿途宣传，广泛地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支持。同时不断地动员群众参军，接纳和改造一部分农民武装和土著武装，壮大自己的队伍，使部队在行军中扩充到三千多人枪。

从杨森部队哗变出来占山为王的甘占元，驻在鹤子城一带，过去秦伯卿曾多次作过他的工作，想收编他未成，而这时甘占元迫于王陵基的追剿，深恐共产军对他进行夹击，在共产军12日到达鹤子城时，便主动要求与共产军联合。秦伯卿考虑为了减少敌对势力，答应了甘占元的要求。

在共产军东进的同时，军阀王陵基派下川东“剿匪”指挥官李圭如率赵元吉、韩宗齐、包衡三个团从万县尾随追来。李派赵团进攻甘占元，韩团截围共产军，包团从南垭宜栗向利川城移动，以防共产军攻城。并令陈兰亭派出三个团在鱼龙清剿，二十一军警备队第三路司令罗启疆派马团在宜栗堵击；鄂西军阀也派杨明部队前来阻击。共产军打垮了罗启疆部队的堵击后，便巧妙的转移了。

共产军摆脱敌人的追剿后，于12月中旬到达湖北宣恩县沙道沟，这里距红二军团驻地不远了，便主动派人去鹤峰与贺龙部队联系。因当时贺龙出征，贺英接洽了他们，并派人前来谈判，达成了协议：“部队进入鹤峰必须听从红军的指挥，不准扰乱老百姓，给养由苏区政府负责安排。”12月20日共产军根据苏区政府的安排，开至鹤峰县境内的毛坝地区。12月24日，又奉命移驻鹤峰县境的五里坪，等待和红二军团会师。

1930年底，贺龙率红二军团南征，配合红一军团攻打长沙后，在回师鹤峰途中，得贺英送来情报称：“川东土著武装甘占元、覃〔秦〕伯卿、袁海清等部三千余人，两千多支枪，自称共产军，集结鹤峰附近招摇撞骗，为非作歹，妄图乘我军主力东下之机侵占鹤峰。”要求贺龙红军主力速返鹤峰。贺龙得此情报后，于12月24日返回鹤峰县的走马坪，与共产军驻地五里坪仅一山之隔，相距三十多华里。

贺龙回到走马坪后，即派独立团副团长文南甫前往五里坪与共产军谈判，提出：如川军同意收编，则仍保留甘、秦、张的地位，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二路军”，秦伯卿等同意照办。于是，贺龙派人给共产军送去了大量的粮草，还派出工作队到五里坪各处张贴标语，宣传讲演，组织学习，以提高部

队的觉悟。因甘占元的队伍驻扎在秦、张队伍之前，贺龙派人送去的慰问品及给养，都被甘占元部独吞了。后来贺龙派去五个谈判代表，谈判具体收编事宜，而甘占元竟违反原先协议，不服整编，致使谈判破裂，他还将贺龙派去的谈判代表杀害了两个。因此，贺龙立即决定对甘占元部队实行武力收编。12月28日，贺龙指挥红军完成了对甘占元部队的五路合围，29日清晨，便发起总攻。红军在攻打甘占元部时，明确提出：“只打甘占元，不打张秦部”，“只打穿灰马褂的”等口号。共产军因原先就对甘占元不满，听到这种口号，于是就趁机从后面对甘占元部进行堵截。经过几小时的战斗，甘部全部缴械，甘占元被擒。张轩和共产军的多数干部认为秦伯卿是共产党员，跟贺龙好说话，要求他到红二军团总部去替甘说情，不要马上处决，留着以观后效。红二军团总部认为秦伯卿为土匪头子说情，与敌人同流合污，是假共产党。因此决定将秦、张等人也扣押。同时命令共产军和张轩部队开至走马坪进行改编。凡愿参加红军者，留下编入红军部队，不愿当兵者，发给路费回乡，伤病人员全部送到红军医院治疗。结果，大部分共产军的战士参加了贺龙的红军部队。

由于红二军团有的领导人，坚持执行立三“左”倾路线，不顾正确的“秦伯卿是共产党员留着有用”的意见，1931年1月1日以“土匪”、“改组派”、“假共产党”的罪名，不但不加区别的处决了甘占元和张轩，同时还错误地杀害了对革命有功的秦伯卿。

（中共石柱、忠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万源固军坝起义

1927年秋，共产党员王维舟、达县籍在武汉中央军校求学的唐伯壮、张鹏翥（戴重），万源籍入黄埔军校的四期学生吴会治等，先后回到家乡进行革命活动。

万源固军坝的革命青年李家俊，1927年在王维舟的教育帮助下，于10月参加了共产党，并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厚坪、固军等地与吴会治、唐伯壮、张鹏翥等并肩战斗。不久，下川东之战发生，杨森二十军政治军官学校毕业曾担任下级军官的徐允仕（寿泉）、胡洪疆等也回乡在井溪、旧院坝等地积极开展革命斗争。以固军坝为中心的这一地区，多是千米以上的高山，地势险要，沟深林茂，河谷纵横，反动统治也较为薄弱。团防武装多与李家俊、徐允仕、胡洪疆等有联系，吴会治本人就是民团队长之一。加上这些地方党的影响深入人心，1926年开江、达县等地，即有农会、工会和商会等组织，群众中蕴藏了深厚的革命潜力。这是开展革命活动的好地方。

1928年王维舟、李家俊决定在万源固军坝发动武装起义，提出了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军阀团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主张，用传单等形式，公开揭露军阀刘存厚的滔天罪行。还提出宣汉、达县、城口、万源四县联合一起反抗，共享太平的主张。同时，大力发动和组织群众，很快发展了一批农会会员，并成立了三个分会，为起义进行准备。1929年春，经研究决定由李家俊为

起义总指挥，雷玉书为副指挥，唐伯壮为政治委员，全面领导起义工作。

1929年4月27日，唐伯壮、雷玉书等在清溪一带聚集宣汉、达县、大竹等地来的革命骨干八十多人，分两路进入起义地区——龙潭河、井溪一带，与当地发动起来的群众会合。5月7日，李家俊等即派人在干坝子截获收款委员张全五，将其所携税款四百块大洋没收。刘存厚驻万源的川陕边防军第三团长刘志超闻讯，即派兵一连，于5月11日赶赴白羊地区查缉清乡。李家俊等得悉，即调动各地农军于5月12日深夜从井溪、白羊、固军等地分三路将白羊包围，敌人猝不及防，人地生疏，战斗不到一小时，即溃败。起义军首战告捷，歼敌一连，缴枪五十七支，抓俘虏三十余人，连长卓群仅以身免。

白羊一仗，我方也有损失，副指挥雷玉书受重伤，于5月18日牺牲。两月后，党代表唐伯壮在达县黄都场被刘存厚军俘获，9月下旬被杀害于达县监狱。

白羊一役，敌损兵折将，大为惊恐，急电刘存厚请求援兵。刘存厚立即调渠县廖雨辰团长代理第三路司令，统领刘志超等三团人马，星夜赶到万源。廖一面派兵向固军、白羊、井溪等地，沿路奸掠烧杀；一面又亲自到白沙召开会议，采取“刑乱用重，剿抚兼施”的反动策略，镇压起义。这时李家俊等将起义军组成“城万红军”，由吴会治、徐允仕、胡洪疆等分任支队长和参谋长，自己兼任总指挥。并采取以下措施：

(1) 以设立“佛堂”为掩护建立农会。通过农会，教育组织青年农民参军参战，扩充兵员，组织农军对付敌人。

(2) 寓兵于农，加紧训练。白天参加生产，晚上参加训练，平时生产，战时作战。军事干部平时则分头深入农村以发动

群众，战时则集中农军以对付敌人。

(3) 采取灵活机动的“飘忽”战术和夜袭、奔袭手段，把深入敌后作战与诱敌深入作战结合起来。并充分运用地形地物和熟悉地理环境等有利条件，打击敌人。

(4) 争取开明士绅和团局团丁参加抗税抗捐和反刘(存厚)反廖(雨辰)斗争，参加农民起义。至少要与农军和平相处，以支援打击刘、廖等军阀官僚。

在廖雨辰进攻期间，李家俊等指挥红军有计划、有步骤地打了几仗。主要有：

五爪埡战斗。1929年8月7日，廖雨辰亲自到白羊前线督阵指挥，到处清乡，并下令向井溪坝进军。廖军一个营从白羊行至五爪埡山坳时，忽然四面山头数声炮响，接着李家俊、徐允仕、胡洪疆等早已埋伏等候的三支人马，四面包围上来，大败廖军。从此廖雨辰再也不敢向井溪坝进攻了。

奇袭白沙河。8月14日起义军又神速进兵敌后。李家俊、徐允仕等率五十多人组成的小分队，一夜行军六十余里，来到廖雨辰驻地白沙河。敌人驻军一连，有长枪七十余支。敌值星排长魏七是起义军的地下人员。李家俊所属小分队全化装成赶场农民。中午，魏按事先商定的计划，命令军队全部架枪下河洗澡，正洗间，三声枪响，李家俊、徐允仕率起义军四面包围正在洗澡的敌人，将岸上的枪迅速运走。这一次奇袭使廖雨辰大为恐慌，不得不从前线抽兵回来，加强后方守卫。

夜战白羊庙。廖雨辰接连失利以后，采取守势，除了清乡扰民以外，不敢轻举妄动。9月18日，李家俊等又聚集农军千人，乘廖雨辰官兵疲惫、疏忽之际，深夜猛袭白羊庙，打死敌排长陈伟以下二十余人。廖即下令烧掉白羊、固军等地的民房四百余

家，然后退回万源县城。

刘存厚对起义军的第一次围剿，遂告失败。

随后，刘存厚加派驻宣汉之第二师吴占荣团从宣汉方面向万源的固军坝、井溪坝等地合围。吴以为廖雨辰胆怯，不敢深入作战，决定把团部驻扎在固军坝，然后派出两营人马，深入到远距团部四五十里外的龙潭河、井溪坝等地“进剿”。李家俊等探得消息，一面及时派出支队长胡洪疆前往重庆找省委汇报，一面对廖雨辰取守势，对吴占荣团取攻势。

第一次战斗是火烧十字溪。十字溪距固军坝八华里，吴占荣团部驻在固军坝，调黄金区长刘绍东带领民团三百余人驻守十字溪。李家俊率起义军趁吴立足未稳之际深入敌后，火烧十字溪，击溃民团，迫使吴从前线调回一个营驻守十字溪，以保后方。

1929年12月底，起义军又打响了龙潭河歼敌的战斗。龙潭河全长七十余里，两岸群峰壁立，山深林茂。入口处岩石嶙峋，人称“崩口石门”。吴占荣带领两个营进行清剿，李家俊先以小分队诱敌从石门进入龙潭河谷，吴军搜索农军达三天三夜，未发现农军主力。这时，李家俊等调动井溪、旧院等地的一千余农军，先以滚木擂石将石门卡住，埋伏在龙潭河上下的农军，一齐出击。战斗从12月27日直到28日上午，敌损失惨重，余部仓惶逃窜。吴逃回井溪坝后，四面筑起土墙深沟高垒，困守一隅。

龙潭河战斗刚刚结束，胡洪疆与省委所派文强（化名李哲生）和王国梁一起来到龙潭河，成立了军事指挥部，李家俊任总指挥，李哲生任党代表，徐允仕为参谋长。下设三个支队：吴会治为第一支队长，向城口县境发展；胡洪疆为第二支队长，向万源县境发展；戴重为第三支队长，向宣汉县境发展；王国梁为政治保卫处长，负责全军及地方的保卫工作。支队下设分队、小队，

还有“神兵”先锋队和持刀矛的技术队。三个支队共计在两千人以上，有枪八百余支。党的领导机构以李哲生为书记，李家俊为副书记，徐允仕、胡洪疆、戴重、王国梁等为委员，组成四县行动委员会。不久，王维舟在宣汉七里峡策动刘存厚士兵一个连起义，到达革命根据地，更壮大了起义队伍。到1929年底，根据地已发展到城口、宣汉、万源三县边境五个区二十多个场镇，共一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在六万以上。

1930年1月9日，起义军指挥部派出游击队连长牟炳祥带领三百余人，深入吴占荣团部所在地不远的大堰坝，骚扰敌人，旨在调敌分兵后方，减轻正面压力。但是，起义军虽在大堰坝打死了民团大队长罗明章等，吴团也未敢分兵到后方去。起义军见敌人不动，于1月15日调集一千五百余人，分五路进攻井溪坝。战斗从当天深夜打响，直到第二天下午，持续发动三次进攻，把敌人的墙堡打破数处，逼得吴占荣亲自出阵督战。因起义军兵力单薄，弹械不足，指挥上也有些失误，便于黄昏后退上四面山头。吴占荣给养困难，又害怕起义军再次进攻，当天夜里便逃回固军坝。刘存厚的第二次围剿又告失败。

1930年1月下旬，四川省委正式命名起义军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除原有支队外，军事指挥部又任命杨金城为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先锋大队大队长，傅友明为大队附，在宣万边境的数百里山岭中活动，积蓄力量，扩大游击队。同时，派出吴长才为宣汉特派员，周德盛为城口特派员，向宣汉、城口等地发展。此时，城口方面忽从开县边境流窜来杨森“垮杆”旅长侯子俊，拟与起义军“合伙”。游击军派吴会治带领一支队到城口与侯洽谈，但吴到了城口时，侯已去陕西投靠了陕军王光宗。吴赶到陕西，王光宗将吴软禁收买，并将带去的四百人枪全部改编，这给起义队

伍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一支队遭受损失后，李家俊等及时采取果断措施：第一、把一支队活动的城口等地，划给第二支队胡洪疆领导，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第二、利用刘存厚、颜德基、王光宗等在达县、万源等地互相火并的矛盾，发展起义队伍。第三、派出参谋长徐允仕到城口、宣汉、万源、开县四县边境，改造、招编了谭春廷、白长益、王举安等几支人马共二百余人。第四、在军事上积极配合王维舟、李光华等在梁平、开江等地的武装斗争，主动向城口、开县、宣汉等地游击。

1930年1月28日，由吴长才等带领红军三百余人，深入宣汉五十华里，攻打敌区署所在地的樊吟店。2月13日游击军又深入敌后五十华里袭击虾趴口。

此时，刘存厚派遣宣汉吴占荣团一个营进驻十字溪和翁松坪，又派黄金区区长刘绍东和大队长丁宗义等带领宣汉清溪、普光、马家、土主、厂溪、黄金等十多个团防大队数百人据守官渡场。采取“以民治民”的毒辣手段，企图分化瓦解起义队伍。李家俊根据情况，决心扫除这支反动武装。2月28日，派王国梁、庞孟昭等率领农民武装三百余人分两路进攻官渡。一路到官渡背后山上的大梁埋伏，一路到半边街，夜袭厂溪团队。当王国梁等夜袭成功后，山上的游击军一齐出动，猛扑下山，敌人狼狈溃逃。游击军又连续打退了敌人“敢死队”的数次反扑，直到次日才胜利撤退。3月30日，游击军又绕道官渡后山，深入敌后火烧厂溪。

最足以震慑敌人的是游击军队伍在城口方面的活动。1930年3月3日《新蜀报》刊载了游击军攻下城口县城的情况：“李家俊是次率领之农民，俱受过相当军事训练，并有共党中坚分子从中鼓励领导，其战斗力强。加以神兵数百人在前线冲锋，其势尤不

可当。竟于昨日（3月3日）神兵先行爬梯进城，农民继之，将城口刘耀卿团全部缴械。并将县知事击毙，各局卡被烧光。李家俊入城后，发布告示，宣布没收土地，烧毁契卷等共产政策，自称红军总指挥。对于各乡之土豪劣绅，则多由各乡农民协会从权处理，其罪重者处以死刑。已被处死的豪绅达十余人，因此，各地农协会员，日益增多，势力日益扩充，乡村政权已被彼等所掌握。由此可见起义军声势之大。”

1930年3月以后，刘存厚纠合军团开始全面“会剿”。敌人大军压境，首先占领了固军、白羊、十字溪、铁矿等地，然后步步为营，普剿普杀。李家俊为了还击敌人，保存实力，首先将县农会及红军游击军指挥机关由龙潭河的白家坪、大钻溪、小钻溪以及高家河等地迁到城口、宣汉、万源边境大山上的草场坝、回龙坝等地。然后把农会基层干部和“神兵”师傅组织起来，分别到宣汉的翁松坪、炮台山和万源的蜂桶山、城口的国梁山等地，一边训练队伍，一边发动群众，在高山上继续坚持斗争。

随着敌人的步步为营，分进合击，起义军也出现了不少困难。特别是1930年4月，刘存厚集中五个团的兵力，并纠合城口、宣汉、万源等四个县的民团共万余人，向根据地“围剿”，形势日急。敌人又实行“坚壁清野”的反动策略，起义军过分集中，枪城物资得不到补充，供给成了很大问题。根据地越来越小，到1930年4月初，只剩下蜂桶、井溪等一部分高山区。

此时起义军只剩下李家俊、徐允仕、胡洪疆、王国梁、李哲生等领导人。尽管处境十分困难，胡洪疆等又在宣汉的白马庙、印盒山等地，与敌魏邦文部队和赵南田区长的反动民团进行数次战斗。

从1930年5月起，刘存厚、廖雨辰等在白羊、固军、井溪和三

区地面挂出“剿牌”，实行“集村制”，把居住四面八方的农民赶到指定的村子里住下来，早晚点名，轮流值日。并且实行连坐法，即一家有罪，十家连坐；一人犯法，十人同罪。疯狂镇压和屠杀人民群众，仅在厚坪，一个上午即杀了一百三十六人。在温水溪、新场坝、罗斗坝、冉家坝等十余个地方，集体屠杀的至少在千人以上。

此时，四川省委和省军委书记刘愿安、李鸣珂等，已遭刘湘杀害。王维舟亦困居开江，李家俊等领导人面对困难和危险环境，不得不决定：埋下武器，保存实力，分头活动。分散以后不久，第二支队长胡洪疆即被叛徒出卖，在龙潭河石板坡被捕牺牲。徐允仕与李哲生分兵由万源八台山到陕西镇巴境内。1930年7月，徐被陕军土匪团长陈德三杀害于陕西西乡之白岩沟。李家俊与王国梁到重庆找到省委后，李先后担任省委委员、江巴兵委书记、川东特委军委书记等职。1931年10月29日被捕后，英勇不屈，被刘湘杀害于罗家湾。

(中共万源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王水清整理)

荣县“五二五”事件

荣县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地方。1926年，在荣县五宝镇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从这以后，荣县人民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

1928年，在中共荣县县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全县农民运动的指挥部——县农民协会。这时，全县参加农协的农户有四千余家，共计六千余人，全县每个乡村、集镇，都开展了以反对苛捐杂税为主要内容的反军阀斗争。

1929年，荣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作出了“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和反对地主加租加稳斗争的决议。各地农协组织按照这个决议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先后选择了一批对农民剥削特别残酷，深为农民愤恨的土豪劣绅进行批判斗争。双石桥大地主张树安（解放后被镇压）收租三百二十石。家有五弟兄，其兄张怀舟任过团正，独霸一方。张树安则仗势残酷的压榨农民，对佃户的剥削花样多如牛毛，除每年各种农产品刚收获，都要佃户给他无偿地送新外，而且规定四大节（端阳、中秋、腊月过年、正月拜年）要佃户送鸡、送膀，并规定所送鸡、膀每只（个）不得少于三斤。佃户因灾减产未交足的租谷，张以高利滚交。同时，年年还对佃户进行加租加稳，有的佃户被逼得家破人亡。如对佃户刘德昭一年加了三次稳租，刘德昭实在无法缴纳，被逼逃往他乡，后饿死于岳池县。赵炳江（解放后被镇压）是双石桥另一大地主，

收田租三百多石，曾任仓首、评议员等职，仗势压榨群众。特别凶恶的是奸淫妇女、霸占民妻。他霸占佃户张佑之的妻子，恐张揭发他的罪行，竟诬陷张是农协会会员，送在县里关押，折磨致死。张、赵二人的恶行，双石桥全乡人民极为痛恨。

双石桥地下党组织和农协会召集丁泽光（中共荣县县委委员）、吕久成（双石桥党支部书记）、陈宝和（东路区委委员）和农协会会员丁炳三、谢三和商量决定，于5月25日（阴历四月十七日，双石桥逢场）组织群众，对民愤极大的张树安、赵炳江以及张怀舟、赖时清等的种种罪行加以揭露斗争，进一步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以利于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这一行动计划，由双石地下党组织报经中共荣县县委同意后，准备如期进行，并组织七百多名农民参加。

中共荣县县委为了加强对这一斗争的领导，于5月24日书面通知程慕仁到双石桥去具体领导和指挥这一斗争。程慕仁是中共荣县县委书记，正准备离职去学习，接得紧急通知后，于当日下午启程前往，并和五宝镇的地下党员、农协骨干李璧君一同赶到双石桥乡下农会活动的据点——高庙山。当夜与农会干部商讨第二天的具体行动方案，决定如下几个问题：一、选举程慕仁任总指挥，李璧君任副总指挥，主持大会。二、确定维持会场秩序的人员和决定上台控诉的人员。三、决定派人与双石桥街上专管收粮的一排驻军（即雷马屏屯殖军）办好交涉，向他们讲明“农会是我地主算帐的，决不影响收粮，使其不要进行干预”（第二天农民队伍行至中途，已得驻军表示不干预的信息，才继续前往开会的预定地点。在开会当中，这排驻军未加干涉，并表示对农民同情）。四、决定由二十名精于农协会会员组成敢死队，每人手持一根木棒，随同正、副总指挥，听候命令。五、如果遭敌人镇压或

有农协会的人被逮捕，就要组织烧场（即烧双石街）。六、参加大会的农民，在高庙山集中，整队开往双石桥。

5月25日清晨，高庙山集中了双石桥及附近章佳、梧桐等乡农民。他们头扎黄荆（作为标志，防止坏人混入农会队伍），开进了安排好的双石桥团防局门口的大会场里。因是逢场天，故实际参加大会的农民上千人，整个会场农民队伍威武雄壮。此时，农会将土劣张树安、赵炳江绑押在会场（因团正张怀舟已闻讯在头天晚上逃匿，秘密派人到离双石桥十二华里的汪家滩，向在那里收粮并带有弁兵四名的县知事告密。赖时清也闻讯逃躲）。程慕仁宣布开会的意义后，李璧君接着讲话：“张树安去年收租谷，未缴齐的每斗合价八元。谷价未付清的，今年又合价为十一元，大家说看合不合理？”农民斗争情绪更加高涨，正欲上台控诉，这时县知事江载英派来镇压农民的四名便衣马弁，冲入会场，直扑讲话台。一便衣马弁掏出手枪朝天鸣枪以示弹压。几个便衣马弁将程慕仁、李璧君抓去，关押在驻军的营盘里。大会指挥者见此情况，马上指挥群众不得擅自离开会场。群众遵守指挥的命令，秩序井然。此时，敢死队员曹相和给那个首先开枪的便衣马弁一棒，几乎把他的手枪打掉，站在背后的另一名敢死队员即用双手把他箍住，另一个便衣马弁见势不妙，顺手一枪把曹相和打死，同时开枪向群众乱射，随后逃出会场。当场被打死的有曹相和、邓春廷、刘清臣等三人，死亡共十余人，失踪三十多人，送医院后又有四人死去。农民看到正、副总指挥已被抓走，又打死打伤了许多人，就马上搬柴弄草，准备烧场。驻在街上的那排收粮驻军听说要烧房子，就出来阻挠说：“这样没有什么益处，你们干时，我们马上掉转枪口先打起来”。为了不遭受更大的损失，队伍才有组织的退出场去。此时，程慕仁、李璧君也趁无人

看管他们之机翻窗逃出。

程、李逃出后，立即派人去找县委委员曾莱。曾当天在威远县五里浩领导群众打米行的斗争才回来，当即在红观音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四项决定：一、埋死医伤；二、慰问死难家属；三、筹款作此次惨案费用；四、组织力量在端午节报仇。会后，曾莱来双石桥处理善后；程慕仁、李璧君立即赶往五宝镇去组织力量。不幸第二天程慕仁在五宝镇被敌人抓捕，次日即送县关监。

6月10日（阴历五月四日）又是双石桥的场期。县农协组织了懂军事、会打枪的党员、农协会会员朱全鲁（县委委员）、张志远（李晏乡党支部书记）、万鼎元（龙潭镇党支部书记）等二十多人的队伍，再去双石桥找土豪劣绅讨还血债。因“五二五”惨案发生后，农会听说这次事件是当时双石桥的另一劣绅、市政建设委员曹午堃（解放后镇压）告密所致，因此报仇的目标也就对准曹午堃。队伍一到双石桥，就遍街寻找曹午堃，未找着。队伍沿街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告密走狗曹午堃”，还在双石桥场口狗屎桥放了一排枪，才向高庙山方向散去。事隔不久，当地农协又在一个晚上组织会员将张树安的老家虎板山围困，拟再次活捉张树安，清算其剥削账和讨还血债。张因在“五二五”事件后畏惧农会的威力，已逃去大才寨躲藏，故未捉住。围至下夜时，才放火将张树安的房子烧了。

“五二五”事件发生后，中共荣县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对这次斗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同时对以后的斗争作了新的部署。

（中共荣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林志湘整理）

遂蓬起义

1929年6月29日（农历五月二十三日），在遂宁、蓬溪边界，由中共四川省委直接领导的邓锡侯所部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全旅官兵的革命兵变爆发了，打出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红军第一路”的旗帜。总指挥是该旅代理旅长、共产党员旷继勋，党代表为省委成员罗世文。起义历时月余，行军十二县，一千多华里。这次起义在四川现代革命斗争史上，占着重要位置，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旷继勋，又名旷廷勋，号旷积臣，贵州省思南县人。1920年当兵入川，1923年驻四川德阳孝泉时，已升任连长。当地有两名土匪，危害着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决心为民除害，调动部队生擒了最坏的头目黄三匠。黄被惩治后，另一名土匪头子刘华亭便不敢作恶，后不久死去。从此，老百姓中便流传着旷连长“活捉黄三匠，吓死刘华亭”的佳话。为了颂扬旷继勋的功德，在他调离孝泉后，地方上募资为他修了《瞻旷亭》以资纪念。旷治军极严，不准军官吞蚀士兵薪饷，军官和士兵共同管理经济，提倡官兵平等，反对虐待士兵，还特别注意士兵的文娱生活。部队纪律严明，所部官兵都得遵守“五不”，即：不拉夫，不扰民，不嫖，不赌，不吸鸦片烟。旷升任团长后，为了防止拉夫，部队行军时每个营都配备五匹驴子运载大型军械。

旷继勋很早就接受了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

器”的民主革命思想。从军后抱着军人应为国家为人民干一番事业的信念，逐步走上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1923年后他已提升为营长，为抗击吴佩孚侵川，旷率的部队一度划归四川“讨吴之役”的川军东路军刘伯承指挥。旷与刘伯承结识，并建立了亲密友谊。

1926年旷继勋已任江防军第七混成旅第二团（主力团）团长。旅长刘丹五因与我党搞地下工作的同志时有接触，思想比较开明，对旷继勋的革命活动也比较支持。当旷知道黄埔军校有“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以后，即决定派钟克戎前往广州联络，同时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钟到广州加入了共产党。这年夏秋之交，党组织派曾留法勤工俭学的共产党员秦青川（又名治谷、稻孙）与钟一起回到彭县（旷部当时驻彭县）。秦即任第七混成旅政治部主任。经过党的教育，旷继勋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于1926年底由秦青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川西特委为加强党在第七混成旅的工作，又陆续派去一些共产党员，组成了党的领导核心——旅委会，团、营、连中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各级政治指导员多由共产党员担任，旅改为四个支队后，就有三个支队长是共产党员。

1928年6月驻射洪县太和镇的二十八军第五混成旅刘文仕（共产党员）、秦仲文（共产党员）两团的党组织暴露。为保存党的组织，当由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李鸣珂（南部人）等领导，将两个团于8月拉至潼南县双江镇举行起义，编为工农红军第一、第二两个旅。起义失败后，由党组织将部份暴露了身份的党员调至旷继勋部工作。中共四川省委决定用旷部作为扩大四川工农革命的基本力量。1929年初，旷部移驻广安。省委书记刘坚予（愿庵）亲自到广安视察这个部队和指导党的工作达半月之

久。在此之前，省委军委书记李鸣珂和程子健，川西特委书记方泽（刘披云）亦曾多次到旷部指导工作。

旷继勋部的种种革命活动，引起了四川军阀的注意和不满，他们放出“旷继勋是带红色的部队”的空气，阴谋予以“整肃”，以瓦解这支部队。

上川东之战后，旷部从广安移驻遂宁县射洪嘴。其时，江防军司令黄隐到达简阳，命旷旅开回成都整编，旷继勋识破黄借整编打击革命力量的阴谋，拒不从命。黄又要旷亲自到简阳面谈，旷只派了一位指导员前往敷衍。黄回成都十分恼怒，命令旅长刘丹五（解放后任省政协委员）按照邓锡侯和他的旨意到遂宁就地整编部队。刘丹五明知旷旅进步力量强大，无力整编，借故养病离开成都，回江津老家去了，由旷继勋代理旅长。刘丹五离队后，又派参谋长谢柚园回部队，企图拖几个营走，以削弱旷的力量。谢一到部队，阴谋败露，被迫只身逃走。不久部队党组织又接到打入江防军总部的共产党员黄聘三密电：“刘（丹五）王（王汉章，一团团长，叛徒）黄（隐）密谋反动。”更加引起了部队党组织的注意。由于旷几度拒绝了邓、黄的命令，黄对旷部的粮饷由克扣直到完全停发。这样，旷部官兵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可是该部纪律严明，经济公开，官兵平等，上下和睦，李家钰等军阀部队的士兵，不少人逃到旷旅当兵。李家钰、陈鸿文、谢德堪等军阀对旷旅十分忌恨，意欲乘机吃掉这支部队，一旦刘、王、黄与李家钰等采取联合行动，则情势十分危急。只有走武装起义的道路，才能挽救危局。旅党组织便向中共四川省委报告情况，要求批准旷旅立即发动起义。

1929年4月，旷旅党组织一面派文莱之（又名文强）到重庆向省委汇报，一面在驻地建立了专门班子，由王金铭（旷旅中校

团附，改编后任第二支队长，起义后任参谋长）、曹仲英（支队党组织负责人）领导，加紧起义前的准备。

军事方面，除加紧战术训练外，按省委原计划，拟联合李家钰所属由共产党员李树华（1930年叛变，被开除出党）为司令的“农村警卫军”（相当一个旅）会攻遂宁，然后沿涪江东下合川，沿渠河向达县、宣汉北进，建立城（口）万（源）宣（汉）达（县）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为实现这一计划，部队便派出侦察人员，对遂宁敌军的位置和遂宁城区街道及地形作了充分的调查并绘制成图，制定了作战计划。

在后勤上，将射洪嘴的天主堂占据，封锁了交通。发动工人赶制红军旗帜，制备臂章、帽花，刻制路、师、团、营、连以及“四川工农革命委员会”各级组织印鉴，印制布告、标语、传单，编制了起义部队全体官兵名册。布告的落款一律为“四川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吴玉章，委员刘伯承、恽代英等十几人。（这些人大都不在四川），以迷惑敌人，扩大影响。

旷旅的暴动计划经省委讨论批准。接着，省委指派罗世文（化名罗泽模）、邹进贤（化名朱三元）到旷部，加强对起义工作的领导。

罗世文等同志传达了省委指示，成立了怡生特委^①，书记邹进贤，路党代表罗世文，总指挥旷继勋，参谋长王金谔。

当军事、后勤方面的工作准备就绪时，得知驻遂宁“农村警卫军”司令李树华用种种借口，不肯参加起义。加上第七混成旅的驻地到遂宁城要过两道河，夏水已发，过河不易。再者遂宁驻有敌人十一个团，敌众我寡。故决定取道蓬溪，举行兵变。

1929年6月29日（农历五月二十三日）下午，部队以“打野

^① 怡生特委即指挥旷继勋部兵变的党委。

外”为名，向遂（宁）蓬（溪）交界处的牛角沟（现蓬溪大石桥乡所辖牌坊沟）山梁集聚。部队到齐后，先召开了军官会，旷继勋向大家讲了国内外形势和部队目前的处境，指出了部队当前的两条路：一是向敌人投降，放弃革命，一是坚持武装斗争，革命到底。顿时群情激奋，赞成走革命到底之路。军官思想统一后，接着召开了全体官兵大会，旷继勋又向大家作了起义的动员讲话，号召大家不要再为蒋介石封建军阀卖命了！马上举行起义，为工农的利益而革命。接着宣布了起义及特委组成的人员名单和整编方案。各部立即按新编制归队，随即打出缀有镰刀斧头的“四川红军第一路”红旗。

全旅官兵三千余众，编为两个师，一个先遣队：

红一师，师长傅介藩（1930年叛变），党代表刘曼（不久改为陈国儒，渡渠河后为曹仲英），参谋长杜泽文。辖一、二、三团，一团团长张光桐（赵封），二团团长尚奇（志成），三团团长王学标。

红二师，师长马之骥，党代表廖宗泽（马廖二人以后叛变，解放后被镇压）。辖四、五、六团，四团团长陈克尧（茂浦），五团团长刘洪，六团团长谭刚（毅夫）。

先遣队司令石光楷（原旅部副官长，非党员），党代表××，辖七、八两团。七团团长彭如初，八团团长吴德龙（一说团长为郭仲模、张光丹）。先遣队去西充时，石光楷潜逃，番号撤销。

部队副官长黄孔乡，四川工农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陈国儒（1930年叛变），秘书曹仲英。

部队于当晚8时下山，每师由手枪队、敢死队为先锋。为了避免惊动敌人，部队宣布了三条严厉的军令，即：高声呼叫者枪毙，明火吸烟者枪毙，开小差者枪毙。部队星夜通过大石桥

乡，向蓬溪县城进发。

部队正式宣布起义后，中共四川省委立即印发了《为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兵士举行革命兵变的宣言》，向全川工农兵士及一切贫苦民众宣告：第七混成旅全旅兵士，举行革命兵变，目的是：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省委又通知各地，要求地方党的组织密切配合红军的行动。

起义部队乘夜急进，当夜12时许，即到达离蓬溪县五华里之双星桥，分兵两路直取蓬溪县城，一路由公路进攻县城南门，一路由白塔寺攻取西门。当时城中只驻有江防军的一个骑兵团，守军不足千人。6月30日凌晨2时许，起义军攻入城内，与守军激烈巷战达四小时之久，拂晓敌仓皇败逃。

红军入城后，随即将县衙档案和征收局全部粮册烧毁，并捣毁了各衙署、机关，没收了县衙大印，打开监狱释放了在押囚犯。这天除县女校外，所有学校、街头、茶馆都派有官兵前往进行革命宣传，高呼农工大暴动，打倒地主财东、土豪劣绅等口号，沿街贴满了“抗租、抗粮、抗税”，“杀尽贪官污吏”，“工农朋友组织起来暴动”，“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等标语。

为了红军进军之需，部队当即召集各法团士绅筹集了银元三千余元，白布数十匹。

驻遂宁的江防军司令李家钰于当天下午得知蓬溪失陷，忙调原驻蓬溪的团长杨特生赶往蓬溪围剿、阻截。杨团长到达蓬溪城四十华里的大石桥，不敢贸然前进，待起义部队离城半天多后，才进驻县城。

红军于7月1日（农历五月二十五日）离开蓬溪向西充转移，进驻西充、南部交界处的古楼场。在此，特委会举行了临时

军事会议，决定转移到南坝场。然后分两路绕道南部县城，途经流马场，当地团总范海鱼因其女范士光是军阀李伟如之倩妇，范依仗权势，无恶不作。特别是范海鱼变卖公产，群众恨之入骨，屡告不发。为除此害，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李鸣珂，曾向起义部队作了惩治范海鱼的指示，南部地下党又写了一封信星夜送往部队，面交红二师师长马之骥，急切要求红军严惩范海鱼。红军遂将范海鱼和另两个恶霸逮捕，并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审判，处决了范等二人。红军张贴布告历数范海鱼“……为劣绅土豪魁首，作贪官污吏之爪牙，卖尽荒年义谷，断绝饥民经济”等罪恶。范海鱼被镇压后，劳苦大众一片欢腾。红军到达南部新镇后，又镇压了新镇团总邱俊成。

红军在新镇驻扎，休息两天后即向营山、梁平进发，到达梁平境内的猫儿寨。原计划在猫儿寨进行休整，因该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寨内地下党组织，约好届时开寨门里应外合，一举占领。部队到达猫儿寨时，党的地下组织竟被敌人破坏，故寨内闭门不纳，红军两次硬攻未下，伤亡很大。加之一月多的急行军，在军阀防地之间穿插战斗，没有休整，人困马乏，疲惫不堪。又遇上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敌人前堵后追，左右夹击，红军处境非常险恶。此时长江一线被军阀刘湘部截断，前往鄂西已不可能。特委乃决定取道开江东进，以便与王维舟、李家俊游击队靠拢。但为时已晚，此路又被达县军阀刘存厚及涪陵军阀郭汝栋纷纷调兵防堵。红军部队从猫儿寨撤到开江县与马鞍山的夹巢沟时，大部分被敌人包围击散，一部转移至达县万家坝碗厂沟云雾山一带，又被敌人击溃，起义宣告失败。后除少数人历尽艰辛到了湖北与鄂西红军会合外，部分中下级党员干部分散隐蔽，大部红军被敌人收编。旷继勋由省委派到党中央工作。罗世文回到重

庆，向省委汇报了蓬溪暴动的经过和经验教训。

(中共蓬溪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涪陵抗捐军

1929年7月，涪陵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抗捐斗争。这一斗争在我党的领导下不断深入发展，影响邻县，波及川东，配合了旷继勋领导的四川红军第一路的东进，还为1930年4月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涪陵抗捐斗争兴起的直接原因是驻军郭汝栋苛勒捐税，残酷搜刮，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连当时的报纸也这样报道：“二十军军长郭汝栋自本年一月起返驻涪以来，搜刮民财，半年之久，征粮八季，复巧立名目，以至民不聊生，起事而为变”。涪陵县人民组织了“涪陵县县民抗捐同盟”，发出了《涪陵县县民被驻军层层敲剥之经过通电》，揭露军阀压榨人民的种种暴行。

党组织在驻涪陵的郭汝栋军中，自1926年以来就建立了军支，与地方党组织配合，使涪陵的革命形势不断发展。

1929年3月26日，四川省委发出第七号通告，要求川东以涪陵、南川为中心，尽量发动群众，为武装暴动作好准备。月底，省委即派许斌、杨天柱来涪陵整顿组织，贯彻省委着重抓军运，组织暴动的指示。

这时，涪陵藿市堡子场的张光堡受上海党组织派遣返川，被分配到涪陵的龙潭、藿市、新妙、同乐等四镇乡发动农民武装暴动。1927年，他就这一带地方和李蔚如一起，领导过涪陵农民运动。1928年去上海入华南大学，在沪中区委负责组织工作。在

这次武装抗捐中，他起了很大作用。

6月，四川省委召开二次扩大会议，决定涪陵设立中心县委。7月，派周晓东来涪陵主持工作。

上半年，农村党、团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共有党、团员一百二十人，新妙、鹤游、青溪、大顺、罗云、兴隆、大柏、百江等区乡都建立了党和团的区委或支部，抗捐斗争得以迅速展开。

为了配合抗捐斗争的发动，军支负责人胡成杰和不久前受中央派遣回川的刘道盛，派军支中的党员霍恂、何希平、孙绍林、饶绘丰等到黔江、彭水和忠县进行军运工作。

7月中旬，由藿市张光堡、陈拱北等人发起，组成涪陵县县民抗捐同盟（亦称抗捐大同盟），发布了通电。

《通电》主要揭露和声讨郭军横征暴敛的罪恶，号召全县人民武力抗捐。还决定：“今后任何军队所派任何款项，均当誓死反到底。”并成立抗捐团，联合作战；成立暗杀团，严惩滥团劣绅；普遍宣传，向省内外呼吁。

《通电》发出后，影响很大，上海的旅沪同乡会刊物还据此编了一首歌刊出，向各地散发。其中一段是：“郭汝栋，妖魔精，十万八千元，只消一月征，目睹鸿哭遍野，又闻卖儿鬻亲生，穷途末路，最后一个斗争”。抗捐军领导人之一张光堡也在藿市创办了不定期刊物《涪波》，揭露军阀郭汝栋及其走狗刘陶君等预征粮税，并宣传抗捐斗争。

7月涪陵抗捐运动迅速发展，四镇乡地区的地方武装陈风藻、赵海洲在张光堡的联络下，加入了抗捐队伍，加上其他农民武装，组成了抗捐军。

驻军郭汝栋所部官兵，受旷继勋兵变起义的影响，纷纷哗变投入抗捐军。其中有郭汝栋独立旅旅长周燮卿，他原为土匪出

身，有二千余人枪，被郭收编驻长寿与涪陵之间，哗变后曾围攻涪陵县城，后退入四镇乡加入抗捐军。郭部驻珍溪镇、鹤游坪的钟占奎团五六百人，亦提出“打倒滥军”，“实行共产”的口号，投入抗捐军。还有活动于涪陵东北部的张小屏、王仲明部千余人，亦到白涛与赵海洲、周燮卿两部相会合，此时抗捐军声势大振。7月，抗捐军与前来镇压的郭汝栋部一个团，在菁口一带激战。抗捐军因指挥不一致，以及加入抗捐军的钟占奎部被敌收买反水，使抗捐军遭到失败。

党组织吸取了经验教训，在8月份又重新集聚队伍，掀起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武装抗捐斗争。此时，郭汝栋疯狂地在全县实行收税和清共，但在大顺、龙潭、蔺市、同乐、明家、兴隆、堡子、新妙、罗云、鸭江等乡镇的抗捐斗争，反而更为猛烈。

8月，李鸣珂、钟善辅、周晓东、张光堡等先后在县属凉塘乡、天台寺秘密举行军事会议，商讨继续进行抗捐抗粮斗争和兵运工作，拟发动全县十路抗捐军的大起义。会议决定魏应炯为前敌指挥，周晓东为政委。张光堡任第一路（陈凤藻部）抗捐军政治部主任，并负责联络长江南岸的“铁血抗捐团”，相机发动城内兵变，与之配合，攻下涪陵，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

中旬，陈凤藻在大顺，张光堡和郑光宗等在兴隆秘密集合队伍，不料消息为郭汝栋所知。17日，郭派其师长刘雨卿带兵一团向大顺寨发动清乡。由于大顺寨方圆一二十里，三面悬崖巨壑，形势险绝，集聚于大顺寨的抗捐军主要是龙潭、明家、新沙、两汇等乡镇的民练和周燮卿部的一部分力量，战斗力较强，郭军未能攻入。

在攻大顺同时，郭汝栋又派其参谋长杨天信赴马武场督师，城内则调陈兰亭部防守。当杨天信由马武两路夹逼兴隆时，张光

堡则将兴隆集结的抗捐军主力带到了堡子场的石塔子和白鱼池一带山区，杨天信扑了个空。

县委还拟定同时发动藺市驻军兵变。当时藺市驻有郭部一个营加上一个教导连，共四连人，有地下党员在其中进行兵运。其中一个连夜间秘密开赴抗捐军驻地白鱼池后又返回，被营长调镇安守仓。另一连约定与教导连同时兵变，但被敌营长发觉，事起后敌营长命令追赶包围，参加兵变两个连的班以上干部十多人全部被枪杀。这两次兵运皆未成功。

时值郭军包围大顺，县委决定以围魏救赵之计，攻藺市驻军以解大顺之围。8月19日早上，天刚亮，手执大刀长矛、扁担、锄头的农民抗捐军，从藺市镇南面的观音岩、一碗水，东面的五马关，西面的梨乡溪山沟和鸡公山梁子，五路围攻藺市，与敌在龙门桥一带激战。驻守在镇南制高点川主庙的一连人，由郑营长亲自督战，企图负隅顽抗，抗捐军四面夹击，三次冲锋，激战两个多小时，各有数十人伤亡。郑营长见抗捐军人多势壮，遂向火力薄弱的东面突围逃窜，至五里的安澜桥，又被抗捐军拦击打败，惟郑营长一人化装跑脱。上午，抗捐军在藺市召开欢庆大会，高呼“废除苛捐杂税！”“打倒郭汝栋、活捉刘陶君！”“工农革命万岁，苏维埃万岁！”等口号。午后，一千多抗捐军在张光堡等人的带领下向涪陵城进攻。抗捐军原定进入涪陵城郊时，驻军朱团即进行兵变，并相约以鸣枪为信号，同时行动。结果待鸣枪后抗捐军进城的只数十人，很快被敌人追捕打散。抗捐军另一领导人周晓东带领二十多名农民武装到焦石坝发动起义，与敌军遭遇又负了伤。同时郭军已派大批军队渡过乌江扑向天台。张光堡等知攻城不能实现，遂决定分散撤退，化整为零，暂时隐蔽，抗捐军斗争暂告失败。

接着郭汝栋对抗捐军实行“大招小剿”的毒计，对实力雄厚的周燮卿、陈凤藻、赵海洲等部实行招抚，对实力不强的其他抗捐武装实行剿灭或诱杀。8月下旬到10月，郭军与地方反动团阀在县内大举清乡，大肆烧杀抢掠。新妙镇反动团阀陈里根捕杀了我党农运干部冉伯华（即尹绍雄）。大顺的清乡军钟占庭团洗劫了李蔚如烈士及很多抗捐军将士的家，杀人放火，并捉了一些人去进行敲诈勒索。堡子乡的反动团阀段奉安诱捕了堡子兴隆地区的抗捐军领导者之一——郑光宗，10月13日杀害于涪陵县衙门前的狮子坝。抗捐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涪陵的土地。

张光堡在抗捐斗争失败后，转移到重庆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并参加了江津兵变。1930年底因叛徒出卖被捕，次年1月17日在涪陵慷慨就义。

涪陵的党和人民总结了抗捐斗争的经验教训，继续坚持斗争，1930年4月在罗云坝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建立了红军第二路游击队。

（中共涪陵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蒲国树整理）

宜宾大塔农民暴动

大塔位于宜宾北路，距城约四十公里，是宜宾地下党开展农运的基地之一。1928年宜宾县委即决定5月以大塔、双石铺为中心举行农暴，因县委负责人被捕牺牲而未遂。9月，党组织又派余宏文、曾特生等到大塔加强农运工作，准备再以大塔为中心举行暴动。经过几个月的深入发动，农民协会迅速发展，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农协还把农民组织起来，编成小组，联组为队，取名“赤卫队”。农协壮大后，提出“反对地主加租退佃”为号召，发动农民广泛开展减租斗争。

1929年6月，县委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推动整个减租、抗租运动，准备秋暴，于月底在古柏乡兴福寺召开各界群众代表大会。会上，着重讨论并通过了减租方案和组织赤卫军的问题。减租的方案是：田减三成，土减一半，利息减少四成。赤卫军由农协会精壮会员组织，各乡设立大队。

7月，大塔农民在农协会的领导下，纷纷向地主提出减租要求，并把租谷扣留起来，地主如若不同意减租，他们就不交。地主张国凡偏与农协会作对，公开扬言他“硬是不减租”，7月21日带了几个荷枪实弹的家丁，大摇大摆地去李家湾佃户黎维之家收租。农协会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出几十人赶来质问张国凡，当场打跑了家丁，并把张国凡的大儿子押到赤卫军指挥部关起来。地主迫于压力，与农协代表进行“二五”减租谈判，地主在减租

的成数上坚持意见，谈判失败。于是群情激奋，纷纷要求暴动。1929年8月20日，宜宾县委派人向省委请求助款并对工作给予指示。省委根据宜宾地区过去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指示宜宾县委：要以抗捐、减租、抗债、雇农加工资的中心口号来满足农村中从雇农到中农的要求。并指出，如果群众示威活动能达到减租的目的，就不必采取武装冲突的形式，但应有武装准备。然而宜宾的减租斗争却在省委指示未到之前就爆发了。

8月，大塔赤卫军领导人张海云两弟兄及刘心太未经请示上级同意，即决定于9月3日举行暴动。计划在邻近各乡派赤卫队支援下，9月2日（农历七月二十九日）赶到大塔岩口，包围大塔坝，再提民团和国民党军的枪。这次暴动已经发动起来后，上级党委指示都还没有下达。为顺乎民意，宜宾县委临时决定由余宏文、曾特生、傅谦漠等设立临时指挥部，余宏文任指挥长，傅谦漠住指挥部并负责预防失败后的收容工作。

9月2日，大塔数百农民集合起来，由余保和任分队长，刘敏忠、樊坤廷任联络，拿起长矛、明火枪、牛角叉、斧头等，奔上大塔坝四周的要道岩口，控制各地重要据点。同时，邻近各乡的农民赤卫队，也从四面八方涌来大塔。具体力量的布置是：李场赤卫队一百多人，驻守田家岩，棋盘岩一带；马场赤卫队一百多人，驻守高笋冲、鹰嘴岩一带；仙马赤卫队一百多人，驻守柑子岩、二斗岩一带；古柏、龙坛赤卫队一百多人，驻守黄角岩、小马村、下桐子林、杀猪坳一带；还有花古、永兴等乡的赤卫队人马等，上千的农民赤卫军形成一个马蹄形的包围圈，将大塔坝团团围困。

9月3日（农历八月初一），大塔全街罢市，整个街面冷冷清清，就连驻镇上国民党军都缩在屋里没有出来。中午，花古、

马场的赤卫队，由黄毛、卢四带队，到距大塔街半华里的望场波示威，并打开斑竹林地主张锡伍的粮仓，将九石多稻谷分给了农民。下午，赤卫军分头向地主“借枪”，王家湾、石坝、飞凤嘴、画眉沟、长庆河、斑竹林等地的地主以及保甲的枪和部分子弹纷纷被缴了出来。9月4日，恶霸地主张子安拒不交枪，竟然开枪射击，赤卫队重伤一人，轻伤二人。赤卫军当即焚烧了张家的庄园。张子安急求救于驻军唐连长，唐连长闻报后，决定立即发兵镇压，伙同警卫队向赤卫军前沿阵地鸣号冲锋，迫使赤卫军撤向岩里黑瓦子、江楼房一带。这时地下党员樊振声带来县上同志的意见，劝说大家不要盲动、急躁，应估计自己的力量，从长计议，要尽量避免造成武装冲突。当曾特生、刘心太等来斑竹林会见时，后面还涌来了很多群众，他们围在外面等候消息。当他们知道谈话内容后，情绪激动，霎时队伍失掉控制，枪声乱响，呼声四起，纷纷向大塔涌去。刚逼近场口，就有国民党军代表出面交涉，要求稍退半里，佯称承认缴枪。当时，群众误以为国民党驻军的力量不大，真的要缴枪，同意稍退。群众刚向后移动，国民党军即开枪射击，当即打死七八人，打伤一人。

9月5日晨，国民党驻军和警卫队分两路向赤卫军合围袭击。由于当时土匪控制着好枪，又不肯迎战，剩下的赤卫军虽奋力抵抗，但力不能敌，因而被敌挫败，敌人乘胜追击五六里，四处搜杀地下党员和农协会骨干分子。中共宜宾县委负责人只得带着机关十多名党员，从大塔的包谷湾转移到仙马的高石梯，由县委书记邹云芳主持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大家暂时分散隐蔽，等候通知。轰轰烈烈的大塔农民武装暴动，就被敌人镇压下去了。在这次农民暴动及随后清乡中，被捕杀的地下党员和农协会会员达四五十人。

（中共宜宾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田若川整理）

彭水武装起义

1928年底，中共四川省军委已在川军向时俊^①部队中秘密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军支。1929年冬，向部进驻彭水、黔江时，有三个团，人枪二千多。当时，向部内党的军支书记是邹隐樵，任该师第一团一营少校副营长，军支委员胡文灿任一团一营一连连长。邹、胡皆随司令部驻在彭水县城。军支委员吴敌任三团中校副团长，随军驻在黔江县城。军支共十多名党员，受省军委领导。

1929年底，邹隐樵到彭水后，省军委指示：“军支要尽快与中共彭水县委取得联系”。不久，他们同县委书记向希平、县委军支书记霍恂等人取得了联系，并在彭水县城秘密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向希平、霍恂、孙瑞华、刘伯容、邹隐樵、胡文灿、吴敌等人。会议的内容是商议部队军支和地方党组织互相配合，控制向时俊部队，以待时机举行武装起义。会后，县委军支向省委和省军委作了汇报，省军委书记李鸣珂指示：“军支要配合地方党组织，对向时俊部队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后，成立红军队伍，以西（阳）、秀（山）、黔（江）、彭（水）建立一个根据地。在可能的情况下，向丰（都）、涪（陵）、石（柱）沿长江一带发展，与四川二路红军会合”。霍恂返回彭水后，及时召开了军支、县委联席会议，传达省军委的指示，并决定立即组

^① 向时俊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杨森部下属的师长。

织行动，作好起义的准备工作。

正当武装起义准备发动时，汪精卫委派李公藩（又名李介，原系中共党员，因严重违犯党纪，被开除出党，后到武汉投靠汪精卫），前往彭水县任向时俊师部少校参谋长。李公藩到彭水后，探听到向希平在彭水活动，他立即对向时俊报告：“彭水有共产党活动，师政治部应当注意。”并以“川鄂边防军司令部”名义张贴布告：“酉、秀、黔、彭各县，近有共产党分子潜匿活动，各界人士必须严加防范”。

党组织为了控制向时俊部队，由邹隐樵对向时俊推荐霍恂担任参谋长。当时向时俊已允诺霍恂任职，但由于李公藩从中阻拦，使霍任职未成。党组织为了掌握地方武装，趁向时俊收编各乡民团武装成立大队之时，邹隐樵又对向时俊推荐张贵清担任大队长职务，也遭到李公藩的反对。李公藩在彭水严重妨碍党组织开展工作。

1929年，黔军周西成部营长罗恒、王作之带领三百余人枪叛逃到彭水县万足乡驻扎，在乌江边设卡收税，独霸一方。彭水县委派向希平、孙瑞华去争取改造这支队伍。罗恒部队中有不少人出身贫苦，因生活所迫而当兵，对于向、孙宣传的革命道理表示赞同，愿意参加革命，唯有头目罗恒坚持反动立场。没几天，罗恒为部下所杀，这支三百余人的队伍就由王作之、周宣统率。经向希平、孙瑞华多次做工作，王、周表示愿意投向革命。

党组织为了有利于对向时俊师发动武装起义，邹隐樵再次推荐王作之担任向时俊师“特遣司令”。王任职后，即带队进城，驻在彭水县城古楼街童家院子。但因王和地下党组织有联系，引起彭翌堂（向时俊师咨议员，与王同院居住）疑虑，彭对王作之言行进行了密切监视。

通过一段时间准备，中共彭水县委认为起义条件已基本成熟。

3月29日晚，县委和军支在彭水县城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起义的行动方案和日期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向希平、霍恂、吴敌、孙瑞华、刘伯容、邹隐樵、胡文灿、王作之等人，由霍恂主持。研究起义问题时，王作之神态忧虑，发言中处处刁难，致使会议草率结束。

深夜，邹隐樵对起义问题很不放心，再次到城南小学校与霍恂、孙瑞华、向希平、刘伯容等人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起义行动推迟，由向希平对王作之作好安抚工作，把王的队伍带回万足乡，以防他久住县城生变。当晚，王作之回到驻地后，心事沉重，惶恐不安，终于将地下党要他参加起义一事告诉了彭翌堂。彭听后即要求王作之叛变立功。接着，彭、王二人即到司令部密报向时俊。

1930年3月30日早上，王作之到城南小学校去会见霍恂、向希平、孙瑞华、刘伯容等人。王一见他们就忙说：“昨晚上开会研究那个事情（指武装起义一事），我没有意见，请大家到我那里吃早饭，再商量一下。”霍恂、向希平、孙瑞华三人即往王的住地走去。刘伯容因校内有事未去。

当天早上，邹隐樵见情况紧急，即到旅馆找到吴敌，共同研究第三团在黔江准备起义一事。突然，一团一营营长何翼如闯进去以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为名，把邹隐樵带到司令部。邹到司令部后，见情况有异，趁何翼如打电话之时，立即逃出，去旅馆通知吴敌迅速离开彭水县城。随后，邹隐樵跑到城南小学校，找到刘伯容。刘说霍恂、向希平、孙瑞华三人已到王作之驻地去了，邹叫刘伯容赶快去通知他们回校研究对策。当刘走至王作之驻地

附近时，见院子外面已被向时俊手枪连包围，刘伯容立即返回学校。当霍恂、向希平、孙瑞华三人进入王住地时，才发觉已被敌人包围了。他们知道上了王作之的当，立即退出院子，敌人一边开枪，一边追击。他们退到古楼街东狱馆时，向希平、孙瑞华、不幸中弹壮烈牺牲；霍恂大腿负重伤，继续向城南小学校方向撤走，在校门前遇着学生，将他背进学校。霍恂立即将身上带的机密信件烧毁，隐藏在学校王爷庙米仓里。敌人跟着血迹追进学校内搜查，并向庙内疯狂射击，霍恂当场壮烈牺牲。

惨案发生后，向时俊下令全城戒严，通缉捕捉共产党员。刘伯容、邹隐樵等人迅速撤到乡下。吴敌返回黔江，不久被向时俊三团团长冠逸群杀害于县城。彭水武装起义遭到失败。

(中共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涪陵罗云坝起义

1929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加紧涪陵地区的军事运动，派钟善辅到丰都，领导团及学生会工作。是年初冬，钟任中共丰都县委书记，与涪陵县委书记、军委委员苟良致等一起，积极作涪陵地区的刘湘所属郭汝栋二十军的兵运工作，准备发动二十军兵变。当时郭师政治部主任胡成杰，营长郭汝槐、傅秉勋，连长赵启民和一个团长都是共产党员。师团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也是共产党员。

当时，涪陵罗云、崇德，丰都栗子、茶园、毛坪，石柱三根树等地方党组织也恢复得很快。罗云乡团正尹颢阳已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他秘密组织赤卫队，培养农民武装骨干。针对这些有利情况，四川省委决定派军委书记李鸣珂亲自到涪陵指挥这次行动，并调涪陵清溪一带的农民赤卫队到县城外面配合。原计划于1930年3月6日，以城内郭军两个营为主力，先在城内包围城防司令何治九后，即以放火为信号举行兵变，城外张光堡、陈凤藻率领抗捐军数千人接应。不料消息走漏，城防司令何治九立即戒严，并派兵袭击抗捐军，第一次起义失败。

接着李鸣珂又在重庆制订了第二次起义计划。但由于派到丰都发动丰都兵变以策应起义的邓震东被捕，赵启民连也因第一次起义引起了郭汝栋的注意，而被调驻涪陵西门外城墙下，被郭汝栋派一营人包围监视，这时要再发动兵变已不可能。于是李鸣珂

派赵启民到罗云坝与尹颢阳的武装会合，成立四川红军二路游击队，到忠县、丰都、涪陵等县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3月中旬，赵启民按计划率两个排到了罗云坝。第二天，李鸣珂、周晓东、苟良歌、尹颢阳、李焕堂等也赶到罗云。4月7日，以罗云坝农民赤卫队和起义士兵组成的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在罗云召开成立大会，发出宣言，宣布苟良歌为红军二路游击队党代表，总指挥李鸣珂，前敌指挥赵启民，政治部主任周晓东，农民赤卫队司令尹颢阳、刘伏洋。红军二路游击队下设两个大队、四个中队。游击队共有队员三百多人，步枪九十多支，冲锋枪二支，掷弹筒一具，刀矛二百多把。为了开辟涪陵、武隆、彭水、忠县交界边区的革命根据地，红军二路游击队成立的当天中午，即按计划向武隆进发。4月9日红军进至武隆县沱田地区，前委在这里召开了会议，检查并研究今后的工作。会议调整了领导班子，因李鸣珂已回省委，调赵启民为总指挥。会议分析并决定了对活动在丰都、石柱边境的“神兵”大刀会的统战政策。当天，“神兵”秦兴隆、左传合部在沱田与游击队相遇，并接受了游击队的改编，游击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红军到来，吓坏了沱田的大地主黄铭辉，他火急逃到白涛求救。白涛镇长周振树率三百多团丁来攻，被游击队在沱田附近击溃。同时，盘踞乌江南岸山区羊角碛的团阀周燮卿，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以“联合抗敌”为名吃掉游击队。前委根据周部兵力大于自己十倍的实际情况，采用虚张声势的办法唬住了周部，使之不敢直接与红军对抗。红军在沱田、烂坝子等地打富济贫，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成立苏维埃政府，农民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参加红军。5月14日，秦兴隆受红军游击队派遣到神兵总部拜见神主汪长清，汪表示愿意与红军合作，并约定在

黄沙坝会合。

5月16日，红军在黄沙坝与“神兵”汪长清会合。5月19日，红军经新建、杨家坝抵达廖家坝。根据省委原来的指示^①，游击队迅速占领了栗子寨，准备以此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时，石柱县三根树地区的共产党员李干之等人，率领农民赤卫队一百多人，丰都何安然、唐世才等率农协会员一百多人，中坝沟戴子新、三羊溪陈茂清、磨刀洞秦惠丰等也纷纷率领赤卫队员，到栗子寨会师，游击队扩大到二千多人。各地农民军组编为赤卫队，由李干之任队长。栗子寨解放后，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在寨前山麓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在栗子寨建立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配合红军打击敌人，开展苏区各项工作。1930年5月下旬，根据地从栗子寨一带迅速扩大到回龙，在杜家岩、张家岩、焦不岩、火烧岩、杂光坪等地，以火烧岩为中心，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同时，发动群众掀起了参军热潮。部队在回龙加紧整训，准备开辟新的区域，迎接新的战斗。在这样的革命高潮中，回龙地区市场繁荣，人心安定，赤卫队员站岗放哨，秩序井然，到处张贴着革命标语，到处有红军的宣传队。

攻打栗子寨时，王岳森来到栗子寨帮助指挥攻寨，红军攻占栗子寨后，由于种种原因，游击队内部发生分裂，导致兵力削弱，因而，前委认为游击队不应孤守栗子寨，应扩大到丰都、石柱交界的太平坝，游击区应扩大到涪陵、彭水、石柱、武隆和丰都五县边区。5月30日，游击队离开栗子寨向双龙方向转移。在双龙，前委严厉制止了部队中的分裂行动，将部队整编为一个纵队，共

^① 4月初，红军二路游击队成立时，执行的省军委计划是准备在丰都、石柱边区建立根据地。5月10日，牛大鸣从上海回到重庆，带回了中央的指示，省委对红军二路游击队的进军方向问题更明确了原有意见，因而有进攻栗子寨以后的发展。

七百余人，赵启民任队长，王岳森任总指挥，苟良歌为党代表。6月11日，前委派陈静率红军一部进驻太平坝，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经一个月紧张的工作，游击队先后在回龙场、坝周坝、后坪、太平坝等地建立起苏维埃政府，苏区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以栗子寨、回龙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反动军政当局和地主土豪的恐慌和仇恨，他们纠集反动武装不断向根据地进攻。6月23日，红军游击队在太平坝与敌军激战，粉碎了都督乡一千多反动武装的进攻。红军游击队还打败了坝周坝王子林、郎瑞丰等率领的地方武装的多次袭击。6月27日，游击队撤离太平坝。

7月初，郎瑞丰、杨森等纠集涪陵、丰都、石柱三县地方团防，从四面袭击根据地中心回龙场。指挥部在组织反击的同时，及时指挥部队撤离地势于我不利的回龙，游击于彭水、涪陵两县地区。但敌人大规模的围攻又已开始，前委决定游击队主力沿龙河上溯脱离根据地，从方斗山进入湖北利川县。7月中旬，游击队经石柱流水等地到达鱼池坝，遭到黄水、悦来、鱼池、石家等团防一千多人的围剿。突围后，红军游击队八十多人于8月初转战到忠县、丰都交界的蒲家场。

此时，苟良歌历尽艰辛带回了四川省委指示：二路红军游击队所剩人枪很少，应立即结束，说服参加红军游击队的农民回家隐蔽，少数干部回省委，多数干部到三路红军游击队，以加强三路游击队的领导。苟良歌召开了最后一次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按省委指示行动。会后，由周晓东负责说服政治部和妇女队，李焕堂说服起义的农民，赵启民说服涪陵武装起义的士兵和青年先锋队，要求大家或是回农村隐蔽，或是打入白军中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待时机成熟时再个别或集体加入红军或游击队。同时发给每人一元钱的路费。荀良歌、周晓东、陈静等调回省委，听候省委安排；梁斌、邓震东、赵启民、王岳森、赵理君等多数干部前往四川红军三路游击队，继续在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

（根据中共涪陵地委党史工委二路红军编辑组提供的资料，参考《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7期载永向前《二路红军游击队始末》，由周舟删节整理）

遂宁吉祥寺武装起义

吉祥寺事变发生于1930年。它是中共四川省委在遂宁吉祥寺争取民团，开展匪运，准备武装起义的过程中，遭受军阀镇压的一次军事事变。

早在1927年，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便曾分析民团、土匪和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我们决定在农运开展之地注意民团工作”，和对一部分易于接受我们主张的土匪头目“设法渐次改变其思想行动，促其打富济贫，不受招抚。并为各地土匪取相当联络”等工作方向。吉祥的民团、匪运，实际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开展起来的。

吉祥寺的民团，属遂宁民团组织边防军农村警卫司令部（又称“八县联防指挥部”）所辖的队伍，其头目李树驊是吉祥寺的土豪。这个司令部内党的组织是从两个方面起来的。一方面是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李鸣珂直接领导建立的。1928年李鸣珂在四川中部一带开展兵运时，常往来于成渝两地，曾在边防军上校参谋、革命人士贾良俊家设了成渝通讯处。贾曾参加过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李鸣珂认识刘伯承同志，还是经贾良俊介绍的。所以二人的关系十分密切。贾又与农村警卫司令李树驊关系密切，他们都是云南护法起义靖国军的旧部。因此，李鸣珂以贾良俊的关系认识了李树驊，常往来于农村警卫司令部。李树驊因贾、李的影响加入了共产党。

另一方面，这个司令部下辖的第十大队里，也在1928年有了党的活动。这支民团队伍，原是参加泸顺起义失败的共产党员刘汉民、吴而笃二人帮助组织起来的。加入农村警卫司令部民团组织后，被编为第十大队，由何致远任大队长，集凤场的土豪蒋安国任副大队长，但未到职，由蒋述法代理。蒋述法经吴而笃介绍入党，于是在这支队伍里就建立起了党的基础。在这支队伍里还有参加南昌起义失散后转回家的共产党人蒋协南（已失掉党的关系），积极在东乡集凤的地方土豪中进行活动。吴而笃又将活动于华蓥山的游击队武装三十余人带来参加这支队伍，成为这支队伍革命力量的核心。他们在蓬溪东乡大力开展匪运和争取民间的松杉教神兵等工作，并与岳池的民团首领陈徒南等取得联系，同盘据于南充、遂宁等地的军阀对抗。

1929年省委在组织四川红军第一路起义时（即旷继勋部起义）曾准备将这一部分力量组织进去，同时举行起义。后因李树骅不同意，和其它一些客观条件的影响，未果。在旷部离开遂宁以后，军委又将原在旷部工作的共产党员李载浦、范弘先、罗南辉、李伯庸、程俊夫等留在农村警卫司令部加强民团的工作，李载浦并担任了司令部的上校参谋。

这时，在遂宁、南充两方面地方军阀武力的强迫下，第十大队瓦解，何致远部被边防军改编为独立营，开往遂宁。吴而笃等为了不使李家钰全部吃掉这支队伍，就由吴率领蒋述法、尤德明、雍平垓等三十余人组成的手枪二队、转到吉祥寺，参加了农村警卫司令部的民团队伍。同时他们将东乡的匪运过来的队伍带到了吉祥寺。这时遂宁党的主要负责人是李载浦。

1930年，省委又将一度离开了指挥部的范弘先及射洪的余云程（余若萍）派到吉祥寺。并将领导过双江镇起义的瞿联承旅的军

特支书记赵子文，由射洪调到了吉祥寺，担任起义的领导工作。同时批准成立中共遂宁支部，由赵子文任书记，李载浦、范弘先、程俊夫为委员。支部成立了军事小组，由罗南辉任组长，蒋述法、雍平垓为组员，负责军事训练。支部计划将这支队伍和南部升钟寺的民团联合起来举行起义，在升钟寺建立根据地。因此赵子文、李载浦等把南部团练局长、共产党员张友明和黄金地匪运过来的队伍都集中到了吉祥寺。因而吉祥寺的队伍越来越多。党支部为了筹集起义的经费，又派蒋述法率一小队人，潜伏到南部张佑民家，借机绑架了南部三官场富绅董雨征和蓝玉阶，向董家索取十万银元的赎金，以作起义之需。董家住重庆。张佑民、蒋述法曾数次到重庆索款，董家都以款项太巨，筹措不及推辞，往返旷日持久，起义时间因此被拖延了下来。董、蓝被禁于吉祥寺的消息也被透露到了李家钰那里。

自旷继勋起义失败后，李树骅就表现动摇，很怕李家钰发觉他队伍里有党的组织。如当时由旷部调到联防指挥部的范弘先，由于影响较大，他就要求范离开他的队伍。后因匪运工作需要，范又被调吉祥寺。在民团里也还有另外一些动摇分子。党支部为了制止这些动摇分子发生叛变，就组织了汪治国等专门负责惩治叛变分子。有一次汪治国就在白天把一个叛变分子打死在遂宁一个饭馆里，一时城内空气非常紧张。李家钰向李树骅追查绑架董、蓝的事，并派便衣到吉祥寺一带侦察。李树骅初不承认此事，一直拖延到了夏天。由于城里空气越来越紧张，晚上街头随时都可以听到对射的枪声。李家钰逼迫李树骅带队到吉祥寺“清乡”，并指名要交出吴而笃。因此李树骅便接受了李家钰的命令，于6月1日带领队伍包围了吉祥寺。

当李树骅与李家钰正在密谋的时候，党支部也正在积极作起

义的准备。一方面派人到重庆催董的赎款，一方面将党支部的领导人集中吉祥寺小学（党支部所在地）研究起义的具体方案。李树骅在进攻吉祥寺以前，为了不透露消息，先将一部分在司令部工作的地下工作人员扣押。在敌人围攻吉祥寺时，赵子文、李载浦、范弘先、程俊夫、余云程等都在包围之中。敌进攻矛头主要对准起义的核心力量，首先将三十多名手枪队员包围，并用伏兵将队长吴而笃打死。清剿队伍的另一部分包围了党支部所在地吉祥小学。李载浦是李树骅司令部的参谋，便声称赵子文、程俊夫等都是李树骅的朋友，要求面见李树骅。李载浦等知道，李树骅虽然叛变，但心里仍然惧怕李鸣珂在惩罚叛徒时所采用的严厉手段，同时他也害怕李等当着众人的面揭露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最后李树骅被迫将李等送出境。范弘先逃出重围后，又设法将李扣押的杨德元及其他一些人营救出来，其余的队伍也因此全部瓦解。

在吉祥寺事变以后，李家钰又派人包围了赵子文教书的康家渡小学。校长何维肇和大部分教师都未在校，所以扑了一个空。吉祥寺准备的武装起义，因李树骅的叛变而遭到失败。

（中共遂宁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梁达虎南农民暴动^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梁山在外地求学加入共产党的青年学生石子安、范继曼、王炎离等，先后回到梁山，成立了地下党特支。开始时，主要在县城几所学校及虎城、龙沙等乡活动。为着斗争的需要，虎城的石子安、石怀宝、石卫卿等被派回乡，成立了党的组织，进行革命宣传，开办平民夜校，建立农会，还成立了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与此同时，毗邻的南岳场在地下党员金治平等人的领导下，以“土地会”、“锭子会”等名义，进行串联，在几月内发展了农会会员千余名。

是年冬，团局改选，由于地下党组织的积极活动，石卫卿、刘湘臣被选为正副团总，石怀宝、石清成被选为正副大队长。这样，虎城场的地方政权和武装全为共产党员所控制。

1928年，梁山县府成立县团务委员会。在地下党积极努力下，李光华、王一贯分别担任了龙沙、太平乡的团总职任，李光华还被推荐作县团务委员会委员。从此，李等利用合法身份，经常到各乡去组织和发动群众，并先后在各乡镇委任了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作民团队长、大队长，发展了革命武装力量。如虎城场被地下党控制的民团武装达数百人；太平乡由李光华带领的武装力量有二百多人，一年后，发展到人枪四百多。这些武装的建立和发展为进行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

^① 梁达虎南即梁山县虎城场，达县南岳场，梁山，今名梁平。

中共四川省委对虎南地区的工作极为重视，及时派省军委委员覃文来虎南指导工作。接着，又派省委秘书周三元（即邹进贤）来梁山巡视，宣传党的政策，开办党员临时培训班，培训基层干部等等。1930年1月26日，党组织派杨勃、张野南枪杀了虎城大土豪石文蛟。6月，党组织又发动当地农民数千人，将虎城寨包围，迫使县长谢璋将杀害革命群众的恶霸石玉楼关押，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1930年夏，因达县南岳一带的苛捐杂税太重，群众怨声载道，金治平等及时发动和领导抗捐斗争，成立了“南岳人民抗捐大同盟”，组织了数千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和罢市等斗争。

1930年7月，蔡奎、金治平等数十人到虎城附近的向家嘴、赵家湾进行活动，行至南岳施家河，与军阀刘存厚的部队徐营相遇，打了起来。由于敌人数倍于我，蔡奎当机立断，退至联陞寨内，凭险固守。刘存厚闻讯，增兵一团围寨，断水断粮，万分危急。当时省委派来的牛大鸣、覃文、王炎离等正在开会，闻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把熟悉军事的干部李云程、杨朴从太平场调至虎城场。然后组织数百人，集中步枪百余支、手枪十余支、战刀三十多把，向敌人进攻。同时，还发动农民数百人四面包围呐喊助威，枪声不绝，造成强大攻势，吓得敌人仓惶逃走。这一斗争取得胜利后，党组织决定将虎城革命武装六百余人、枪三百余支集中起来，开展游击斗争。不久，省委指示虎城和太平、龙沙的农民武装合并成立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远征湘鄂西，与贺龙所部会师。7月28日，省委派来筹备成立下川东中心县委的牛大鸣（原名牛正声）在李光华家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行动计划。会上对“东进”问题虽分歧较大，仍决定部队在忠县的黄钦坝集中。7月29日，虎南、太平、龙沙三支队伍共千余人齐集黄钦坝

场上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由李光华任司令，王维舟任副司令兼前敌总指挥，王炎离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三个大队。同时还设立了前敌委员会，由牛大鸣、覃文为主要负责人，王炎离、蔡奎、李维为前敌委员。

起义部队由黄钦坝进至花桥寺休整三天后，指挥部决定东进。在经马家、云元到九亭的途中，击溃了几百民团的阻击。由于起义人员多是团丁组成，教育时间太短，旧军队习气很浓，乡土观念义重，一听说部队要远离家乡开往湖北，思想上就发生动摇。队伍到达石宝寨后，在当地党的地下组织的帮助下顺利渡过长江。此时，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遭到失败，其主要干部赵启民、饶春生和平民革命军的秦伯卿各带领部分官兵，前来参加，部队力量有所增强。当游击队进至石柱西罗坪时，军阀陈兰亭部张晓平团尾随而来。由于我军平时缺乏训练，指挥不统一，第二大队的部分官兵自行后撤，第三大队也跟着后撤，敌人乘机从四面八方向总指挥部猛攻。总指挥李光华奋力组织部队抵抗，当他亲自带领部分战士到山梁上察看敌情时，同敌人接上了火，警卫员王天伦、古绍青英勇战斗，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李光华身负重伤后被俘，李次华、饶惠丰等亦被俘，后均被敌人杀害。副总指挥秦伯卿虽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只好带部分人员撤退。至此，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遭到失败。

(中共达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颜昌忠整理)

合川兵变

合川兵变是1930年中共四川省委直接领导下发动的，是当时全省的四大兵变^①之一。

1926年，当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四川军阀纷纷易帜之时，中共重庆地委选定了愿意接受革命主张、有一定进步表现的，驻防合川的邓锡侯二十八军第三师为军运工作基点之一。师长陈书农在大革命潮流的冲击下，较早地接受在部队成立政治部的措施。重庆地委派刘愿庵到政治部任宣传科长。不久刘调离，便推荐范英士担任此项工作。12月底重庆地委又派陈仲弘（陈毅）到政治部任中校组织科长，并在该部军士教育团教政治课。他向学员大讲革命道理和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同时，在军队中发展了党员，建立党的组织，革新了政治部主办的进步刊物《武力与民众》，并为刊物亲自写稿。陈仲弘在合川的革命活动，为后来党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陈仲弘被迫离开合川。但党在三师中的活动仍隐蔽进行着。陈卓、杨耸、凌朝忠等一批年轻共产党员，乘三师军事教育团改为军事政治学校招收学员时，考入该校受训。一年毕业后，就分到部队当了下层军官。同年10月四川临时省委又派周思齐、钟又尊等人到合川林翼如旅部任政治副官。他们创办了进步刊物《士兵周刊》，开展了党的活动。

^① 四大兵变即合川兵变、江津兵变、广汉兵变和旷继勋部兵变。

1929年6月省委又派黄肇纪回合川（公开职业是简易师范校长）开展学运，与军运配合，为武装暴动作准备。同时来合川的，还有团员廖瑞呈、杨镇丰、戴祖瑶、甘大成等人。他们与合川女中校长李光岱、进步教师岳琼林等配合，发动两校的师生员工，利用节假日上街进行宣传活动。

1929年9月，四川临时省委派李璧澄来合川任县委书记，为发动组织兵变充实了领导力量。接着旷继勋旅的一部分进步官兵易文斐、戴力等十多人，也陆续来到合川。合川县委机关设在简易师范学校内。合川紫金巷康家院（又名歪朝门）是县委的联络点。

1930年春，县委对全县党、团组织进行了清理，当时共有党员百余人。军队中建立有党支部（简称军支），城区有合阳区党支部，简易师范学校、合川女中、天健体专、涪溪复兴小学，均有党团组织。在农村狮滩场建立了区委。一些乡镇也建立了支部。

1930年7月25日至28日，省军委在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在江津召开全川军支联席会，决定组织十七路红军游击队，会师重庆，进攻武汉。1930年8月省行委派了罗世文、李鸣珂来合川巡视，在县城塔耳门外一个坟坪开会，错误要求合川立即组织行动。县委按照全国总暴动的计划，成立了军运特委会，由李昌炽、黄淑华负责与军运联系。县委分析情况，错误地认为云门镇和城内较场坝新营房两处驻军的暴动条件成熟，决定首先在云门镇发动。同时派游击队长冉正清打进新营房驻军当兵，为暴动做准备工作。当即成立了“中共合川县行动委员会”，书记李璧澄，组委潘自寰，宣委黄肇纪，工委陈福田，青委廖钧。随后省委又通知，以合川为中心成立合川、武胜、铜梁、大足、璧山五

县行动委员会(简称合武行委),李璧澄任书记。兵变成功后拟成立“四川红军第四路(合川)游击队”,指挥总部设在合川城内紫金巷康家院内。接着,省行委决定在合川首先发动兵变,委任赵伯先为合武行委书记,调李璧澄去重庆,但暂不离开,协助赵的工作。赵到合川以后,认为主观力量差,不能举行暴动。省委批评赵伯先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定给予撤职留任的处分。又立即派范子琦来合川领导兵变。当时合川行委认为,党在主观力量上已有同志近四百人;陈书农部队驻云门镇的十五混成旅的一个营,已组织发动就绪;驻新营房五旅的一个团三个营也活动成熟。决定兵变地点选择在城郊较场坝新营房和纯阳山,以及云门镇、双凤场等四个驻兵处,以新营房的五旅二团为重点。

为了配合兵变,8月20日晚,狮滩区委首先组织三百多名农会会员,高举“四川红军第四路合武纵队合川支队狮滩大队”的红旗,手持大刀、土枪、长矛,在狮滩场举行“秋收起义”。兵分两路,第一路由区委书记秦槐率领二百余人,攻打团防局长王子敬的庄园葛家岩,夺取王家和区长李君博的枪支弹药。农军到达葛家岩寨下,首先割断了通往合川的电话线,然后搭起竹梯向寨墙上攀登,但迟迟未见寨内接应信号,便立即撤回,准备第二晚再行动。第二路百余人,攻打长生寨地主李秉奎庄园。农军到达后,寨门紧闭,农军手持大刀、土枪等武器,知道李秉奎养有家丁,备有枪支弹药,不敢硬攻。见河对面第一路攻打葛家岩又未打响,也即撤回。

狮滩农暴失败后,五县行委决定,8月23日在陈书农部队驻云门镇的十五混成旅第三团组织士兵暴动。计划在团部给一营长祝寿,将主要军官聚集在酒席上,然后士兵于晚上里应外合,杀死军官(口号是要兵不要官),拖出部队,打出红军旗帜。后因叛

徒告密，中午团部就勒令士兵将武器全部入库，并加强了营门警卫，不许自由出入。负责指挥兵变的向子瞻，见情况有变，胆怯而去。晚间，行委派去在营门口接应的戴力、邓福全等，用电筒照射施放信号时，即被逮捕。第二天即遭敌人枪杀于云门镇。

8月24日，五县行委按原计划又组织城内新营房的兵变。行委组织的破坏队分布在南津街，北门外、塔耳门等三处，计划先切断电线，在深夜熄灯后杀掉军官，举行暴动。行委派进去的团特派员高于钧，久等未见第三营行动，第一、第二两个营也迟迟未动。自己惊慌失措，不等行委命令，就逃跑了。兵变未成。

9月1日，五县行委又决定在新营房发动第二次兵变。从组织上、力量上都作好了准备，指挥部设在小南门河边一支船上。行委的李璧澄、黄肇纪都参加了指挥部的工作。并从简易师范学校和狮滩区委抽调十多个党团员分别在纯阳山、北门朱家巷和苏家街衙门口、小南门等处，发放火信号和散发传单。又派人先运进了一批匕首到新营房，发给士兵，布置他们等到火起、枪响，每三人一起，持匕首先杀守护武器库的卫兵和军官，然后拖出武器，与外来接应的人员配合，占领新营房后就攻打师部。行委派已在部队当排长的张也南为内应，以鸣枪为号。张正准备到营门口鸣枪，至七连驻地的巷道，却碰到执勤官傅尊帆，张十分紧张，不慎手枪落地，傅立刻呼卫兵将他逮捕。傅从张也南身上搜出了准备暴动的士兵名单，立即集合全营士兵搜查，查出了匕首，并急电报告了陈书农师长，立即全城戒严搜查。由于鸣枪信号落空，去纯阳山制高点组织一连驻军暴动的唐促征、秦友石二人，久等未闻新营房的枪声，便派人在山上先放火。士兵以为是失了火，前去扑灭，从燃烧的火中，发现了宣传兵变的印刷品，便急向师部报告。城防司令部立即出动部队包围了纯阳山，大肆

搜查。正在纯阳山下朱家巷一带准备发放火信号的秦槐、刘登奎等，在戒严中被逮捕。刚要天亮时，联络员王树槐到小南门旅馆向李璧澄汇报：“新营房失败了，张也南被抓”。李璧澄、易文斐、王树槐与赵伯先便乘船撤走重庆。

李璧澄、赵伯先、范子琦离开合川后，郑佑之被任命为县委书记。1930年12月，省行委又派了曾海云、邓止戈、何志华等来合川清理组织，继续开展军运，打算在条件成熟时组织兵变。曾海云分工负责工运，邓止戈、何志华负责军运。他们趁补充新兵的时机，打入新营房机枪连和电话兵连当兵，暗地清理组织，重建了军支。这时，陈书农悬重赏缉拿组织兵变的首要分子，军运工作十分艰难。行委指挥机关迁到了北门楼子坎。不久，行委机关被抄，何志华被捕，邓止戈混出营门，与郑佑之一道撤往重庆。最后一次兵变计划，在孕育中也流产了。

1930年从8月到12月，合川发动的几次兵变都失败了，先后牺牲的同志有二十多人，被捕的有七十多人。

(中共合川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杨联陞整理)

江津兵变

1930年7月，中央派余乃文来四川任省委军委书记，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即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8月，省委在重庆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江津、合川、广汉发动兵士起义，在荣昌、铜梁等地发动农民暴动，积极配合全国暴动。

自“六大”以后，四川党为了加强革命的兵士运动，在江津的国民党二十四军刘文辉部的暂编第一师第二混战旅中建立了党的组织。省军委派杨云樵到江津负责该旅党的组织、宣传、教育和训练工作。杨云樵的公开身份是师部军法处法官。省军委还指定李崇实（师部录事）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副师长兼旅长张志和（又名清平）是中共党员，旅军支成立后，是军支委员。他1929年即与省委军委书记李鸣珂有直接联系，曾由李崇实送去手枪多支。张志和作为副师长，掩护了党的活动，党在二混成旅的力量逐步得到发展，在一些连建立了党的支部。这是省行委在江津二混成旅发动士兵起义的重要因素。

其次，江津和合川邻近重庆，省行委错误认为这两处同时发动起义成功后，可分别从长江和嘉陵江顺流而下攻打重庆。然后，沿江直下，“会师武汉”。江津兵变是党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总计划的一部分。

第三，1930年，江津县委重建后，由龚秉仁（又名文棋）任书记，委员有陈叔唯、龚慰农。县委清理、整顿和发展了组织，

在李市、马宋、蔡家等地组织了农民协会，发动了农民斗争。在城镇把电话工人也组织起来。如兵士起义，可以发动工人、农民配合。

第四，江津人民对反动统治充满了仇恨。党建立后，在江津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人民接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工农要翻身”等革命口号。在江津发动兵士起义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

江津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条件下发生的。

1930年8月26日，省行委决定在江津、合川两处同时进行兵士起义后，建立第七路红军游击队。并任命项鼎（即苏爱吾）为党代表，于渊（于邦齐，第二十一军刘湘军第二师第六旅旅长）为军长。因张志和表示不支持起义，省行委认为张不可靠趁他因事去成都时，决定立即发动江津兵变。

8月29日，起义领导人罗世文、项鼎与徐幼平中午到江津，住在贺竞华（在重庆省军委工作）的家里。贺竞华的父亲在江津开设药酒铺，在当地有些名望，和驻军有联系。项鼎他们到达江津后又会见暂编第一师第二混成旅党的负责人李克俊（又名李德孚、李心田），研究了起义事宜。

29日傍晚，在江津对岸德感坝的一位同志家中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参加的有省军委、旅的党组织和江津地下县委的同志。这次会议对起义作了具体部署，定于9月5日起义，成立了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成员有项鼎、于渊、李克俊、龚慰农和曹泽芝（女，江津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会后，县委书记龚秉仁与军委同志发生过争论，龚秉仁认为起义危险性大，纵然兵士起义成功，以少数兵士力行几千里路程会师武汉，前途难以预测。军委同志反复打通他们的思想，最后说：“党中央的决议，

你怎样对待？”龚秉仁只好表示服从，并准备调动力量响应。当时江津地下党同志在江津城的只有三四人，团员多一些。

起义工作正在筹备中，不慎机密泄露。张志和离开江津时，将职务交由四团团长方魏镛代理，魏镛很反动。第二混成旅兵力分布情况是：第五团驻德感坝，团长是黄仲华。第四团和第二十四团驻城内，第二十四团团长方魏鸿钧。旅参谋长刘中生兼江津县县长。师和旅司令部设在县城内，离县府不远。敌人探知要发生兵士起义，采取了预防措施。一到傍晚，就把士兵的枪收藏起来锁在一间屋子里，并派人看守。同时，派人在邮局检查来往信件。风云突变，气氛紧张，干部和战士都有些恐慌，议论纷纷。于渊得知起义计划泄露，敌人已有准备，提出起义不能发动，否则不仅要失败，连部队里的党组织也将遭到破坏。他的建议没有被接受。项鼎在小十字曹泽芝家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提前于9月3日起义。

9月3日，首先起义的是驻大西门外丝厂（今三五三九厂所在地）附近的直属机枪连。机枪连在城外操练，因为要作示范，发了两挺重机枪。傍晚，将要收操的时候，李先俊带了几个精干的同志按照事先约定的口号，配合机枪连党组织的同志夺了机枪（其中一挺没有撞针，只有一挺能用）。机枪连士兵起义后，由通泰门打进城。驻通泰门的四团一营第一连和第三连都是准备参加起义的。当机枪连起义士兵到通泰门时，一连（连长彭树森）、三连（连长吴毓英）鸣枪响应。一营营长方文德起来镇压，被起义士兵打死在通泰门口。

江津兵士起义了。驻北固门的第五连的士兵原来打算参加起义，但武器库被军官把守了，营门也关闭了。

江津在长江之南，三面临水，象一个半岛。一条从西向东的

长街横贯全城。从大街到河滨有嘉惠街、通泰街和七贤街相通。起义在晚7点打响后，天已经黑了。起义战士从通泰街冲向小什字，然后向东直攻县府（今衙门口）。这时，除了一挺机枪外，还有一些步枪，城内的同志也闻声前来参加。敌人方面警卫县府的是四团一营，他们在县府前设置沙袋做工事掩护，凭此顽抗，并从后面侧门调来了援兵。因于渊是川军老军人，认得的人多，未到战斗现场，项鼎来到县府门前指挥。战士们冲了几次，也攻不进去，有的起义兵士见攻不进去退回去了。

守卫师旅部的是二营六连的一个排，他们是约定参加起义的，听到枪声后立即响应。师部上校副官长张伯卿出来镇压，被起义士兵打死。师旅部在考棚，驻考棚内左侧的四团一营二连没有参加起义，即刻占领了考棚后半段。起义的六连一个排的战士企图拿下考棚，因人少，力量薄弱未能实现。此时，驻东门城门口下面的第四团第一营第四连武装占领了东门城楼，居高临下，截断了起义士兵进出东门的道路。驻县府右侧的四团三营没有参加起义，派队伍支援了据守师旅部的一营二连，同时截断了县府门口东门大街的通道，阻止了攻打县府的起义兵士与师旅部门口起义兵士的会合。

战斗在进行，敌人在聚集力量。驻城南部和西南部的第二十四团（团部在文庙侧边）魏鸿钧，驻城内、城北部和东部的四团其他连队占据了东西大街的各个街口，并在各条街口安设了警戒线。二十四团团长江魏鸿钧同一营长兼城防司令陈子卿率队伍从小什字的三品金绸缎铺后面翻墙过来，袭击起义战士的背后，起义战士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局面。县府又攻不下，渐渐地被逼到通泰街和七贤街的一段狭小的区域内。在敌强我弱、敌众我

寡的形势下（驻津城有二十七个连，起义的只有四个连），起义战士仍然坚持着战斗。

江津地下党的同志，事前并不清楚9月3日哪个时刻起义，正在赶赴起义的途中，敌人的火力封锁住街面，交通断绝，龚慰农被阻挡于大河沟。稍晚，曾庆云、曹泽芝自动跑出来了解情况，并担负交通联络工作。曹泽芝左脚中弹受伤。

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天又快亮了，起义战士只好撤出城外。一部分由通泰门、北固门河边过对河上中渡街，朝永川铜梁毗连的东西山方向前进；一部分沿河东下；一部分从先锋、夹滩到四面山；一部分由仁沱、广兴到綦江、南川。队伍拉出后，已经涣散了。没有撤出的起义战士，一部分隐藏在老百姓的家中，如起义的六连连长彭树森等，一部分回到了营房。

天亮后，项鼎和于渊回到了贺家药铺，正遇着敌军在搜查。贺家说项鼎和于渊是他的亲戚，就掩护过去了。9时过戒严解除，于渊先搭船回了重庆。项鼎留下来找到县委的同志和部队骨干，让他们集中起来向綦江、南川经酉、秀、黔、彭去湘鄂找贺龙的队伍。

9月4日清晨开始，魏鏞、刘中生和陈子卿率领敌军对全城进行搜查。清点军内各团人数、武器，监视有嫌疑的人，进行戒严搜查。

搜查进行了好几天，逮捕了百多人。其中包括起义士兵和江津地下党的龚秉仁、秦志敦、曹泽芝和其他人士刁茂维（书店老板）、杨克从（老师）、李德安（照像馆负责人）等。

项鼎在于渊走后的第三天赶回重庆向省行委报告请示。省行委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派先回省里的李克俊等几人去白市驿及白沙镇等交通要道设立收容站，尽可能将党员和积极分子收容起

来，分别介绍到各有关部队予以安置。二、增派帅朝吟和项鼎去追赶散了而又结集起来的起义兵士，要他们向贺龙部队靠拢。

江津起义一发生，刘中生就电告了刘文辉，要张志和立即回去严肃处理，以整军纪。同时，还斥责张志和纵容共产党。

张志和日夜兼程回到江津，就被团营长包围，他们主张对抓起来的百多人一律枪毙，态度很强硬。结果部分被捕人员壮烈牺牲，其余被判了徒刑，释放者仅二人。江津兵变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

(中共江津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铜梁土桥农民暴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各大中心城市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爱国人士纷纷向中、小城市转移。从北京、武汉、广州等地转移到铜梁的党员和进步人士有吴建庄、牛大鸣、赖鸣柯、杨其生等二十余人。他们分散在铜梁中学、国立师范、正谊、养正、县立高等小学和土桥王氏达立学校等八所中小学，以任教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开展革命工作，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先后在学生和工人中发展了濮文昶（又名华辅）、陈世邦、李思纯等入党，在学校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党小组。同时还在青年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建立了团的组织。

1929年2月，铜梁党的负责人牛大鸣（又名牛澄夫，省委秘书长），出席了省委在成都召开的临时省委扩大会，回县传达了党的“六大”会议精神。不久，牛调离铜梁，党的工作则由濮文昶负责。这段时间，铜梁党的组织注意农村工作，党的基层组织在乡村有了较快的发展。1929年底至1930年初，土桥、平滩、东区（旧县）先后建立了区委和支部，由雷汝维任区委书记，东区支部由李思纯任支部书记。新民、板桥、福果、天锡等乡均有了党的活动，并个别发展了党员，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1929年寒假期间，土桥王氏达立校教师雷汝维（本县人，黄埔毕业生，共产党员，曾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回铜梁）以学校

的名义，在土桥中心小学创办平民夜校，趁修铜（梁）大（足）公路的时机，动员组织筑路民工、街道居民和附近农民入校学文化，进行革命教育。南郭冷氏萃英校教师周述良（共产党员）利用星期天晚上在巴岳山松林口冉鸿章家，将沿山一带的煤窑、纸厂的工人组织进校培训，培养了积极分子共二百多人。1930年10月土桥武装起义前夕，土桥地区党、团组织已有相当的发展，小学、农村都有党、团支部。党、团员发展到二三十人。在党组织的领导发动下，大部分农村成立了农会和农民武装，为土桥的武装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

1930年7月省行动委员会决定发动暴动，组织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于是，铜梁县委负责人濮文昶在铜（梁）、武（胜）、合（川）、大（足）、璧（山）五县暴动负责人赖鸣柯的领导帮助下，成立了铜梁县行动委员会，由濮文昶、冉欣向、江正隆、雷汝维等人组成，多次召开了行委会议，讨论了行动计划。

暴动前一月，县行动委员会在养正学校秘密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的人员主要是全县各基层的党员骨干和有关人员，还有邻县如大足的赵理君、周初平（均系党员）等二三十余人。这次会议由濮文昶、赖鸣柯主持，主要是在党内传达贯彻县行动委员会的计划。决定发动以土桥、玉龙地区为中心的合、武、铜、大、璧五县工农武装暴动。会议还决定：（一）成立土桥武装起义指挥部，以万平为司令员（指挥员），濮文昶为政委，雷汝维为副政委，江正隆负责联络，冉欣向负责后勤工作；（二）武装起义的番号，定为四川红军第七路军“川东游击纵队指挥部”；（三）选择土桥为武装暴动的中心点，指挥部设在土桥巴岳山手爬岩潘延兴纸厂；（四）起义时间确定为1930年10月6日

（即农历八月十五日）；（五）进攻目标，先打土桥场乡公所、税卡，进而破城。此外对起义时散发传单、标语、口号、安民告示等都作了研究部署。

会上还宣布了暴动中的纪律：（一）一切行动听从指挥部指挥，严格实行请示报告制度；（二）严守机密；（三）不得无故鸣枪，不准乱杀乱捕；（四）缴获要归公，不准私吞隐匿；（五）要冲锋陷阵，不准临阵脱逃；（六）不怕牺牲，不准投敌叛变。

扩大会议后，濮文昶、江正隆等亲自去西山一带巡视、检查，并召开工农群众大会进行动员。

9月底，行委、总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先后到了指挥部，大家忙着赶制义旗、布告、标语、传单工作。不幸消息泄露。参加起义的驻斑竹场的铜梁县保卫团山防大队第八中队二分队，由分队长黄明渊、陈云辉等率领，于农历八月十日晚上，提前拉出向土桥总部开拔。黄部出发时将斑竹场通县城的电线截断。第二天被斑竹场团总黄梓芳等人发觉，乃飞报铜梁县府。县长陈文府闻报，立即呈电驻军和飭令团练局长冷天庆（冷雪樵），急速调驻军和各乡分团队，向土、玉地区的起义队伍进击。黄明渊率部于当晚抵达指挥部，向司令员万平、政委濮文昶汇报提前开拔原因后，总部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发出紧急通知，将原定暴动日期提前于10月2日举行。事实上，除土桥当地的武装力量外，离本县较远的乡镇和邻县预先准备好的支援力量，都来不及赶到土桥参加暴动。

10月2日拂晓，附近各地武装力量和工农群众荷枪举戟陆续向指挥地点集中。万平、濮文昶等人立即将到达的武装力量三百多人，现场编组为三个大队，步枪和火药枪编入一大队，负责作战任务，其余编入二、三两个大队，负责抓土豪劣绅、运粮食、

办伙食、抬担架等。黄明渊部队为指挥部的警卫队，其余参加暴动的老师和学生编入政工队担任宣传工作。起义人员每人发给一根红布带拴在左臂上作为标志，并打出了“四川红军第七路军川东游击队”的大红旗。万平、濮文昶随即下达命令，一、二大队去土桥，黄明渊率警卫队作尖兵，提前出发，并指示黄部尽可能将土桥乡团总俘获。命令下达后，万平、濮文昶等与一、二大队一起急速向土桥进发，发现土桥团总夏作舟带领团丁四人携带武器，从土桥新街出场侦察我军动静，被我潜伏于林中的尖兵发觉，将团总夏作舟就地击毙（当时还在石板路上用粉笔写了夏的罪状）。雷尔家等四个团丁放下了武器被俘。尖兵进场时，鸣枪示威，未遇抵抗。一、二大队当先导，一路从木鱼坡进场，一路从猪市堡进场，随即政工人员展开宣传讲演，张贴安民告示和标语，散发传单。起义枪声一响，街上和附近的群众自觉持枪、刀、戈、矛等武器参加革命行列，队伍扩大到八九百人。攻打乡公所时，乡丁闻风逃窜，被我俘虏二十余人，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支，群众将乡公所砸烂，接着捣毁了税捐分卡，还没收二十余户豪绅地主的金银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并缴获枪支二十三支，子弹二百零六排。

起义队伍占领土桥后，中午时分县警备队已向土桥压来。鉴于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迫，万平当机立断下令起义队伍沿马滩桥大路向玉龙场撤退。反动武装尾随追来。由于我部撤退神速，未遇抵抗，顺利进入玉龙街上，攻打了乡公所。不久敌人向山上扑来，万平乃急令队伍向龙神口撤退，并在该地布署任务，赶吃中午饭。这时闻报游广居旅驻虎峰场古雨山营正从东面扑来，驻古龙村铜（梁）、大（足）、璧（山）联防司令陈渊阁所带人马从南面扑来，城内驻军游广居旅一部分人又从东北面逼近，起义

军处于三面受敌的境地。为保存革命力量起见，万平、濮文进立即下令，将起义农民武装划整为零，分散隐蔽。他们仅将指挥部的警卫队带走，其余的人向安全地方转移，轰轰烈烈的土桥农民武装暴动遂告失败。

土桥农民武装暴动受挫后，反动当局曾猖狂一时。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六十余人被捕入狱，共产党员周红河、彭海山，农民蒋吉山被杀害。县委书记濮文进、委员江正隆撤离。鉴于以上情况，省委立即采取措施，任命冉欣向为铜梁县委书记，负责清理组织，营救、转移同志，坚持隐蔽斗争。省委还派熊尔纯来铜梁，将县委机关化名“张清和”与省委直接取得联系。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铜梁地下党仍继续坚持隐蔽斗争。

(中共铜梁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荣县农民暴动

1926年，中共在荣县建立基层组织后，积极领导农民运动。1928年春，正式建立了中共荣县委员会。1930年，全县已有二十多个党支部，三百多名党员。党所领导的农民协会发展也很快，从1925年五宝镇建立农协小组开始，到1928年夏，参加农协的农户已达四千余户，计有会员一万六千余人。随即在全县各区、乡均建有农民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领导全县农运工作的总指挥部——荣县农民协会。至1930年8月入会农户增加到四万户，还有村赤卫队数千人。

1928年1月，中共川南特委在富顺县三多寨会议通过的“川南暴动计划”，把发动农民武装起义的工作放到了首要位置。1929年荣县县委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议，中心内容就是宣传、组织农民进行武装起义。随后在农民协会中建立了农民赤卫队。

1930年8月，川南行委（设在自贡）成立后，决定领导自贡全市人民为“夺取自贡地区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进行大罢工、大罢市，并决定各县举行秋收武装起义，配合自贡工人的斗争。

1930年，为了贯彻第二次“左”倾特定路线，上级党组织曾先后派何之、李觉民、刘曼等来荣县作军事活动的计划和武装起义的准备。8月省行委又先后派梅子乾（又名梅岑南）、熊灼微

(又名熊伯虹、张敬人)来县督促和指挥农民暴动。梅子乾来荣后，与当时的县委书记方沁接上了头，经过调查了解，认为荣县组织暴动的条件尚不具备，准备返蓉向省行委报告放弃暴动计划。正在这时，熊灼微来县传达省行委指示，大意是：各地都在加紧准备暴动，荣（县）、威（远）暴动是这次全川暴动的重要一环，应加速准备，不论条件如何，都要组织暴动，愈快愈好，荣威动起来后，可以促进其他地区暴动。熊灼微最后说：“省行委指示，非暴动不可，我是省行委派来帮助你们搞暴动准备工作的”。根据省行委的指示，县委开会错误决定：“全县于旧历八月十三日（公历10月4日）晚上同时起义，在李晏集中进攻县城，再夺取自贡市，然后东下重庆，最后会师武汉。”起义口号是：打倒万恶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政权归农会！没收土地归农民所有！打倒贪官污吏！会议还按照上级规定，将党、团、农会合并组织荣县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起义事宜。同时，把农民赤卫队整编为四川红军十三路第二纵队，梅子乾任纵队总指挥，熊灼微任副总指挥，纵队下面设若干大队、中队，纵队总指挥部设高山铺。

暴动前，各地党组织把参加暴动的人员组成小队，每个小队发给一支教练枪，并进行军事训练。1930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三日）半夜，纵队领导人梅子乾、熊灼微在高山铺按预定计划向纵队直属的五六百起义人员讲了武装暴动的意义，接着就宣布起义。暴动开始后指挥部立即率队缴获高山铺、鸦雀冲、梧桐等团防枪支四百余支，打开高山铺街上厚利盘剥穷人的当铺，把所有衣物、被盖分给附近贫民。当晚，暴动部队即从高山铺出发，次日拂晓，即达望佳，将团正刘泽昭抓来杀了。紧接着，队伍直向李晏进军，到达李晏时，见无行动，即从河口向小南区方

向游击前进。

由于南路区委的命令迟下，李晏、鼎新暴动队伍分别在14、15日才开始行动。14日晚上，罗文俊（时为中共李晏支部书记兼南路区委委员）集齐李晏队伍一百多人，在金方洞沈德三家布置夺取李晏团防枪支和起义事宜。二更开始行动，捣毁了李晏团防局，缴获马枪、毛瑟枪四十多支，子弹两千余发，没收土劣银元八十多元，铜元两挑，鸦片一百九十多两，红布八丈，处决了恶霸张明哲。由于纵队已离去，李晏党支部由罗文俊率队去追赶纵队。15日晨队伍到达谢家庙，将缴获的红布做了两面大旗，旗上做有镰刀斧头及“打富济贫”四个大字。当晚到达老龙场与团防队伍展开战斗，缴获毛瑟枪十八支，子弹二十多发。15日夜和16日分别与董佳（今东佳）、金花暴动队伍汇合后，又夺了董佳、金花团防枪支三十多支，打了金花的当铺。在离董佳不远的佛耳岩住了一天多，与纵队总部仍联系不上，当晚被敌军一个营包围，当地的暴动队伍就地解散回乡。李晏队伍冲出包围，深夜至老龙、留佳之间的一个山沟里，遭军阀、团阀的追击、堵截，只得被迫分散突围，撤回原地。

15日拂晓，鼎新一带的暴动队伍由县派去的熊思友、范光岑率领向黑屋城进发。队伍到黑屋城时，拿走李玉良步枪五支，强夺同院和其他地主李宏模、李集皋家的枪支，然后，追赶大队。队伍到达古文所辖烟灯寺和董家场，皆未赶上大队。这时，听说纵队在铁山与敌军打响了，经过激战损失很大。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下令全线暴动队伍暂时转移，听候上级调动。

东保（今富东乡一带）的暴动队伍，弄错了约定的暴动的时间，提前在12日晚上行动，把红旗插到离县城三里路远的虎洞（又名猫猫洞）上。快到拂晓，看到各地都无动静，只好退回大

石门、金鱼寺一带。但已惊动了敌人，无法再打县城，只好把攻伍解散。

西保（今富西乡一带）的暴动队伍在高石梯扎营一天，见无攻城动静，就把队伍解散了。

墨林乡刘富崇（时为墨林党支部书记）拖了百多条枪，在山上住了一天一夜，因与各方面都未联系上，也把队伍解散了。

纵队总部，从高山铺出发后，一直往前挺进，从东区径南区到西区的长山桥，再到北区的双古时，把从团总周慰文、程镜明家里搜出的钱物分给贫苦群众。19日夜，纵队赴青峰场附近的鸡公山扎营，深夜被敌军追击包围，队伍被冲散。纵队总指挥梅子乾、副总指挥熊灼微经由仁寿转回成都，其余人员则分散返回原地。

这次武装暴动从10月14日至10日一周的时间里，从高山铺出发，游击三百余里，夺枪六百多条，子弹两千多发。同时，摧毁了十多个场镇的反动武装，打垮了几十个反动基层政权，烧毁了勒索人民的粮、债单据，打了一些便民局（放高利贷的），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由于党的“左”倾错误的指导和敌强我弱，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

（中共荣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林志湘整理）

广 汉 兵 变

1930年8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为了贯彻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在重庆召开会议作出相应的决定，成立了中共四川省行动委员会。在成都的中共川西特委也相应地改为川西行动委员会，并根据中央和四川省行委的武装起义计划，分析了当时各地驻军的情况，认为驻广汉的第二混成旅经过我党几年艰苦工作，基础较好，故决定发动广汉驻军兵变。

广汉早在1928年即建立了党的特支(由省委直接领导)。1930年，中共广汉党组织有所发展，建立了工人、农民、中学、小学、城区平民店员等党支部，同时，还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建立了团县委。并在城乡开展多种形式的革命活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1925年以来，广汉一直驻有一支“防区制”的军队。该军属国民党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相当于师的编制，辖三个团，一、二团驻广汉，三团驻新都)，旅长陈离，字静珊，思想较开明，同我党有联系。泸顺起义失败和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中共四川省委和川西特委，有计划地转移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广汉暂时隐蔽，就地开展工作。同年夏，陈离还请地下党员张秀熟在该旅一百多人的军官学习会上作了三个半天的演讲，宣传进步思想。此后上级党组织又陆续输送一批同志到广汉，分别安置到军队和地方工作。以后，进而在军队中建立了特

支，先后由帅惠先、杨月湘、曾学圃等负责。

1930年春，曹获秋奉派到广汉后，任广汉中学训育主任，主要负责领导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军队和地方党组织之间逐渐有了横的秘密联系。根据党的有关指示和当地的具体情况，军队特支在近四年时期内主要开展的革命活动是：发展党员百余人，三个团、八个营大都有党的基层组织，还发展了许多共青团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包括陈离在内的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五育社”，并以“教育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公开活动，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强改造旧军队和地方建设的工作，成效卓著。

在近四年的时间，党组织在第二混成旅中，投入很大的力量，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军队素质一新，打开了工作局面。但却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和四川军阀的注目。

1930年“双十”节，按照惯例，国民政府当天要举行军事检阅。陈离奉命率驻广汉的两个团到成都应差。检阅后，邓锡侯即向陈离施加压力说：“据报，你的官兵都是‘红’的，你本人也是左派，我命令你要限期清理，以免发生意外。”陈离在此境况下，随即秘密召集部分营以上军官开会，商讨对策。决定将驻广汉的两个团混合整编，打乱党的组织基础，同时进行清理，将查出来的人开除送走，另招新兵补充，并规定不准杀人。会后，他们返回防地，按计划准备行动，颇有“山雨欲来”之势。

但是，早在8月，中共川西特委军委根据中央的《决议》，已作出了“广汉起义”的决议，并进行了具体部署。先后派刘达（刘连波）、廖恩波、陈输屏等到广汉巡视检查工作，研究起义计划。他们一方面秘密召开部分党员和士兵代表会议，传达中央的《决议》，讨论文件精神。另一方面，制定了起义具体部署：

首先发动第二混成旅驻广汉的第一、二团起义，驻新都的第三团基础较差，不宜行动；鉴于广汉距军阀盘踞的中心成都较近，敌军朝发夕至，计划起义成功后，即迅速撤出广汉，转移西山地区，开展“依山游击”活动；起义时按上级党组织规定“要兵不要官”，凡排长以上军官不论是否党员，一个也不要，从士兵和参军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干部。

“双十节”检阅后，陈离召开的秘密会议的内幕，旋即为军内党组织获悉，因之更加促使该部加速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组成中共广汉行动委员会，将广汉原县委、军支、工支、农支及共青团等合并，归行委统一领导。其次，组织前敌委员会，由廖恩波、刘连波、曹获秋、徐昭骏、廖宗泽五人组成。因原指派负责人廖恩波未到，实际由刘连波负责。此外，还确定了起义的时间、信号、起义军的改编番号等，积极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的。

1930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四），夜间11时许，广汉县城电灯全部熄灭。忽然从广汉中学的钟楼上敲起急促的钟声，这是广汉武装暴动的信号。

这天是星期六，按二混成旅的惯例，晚上要放假，陈离在下午就回到成都的家里去了。各团、营、连军官，除留一名值星官外，其余都回家住宿。当晚，前委的同志全体出动，分头准备起义事项。钟声响后，北门外白衣庵驻军二团三营首先鸣枪，紧接着城内各处驻军鸣枪响应。行委还派人把靠近警察局的草房焚烧，火光冲天，以牵制敌人。刘连波等人立即指挥起义人员首先占领电话局和电灯公司，以控制通讯和照明系统。起义领导小组鸣枪、鸣笛，向全体官兵宣布起义，并组织兵力砸开武器库，夺取枪械弹药，装备起义人员，将该旅军官中一些可疑人员暂时扣

押，把民愤很大的旅部军需处长、原县长雷雨膏击毙。当晚，除与驻守旅部的手枪队有过一场短时激战外，未发生大的战斗。在行动中，起义军还事先规定了问答口令和醒目标志，也未发生过混战，因此起义顺利得手。

26日拂晓，全城恢复平静，秩序井然。起义军总指挥部设于老君观。前委又继续进行紧张的工作，发出“安民告示”；按原已列的名单，将一批官僚、豪绅逮捕，令其缴款赎罪，取保释放，用以筹措军饷；销毁县政府征粮册，开仓济贫，释放囚禁的无辜群众；派出宣传队，手执红旗，遍街张贴大幅革命标语，在各主要街口设置讲台，向群众作口头宣传讲演，散发革命传单，鼓舞士气；还在总指挥部门前设置招兵站，接收群众参军，扩充部队力量。

26日午后，行委在总指挥部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发布布告实行一切权力归人民。下午，前委在公园大操场召开全体起义官兵大会，由徐昭骏主持整编部队，曹获秋宣布任命领导干部名单。将原二混成旅一、二团重新组建，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一路，司令部辖两个纵队，纵队下分设大、中、小队，即相当于原营、连、排的编制。另又组建警卫、机枪、特务（游击）等三个大队，直属路司令部领导。任命了各级主要领导人：路司令员徐昭骏（后叛变），前敌总指挥刘××，路司令部政委刘连波，参谋长雷润侯。第一纵队司令员徐昭骏（兼），政委廖宗泽（后叛变）；第二纵队司令员易心谷，政委曹获秋。

在起义前后，地方党组织在曹获秋组织领导下，发动中小学教师、学生开展文艺宣传，举办文化夜校，以提高革命群众觉悟，秘密赶制红旗，刻制苏维埃政府印章，书写标语传单；组织宣传

队，动员工农群众参军等，为配合起义壮举，作了大量工作。

此次起义，不到二十个钟头即顺利完成预定的第一阶段计划。虽事起仓促，但行动非常迅猛，且军纪严明。26日午后4时许，红军分批出发，按第二阶段的计划，向绵竹方向进军。

起义军自广汉开拔，当晚在高骈、金轮两地宿营。27日经什邡县境，取道禾丰、双盛，直抵绵竹新市镇。此时，中共绵竹县委早接川西行委的指示，已事先作了安排：指派清道乡和当地的党组织及农会负责人，率领数百名农民武装，带上枪支、大刀、长矛，齐集新市镇待命；组织群众担上粮食、茶水，热烈欢迎慰劳；配合起义军宣传队在街上呼口号、贴标语、演活报剧，情绪极为热烈；不少群众还主动向指挥部要求承担带路、砍电杆的任务。

在起义军已撤离广汉，进军绵竹之时，邓锡侯获悉广汉兵变，急令陈离亲率驻新都的两个营，会同邓调遣的三个团，向绵竹方向追击。二十九军军长田頌尧闻知，亦令师长董长安率兵两团，沿途截击红军。还指挥所辖防区的德阳、什邡、绵竹等县保安部队和民团倾巢出动，协同“围剿”。因此，红军陷入重围，处境艰险。一面组织火力还击，阻歼来犯之敌；一面派遣第二纵队作为前锋，由司令员易心谷率领，刘××协同指挥，突破包围，直攻绵竹县城。

田頌尧所部蒙善伯团阻截起义军未果，遂收兵回绵竹城，龟缩不出，凭借高城深壕，固筑工事，企图以逸待劳，歼灭起义军。易心谷率部于黄昏时抵绵竹城郊，第一纵队亦随后赶来。当地农会和群众立即烧水煮饭，热情欢迎慰问，并积极主动担任向导、后勤、救护等工作。各乡原已组织的数百名武装，大部均已齐集配合起义军行动。

晚饭后，攻城战开始了。前委命令一纵队迂回进攻东北门，二纵队主攻西南门。在农民武装的配合下，以猛烈的火力向城内进攻。起义军战士英勇顽强，发起几次冲锋，但进展不大。又准备架设云梯攻城，而敌军居高临下，凶狠还击，不能接近城垣。因此暂停火力进攻，改用政治攻势。在离城较远处，搭起高台，宣传队员向城门喊话，遭敌兵射击负伤，仍坐在台上坚持喊话。因起义军无重型武器，始终无法破城。此时弹药消耗很大，战士也有不少伤亡，处境十分艰苦。在这紧张关头，突然有一个大队长（原排长）在后面大喊大叫：“后面的追兵打过来了！”随即擅自将部队撤退，部分农民武装也随之溃散。部队建制已乱，指挥调度失灵。前委根据战况的变化，决定立即调整队伍，全部撤离绵竹县城，拂晓前向遵道场进发。

在进军途中，不断遭到军阀部队和民团、土匪队伍的截击，红军且战且走，伤亡溃散甚多。当晚在遵道场宿营。前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行动计划，多数主张应遵照川西行委早已下达的指示：“依山游击，建立根据地”，迅速转移在什邡红白场和彭县海窝子一带，坚持游击战。而刘××却别有用心，坚决主张撤退到绵竹汉旺，另谋出路。前委在此关键时刻，为了团结对敌，避免分裂，迁就了刘的意见，往汉旺撤退。

10月30日，起义军在转战汉旺途中，又遭敌军、团防、土匪的多次袭击，部队伤亡、走失者不少。中午抵汉旺，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刚住下不久，四周又响起了枪声，各路敌人跟踪包围。此时军心动摇，不断溃散，难于掌握。鉴于我军已处于孤军无援的险恶境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更大损失，在此最后关头，前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外来干部就地分散转移，起义军战士每人发给六至八元路费，资送回家，由警

卫连掩护撤退。前委领导成员也都分散转移到外地，而刘××却乘机拉上一支队伍，投靠田頌尧部的吕康团去了。至此，广汉起义虽经广大革命官兵的英勇奋战，取得初胜，但由于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指导和强敌的疯狂镇压，经过绵竹之战后，终遭失败。

（中共广汉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杨季生整理）

彭山公义场农民暴动

1925年在国共合作时期，彭山县的一部分乡就有了农民协会组织。1926年寒假，中共川西特派省高师学生、共产党员帅世襄来彭山指导农民协会工作。1927年开始发展共产党员，1928年建立了中共彭山县委，加强了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各种群众组织和进步刊物相继涌现，如青年学生会，彭山新益学会，青年互助社，少年俱乐部等等。在党的领导下，农运工作进一步开展，农民协会组织不断壮大，农民抗捐、抗粮、抗暴斗争接连发生。其中，震动较大的，有1928年2月由县委书记刘单如、农会总负责人郭祝三等人领导和组织的抗交军饷七万五千元大洋的斗争。同年冬，农协会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放火烧了乡民团大队长张志龙的住房，取得抗捐、抗租斗争的胜利。

1930年7月，省行委贯彻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彭山县委根据省行委的部署，决定组织一次农民暴动。暑假前县委组织了一次宣传活动，内容主要是：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9月下旬，县委在观音乡梓桐小学开会讨论暴动问题，会上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张泽然任总指挥兼组织工作，王文倩负责宣传工作，马茂林负责粮食供应工作，并决定于11月2日（阴历九月十二日）在公义场举行暴动。暴动队伍以青年互助社社员为骨干，组成赤卫队，牧马山由梁克明负责组织领导农民武装，马茂林组织江口镇的航运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青龙

乡由黄天泽负责领导，公义乡由吴用田负责领导，谢家乡由孙桂山等负责指挥，观音乡由帅志安负责指挥，保胜乡由田松廷负责指挥，凤鸣镇由王永山等负责指挥。为了配合这一次暴动，由王文倩在县中校发动师生罢课，并组织党的积极分子参加暴动。会议还决定由吴用田去做土匪何跃武的工作，要其保持中立，并争取何手下一部分人参加暴动。同时做好公义场团练所一些人的工作，以便暴动开始后，将团练所的枪支弹药用来武装赤卫队。提出的口号是：夺取一乡、一区、全县的暴动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参加暴动人员一律以红布条拴在手膀上为记号。

会后，各地积极进行暴动前的准备工作。吴用田、洪文渊、魏学儒等在公义场小学组织农会骨干开会。青年互助社社长郭祝霖和王庆顺、王柱臣等，深入到公义乡五马村召开农会会员紧急会议。他们宣布了暴动时间，宣读了参加暴动人员的组织纪律等事项。军事总指挥张泽然，则以梓桐小学为重点，巡回到各地了解掌握情况，随时向县委汇报。

暴动前的晚上，由陈大发带领三十多人，割断了新津县与彭山县之间的电话线十七档，锯断了木质电杆三根，切断了反动政权之间的通话联系。

公义场团练所的教练陈少南、班长骆少轩、团丁李银轩等已商定参加这次暴动，负责维持场上的秩序。

11月2日（阴历九月十二日），各地农民武装一千多人，人人佩带红布条，汇集在公义场戏台前参加大会。会场外贴满了宣传标语，绣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在会场上迎风飘展。洪文渊、吴用田、李玉安等先后上台发表演说，抨击军阀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榨农民的罪行，号召大家起来参加暴动，用农民武装摧毁反动势力。散会游行时，不少围观的农民参加了游行队伍，边游行边

高呼“拥护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军阀混战！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游行结束后，群情激愤，捣毁了区长袁子成的酱园铺，郭事长（管民事纠纷）——郭少文开的茶铺，烧掉了征粮处的粮簿。洪文渊手提大刀指挥群众捉拿欺压农民的土豪劣绅，一时场上人群一片忙乱。这时，公义场上的袍哥舵把子万晓楼伙同成都到公义场的武装土匪方青云、薛开太和金堂县的土匪多人，连同他手下的狗腿子十多人，袭击游行队伍。农民武装步枪队早就要安排驻扎在祝家山待令，一听枪声，为了掩护农民游行队伍顺利退却，农民武装步枪队立即冲下山迎击。在激战中，洪文渊、陈少卿、文吉武三人英勇牺牲，刘光明、杨茂清被俘。起义领导人当即在祝家山上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更大牺牲，农民武装立即疏散隐蔽，存放县中校的秘密文件和进步书刊尽快转移。并派张泽然等到成都汪家拐街三十六号向省行委报告。彭山公义场农暴震惊和打击了反动统治，但在敌人的攻击下而失败。

暴动失败后，反动政府气焰十分嚣张，随即把在枪战中不幸牺牲的洪文渊的尸体运至彭山县城北门外关帝庙门前示众，并在全县各地张贴告示，悬赏捉拿郭祝霖、郭祝三等领导人。同时委派谢家场的惯匪帅鹏章、公义场的土匪何跃武带领匪徒挨家挨户进行搜查，捉拿参加暴动的农民。为保存力量，一批党员和农会骨干分子纷纷隐蔽，郭祝三转移到仁寿县嘉禾庄教书，郭祝霖由省行委派到青神县工作。

（中共彭山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川党内战大事记（节录）

程子健

南溪暴动。

1928年2月〔公历4月〕，南溪李庄农民暴动，参加千余人，枪支几百。领导人曾君杰、曾海云、郑则龙、赵××。李庄系产米区，靠江边，交通很方便，军阀队伍上下夹攻，经几次战斗失败，曾君杰同志被捕牺牲。

绵竹暴动。

1929年〔应为1928年——编者〕秋绵竹农民暴动，县委书记黎冠英和王干清〔青〕、张仲琛同志等领导发动北东西三路农民几百人，枪支几百条，内有七旅旷继勋部下干部及□□参加，以打倒军阀、建立苏维埃、分土地为□□。晚上发动以后，三路向县城进攻，两路走××场杀死收捐委员，东西两路攻至城边，城内军队抵抗，火□□□农民动摇，军队出击，农民失败逃散。黎冠英、李晏蟠、张民宽（仲琛）三同志逃至白区团练队长谭尊五家，谭曾以四十支步枪帮助暴动，至此动摇叛变，杀死黎冠英等三同志。

双江兵变。

邻水农民暴动。

万县杨部兵变。

红一路游击活动。

1929年春天，李家俊同志去城口万源一带，领导农民抗捐，杀死收款委员。刘存厚军阀派军队围剿，几次失败，农民暴动由抗捐达到分土地，建立纵横各一百七十八里赤区，农民会成为革命政权。王维舟同志在梁山、开江一带，动员收集武器支持赤区。王国良同志任保卫局长，曾杀土劣多人。作战时利用神兵打先锋，并缴获最好武器，意国步枪，游击队发展至一千几百人。1930年四川省委决定该区游击队改编为四川第一路红军游击队。

荣县农民暴动。

1929年6月〔5月〕，荣县农民开大会反对苛捐杂税，县府便衣队混入人丛中开枪打死讲演的农民，于是农民愤恨打死便衣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抗捐武装斗争。后来政府减轻捐税，武装斗争停止。

涪陵兵变。

1930年4月军委书记李鸣珂在重庆被易觉先出卖被捕牺牲。

荣县农民暴动。

1930年9月〔10月〕，荣县农民暴动。事前，自井工人、荣县、宜宾农民成立川南革命委员会。自井工会派工人到荣县、宜宾帮助农民准备暴动，决定自井工人同盟政治罢工，配合两县农民暴动，□□自井，但自井同盟政治罢工已发动，遭受军阀镇压，杀死一个工人。罢工失败以后，荣县农民暴动领导人梅子乾、饶孟文、陈觉元，向仁寿方向前进。追击的敌人当中有党的组织，他们一面追，一面待机兵变。但游击队去的方向不变，这便于敌人跟踪包围。领导人缺乏胆略及决心，认为农民队伍乌合之众，无法作战，自行溃散。

（摘自自贡市档案馆存自贡市委组织部调查材料）

制订南溪农民暴动计划的回忆

赵 之 祥

1928年2月，南溪县农协在党的领导下迅猛发展，农运的声势日益扩大，城乡各地的抗税、抗捐斗争风起云涌。特别是牟坪地区的农民，因反对“烟苗捐”，打了乡团总陈跃先的柜台，夺了乡团的枪支。县知事李凌霄妄图炫耀武力，震慑农协，调集全县民团武装，进城搞了一次“团练观摩大会”。同时，扬言要对抗捐地区进行普剿普杀。当时，在南岸几乡，曾一度出现紧张局面。

中共南溪县委根据川南特委发动“春暴”的指示，联系城乡当时社会的斗争情况，对敌我双方武器兵力，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一、军阀部队常驻李庄，只有一连人的兵力，城内比较空虚。县城团局兵力不多，武装不足，且通过工作，部队实力已控制在手。二、各乡团队，人数虽多，武器大都不甚好。而凡有农协组织的地方，团练义务兵丁中，多是农协会员，大多数的乡团大队长、分队长，早已勾通，实际上是支持农协的。三、农协组织掌握的枪支较多，如外东李庄、绥庆、宋家、牟坪等乡都掌握有许多枪支。由此，肯定了暴动的可靠性和有利条件。乃决定由张守恒、洪默深、赵之祥（洪、赵是黄埔军校早期的学生）三人制订暴动计划。

是年2月底，在张守恒的主持下，在李庄开会。会上遵照上

级发动“春暴”的指示和县委对形势的分析与要求，经过反复审慎的研究，除及早派人分赴牟坪、宋家等地揭破敌人谣言，安定农民情绪外，草拟了“南溪农民武装暴动的军事计划”。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 凡建立农民协会组织的地方，所有的农民协会会员，按军队形式编制，决定能干人员担任领导，听命各地区指挥部指挥。部队命名为“川南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设牟坪，配正、副总指挥，统一指挥暴动事宜。

2. 各地区分工：北岸集中点为东乡，由洪默深，廖时勉负责；南岸集中点为牟坪，由郑则龙（临暴动时变更为曾君杰）、赵之祥负责；李庄集中点为帅家沟，由张守恒负责。

3. 由南北两岸地区指挥部，统一起义时间，分别指定临时集合地。外东部队，首先进城收缴团练局枪支及豪绅的武器（这一计划，临时因县知事出巡北岸，暴动时有所改变），随即收缴附城各乡团队武器。进军中，一定要狠狠打击民愤最大的地主豪绅和反动的乡镇团总。如顺利得手，快枪掌握到两千支以上，就从凉亭子、杨柳管过河，与南岸部队汇合，进取宜宾。如枪械不足，则渡江会师后，迅速转进汉王山，整编后再作部署。

4. 暴动时，务要先切断通话电线。将李庄至罗龙一带船只，控制起来，听候使用，以便部队渡江。

5. 赶制“川南工农革命军”旗帜两面，分送南、北岸各一面。并雕刻“川南工农革命军指挥部”图记一颗。另派南中“学术研究社”的青年，组织宣传队，写好标语、传单。至于暴动前所需经费，由张守恒负责找他的同学张官周资助。

以上决定，嗣经党组织分别部署。

（中共南溪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回忆邻水农民暴动情况

危 石 頔

1927年秋，四川临时省委派我到邻水负责县委工作。我化名代维贞，到合流场找陈峻山接上头。陈峻山当时在苏家洞子教私馆，我就作为老师的客人住在苏家。春节快到了，老师要回家过年，我又随陈峻山到了石稻场住在他的家，主要做农村工作，利用晚上出去走院串户，找农民个别谈话，宣传组织农会，准备武装斗争。

当年腊月三十日晚，我们曾组织党团员打着灯笼火把在全县场镇街道、路旁、岩石、树上刷过一次标语，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军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土地归农民所有”……

当时省委要我们搞武装暴动。1928年派了任煜、任纯儒来邻水检查准备情况，认为邻水条件不成熟，向省委写了报告。接着，省委又派刘愿安来检查，我和刘到九龙开了个农民大会，有好几百人参加，把一个院子挤得满满的。通过考察了解，认为农民确实没有行动的要求，更没有什么武器，刘愿安回去又报告了省委，才停止执行暴动计划。但省委又给了我们个条条：“以赤色恐怖答复白色恐怖”。县委召集各支部负责人研究，选择了丰禾场大地主、大团阀王绍烈为打击重点。我们先派了刘之廷（裁缝）利用到王家缝衣服的机会把他小老婆争取过来，进行里应外合。

我们组织了十多人深夜摸到王绍烈住的大院翻墙而入，他的小老婆事先把家里的狗关了起来，给我们引路，找到王绍烈，用一把杀猪刀结果了他和他老婆的性命。

(中共邻水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回忆涪陵天宝寺和金银乡农民暴动

皮 斌

1928年春，省委调我到涪陵新妙场小学教书，校内有新来的三名教师，郑益阳、陈竹筠、李芳，都是团员。由我担任新妙区团委书记，郑益阳任组织。当时赵经权是新妙人，在弋阳中学教书，负责党的工作。

我的任务主要是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口号是抗租抗粮，为李蔚如烈士报仇。5月间，农协会会员已发展到五六百人。为了发动暴动，先要筹集资金。我们学校楼上住房有三间，四个教师住了两间，其他一间为区税务所人员住宿。我们了解到区税务所要向县送交税款八千多银元，党组织决定拦劫这批现款，作为暴动资金。送款人只有两支手枪，我们派了四个人四支手枪，加上挑运的两人共计六人。在税所送银的早晨，离新妙场几里路的一个山湾内，我们没动一枪就成功了。带队去执行任务的就是区团委宣传夏鹤松，他不将款项交到党组织指定的地点，却拿去放在他舅爷家中，他舅爷即到区公所报告了。

从此风声日紧，暴动迫在眉睫。大概5月底人员在天宝寺集中，取名“贫民革命军”，其中主要力量是三合场田致远兄弟的民团队伍，第二是各地农民协会会员，第三是蔡德芳率领的那部分人，共计约有四五百人。农民夜间来，白天回去。这时涪陵城内郭汝栋正与杨森打仗，全部兵力调到万县前方，涪陵城内只有一

营人维持秩序，营长傅炳勋是共产党人。我们想一鼓作气进入涪陵城内会合，向石柱、黔江方向前进，东出湖北石首、公安与贺龙会合。当时省委派有一个五人小组指挥军事，全是黄埔生。其中有两人还记得，一个是罗星樵，涪陵人，一个是任锦时，巴县人。不久学校放假，我们四个教师全部撤离，郑益阳回金银场，陈竹筠回涪陵，我到城内，县委书记游动斯叫我担任团的县委书记。省委命令城乡还要不断组织农暴，组织上即去信通知在新妙、大顺一带活动的蔡德芳，要求他到金银场去配合郑益阳行动。蔡德方先派五个人，每人各带手枪一支去金银。谁知这五个人走到藿市就去烟馆烧烟，手枪上的红绸子掉了出来被人发觉。烟馆的人暗中报告了军队，军队派了一连人把烟馆包围了，当场逮捕了这五个人。第二天，军队把这五个人弄到河坝杀害了，可惜不知他们的姓名。

事隔几天后，蔡德方来到城内，弄到一支小手枪。他满怀革命热情，表示愿意奔赴前方。临行时他说，我自 有办法开展工作，决不辜负党团组织的希望。他先到了鹤游坪，大约一个月，已有手枪六七支。这些枪是在金银场附近，由郑益阳掩护，在夜间挖墙打洞弄来的，或白天遇到团队人少带枪行走时夺来的。蔡德方把这些枪拿到金银场，武装了暴动队伍。

1928年7月以后，涪陵形势处于低潮，郭汝栋军阀败走涪陵，城内党员已纷纷离去，只有我同游动斯。大约阴历七月间，我的生活成了问题，吃饭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一天早晨天刚发白，我即动身向金银场走去，知道蔡德方小组在金银场郑益阳掩护下活动。下午4点钟左右我步行到了金银场，在离场一二里的一个庙宇内会见他们，时共有十多人，几乎每人都有一支手枪。郑同蔡向我说，他们已决定今晚在金银场暴动。我当时说，为什

么不先报告，由县委批准。他二人说事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不干，今后是要暴露的。因此，我只得依从他们的意见立即行动。

当天金银场逢赶集，暴动后要打那些人，郑益阳、蔡德方已列有名单。我对名单上列的人，完全不知道。暴动的当晚打死几个人，更无法知道。到了天黑，大家吃饱了晚餐，开始出发。我们正过溪沟时，大家一齐跑步进场。只听见枪声、呼吼声、奔跑声撼全街。过了一阵，郑益阳呼喊集合，出场后我叫大家不要说话，不鸣枪，不开电筒。我们行动后，附近民团在山上打枪，而且枪声很急，他们不知道我们从那个方向走了。夜里，我们向大河边方向急走了几十里路程，有向导带路。深夜两点左右，我们来到大河边，这里有两只木船停靠着，我们上船去向船工买了点米煮饭吃，饭后轮流值勤，每班两人。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天快亮了，我们清点了一下收来的现金有千余元。

这时郑益阳等找我商量去向，我说不能再去涪陵城了，到重庆找省委。可是郑益阳一定要去涪陵，说要与女友陈竹筠再见一面，因为他俩在新妙教书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此次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涪陵。经我反复说明利害关系，郑仍然坚持进城，我只好说进城后各人自找亲戚朋友家住下，互相不发生横的关系，每个人交一封信到总的通讯地点来，由我分别会面分配工作，当时均无异议。当天进城后，直到深夜10点均无一点消息。第二天早晨，我同游动斯到交通处，仍无一点消息。我对游动斯说，我们到西门外陈竹筠家的隔壁一家旅馆看看，估计郑益阳在那里住。我同游动斯一道去旅馆，外面是一间鞋铺，有几个工人在做鞋子。我上前问师傅里面是不是旅馆，工人只管理头做工不答应。当问到第三次时，身后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把我衣服一拉说，“不要进去了，里面在清共产党”。小孩话音刚落，郑益阳

已被敌人捆绑出来，我们互相目视而别。我即离开此地到北岩搬家进城。

郑益阳在狱中传信要我去会他一面，我冒险去了，声称是他表弟。后来郑益阳在狱中表现很坚决，惨死在敌人监狱里。

(中共涪陵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王应全整理)

凌霄血战

张国忠

民国17年7月我和吴定杨在建武学田上，成立了兴珙支部，我化名为汤玉文，任支部书记，吴定杨任副书记。

同年腊月，建武团总陈重民要来打我们，正好有人来密报珙县上罗东皇殿团防的松懈情况。我们派人侦察属实后，就召集五六十人，趁夜摸黑到东皇殿，由内线开门，攻其不备，速战速决，提得枪十多支。撤走时，张益新不慎，跌倒在粪坑内，被一个看牛娃认出，报告上罗团防。不久，上罗团防追到建武小阳坝，伙同建武团防，追击我们。我们边打边退，至正月初几，我们退到石碑大石盘岩洞里坚守。后来，陈重民、张伯常等，约集附近几乡民团来围我们的洞子，用自制木炮，轰击洞口。游击队员李树生，装填了火药炮，亲自瞄准，向洞外开炮，击毙了陈重民。几天后，长宁团务局长陈子方、兴文团防指挥袁国清、珙县团务局长杨冠英又调集武装，来围攻我们。弹少粮缺，形势紧迫，我和吴定杨、刘永吉、李国钊等在洞内研究决定，我去叙永大坝，吴定杨、刘永吉去孝场寻找救援，李国钊弟兄仍留洞指挥。不久，李国钊等即率武装人员突围出洞，经司堂铺到云南郭家坟去了。

我到郭家坟住了十多天后，才探听得吴定杨、刘永吉已与王泽嘉、袁书甫（袁敦厚）等同志取得联系。解围的队伍于5月

初，打倒兴文建武城来了，我们非常高兴，双方的队伍就合并起来，有两三百人，声势浩大，震惊了珙县、长宁、兴文、威信、叙永、古宋等县。

在建武驻扎三四天后，队伍开到附近的清凉寺。我们在庙内开了一次会，内容是：

一、推选干部，王泽嘉为司令员，人称团长，袁书甫负责政治工作。

二、编成四个支队，郭洪发、刘永吉、李国钊、王学勤为支队长。

会后，队伍在附近几个县的边区继续活动，到了八月间，又在大石盘开了一次会，主要内容：

一、讨论研究如何对敌，游击战斗的方式方法。

二、如何发展队伍，寻找枪弹的来源。

三、谋求革命根据地。

这次会后，战斗尤为激烈，斗争更加艰苦。

同年10月间，队伍开到建武毓秀大庙，又开了一次会，主要内容有四。

一、决定根据地，选出珙县、长宁、兴文三县交界的凌霄城，这里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二、派人去做土匪田海云的工作，争取作为外围力量。

三、由王泽嘉、袁敦厚提出纪律八条：

1. 联系广大群众，要发动云南边区的苗族。

2. 遵守纪律，对群众秋毫无犯。

3. 不奸淫妇女，违者从严惩办。

4. 不乱拿群众的财物。

5. 不乱烧毁群众的房屋，或宰杀猪牛。

6. 不准临阵脱逃，或拿走枪支弹药，违者拿获处死，万无

宽恕。

7. 不准泄露机密，违者处死。

8. 爱护枪弹。

田海云看到我们势力雄大，早有投靠思想，一拍即合。我们也就把他弄作外围势力。但我们对他总不放心，指派他仍旧驻在燕子洞。

民国19年正月初三，我们的队伍就开上了凌霄城。上寨后，立马派人下山到同心（兴文）、黄金（长宁）等地挑运地主的粮食，挑了十来天，得粮不少。既后，我奉令下山，收送情报。

长宁、江安、兴文、珙县等团务局，调集几千人马，把凌霄城和燕子洞包围起来，凡属重要隘口，皆有军团严格把守检查，昼夜猛攻，大小枪声，不绝于耳。形势危急。外界原来暗中帮助的人，唯恐被害，竟避不见面，纵然深夜私访，也闭门不会。情报、联络均被扼断，无法复通。

团防围攻起义军至5月13日夜，田海云已叛变投敌，部队内部，领导意见分歧。是夜，先由雷步云率一小队偷摸下山。王泽嘉、袁敦厚率大队伍突围下山。团防发觉，双方血战，敌众我寡，竟至溃散。王泽嘉、袁敦厚、吴定杨等在突围中壮烈牺牲，郭洪发、吴必鼎和其他一批战士，在珙县、长宁等地，惨遭杀害。少数人侥幸逃脱，也妻离子散，有家难归。

李国钊率领的一支小分队，在郭家坟附近活动，没有上凌霄城。后李国钊等三弟兄被滇军招安团团团长吴银章杀害，缴去了全部枪支。

刘永吉有二三十人，跑到长官司下五甲一带活动时，被团防打散。他跑到贵州大定、黔西沙窝一带隐蔽近二十年。

（中共宜宾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涪陵罗云土地会情况

刘 贵 方

1928年，我在罗云坝加入土地会。我们经常在山林里开会，主持会议的人是李焕堂。每次开会都是在晚上进行，开完会回家已是半夜了。李焕堂强调开会的内容要注意保密，就是父母都不能向他们讲。1928年四川土地会暴动的前一天，我们开会制定暴动计划，晚上李焕堂叫我第二天早点上街，监视地主刘范君、刘树槐的行动。次晨，我身穿长衫，里面藏一把刀上街，听到暴动的枪响后，我先杀了刘树槐，然后去找刘范君。刘早已逃跑，藏在赵云清家寿木里，我们找到后就一阵乱刀捅去，把他捅死了。刘范君这个地主很可恶，我给他做了两年活路一个钱不给。接着又有两个地主的狗腿子向我们走来，我和刘二毛等四个人把那个家伙干掉了。我先后杀了四个地主恶霸。过后，李焕堂要我们分散到各地隐蔽。清乡兵来时，我已到包蛮的亲戚家去了。清乡兵在罗云清乡时，杀了几十个无辜的农民，手段十分残忍。

（中共涪陵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关于绵竹“七四”事略追述

丁 毅

1928年初，绵竹人民革命情绪高涨，革命力量雄厚，中共四川省委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示绵竹县委组织发动农民响应全省春荒暴动。绵竹县委根据省委指示，成立了指挥暴动的“行动委员会”，主任由县委书记黎冠英兼任，委员有张希鲁、刘仁俊、周璧澄、张治、方次林、王干青、龚锡五、骆显光、丁毅等十余人。此外还有省委临时派来的方策、贺宇生、范东浦、李伯渠等同志，携带手枪十余支，来绵竹参加指导暴动。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分政治、军事、财务几部。政治由主任黎冠英负责，财务由史明理负责，军事由范东浦负责，任军事总指挥，张民宽、王干青任副总指挥。领导全县人民革命团体，如赤色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儿童团、怒潮社、新生民导社等革命群众数千人，前后宣传讨论达两三月，并报告省委。省委又多方慎重考虑，指示彭（县）、新（都）、汉（州）^①、安（县）等地革命力量进行配合。又在绵竹南外白衣庵举办特别训练班，教育同志使用武器及必要的技术。然后，才定期于“七四”那天在抗捐抗粮的革命斗争中，正式举行武装暴动，夺取反动政权。“七四”夜，根据指挥部决定，全县革命力量分为两路向县城进攻。西南路由总指挥范东浦、副总指挥王干青指挥；东北路由主委黎冠英和

^① 汉州，即今广汉县。

团书记李晏蟠、副总指挥张民宽指挥在张民宽家结合，先解除兴隆乡哨卡反动武装，夺取步枪十余支。西南路在广济乡王靖川家结合，先解除邓家林哨卡反动武装，夺取步枪十余支。然后两路一齐浩浩荡荡向绵竹城内进攻，西南路在西外烧茅屋呐喊，东北路在北外沈家牌坊呐喊，以便配合城区内外革命力量，里应外合，攻下绵城建立川西苏维埃政府。殊不知，西南路范东浦、王于青带队攻入西外诸葛庙时，即被早为设伏的反动军阀曾启戎击溃，立即退到北外红茨藤，准备与东北路会师。此时东北路在黎冠英、张民宽领导下，由兴隆刚到北外沈家牌坊，遭到反动军队的追击，不得已只好退守山区。不料此举前夕，谭尊五即将暴动的消息密告军阀曾启戎，曾一面布〔部〕署对策，一面正式委任谭尊五为西北山防支队长兼汉旺大团正，镇压农民暴动。当东北路农民武装到汉旺后，谭尊五阴谋屠杀了黎、李、张等为倒戈立功表现。从此，东北路武装遂为谭尊五盘踞汉旺及西北山一带，作为蹂躏人民的本钱。西南路方面，由范、王带队到红茨藤，见该处早已设伏，并隔断了去汉旺、兴隆的道路，更怕拂晓后无法掩护，只得由黄土寺、瓦庙子一带退回广济王家院子。翌晨，赵祝三又带信给王于青，叫他们立即出境，否则他便对不住。因此范东浦逃回成都，王于青逃到什邡。西南路人民武装遂为赵祝三盘踞广济及西北山区一带，作为蹂躏人民的本钱。当时，城区由张希鲁、方次林、张治、史明礼等领导怒潮社、赤色工会等革命同志，部署响应事项。城内则由刘仁俊、丁毅、刘浴新、李林、骆显光、傅友和、江紫烟、张祖祥、张锦垣、冯国轩等领导新生民导社、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同志，在罗家坝观音堂集合，到中学校南河坝一带听命。不料这队赤手群众，在南河坝中学校呐喊一夜，只见西北火光满天，枪声不断，但越响越远，又见天色渐亮，

遂各自哄散。钟声清、龚锡五、丁毅、向祁嘉、邓任廉等便由石滚河、财神庙、东林寺到铁五显庙张民宽家找下落，此时才知张、黎、李已为谭尊五所杀。我们到土门后，听说范东浦、王干青不知去向，赵祝三正在搜拿党人。我们只好由山溪寺、朱家桥到什邡高桥会李刚（什邡党的同志），便到新莹华山住了半月，才绕道到成都。到成都三天后，就参加了省委在双凤桥召开的绵竹暴动检讨会。会后，钟声清、向祁嘉等回绵竹，继续恢复工作。

（中共绵竹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绵竹农民暴动前后

骆 是 愚

1928年绵竹发生农民暴动的基础是：一、当年绵竹农村夏旱，栽不下秧子。在暴动的前夕我们发动过游行请愿，参加游行请愿的农民每人肩上都扛一捆被太阳晒干了的秧苗。二、农民要求减租，城市商民住户要求按期开彩票。当年人民生活确实非常困难。三、农民还要求减青苗捐（实则是鸦片烟的烟苗捐）。游行请愿那天正逢赶场。游行请愿的领队是我和李晏蟠，我开腔说话，李晏蟠没有说话，因他是外地人，口音不对。讲演以后进行游行，进北门城到龙王井，经大东街进县政府，找县知事答话。这次游行请愿是暴动的前奏。

（中共绵竹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武隆火炉铺农暴点滴情况

邵益阳 邵征先

农民协会成立后，无枪怎么办？首先打算把当地土豪罗正新打死，提他的枪（罗有十多支长枪），结果未实现计划，又由邵平阶出据借了罗的枪十多支。

通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决定兵分两路进行：一路由李仙舟、邵平阶、邵楚侯等带领万峰乡的农协会员向火炉进攻；另一路由杨畅时带领他的部队百多人冲进火炉区里提枪、捉人。事成后，两军连夜集中到火炉、万峰两乡交界处——肖家堡会合。当晚就在肖家堡肖泽山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晚上，邵平阶、李仙舟、杨畅时商讨了今后怎么办？邵平阶要组织农民军，杀几个大土豪，杨畅时不同意，互相争论起来。越争论越发火，邵楚侯见此情况不妙，便暗示李、邵二人分别逃跑出去。结果火炉农民暴动的胜利果实被可恶的杨畅时一口独吞了。后杨畅时拖着队伍，押着张汝林等到丰都厢坝等候张明堪来取人。张明堪送去银元，承认了条件，才取回了他的父亲和妻子。

（中共武隆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1928年丰都农民起义

朱 挹 清

一、丰都农民起义

1928年7月，省委派我到万县清理受破坏的万县党组织。8月，向省委汇报了情况，省委派我回丰都工作。当时，丰都的党组织是总支，下面有三个支部，总支书记李彤辅，我去的时候，他已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了。参加总支工作的，有甘禹疏，他是重庆高农的学生，1925年入党，毕业后回丰都在农场作职员。还有李潜龙、危直士（危石顽），他们是省委派到丰都作农运，准备发动农民暴动的。我去后，和总支几个同志开会，经过讨论，成立了临时县委。甘禹疏任县委书记，我是副职，分管组织、秘书等工作，李彤辅负责宣传。县委成立后，第一件要解决的问题，是崇德乡的武装起义。李潜龙在县委会上报告了准备工作情况。先是李潜龙和危直士在崇德乡作了半年多的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他们到崇德乡的观音寺小学作教员，通过学生家长，逐个启发教育农民，组织秘密的农民协会，发展农协会员。又通过关系，联系观音寺附近的小月坝的团队，在团队中组织农民协会，从上到下把团队掌握起来了。这个团队有一百二十多支枪，可以作为起义的基本武装。邻接小月坝的大月坝有一支地主武装，原来想去拉些枪支过来，没有成功。枪支不足，又把小月坝场口的一个铁匠教育过来，打造刀矛，有几百把。李潜龙他们

工作的地区很宽，南北长一百里，东西宽七八十里。其中磨刀洞等地区离县城一百三十余里，交通不便，是偏僻地区，便于活动。有组织的农民群众五六百人，能够掌握使用的枪支二百多支。县委听了汇报以后，要研究决定两个问题，一是神团问题，二是起义计划。神团，是丰都农村中比较普遍的迷信组织，影响很大。神团有三个会门，一、大刀会，二、联英会，三、八德会。我们分析研究了这三个组织的社会情况，决定不同的对待办法。大刀会的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的口号是“不上税、不纳粮、打官军”。我们认为是自发的反抗地主豪绅的农民迷信组织，可以和我们合作起义，是争取团结的对象，决定大刀会员可以加入农协会，农协会会员经他们邀请可以加入大刀会，但是必须服从农协会的纪律，照农协会的指示行事。联英会的成员虽也有相当数量的贫苦人家，但是谁出钱就给谁保家，有很浓厚的流氓无产者习气，是一支地主也可以雇用的武装组织，争取他不与我们为敌，保持中立。八德会主要在石柱县境内，同我们仅有个别联系，其中中、小地主成份对农协会采取比较对立的态度。他们也提出“不上税、不纳粮”和“保家保乡”，但拒绝与我们合作，我们也没联系他们。在起义地区的边缘地带，大刀会和农协会有交叉，我们告诉这些地带的大刀会领头人，要他们在起义时不暴露。所以，起义失败他们仍然隐蔽下来，以后与我们配合，和反动派作了长时期的斗争。其中一个当地有名人物汪长青（外号汪大菩萨），后来领导起义，曾与二路红军汇合，二路红军失败他也牺牲了。起义行动计划，在县委会上作了反复研究，尽量作得周到些。决定由甘禹疏负责领导起义，我留在县城，作后勤工作兼管其他地区党的工作。会后，李潜龙、危直士调离了丰都，同时从崇德乡工作地区调走的还有四五个同志。甘禹疏带

领了一个同志到崇德乡领导发动起义的工作。临起义时，省委又派了两个进过黄埔军校的人来指挥军事，这两个人以后在起义失败途中溜走了，不知下落。

起义时间，原定在中秋节，虽然一再向农协会员交代，要他们保密，农民还是沉不住气，把消息传出去了。大月坝的地主武装知道消息，有了准备。为了防止不利发展，我们只好提前两天发动。起义时，一个青年陈光鑫作总司令，甘禹疏作党代表。陈光鑫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小学文化程度，很能干，在农民中很有威信。县委派去作后勤、宣传等工作的有熊盛业、傅克强、廖某等同志。起义先从观音寺发动，过河行军约三十华里，沿途吸引农民参加，到小月坝与团队汇合，在小月坝聚集的起义群众多达一千多人，七八十里外的农民也有赶来参加的。在小月坝镇压了一个恶霸地主，焚毁了一批地主的契和债券。我们计划主攻地点是大月坝，总司令部随即率领起义群众前进三十华里到大月坝夺取地主武装。土大王郎瑞丰见势不妙，不敢迎敌，指挥他的武装逃到山洞里据险抵抗，起义群众放了一把火，把他的房子烧了。队伍仍按原订的占领险要的计划，过河上山占领了栗子寨。在这四十华里的行进中，群众斗志昂扬，沿途集合群众，宣传打倒军阀恶霸，没收地主土地。起义队伍在栗子寨驻扎时，立即组织了守御，北面的主要寨门由青年组成的赤卫队防守，东西两面由两个大队防守。甘禹疏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同时给群众分配没收的财物。几天之后，杨森派了一个团的部队进攻到达栗子寨，这是大家熟知的配备较强的董团。此时，大部分起义时参加而没有枪支的群众，一见军队进攻，在分得了一些财物后，就自行散去；留下守寨抵抗的，只有四五百人了。守主要寨门的赤卫队，是县委派去的一个同志指挥。据守东

西两面的大队，分别由一个姓廖的和李文彬指挥（指挥人员中是否还有毛坪的刘代池，现在记不清楚了）。北面寨门，居高临下，抵抗渡龙河来进攻的敌军，作战是英勇的，曾用土炮打断敌人渡寨前一条支河的浮桥一次。抵抗到第三天，总司令部开会决定转移地方，由甘禹疏和陈光鑫各带一部分队伍，分途撤走。陈光鑫由东路撤走，甘禹疏带领赤卫队由南路上金龙寨高地（海拔一千四百二十八米）向毛坪撤走，约定在合面铺汇合。陈光鑫撤走的路线是由栗子湾抄暨龙河小路到合面铺，途程约八十余华里，比甘禹疏那一支部队到合面铺的途程短，让陈光鑫早一点到达先作布置是好的。甘禹疏在撤退途中因道路不熟掉队，在歧途中遇上团匪，团匪中有人指认甘禹疏，他就被敌人的乱刀砍死了。赤卫队长朱绍元也因夜间不熟路，从山崖上跌下去，幸未重伤，队员们找到他后又才继续前行。赤卫队在撤走途中遇着来支援起义的大刀会“神兵”，相约回头反攻董团军队，正遇董团搜索前进，他们看到反动军队的气势，即行退回。“神兵”服从他们自己的指挥撤走。从金龙寨以来人数已不多的赤卫队员和起义的农协会会员，也走散不少，到合面铺同陈光鑫汇合时，只有五六十人了。

陈光鑫在合面铺集合部队，得到董团向合面铺前进的情况后，开会决定不是本地人参加起义的离开战场，由石柱的福海场转江池去高家镇，派李文彬带十多支枪护送撤离，并要李文彬回县委报告情况，请求援助。余下的人由陈光鑫率领抵抗。董团的军队追到合面铺，陈光鑫率队向福海场方向退走，途中终于被包围。经过最后一场激战后陈光鑫被俘，后送万县为敌人杀害。其余的人或走散或被俘或被杀害，一场起义，暂时就此结束。（下略）。

我所知道的秦伯卿情况

谷志标

1930年底，我们（贺总）部队从洪湖回鹤峰途中，听说秦伯卿、甘占元的部队因与共产党有关系，被四川军阀排挤而被迫来鹤峰。秦伯卿来到鹤峰后，就派人来与贺英联系，说他们是来找贺龙的。当时是贺英去联系的，叫他们的大部队住到五里坪。贺龙的军部驻在走马坪。后来贺龙设宴，在宴会上就把他们逮捕了。然后又把他们杀了。其罪名就是说他们是假共产党，是改组派，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于是就把他们杀了。这实际上是“左”的做法，反正要搞掉人家，就给他们加上个罪名。因当时是执行的“左”倾路线，要消灭异己，这是很自然的。至于杀掉多少，我记不清楚了。士兵们愿意当红军的就留下，不愿的就发银元或大烟遣散回家。我当时在贺龙部队为参谋，知道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中共忠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注：谷志标系红二军团参谋长，现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秦伯卿等人被处决的情况

张明才

秦伯卿的部队到了鹤峰县境后，贺老总的姐姐贺英派来了三个代表，但被甘占元挡住了，甘占元提出要钱要粮，结果贺英派人用马送来了粮、银元、盐巴，但都被甘占元独吞了。后来贺龙又派来了五个代表，却被甘占元杀了两个，其余三个回去了。当天下午贺龙部队就与甘占元部接上了火。红军宣传队喊话要联合打甘占元。秦伯卿的队伍在后面一堵，甘占元的队伍就被打垮了，我们还缴了甘部十多支枪。几个头头到贺总红军总部去后，据说秦伯卿等还当了几天副总指挥。1930年12月底，贺龙红军到我们部队来登记枪码，张范成、袁海清、盛从武等部编到红二军，秦伯卿部的人编到红六军，我被编到十七师四十九团一营当通讯员，营长是石基藻，湖南岳州人。我们编入红军后，就问我们原来部队头头的情况，老红军同志给我们解释说：秦伯卿等是因出面保甘占元而被处决的。说是张范成、袁海清等提出来叫秦伯卿出面说情，请贺龙红军总部不要杀甘占元把他放了。但邓中夏说不能放，主张杀，而且全部杀了。据说当时贺龙有不同意见，说秦伯卿是党员，不要杀他，其他几个也不要杀，让他们自己出去拉队伍，今后还会有用的，只同意杀甘占元一人。但邓中夏坚持全部杀了。据说秦伯卿被杀后，买了一个财主的棺材把他埋在走马坪附近。

我个人看法，秦伯卿是应该平反的，秦伯卿不应该出面保甘占元，但也不应该把他枪毙了，应该把秦伯卿与甘占元区别开来。

(中共志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回忆大塔农民暴动

曾特生

1929年6月，郑佑之回大塔传达二五减租会议（荣县、威远、宜宾、高县、南溪五县总动员），开了一个临时会议，责成加速农协组织发展工作，做好二五减租准备。具体措施俟上级党委指示按决定布置进行。参加此次会议的有邹云芳、杨淑修、余宏文、傅谦谟、叶甸夫、戴仁章、曾特生、张海云、刘心太、石明等。郑佑之指定邹云芳代理县书（常委），余宏文常委兼秘书，傅谦谟（执委）长住机关，曾特生任执委领导花古场、马场农协组织。郑佑之又去找江绍辅谈了一席话，并叫余宏文去领取了五六两月的经费，住了三月他便离开了。

郑佑之的传达报告贯彻到基层后，大塔张海云与其兄张海青及刘心太在农协中大肆鼓动，夸大自己力量，把郑佑之传达精神扩大化，提出减租减息非达到三成不可。激发了群众革命的热情，提出不给地主送租谷，如送租地主必须付出工资；地主私枪、民团和驻军枪弹一律缴农民协会，得到群众一致拥护。他们未向组织请示，于8月29日（旧历七月二十五日）（暴动时间原计划是在9月3日，即旧历八月初一始）发动群众提枪、挑运地主黄谷。刘心太下令“抗拒者捕杀，烧毁其房屋。”各路口戒严，断绝交通。当他报告时，瓦房子地主张子安的房子已经燃起来了。地主开枪打伤农民一人更激起了群众愤恨。这时邹云芳去宜宾未

回，机关内仅有余宏文、傅谦谟、戴仁章和我在铁炉湾。特委指示和布置尚未下达县委，张海云、刘心太一定要坚持干下去，并称他们已在桐子林设立了大本营，将红布做了一面大旗子，集中了很多群众在那里等候，请县委赶快派人前去指挥。余宏文当即批评了他们这样干，当即到桐子林查看，确有几百群众携着刀、矛、枪、械在那里，各路口派赤卫队把守，形势颇为紧张。这时，大塔境内地主们都逃跑到大塔场上去了，场内有驻军一连。在余宏文的号召下便组织力量，余宏文任总指挥，石明担负筹集粮秣，张海云、刘心太领导武装群众，傅谦谟和我设立临时指挥部。这时江绍辅（原县委委员，地下武装负责人之一）叫樊振声（党员）来通知我们下坟去，他有要话相叙。余宏文叫我与刘心太同去在斑竹园会见，相距桐子林约两华里，并有农民群众武装十余人一路。到时樊振声说他是江绍辅叫他来的，叫我们不要盲动、急躁，应该估计自己的力量，这样行动是不对的。如能赶快平息下去尚可挽回，如果造成武装冲突，难免不会流血死人的，哪个负责。他主张稍缓一步从长计议，并问武装暴动是谁主张的。我说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现在局势我们掌握不住，他们态度很坚决，非达到目的不可。樊振声问：“群众要求的目的是什么？”我便根据群众意见提出：（一）租减三成，一粒不少；（二）佃户不给老板送租，如要佃户送租必须付给工资；（三）地主所有枪械、民团枪械、驻军枪械全部交农民协会。他听了后对一二个问题认为不大，对第三个问题便说这个恐怕做不到，我回去找江绍辅商量。群众听了便怒吼起来：“做不到算了，有啥商量！”一时枪炮乱响，吼声四起，漫无秩序地就向大塔包围上去。逼近场口，即有驻军代表出面要求稍退半里，承认缴枪。于是群众遭骗，认为军团力量不大。刚向后移动，军团队伍

即开枪射击。群众仓皇失措，四散溃逃，地主们得势，便随后追击，当即打死群众八人（凶手张平安），打伤一人。我同余宏文、戴仁章、石明等在马场赤卫队的掩护下，退走马场方向，傅谦谟绕道回家去了。刘心太、张海云退走李场牛青山方向。八月初，邹云芳到达花鼎坳（高石梯）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与会者有：余宏文、傅谦谟、戴仁章、石明和我。在会上决定由邹云芳、戴仁章负责将县委机关迁移宜宾城内。余宏文到观音乡，石明到泥溪，留傅谦谟和我在大塔农村观察动向，等候指示恢复农协工作。

（中共宜宾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回忆彭水武装起义

邹 隐 樵

1930年3月11日彭水事变，当时我的公开名义是二十二军五师一团一营副营长，驻扎彭水，担任城防任务。实际上是五师中共军支书记，负责全师组织工作。

彭水位于四川东南方，接湘、鄂、黔三省边区，属于乌江流域下游。大山重叠，地形复杂，退可以守，进可以向长江发展。彭水土匪猖獗，如徐子和、王作之、傅天华等匪徒，各有人枪数百或一千。各乡恶霸盘据一隅，相互械斗，地方秩序极端混乱。加之二十二军五师师长向时俊是一个军阀，在酉、秀、黔、彭几县扩充武力，大肆括削民财。

1929年冬，向时俊部开进黔江、彭水驻防。黔江住一团，由寇逸群任团长，吴敌为中校团附。吴敌是中共党员，军支成员之一。我是第一团副营长，住彭水县城内，担任城防任务。我是党的军支书记。团长王道周、营长何翼如和我都有关系，事变前他们都知道我是中共党员，整个师有党员十余人。

彭水武装起义前，军支方面派吴敌，彭水党组织派冉隆华、霍恂先后分别去重庆向省委汇报请示。省军委书记李鸣珂指示：“要‘军支’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配合行动；发动后要以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为根据地；如有可能时向丰都、涪陵、石柱沿长江发展，与四川二路红军游击队会合；要组织行动委员会，统一

指挥”。吴、霍、冉先后分别返回彭水后，即召开联席会议，传达了省委的指示。会议决定：军队方面由“军支”负责；地方武装由彭水地方党负责；匪运工作由向希平负责，特别注重策动王作之、周宣的工作，要抓紧抓稳。至于起义时间，要看整个准备情况如何再作决定。

1929年底，李公藩（又名李介，黄埔军校四期学生）受汪精卫的派遣来到彭水，任向时俊部队参谋长。他到彭水，四处侦察，得知向希平在彭水活动，就特别注意向的行动。李公藩到彭水不久，就用向师的名义发出清党布告，内容是：“酉、秀、黔、彭各县有共产党分子潜匿活动”，要“各界人士严加防范，如有知情不报者，要以通共论处，如误入歧途者，来部登记自首，免于追究”。为了清除李公藩这一最大障碍，党组织开会决定：叫王作之趁李公藩看剧时将 he 处决，王借故搪塞未实行。王作之的两面行为没有引起党组织的注意。

1930年3月1日，王作之把队伍带进了县城。是日7时左右，“军支”和地方党组织在县城召开了联席会议，开始提出利用向时俊检阅部队的机会，开始行动。还没有研究具体时间及一切事宜，王作之神态不安，提出武器、粮食等补给问题，大意是说困难重重，不愿起义，使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我和吴敌、胡文灿三人借故有事，先离开会场。霍恂发觉王作之不可靠，就采取应付态度，会议就不欢而散了。当晚约10点钟左右，我与霍恂等人又集中在城南小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王作之的动摇情况，提出如何处理。大家决定，为今之计，要向希平去做王作之的安抚工作，叫他把部队带回万足乡，免得夜长梦多，妨碍起义计划。

次日是星期日，早晨，王作之去师部给向时俊告密，将昨晚

开会情况，全盘托出。向时俊听后仓皇失措，一面派人捉我，一面要王作之捕杀霍恂等人。这时，王作之即去高校向霍恂说：

“昨晚所说的事，完全照办，须得详商具体”，并请霍恂、向希平、孙瑞华、刘伯容等人到童家院子他的住地吃早饭，便于研究。霍恂等人信以为真，随同到了童家院子，当霍恂等走到院内，敌之手枪队当即将向希平、孙瑞华打死。霍恂身负一弹，未中要害，奋力冲出，跑回学校。敌人跟血迹追踪，追到学校，当场把霍恂枪杀于校内。刘伯容是学校校长，有校务理料未去，得免于难。这次起义由于王作之叛变告密，未能成功，“军支”和彭水地方党组织都受到了损失。

（中共彭水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四川第二路红军游击队始末

石大城

1930年4月6日（农历三月八日）在涪陵县罗云乡起义的四川第二路红军游击队，曾经转战于涪陵、丰都、石柱三县的山区地带，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使反动军阀和地主豪绅闻风丧胆。这一轰轰烈烈的农民和士兵的联合起义，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和涪陵县委的策动下，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的。

当时省委根据全国和四川的形势，计划以涪陵罗云乡农协会所领导的农民群众为第二路红军游击队的基础，以涪陵、丰都、石柱、忠县四县山区为第二路红军游击队的游击区域。省委特派军委书记李鸣珂来涪与县委和郭汝栋军部的党支部接头，组织这次起义的工作。

在1930年的2、3月份，涪陵郭汝栋军部奉蒋介石电令，要调往鄂东剿“匪”（红军），大部分官佐士兵均不愿前往，军部内情况相当混乱。这时，罗云乡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原来计划策动郭部第一师朱团参加起义，然后将第一师的另外两团人缴枪后开往罗云乡。后未能实现，仅有朱团的三营一连连长赵启民率全连武装在农历三月初，借打野外为名，开到罗云乡与农民群众会合。在4月6日那天，涪陵罗云乡正式揭出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的旗帜，当推尹颢阳、刘伏洋为正副司

令，赵启民为总指挥，苟良歌为党代表，起义时全部武装农民和武装士兵一连，共计三百余人。

起义后，罗云乡四周的地主武装和涪陵驻军节节进逼，而彭水方面约定来会师的农民武装又久待不至，队伍只好离开罗云乡，向丰都边境进军，打算在丰都、石柱的山区地带，开展游击活动，建立革命根据地。

那时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目标是丰都的栗子、茶元等山区。部队转移途中曾多次击退地主武装和土匪队伍的进攻与阻击，在农历四月中旬，胜利地到达丰都栗子湾一带，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整编以后，参加游击队的士兵、农民和青年学生达七百余，人数比起义之初增加了一倍多。

二路红军游击队在丰都的回龙场、太平坝、坝周坝、双龙场、廖家坝等乡，先后组织乡苏维埃政府，并成立地方赤卫队，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因而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不少农民要求参加起义军，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

1930年夏初，游击队的势力已到达石柱境内。在这年的夏天，游击队经廖家坝，沿大山梁子向石柱鱼池方向进军。一天早晨大雾迷漫，游击队与鱼池坝的地主武装及八德会等反动组织的武装，在浓雾中发生遭遇战。敌人先盘据着高地，居高临下，向不熟路径不明方向的游击队合击。这一战部队受到很大损失；不仅伤亡大，而且子弹几乎消耗殆尽。突围出来后，在茶店山中休整，已不能再战。部队一面派人到梁山县与三路游击队司令李光华联系，请其支援；一面向上级党委汇报情况，并请示办法。后待上级党委指示，始离开茶店山向丰都退走，经洋渡溪到达蒲家场，将枪弹交予该场的陈大队长接收，部队遣散，人员分散隐

蔽，军中负责的同志们均转入别的地区活动。于是四川第二路游击队遂暂告结束，停止了活动。

(中共涪陵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吉祥寺的枪声

蒲善全

吉祥寺暴动准备得很久，有十七个匪棚子要在那里集中。当时射洪县委赵瑜东负责，赵瑜东又名赵水牛。

1929年，在遂宁的李树骅部队，叫八县联防指挥部设在遂宁城隍庙内。我在南部住不下去了，打算到遂宁去考学校。我到遂宁后，找李载浦接头。李载浦当时在李树骅的八县联防指挥部当秘书，我到他那里，见到李鸣珂也来检查工作。李鸣珂与我相熟，他告诉我通缉我们的是二十九军，遂宁也是二十九军防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还是到潼川(三台)为好。潼川是组织上的重点，要集中一些力量到那里去。于是我和王井锐一起到了潼川。旷继勋部暴动的工作，也是李鸣珂布置的，打算继旷部兵变后，李树骅部也接着暴动，使兵运工作有连续性的发展。

当时为了做李树骅的工作，派李伯庸、王治国、程俊夫、李载浦、赵子文、雍平垓和张佑民去遂宁，这些都是南部的党员。在旷继勋兵变后，我们党组织已发现李树骅部队中有的人对兵变已有动摇，就决定处决这批动摇的人。在一次处治动摇分子中，由于在城里打枪，空气紧张起来，李家钰警觉了，就盘问李树骅是否是共产党？李树骅不承认，李家钰说你不是共产党，就要拿出表现来，叫李树骅大清乡，清查共产党。李树骅为了保存自己，便带了队伍到吉祥寺，下了个大包围。李载浦，程俊夫、赵

子文都在吉祥寺开会，听见十几处有枪声，知道有情况，便把枪丢了。搜查的人进来抓住他们，李载浦说他们都是李树骅的人。当时李载浦想，如叫李树骅来认，他要不帮助开脱的话，就把他也喊响，要牺牲大家都牺牲。李树骅怕把他咬出来，又想到这几个人都是李鸣珂的人，李树骅三番五次要求入党，还是李鸣珂接受他入党的。便说：这几个人是好人，与共产党无关，就把他们放走了。但是吴而笃等人，李树骅说声不认识，当场就打死了。

(中共遂宁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回忆梁（山）达（县）边境 三次武装斗争（节录）

李 维

（上略）

二、虎、南、龙、太武装起义

中共四川省委对梁山地区的工作很重视，1929年春天派覃文来梁山，并到虎、南地区协助和领导工作。不久又派省委秘书长周元山（即周进贤）来梁山巡视工作。除指导工作外，并开办党员临时训练班，给部分支委以上干部讲解中国革命任务、性质和动力等根本问题。

1930年上半年，虎、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高涨。1930年1月26日（旧历腊月二十七日），县委派杨勃（湖南人）、张野南（涪陵人）将虎城大土豪石文蛟枪杀于虎城街上文昌宫内。石死后，土豪石玉楼借口为其报仇，于2月19日将大队长石轻尘扣留，施以残酷的刑罚，要他供出组织。石毫不动摇，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次日石玉楼将石轻尘枪杀于虎城赛西门外牛爷殿旁。……

当时达县地区的苛捐杂税特别厉害，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反对苛捐杂税。党及时发动和领导了这一斗争，组织了“南岳人民抗捐大同盟”，开展了斗争，使该乡的苛捐杂税暂时比以前有了一些缓和。

旧历六月下旬的一天，蔡奎、金治平带了几十个人去向家祖、赵家沟开会，走到施家河，和刘存厚军队徐营的人相遇打了起来。打了约一小时，由于敌军强大，蔡奎等遂败退到离施家河数里远的联陞寨内。敌人把附近的房子烧了，跟即调集重兵，把寨子团团围住。为了解联陞寨之围，党急把已去太平乡工作的李云程、杨勃二人调回虎城指挥。他们回到虎城察看了地形，召开了会议，次日下午后太阳落坡时，集合了步枪一百零五支，战刀三十多把，手枪十多支，向敌人进攻。并发动附近农民（不分男女老幼）集合在联陞寨附近各个山头，虚张声势呐喊助威……这时各个山头号声四起，枪声不绝，敌人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仓皇逃到大树坝去了。

联陞寨解围后，次日休息了一天。这天的后半夜（即7月28日凌晨），集中虎、南武装五六千人，枪支三百左右（其中步枪二百多支，手枪一个分队），又投入游击活动……

7月29日晨，龙、太^①的游击队开到忠县黄敏坝。当晚召开大会，根据省委指示，正式宣布龙、太游击队和虎南游击队合并成立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由李光华任总指挥，王维舟任副总指挥，覃文任政治部主任，王炎离任副主任。下分三个大队……

党的组织是前敌委员会，由牛大鸣、覃文负主要责任，王炎离、蔡奎、李维参加前委。

队伍在黄金坝住了一晚，次日便开到花桥寺。……在花桥寺对队伍进行了初步整顿，……按照既定计划，从花桥寺出发，经过马家场、三汇场、九亭、雨济滩等地，从石宝寨渡过长江。在离九亭五里的黄泥垭，有几百团练在那里集合起来拦阻去路。由二大队的一个中队打前哨，十几支号吹号冲锋，部队先未打枪只管

^① 即梁平县新屋龙沙（今名方龙）、太平两个乡。

前进，仅打了十几分钟，敌人吓跑了。……从石宝寨过河便是西界沱，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晚。原第二路红军游击队的干部赵启明等来参加，还有秦伯卿率领一部分人也来参加。……秦参加后任副总指挥。次日经过楠木垭，上山十五里，便到了石柱的地界，在西罗坪驻营了。后因军阀陈兰亭派军队追击，经过激战起义军败退，领导人李光华等被俘杀，遂遭到失败。

三、虎、南、大（树坝）赤区的再建及其失败

第三路游击队在石柱失败后，省委决定于1931年成立了梁山（山）达（县）中心县委，管辖开江、宣汉、万源、大竹等县，先后派曾莱、张云禄、杨克明、易辛谷、王希伯、杨锡蓉、盛一平等十多位同志前来负责。……1931年秋，省委曾派程子健前往该地巡视，对该地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在这个区域成立了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大约有一百多人，其中包括广福场的一部分人，枪支也有几十支，以手枪为主。活动区域主要是在虎、南地区，有时也去大树、黄都、万家坝（均属达县）等处活动。游击队平时采取分散活动，遇有敌人来时就集中上山。东西山百里槽一带，两边是高山，中间是峡谷，最便于隐蔽。他们先后在孔家沟、刘家大营、豆子沟等地住过。游击队有时进行武装宣传，如在街上和乡下要道、隘口处贴标语，到一些地方召开群众大会作讲演等。有时打土豪，实行破仓分粮。

领导上对外部敌人是有高度警惕的，但对内部暗藏的异己分子和敌人，则警惕不高。后来这支游击队的失败，主要失败于内部叛徒的出卖和暗害。叛徒金长毛等先后将王希伯、曾莱、蔡奎等领导人害死，队伍打散，游击队再次遭到失败。

四、黄（都）、大（树坝）、万（家坝）赤区的建立及其失败

1932年，由虎、南、大地区所建立的这支游击队，从领导人张

云禄、蔡奎牺牲后，没有继续再干。但黄都、大树坝、万家坝又搞起来了。早在1927年、1928年，黄、大、万地区就开始建立党组织，当时属达县管，和虎、南区党组织没有联系。最先在黄都开始活动的是当地人唐伯壮、唐仲明 弟兄 等人。……他们在这里教书，开始在学生中建立了儿童团、少先队、共青团等组织。当时共青团员发展十儿人。……1930年冬，刘传喜、严代明、谭吉晋、冷大成等在这一带活动。1931年10月份开始发展妇女组织，先用“姊妹会”的名义发展，由罗廷英等负责。1932年，大树一带的群众组织普遍地发展起来，成立有区农会……1931年以后，这一带地区邇属梁、达中心县委领导，达县建立了特支，黄、大、万区主要由钟久（又叫温都）负责。

黄、大、万地区党组织，也曾遭到敌人的破坏。如1932年8月15日（旧历七月十四日）晚，由于蒋开富等叛徒带领刘存厚的军队到大树塔水桥谭真祥家打死钟久，抓走严代明，于同月21日，在麻柳场被枪杀。

1933年9月红四方面军攻下达县城，并向东打到大石桥，离大树只有七十里路。黄、大、万区这时派人去和红军接上了头，准备积极响应。当时决定成立川东敌后游击独立师，由谭吉晋任司令员，张胡子任政治委员，冷大成搞政治工作。下分三个大队……大约人枪有二百左右，其中黄都有四十儿人，妇女还编了一个队。这时刘存厚在大树的部队也调走了，形势很好。临近冬天，穷人没有吃的，遂发动破仓分粮，如发动农民去大树坝恶霸杨海山、任天光等家挑谷子。在这期间，游击队还打了黄都和大树两个乡公所，得了八十多支枪，并把黄都的乡长马金阶、大树乡长兼大队长胡致平打死了，还打死大树保长蒋铁嘴等。不久红军退了，敌人反攻，二十军王陵基的部队梁营开到了大树，配

合开江孙昌国所带领的模范大队等部队，对游击队进行“清剿”，谭吉晋等被俘杀，游击队遭到失败。

(中共达县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参加江津“九三”兵变的经过

苏爱吾

我是1930年8月27日奉省委命令同于渊（号邦齐，原二十军杨森部旅长，万县“九五”惨案就是他指挥炮击英国兵舰“嘉禾号”的）、徐幼平（现名徐庆坚）一道赴江津。当时省行委决定起义后，由于渊任红军军长，我作党代表。29日到达江津，我们住在贺竞华的家里，因贺家开药铺，离县政府不远。当晚在江津德感坝一位同志家中开了一次联席会议，有县委和暂编第一师第二混成旅党的负责人李德孚等人参加（李后来叛变），决定9月5日暴动。

当时的背景是：第一，党中央在“立三路线”统治下，到处搞暴动和兵变。在四川当时就有广汉兵变、遂蓬兵变以及川东宣达城万一带的兵变和暴动。第二，省行委执行“立三路线”，决定在合川、江津同时举行兵变，成功从嘉陵江、长江上游直逼重庆；夺取重庆后，即从长江上游与湖北鄂西特委联合进攻武汉。我就是奉命和于渊赴江津领导兵变的。

二十四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张清平（共产党员）不赞成起义，所以就利用他在成都的机会，发动兵变。1928年我任川东特委书记时，他驻防重庆，归我直接领导，所以我了解他。

29日晚在德感坝联席会议上原决定9月5日行动，后来泄漏了消息，敌人已经知道，并有所准备了。（一）到了傍晚就收缴

士兵的枪支，集中在一间屋里锁起来，并派可靠的警卫看守；（二）晚上点名以后，将士兵的衣服裤子也集中起来保管。风云突变，空气紧张，我们又在曹泽芝（一位女同志，是武汉军分校毕业的）家中，开了一次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改在9月3日行动。是日下午，该军一个机枪连在城外操场下操，为了示范带了两挺重机枪去，后来发现其中一挺没有撞针。傍晚，将要收操进城的时候，师党组织的负责人李德孚同该连党组织的同志们照事先的约定，夺取了两挺机枪，用几人抬在肩上乒乒乓乓打进城。驻在城内的其他同志，也闻声出来响应，有的有枪（即连长是党员的），有的没枪，就这样一直攻到县政府。县政府门外早已置有沙包，凭此顽抗，攻了一夜也未攻下。次日天尚未明，驻扎在城外的部队就攻进城来了，我们受到两面夹击，兵变宣告失败。

当天上午，我们又回到贺家，当军队来查户口时，主人说我们是他的亲戚客人。于邦齐个子特高，目标显著，又怕碰见熟人，所以就搭船回重庆去了。我又住了两天，张清平从成都赶回来了。驻军逮捕和杀害了许多人，最残酷的是还将一位同志头上钉蜡烛点天灯祭了灵。我们派了几位营连干部出城去收容部队，我则回到省行委去汇报工作，并请示善后。省行委研究后又加派帅朝吟（他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和我一道，以重庆《新蜀报》记者的名义，又重返江津。一面沿途收容溃散出来的队伍，并介绍到有关各处安置工作。我们回到江津时，张清平正派队伍围剿溃散出去的部队。我们派出去收容败退队伍的最后目的是向湘鄂西去，和贺龙同志领导的红军会合，以保存实力。但是，我们到了一个集镇，想了许多办法就是进不去，敌人在沿途封锁盘查极严，只好返回重庆向省行委汇报。

（中共江津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关于“九三”兵变的点滴情况

张志和

1929年我的师部移住江津县城后，鸣珂同志派李崇实来江津任交通员，我把他安置在师部军需处当录事……在处办江津兵变人员那天，是旅参谋长兼江津县知事刘中生执行。我怕他们多杀人，就在大堂后面一旁监审。我忽听到有人在喊：师长！我是李崇实呵！我是江国勋呵！我一看是李、江二人，就叫人通知刘中生，说我要把李、江二人带到师部去问，刘同意了。我把他二人带回师部，跟着就把李、江二人释放了。因为我知道李、江二人是党员，我既没有审问过他们，他们二人也没有写过什么悔过书。

(摘自中共南部县委统战部所藏李崇实档案中张志和写的材料，中共江津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我所了解的“九三”兵变

洪沛然

张志和的部队中有党的军支领导，他本人是共产党员，是军支委员。1930年发动兵变，党组织趁他到外（成都）开会的时候搞起来了。

江津驻军是张志和混成旅。我在混成旅当教官时，发展张志和入党（1927年在邛崃）。现在看来，张因地位高了，考虑问题总是求稳，怕搞不好影响自己的实力。所以对搞兵变，他一直不怎么同意，想走和平道路，再发展力量，然后再搞。我们说在和平环境中发展力量靠不住，他不同意。当时，第一师由刘自乾（文辉，二十四军军长）兼师长，张任第一副师长，实际是张管事。刘听了小报告，对张有所怀疑，但因张能干，还常常给他出谋划策，所以又很倚重他。因为张不赞成搞兵变，说冒险，力量不够，搞了也失败，军支便利用他应刘自乾召去成都开会之际，发动了兵变。由于兵变是“左”倾错误指导，兵变一发生，就被镇压下去了，抓了一百多人。团长们立即发电报叫张回江津。刘自乾接到电报，告诉他：“你的部队造反了！”张因军支事先没有通知他，很不满意。回江津后，团长们又包围了他，非要处理参加兵变的不可。张答应了，让把参加兵变的名单列出来。

在被捕的人当中，有两个党员，一个是师部会议室的江国勋，一个是搞译电工作的。这两个人听到要处决的消息，便托一

个副官去找谷醒华（谷后来作过江津县县长）。这个人比较正直，跟张的友谊很深，他答应说情。没想到第二天开审很早，念一个名字绑一个，绑了二十三个。那个副官又去找谷，谷立即写了个条子，要求张从宽处理这两个人。当念到这两个人时，江国勋大叫：“师长，我冤枉呵！”张因见了谷的条子，命令把两个放到一边，后来释放了，其余许多人被杀了，还有一些人投了监狱。这件事发生后，省行委总结了经验，错误认为主要是领导人思想右倾动摇，便开除了张志和的党籍。当时，中央出了个刊物叫《布尔什维克》，记得在其中一篇文章中，还提到这件事。

当时的领导人，有苏爱吾（前委书记）、于渊，起义失败后他们都离开了江津。

（中共江津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重庆博物馆罗人庆整理）

铜梁土桥武装起义情况的回忆

彭如春

共产党的组织在土桥活动的情况，我知道有个雷汝维，他是土桥乡二村徐家湾的人，是黄埔军校学生，参加过广州起义，负过伤。1929年秋他回到铜梁，在王氏达立校教书，通过任教发展了我大哥彭东山入党。彭入党后又介绍我和谢炳清等人入党。南郭冷氏萃英校的周述良（潼南人、共产党员）老师是我们的上级，土桥区委的负责人。我和周去养正校开过多次会，听他说县委机关就在养正校。由于经常开会，所以我认识赖鸣柯、冉欣向、江正隆等人。有一次我同周述良去养正校开会，冉欣向宣布我负责土桥支部工作。这时在土桥场先后发展了党员十多人。

土桥武装暴动前，我们在土桥中心校办了平民夜校，以修铜（梁）、大（足）公路的筑路工人和附近参加平民夜校的农民为基础，通过平民夜校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组织革命力量。

土桥武装暴动是民国19年旧历八月十一日（公历10月2日）。原定是旧历八月十五日。因驻斑竹场的起义山防大队第八中队第二分队长黄明渊率队提前拉出去，起义就提前在旧历八月十一日干开了。在暴动前夕，组织开过多次会议，主要是作好准备工作，谁负责什么工作，均作了具体部署。是日晨，党组织通知我参加暴动，当我走向指挥部的途中，见山防大队第八中队二分队长黄明渊率队打着四川省工农红军第七路川东游击纵队指挥部的义

旗。我赶到黄部时，黄叫我把红布带发给参加起义的每个人，拴在左臂上作标志。黄部向土桥挺进时，碰上土桥团总夏作舟带领团丁出场侦察我军动静，行至蒋家垣花生垌处，黄将团总夏作舟击毙。随即黄部进场攻打了土桥乡公所，赶跑了乡丁，捣毁了钱庄、当铺和税捐分卡。我们在街上张贴了布告、标语，散发了传单。总指挥万平还向群众讲了话。不幸县团练局派兵追来，我们起义队伍退至玉龙场龙神口，万平和黄明渊进行了转移，暴动失败了。我当天和彭海山从合川跑到了邻水。

(中共铜梁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彭代煜整理)

回忆“广汉起义”（节录）

刘连波

（一）

1930年8月，中共四川省委为贯彻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将党、团、工会合并，成立党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加紧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川西行委成立前，我担任共青团川西特委组织部长。川西行委成立后，管组织工作的廖恩波同志对我说，行委学习和讨论了中央决议，决定按照省行委指示，组织发动广汉驻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武装起义。指派我为川西北路巡视员，巡视成都、广汉、什邡、绵竹等县党的工作情况，组织农民武装配合军队起义，动员他们参加红军，以冲淡旧军队中的流氓意识，从组织成份上巩固和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

中秋节前，我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巡视了新都、广汉、什邡、绵竹四县工作。了解到这几个县的党、团员主要是小学教员，少数是中学教师和学生，各县人数不等，多的二十几个，少的不到十人。我在什邡农村一个中学生团员家中，会见过八九个农民，发现组织不够健全，缺乏旺盛的战斗意志。

回到成都，我向廖恩波同志如实汇报，认为地方党组织无法对武装起义作有力的配合，希望行委考虑。但过了不两天，廖恩

波同志告诉我，行委仍然决定发动广汉武装起义，并要我参加。随即召集曹健民（曹获秋）、徐孟超、廖宗泽和我开会。

廖恩波同志在会上说，省行委为了执行中央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原定在川东组织合川、江津两处武装起义攻占重庆，在川西发动新津、广汉两处武装起义攻占成都。现江津起义失败，合川起义未实现，川西担子更重了。徐孟超原来领导党的广汉军支，他说，士兵群众精神振奋，希望大干，不要小干，早已作好思想准备，迎接起义这一天的到来。自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赴成都参加“双十节”阅兵后，就有消息说，刘文辉、田颂尧、向传义等几个地方军队长住成都的头子曾迫使他们的军长邓锡侯解散或改编这个部队……廖恩波认为，发动广汉武装起义是党的重大决策，必须加紧准备，坚决执行。目前，士兵群众起义的条件早已成熟，若再延误时机，被敌人先下手，革命力量就将遭受严重损失。同时考虑到江津起义失败和农民武装不强的情况，将原定攻占成都的计划，改为起义后在绵竹西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并宣布了前委组成人选及起义后红军的编制和主要领导人名单。

一、前委由刘达（刘连波）、曹健民（曹获秋）、徐孟超、廖宗泽四人组成。

二、起义后，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一路，路司令员徐孟超，政治委员刘达，参谋长雷润侯，副官长薛彦夫，政治部主任刘达（兼），秘书长刘元海（刘铁夫），直属警卫大队长罗南辉。

三、路以下设第一、第二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徐孟超（兼），政治委员廖宗泽。第二纵队司令员易心固，政治委员曹健民。

四、纵队以下设大队，大队下设支队，大队以下军事负责人，由徐孟超在士兵中提名，前委决定。

至于前委书记，廖恩波同志说，随即派来，决定后就通知我们，我们几个人当即根据会议决定，去到广汉，加紧工作。

(二)

川西行委、军委认为，江津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起义的行动计划只规定营地党小组的任务，但党小组长没有明确每个同志的具体任务，因而有的小组在得到起义的信号的一瞬间，行动稍有观望，即被敌人发觉，动不起来。二是在情况发生意外变化时，指挥部与有些基层党组织失去联系。这样，虽有少数部队起义成功，可是在敌人猖狂反扑下，孤军奋战，终遭失败。为此，前委一致认为，起义行动计划的好坏，是决定起义成败的关键。这个观点得到川西行委的赞同，所以，在起义准备期间，前委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这个问题上。

前委根据广汉部队的战斗力强于附近各县国民党军队这一特点，决定起义后，首先攻占绵竹县城，取得初战胜利，以扩大红军声威，巩固提高士兵群众的革命热情和胜利信心，并尽可能解决部队的供给问题。同时，根据当时“立三路线”要兵不要官的错误政策，川西行委决定，有关起义的消息，均不通知原在部队中担任军官职务的党员，起义成功后，这些党员也同其他军官一样遣送离队。

前委对起义作了如下分工：（1）在书记未到之前，由政治委员刘达同志负总责。（2）徐孟超继续领导军支，负责在军队中组织实施起义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廖宗泽、易心固协助。曹健民同志负责联系地方组织（行委决定，部队所到之处，地方党

组织即由前委领导），利用广汉中学教员身份和家住成都的条件，负责前委和川西行委之间的联系。

经过十天左右的紧张准备，廖宗泽、易心固和我，分别会见了部分党员士兵骨干，他们确实态度坚决，热情高涨，工作积极，给我以很大的鼓舞。曹健民同志负责布置地方的工作：由小学女教员中的党员、团员连夜赶制红军旗帜；由地方党组织的同志开出土豪劣绅名单及其应交的赎罪金；给红军派出向导人员等。陆续准备妥当。对地方农民武装也作了布置。行委廖恩波和行委军委书记周国淦，先后来广汉进行检查，最后行委批准按照预定计划，于10月25日（星期六）晚间，举行起义。

起义这天下午，行委派刘元海、吴健庄等二十余人来到广汉，担任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入夜，前委四个同志分两组隐蔽下来，大家既兴奋又紧张地期待着起义的钟声。

（三）

国民党旧军队每逢星期六这天，军官们一般都去吃、喝、嫖、赌，少数不嫖不赌的，也忙于个人私事。晚上，各团、营、连只留值星官一人。营地内戒备也比较涣散松懈。10月25日是星期六，晚上11时，全城的电灯熄灭了，广汉中学的钟声由革命学生敲响了。象征着旧军队灭亡，新红军诞生的起义信号发出了。我们前委的同志立即从隐蔽点转入事先选择好的指挥点。随着稀疏的枪声，各主力营地顺利地实现了起义计划，许多党小组长亲自率领通讯员前来报喜，请求分配新的战斗任务。我们当即指示他们派出得力连队，就近支援党组织力量薄弱的营地。经过几个小时，除手枪连外，其他各营地都胜利实现起义。革命力量迅速控制了全城。这时司令部进驻电灯公司，由罗南辉同志率步兵一营

担任警卫。广汉驻军手枪连的连长是该部旅长陈离的心腹，士兵多属他的同乡（安岳人），驻在一个庙里，背靠城墙，负隅顽抗。经包围喊话无效，乃于拂晓时发起总攻，他们随即越城逃散。

广汉驻军有两个团，加上直属部队，共二十几个连队，计人枪两千余。三分之二的连队有党的组织，内中有八九个连队的党组织很强。起义后，按预定计划派参谋长雷润侯率武装一营向成都方面警戒。26日上午，按计划从革命力量较强的各营抽出一些力量，与革命力量薄弱的营同等数量连队掉换，以加强党在这些营中的领导作用；由地方党派出同志，引导、协助红军按名单逮捕土豪劣绅，催缴赎金，打开监狱，释放在押人犯；由军队、地方党组织分别派出宣传队，上街宣传。

在胜利的凯歌声中，所有同志都在忘我地工作。这时原任该部参谋长刘的均走出来向徐孟超要求参加红军。徐认为，我们的军事干部太少，刘的均又是我党党员，主张把他留下协助工作。前委各个同志都表示同意，但没有明确他的职务。

另有一个党员排长（姓名忘记了），并未参加起义准备工作，但在起义信号发出时，他乘机宣布起义，夺得了该营领导权。我们感到党在该营力量很弱，任命他为大队长。但这个人在我们向土豪劣绅家属催缴赎金过程中，率领十多个持枪的战士，来到司令部为某个豪绅说情，遭到我的拒绝。他表示不满，悻悻而去。我速即将这件事通知前委各委员。

下午四时，全部起义部队集中在广汉公园开大会。由雷润侯同志率部在城外警戒。曹健民同志代表前委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一路军，下设两个纵队，纵队下设大队，大队下设支队，任命了路司令员、政治委员等，纵队司令员、政治委

员等。这些同志逐一走到台前同革命士兵见面。我们几个从外面派去的同志，原先与部队没有联系，当时还穿着长衫。这时，在部队里面暗中活动的反动势力，鼓动群众要求刘的均出面指挥，会场有些嘈杂。前委当即决定宣布刘的均为总指挥，借以稳定军心。会后，部队向绵竹方向进发，当晚宿高骈镇。

27日晨，部队继续向绵竹方向前进，后卫部队全无消息（雷润侯同志从此不知下落，可能牺牲了）。这时，我们纵队以上领导人都换上军装，但行军途中，仍有些破坏领导威信流言。前委针对这个情况，联系到刘的均的突然出现，那个由排长提升的大队长的表现，认为起义部队有反革命复辟危险，决定进行肃反，秘密通知各大队党的负责人，提出肃反对象名单。

第二纵队司令员易心固同志，曾参加过刘伯承同志领导的泸州起义，在旧军队中历任排长、连、营长，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我们同刘的均商定，任命易心固为进攻绵竹县城的指挥员，请刘的均亲往前线督战。战斗在27日夜间开始。前委趁刘的均前往前线督战之机，立即在新市镇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徐孟超、曹健民和我，以及各大队党员负责人（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廖宗泽，黄埔四期学生，曾参加旷继勋同志所部起义，这时在前线指挥一纵，没有参加）。我讲了红军面临的危险，前委决心肃反。会议审定了肃反名单（其中包括刘的均和那个由排长提升的大队长等），决定攻克绵竹县城后，立即执行。

这次会开得不长，我们跟即赶赴前线与刘的均会合。这时已过午夜，易心固同志派通讯员前来报告，攻城受阻，正当调集主力集中突破时，那个由排长提升的大队长，擅自率部撤离阵地，波及全线，制止无效，请示办法。我们被迫改变攻城计划，下令后撤，到遵道场集中待命。曹健民同志因患高度近视，深夜

赶回部队，正值撤退，从此失去联系。

部队因仓促后撤，队列混乱，不少战士掉队，到遵道场已近28日黎明。部队就地休息。司令部召集纵队负责同志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计划。有人提出彭县海窝子铜矿有矿工，地形也好，建议部队撤向那里。天明后一个主力大队和那个排长带领的大队开往海窝子，大部队仍向汉旺场前进，后来向海窝子撤退的两个大队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部队越来越加分散，在赴汉旺场途中，反动地主武装团队不时从大路两侧偷放冷枪。刘的均乘机夸大敌情，独断专行，不断发出各种命令，无视前委领导。到汉旺场后，一面竟自出面与袍哥、地主、恶霸勾结，乞求援助，并要我们作同样妥协；一面纵容、指使部队中的反动势力蒙蔽部分落后群众在军内制造摩擦。忠诚勇敢的士兵党员骨干感到控制不住局势，建议我们迅速离开部队。前委徐孟超、廖宗泽和我，召集易心固、罗南辉及部分大队党员负责人开会，决定：（1）由各党小组长（也是军事负责干部）经手，立即发放本月薪饷，尽可能地把更多的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广汉筹得大洋四千余元）。（2）外来干部一律撤离。由徐孟超、罗南辉掩护，易心固和廖宗泽，我和薛彦夫随即分两路离开汉旺场，分散在各大队的外来干部，也就地自行撤退。

（四）

广汉武装起义，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对社会震动很大。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扑，在广汉、成都等地残酷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把在群众运动中的许多知名活动家和特务告密的人，都列入了黑名单，深夜包围一些学校，集合学生点名捉拿，有的学生在梦中蓦然叫醒，不知缘由，对点名未到的

同学恐受斥责，代为应名，也被抓去。不少人受尽严刑拷打，最后牺牲。反动军阀甚至不择手段，白天在大街上追杀革命群众。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

在严峻的考验下，少数人动摇、退缩，离开了革命阵营。个别向反动派屈膝投降，成为可耻的叛徒。大多数同志坚持革命，继续前进。易心固同志在川东地区开展革命斗争，1932年在达县牺牲，曹健民、罗南辉两同志最后成长为我党的重要骨干。

（下略）

（原载《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期）

对彭山农民运动的回忆

李 蕴 璞

1926年我在成都高师读书，寒假留校，从事革命工作。同学郭家驹是彭山人，回家后来信说彭山公义场农民起来了，有地下党员帅世襄（帅时昌）在那里工作，望省上派人去指导。我向支部汇报，不久支部书记李正恩说川西特委决定派我前去彭山辅导和协助工作，相机扩大农民运动。我去公义场与党员帅世襄接上了头。了解到公义乡有健全的农民协会，其它不少的乡也曾有农会组织，并且知识分子中确有不少的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但还没有党的组织。郭家驹的哥哥郭家驹（郭祝三）是公义乡小学校长，很有威信和组织能力，是原县农民协会的主要干部。农民群众和知识分子因张卓宣惨案怒不可遏，急欲起义抗暴。

1927年2月6日，彭山县农民协会在公义乡召开大会，声讨县长李瑶为军阀卖命，加重粮税，横征暴敛，打死在县政府为民请命、反对征粮过重的张卓宣的滔天罪行。县里许多农民、知识分子齐集公义乡，到会的团体有各乡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新益学会等，共约一千余人。还演出一个活报剧——《枪决李瑶》，群众拍手称快，齐声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枪毙李瑶！”“打倒军阀！”“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现实的阶级斗争教育。此后，参加农民协会的会员日益增多。

这次声讨李璠的群众大会，负责主要组织领导工作的是郭家驹，当然还有其他同志，而他表现的最为突出。不久，我介绍了郭家驹、郭家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公义乡介绍郭氏弟兄入党后，曾秘密开会，传达党的指示：在乡村要发动农民搞武装斗争，反对军阀，反苛捐杂税，反租押和高利贷的剥削，发动农民举行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府”。他们听了大受鼓舞，都说现在彭山这样的大好形势，应效法澎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起来大干，才能打倒军阀、地主和帝国主义。布置以后，我因工作需要又转回成都。接着公义场农民二三百人在郭家驹等领导之下，反对民团大队冬防牛捐，打败了民团，取得了一定胜利。

1928年1月寒假，郭家驹来信说公义场将发动一千多农民群众，准备武器，就要暴动了，希望省上派人前去。我向支部汇报了，经研究后，党组织又派我前去辅导和协助。2月中旬我到公义场，见到了郭家驹、郭家驹、刘单如、高从检、郭少文等，知道彭山已成立县委，负责人是刘单如，公义乡建有支部，郭家驹任支部书记。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千余人反抗二十四军刘文辉强派的七万五千元军饷款，并积极准备土枪、长矛、锄把、扁担和土炮，即将发动暴动。刘单如（仍为公义乡小学教师）负责部署全面工作，组织“抗粮抗捐大同盟”。我们正在筹商如何开展对敌斗争之际，忽闻成都“二一六”惨案发生，我即返回了成都。

我走后，他们仍然坚持斗争，郭家驹不再读书了，与郭家驹等领导彭山农民组织起十个支队，进行了几次暴动，全都失败了，牺牲了同志五人。郭家兄弟曾被二十四军和彭山县政府布告

悬赏捉拿。1930年秋冬，为配合广汉兵变，彭山又一次发动农民暴动，也遭到失败。

(中共彭山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